

王阳明大传

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日〕冈田武彦 著

钱明 审校 杨田 译

上



现在呈现在中文世界读者面前的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可以说是冈田先生晚年花费心血最多的著作，也是他组织和领导王阳明遗迹考察、践行阳明精神的心血结晶。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冈田武彦关门弟子 钱明

阳明学之精神融化于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之行事中，故欲深窥阳明学，必先详知阳明子之生平事迹也。

——阳明精舍舍长 蒋庆

一位世界级阳明学者写给大众的阳明心学普及读本。《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深入浅出地描述了王阳明的传奇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成过程，既通俗易懂，又直达精髓。

——浙江大学求是学者、哲学系主任 董平教授

市面上很多写王阳明的书，绝大部分都是流于平面，缺少立体感。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是一个突破。本书着力于探讨人生经历和师友交往对王阳明思想形成的重大影响。

——浙江省儒学会执行会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吴光教授

王阳明是世界级大哲，冈田武彦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现代哲人，两位都是儒家的典范。本书是名家写名家的难得佳作，很值得一读！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郭齐勇教授

上架建议 人生哲学

ISBN 978-7-229-0877



9 787229 087784 >



定价：99.00元(全三册)

王阳明大传

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日〕冈田武彦 著

钱明 审校 杨田 译

上

OUYOUMEIDAIDEN<1-5>

Copyright©2002 Takehiko Oka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Meitokushuppa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eitokushuppan through Timo Associates Inc., Japan and LEE's Literary Agency, Taiwan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5 Beijing Wisdom & Culture, Co., Ltd.

版贸核渝字（2013）第3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 （日）冈田武彦 著；杨田等 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229-08778-4

I. ①王… II. ①冈… ②杨… III. ①王守仁（1472～1529）—传记
IV. ①B24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4372号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WANGYANGMING DAZHUAN ZHIXING HEYI DE XINXUE ZHIHUI

〔日〕冈田武彦 著

杨田 冯莹莹 袁斌 孙逢明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卓文天语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陈丽 何彦彦

特约编辑：李一鸣

责任印制：杨宁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16 印张：62 字数：884千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9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文版序一

阳明精神的虔诚践行者

钱明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的恩师冈田武彦先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当代日本著名阳明学家。以他为首的九州学术圈，在为学方法、致思理路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有别于东京、京都等地学术圈的学派雏形，我将其称之为“九州学派”。冈田先生是自幕末维新时期由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开始的，到端山之孙楠本正继承续的九州地区新儒教运动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但冈田先生却谦虚地将此学术思潮用其恩师楠本正继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楠门学”。后来冈田先生的学生又在“楠门学”之后加上了“冈田学”，想用“楠门学”和“冈田学”来概括和统称九州学派。

以楠本正继为代表的“楠门学”的基本特征，九州大学出身的难波征男、柴田笃、荒木龙太郎等先生已有详述。而以冈田先生为代表的“冈田学”的基本特征，以笔者之见，则是在虔诚践行阳明精神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阳明学中的“体认”精神加以充实和完善，并结合日本传统的神道

教而使之进一步体系化和理论化，进而创设了以“体认之学”为核心的“东洋之道”的致思趣向和为学宗旨。

我与冈田先生相识，实亦缘自阳明学。记得二十六年前的早春，一封并不太起眼的国际信函引起了当时兼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秘书的我的注意：以九州大学学者为主的日本学术代表团来浙江进行王阳明遗迹探访活动，希望我方给予协助。那时我刚开始研习阳明学，在渴望拜读的有限的日文资料中，就有冈田先生等九州大学学者有关阳明学方面的力作。所以见信后，我喜出望外。几个月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时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的王凤贤先生去杭州笕桥机场迎接冈田先生一行。当时冈田先生虽年已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铄，给人留下了和蔼可亲、慈祥宽厚的第一印象。

访问团在杭州期间，我院提出进行两地中青年学者交流的建议与设想，冈田先生欣然同意，并表示将尽快制订出具体的交流计划。在绍兴期间，当日本学术代表团一行探寻到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阳明墓时，冈田先生的心情很是沉重，流露出欲资助修复阳明墓的意向。不到一年时间，这两件事便都有了着落。翌年4月，我与吴光先生便应冈田先生之邀访问了九州及日本其他地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对我之后的学术发展和人生旅途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1989年3月，由冈田先生发起，在日本全国筹集三百万日元资助绍兴县修复王阳明墓的工程顺利竣工。同年4月，冈田先生亲率三十三人的“王阳明遗迹探访团”再次来华访问。在考察完贵州的王阳明遗迹后，他们又专程赶往绍兴出席“王阳明墓修复揭牌仪式”，并参加了浙江省社科院和余姚县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国际阳明学学术研讨会”。在总共十五天的日子里，我随同冈田先生探访遗迹、参拜陵墓、讲学研讨，并以酒会友，虽言语不通，但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渊博学识令我受益匪浅。

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会与浙江省社科院组织的“日

中联合王阳明遗迹学术考察团”，对广西、广东、江西三省的王阳明遗迹以及宋明思想文化遗址作了实地考察。尽管当时这些地区的各方面条件还比较落后，但冈田先生不顾八十四岁高龄，与两国团员跋山涉水，同甘共苦，以践行和传布阳明精神及其“体认之学”的理念。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1992年4月30日上午，晴朗了半个多月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沉的，冈田先生一行伫立在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的章江岸边，面朝南，口吟诗，洒洒问苍天，吊慰阳明灵。看到冈田先生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事后，大余县政府提出要在青龙铺修建纪念碑亭，冈田先生非常赞同，回国后立即发出倡议，两百八十名日本友人和民间团体慷慨出资，由浙江省社科院协力修建纪念碑亭的事很快得到落实，于是就有了1994年4月28日至5月8日的“第五回王阳明遗迹考察”暨“王阳明先生落星之处”纪念碑亭的落成仪式。

后来，当冈田先生得知浙江省余姚市的王阳明故居瑞云楼修复工程在资金上尚有较多困难，又再次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日本募集资金的重任，并于199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亲自携捐款，率二十一人代表团赴余姚出席瑞云楼的修复落成典礼。参加完典礼后，冈田先生又与京都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矢崎胜彦一起赶赴贵州修文县，出席由矢崎胜彦捐赠的王阳明铜像落成式和由蒋庆先生开办的阳明精舍奠基式。

从1986年至1996年，在冈田先生的亲自指导和感召下，中日两国学者和民间人士共组织了六次规模较大的王阳明遗迹考察。在这持续十年，横跨八个省市自治区八十余个市县，行程两万余里，有一百多人次参加的“思想考古”活动中，冈田先生自始至终都是其中的灵魂。他以自己的执着和义无反顾的精神感染了中日两国的学者，并以对中国文化的真挚情感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向被考察地区的人们传播阳明学的真谛。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仅吸引着他周围的日本人，而且影响了跟随他一路走来的中国人。

十余年时间，六次考察，三次募捐，无数次地来华讲学和访问，倾注了冈田先生晚年的巨大精力和财力，也牵动了无数日本学者和友人的心。这份情谊，使每个与冈田先生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中国学人和朋友都无不为之动容，特别是作为六次考察的直接参与者、三次捐款的中方联络人、数次讲学访问的陪伴者之一的我，作为受冈田先生教诲和关爱最多的大陆弟子，对冈田先生的远大情怀和高尚人格有更真切更深刻的感受与体会。

正是在冈田先生所发起的“阳明之旅”的推动下，当时中国各地的文化复兴事业得到了莫大鼓舞和启示。以余姚市为例，在短短十余年间就完成了以下事项：1993年，原新建中学更名为“阳明中学”；2002年，原管家弄居委会、山后新村居委会、候青门居委会合并，被命名为“阳明社区”；2006年1月，原余姚西北街道更名为“阳明街道”；2006年，余姚市政府出资八千万元，搬迁了寿山堂内的居民，修复了“王阳明故居”，故居被列入全国文保单位，于2007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2010年，余姚市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10月举办了首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此后每年举办一次，形成惯例。在此以前，王阳明的讲学场所——龙泉山“中天阁”也按王阳明讲学时的原貌修复开放；一条横贯阳明故居门前的东西长街被命名为“阳明东路”、“阳明西路”；其他用王阳明命名的各类场所，更是数不胜数。所有这一切，我想冈田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现在呈现在中文世界读者面前的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可以说是冈田先生晚年花费心血最多的著作，也是他组织和领导王阳明遗迹考察、践行阳明精神的心血结晶。在冈田先生呕心沥血地埋首撰写此书期间，我正好在九州大学做访问研究，基本上每周都要去先生府上拜访，聆听先生的教诲，偶尔先生也会向我询问有关阳明遗迹、世家、交游等方面的情况，所以说我对此书的整个撰写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然而遗憾的是，

当此书于2002年12月开始出版时，冈田先生已重病在身，几乎无力对书稿进行仔细校对，而我又身在国内，帮不上先生任何忙。等到2005年10月此书最后一卷出版时，冈田先生已仙逝，没有看到这部倾注了其晚年大部分心力的大作的全部出版。因此，此书中出现个别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我这位学生的“失职”。对此，在全书的翻译过程中，大多已作了直接改正而未出校记。

冈田先生曾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前言中说过：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而“冈田学”的实质，概而言之，也就是“体认之学”和“培根之学”。冈田先生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践行阳明精神，其目的就是要尝试和再现这种“体认之学”和“事上磨炼之学”。从冈田先生极力倡导的“体认之学”和“事上磨炼之学”中，不仅可以看出先生的为学为人之风范，而且“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现代日本式的开展”。而在冈田先生的所有学术著作中，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体认之学”的就是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冈田武彦全集》的编辑者特地把《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作为《冈田武彦全集》之开篇，其深意似乎就在于此。

有鉴于此，我认为要解读冈田先生的思想体系及其传承道统的心路历程，仅仅凭借理论思考和学问辨析是远远不够的，而应主要依靠其所倡导的“体认”或“追体认”的方法和路径，去亲身实践和体悟其中的真谛。这是因为冈田先生所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见解，不仅是理论思辨的产物，也是其从自身数十年的人生磨炼和社会体验中逐渐领悟到的生命之道。这也许就是冈田先生常说的治学过程与体道历程的统一吧！而正是本着这种理念，冈田先生对我的教诲基本上采用了身体力行、寓智于情、行胜于言式的体验教学法，即使是在日常讲学中，先生也并不停留在知识层面上，而是更多地教我如何做人，怎样与古代圣哲进行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在“追体认”中领悟先

哲的情思和感怀。通过近二十年的交往，我从冈田先生身上，不仅感受到一位思想大师的睿智和胸怀，更体察到这位几乎与二十世纪同步的日本儒者的高风亮节。

因此，我坚信《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文版的出版，不仅会有助于国人对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了解和认知，也会有助于国人对日本当代儒学家冈田武彦的了解和认知。这也是我向中文世界的读者推荐此书的初衷。

2014年11月谨序于杭州心闲斋



中文版序二

他山之石，攻吾之玉

蒋庆

阳明精舍舍长

阳明先生，中土之圣哲也。五百年来，中土之圣哲未有居于阳明先生之上者也。冈田武彦先生，东瀛之阳明学者也。百年以降，东亚之阳明学者未有居于冈田武彦先生之上者也。故处今之世，欲学圣贤，孔孟而外，当首推阳明；而欲借他山之石攻吾之玉，阳明学失于吾国而求诸异邦，舍冈田武彦先生又何者适哉！

吾国自蕺山而后，阳明学断于中土，存乎东瀛。三百年来，东瀛阳明学代有传人，蒸为习尚；名儒迭兴，蔚为大观。至冈田先生出，其传不知几何矣！冈田先生早岁从楠木先生游，始悟东方之学非概念之学，遂信奉儒家心性体认之学。中岁后悟心性体认之学正宗在阳明学，遂倾毕生精力究心阳明学，终为阳明学之一代儒宗。依冈田先生，阳明学之根本特质为“体认培根”，阳明学即是“体认培根之学”。故吾人循此以往，可得阳明学之真精神，可窥儒家心性学之真面目。

忆昔阳明铜像落成龙场，冈田先生至龙场主持典礼，余始与先生有道缘而相交焉。虽言语不通，然先生道容行谊，令余深为感动。先生信道之笃，卫道之坚，当世少有能及者。时先生年近九十，远赴龙场祭奠阳明先生。岁已入冬，先生衣单，余主祭，以天寒先生年迈请不脱外衣不行跪拜礼，先生不许，坚依礼数以终。后余问道请益，如沐春风。及别，依依不舍，感泣无语，是道心之相通，同契之交感，无间于年齿语言者也。尔后，定忘年之交，受醍醐之赐，先生常致函教诲，并惠寄平生著述。至余建龙场阳明精舍，请先生题写山门，先生欣然命笔。如今阳明精舍山门之名为先生所题，铁画银钩，古雅苍劲，日日面对朝晖夕月，山雾松云。嗟呼！今先生往矣，余每过斯门如见先生其人，得悟先生之灵常存于龙场古驿，而为阳明子五百年前龙场悟道之大事因缘乎！

壬辰冬，余赴京与会，邓东文君携冈田先生所著《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译稿索序。是稿始于西元 1977 年，终于西元 2002 年，逾时二十五年，乃冈田先生费时费力最多之著述。王阳明是“行动圣哲”，阳明学是“行动儒学”，阳明学之精神贯穿于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之行事中，故欲深窥阳明学，必先详知阳明子之生平事迹也。因余与冈田先生有龙场之道交，又欲使国人依严肃之阳明传记见阳明学之真精神，故不辞邓君之雅意，谨为之序云。

孔元二千五百六十三年冬，盘山叟蒋庆拜序于深圳莲花山畔之繡经斋



中文版序三

用一生演绎阳明心学

吕 峥

《明朝一哥王阳明》作者

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先生乃一代儒宗，认为阳明心学之精髓在体认，当于经验与磨炼中领悟，并以数十年身体力行践履这一同生命融为一体的“信仰哲学”，令我等后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16 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王阳明对入学的贡献，与此类似。儒家的最高价值是让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人人皆可成圣，意即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神圣的意义。而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体制，无人能替你看顾自己的内心。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来。因此，即便说“一生的结果皆出于心”，亦不为过。

直面当下，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极权主义的回潮带来的是阶层固化、共识破裂、道德沦丧、法度陵夷。物质文明的繁荣并没有赋予人生更具价值的意义，相反，欲望日渐膨胀，幸福感却每况愈下。多少人迷失在成功学编织的所谓“梦想”之中不能自拔，蹉跎了青春，荒芜了精神，在循环的自我否定中走向消沉，走向封闭。放眼望之，许多国家都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国民的幸福指数；许多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财富，却不清楚自己的生活何以越来越迷惘纠结，日甚一日地充满挫折与焦虑，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感。事实上，一个人成不成功，人们多以权力大小和财富多寡来衡量，但幸不幸福，却无法以外部指标来判定，只能借由内心去感受。毕竟，若仅剩物质，则会害怕；若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就不用去害怕。因此，最好的救赎之道便是把习惯向外追逐的目光收回来，关注放逐已久的心灵。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要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从这个角度看，阳明心学就是要人敞开来检视自己，认识生命，从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搭建的自我意识中跳出来，站在心体的层面审视、监督意识，用正确务实的观念指导行动，用对人心深刻的体察来打破他人的心墙，树立起“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生活态度，达到“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的境界，使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能心安自得，始终保持内心的强大。

同时，是非不用从学者的讲学中区分，只需在自己的内心里辨别。一个真实的自我可以让人有效地应对真实的世界，从而完整地把握世界。而当人厘清了生命的意义，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实践生命意义的斗志里，那种酣畅纯粹的美，就是心学。以冈田先生为例，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定期在福冈、东京等地开设讲座，赢得了公众的爱戴和敬重。著作等身的他还多次来华考察，行程两万余里，为赞助修复阳明故居和阳明墓在日本发起了广泛的募捐活动，用坚持不懈的努力诠释了知行合一的真谛。因此，即使先生的亲戚中出了不少企业家，即使先生的收入比兄弟们的低得多，但“冈

田武彦”这四个字在家族里的分量却无人能及。

四十五岁那年，先生顿悟“体认为本”，明白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实际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人，不应当活在概念里。就像歌德曾让他的弟子去参加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能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能和任何人打交道。”

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对真理的探寻，注定道阻且长，注定需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激发性，在持续的“格物”与“诚意”中构建起思维图谱，日臻明觉良知之化境。

正如凡·高所说：“没有什么事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用一生演绎、再现了阳明心学的冈田先生，为我们树立起了一座山高水长的丰碑。

2014年10月拜序于成都

前 言

1977年，福岡市的《Topics九州》杂志社向我约稿，委托我撰写有关王阳明生平的连载。王阳明是明朝大儒，在所有儒学大家中最推崇“真切体认”之学，再加上我当时也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所以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但很不幸的是，两年之后这家杂志停刊了，我的连载也被迫停止。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打算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向日本读者介绍王阳明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作为一名儒学家，王阳明经历了别人未曾经历的困难——其一生简直可以用波澜壮阔一词来形容，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才总结出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

我希望读者能够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身上都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阳明思想的精髓，并以此约束自己的品行，那我将不胜荣幸。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在杂志停刊后我没有停笔，而是继续撰写王阳明传记。

早在三十岁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体认之学”的重要性。当时我读了

一些阳明学的著作和《明儒学案》，发现明末诸儒都是通过真切体认之学悟得深刻的哲学思想的。他们挺身赴国难的事迹以及严格约束自身行为的态度，都让我深受感动，甚至一度落泪。

我们这些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人，如果不去了解先哲们的生涯，不去体验他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东方哲学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特点，所做的学问也就无法变成“活学”。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方法更是在我心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但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发现通过普通的学术论文，很难将先哲们的思想充分表述出来。

“二战”之后，我原本打算总体介绍朱子的生涯和哲学思想，并且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却专心致力于研究明末阳明学者和朱子学者等。五十岁时，因为劳累过度，不幸得病，恰在此时，恩师楠本正继先生仙逝，心中不胜悲痛。五十六岁时，大病终愈的我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教。

在美授业期间，了解到欧美学者与日本学者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上的异同，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之特色，实乃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归国后不久，学生运动爆发，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从九州大学退休之后，随即来到一所私立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经常出席海外的学术会议，繁忙至极。在诸事烦扰之下，终日萦绕心头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工作也变得难以进行。

从私立大学离任之后，虽想尽快完成《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但周边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进度迟缓。在此期间，我联系浙江省社科院，和研究阳明思想的中国学者一起，多次踏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四川和福建等与王阳明有关的遗迹，这一行动对我进一步研究阳明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八十三岁时，我对王阳明遗迹进行了第四次踏访调查。在1992年4至5月的四十多天的时间里，踏访了很多过去未曾涉足的遗迹遗址。王阳明病逝

于江西青龙铺(今江西省大余县青龙镇)章江的扁舟之中。当我站在章江岸边,遥想王阳明当时的心境,一度哽咽。那种感动,终生难忘。

从中国回来后,继续《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创作,但受身边诸事干扰,进展依然缓慢。后来患上眼疾,读书执笔日趋不便,借助放大镜,坚持写完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此后便难以为继了。“致良知”说代表了王阳明晚年最成熟的思想,而我却不能执笔撰写这一章节,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在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过程中,太宰府市的森山文彦一直帮我打字,为该书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将原先拟好的提纲交给他,请求他代笔。他非常了解我的心情,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了。

本书以《王文成公全书》为基本资料,同时也参考了东正堂¹手抄本《阳明先生全书论考》等相关资料。在此必须向读者阐明,文中部分内容还引用了墨憨斋²的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可能有读者会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是传记小说,其中肯定会有虚构的成分,为什么还要引用呢?这是因为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读者可以更容易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

阳明思想中最出彩的“体认”,其实是一种情感。西方哲学重理性,东方哲学重情感。如果我们把哲学思想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阳明的东方哲学就可以看作是对根的培养,而西方哲学则是对枝枝叶叶的探求。学问有本末之分,阳明哲学乃“培根之学”,西方哲学乃“枝叶探求之学”,何为本,何为末,各位读者要切记。

但是,综观现代哲学界,“培根之学”却一直被人忽视。我之所以要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坚持向大家阐述阳明的“培根之学”,其中也包含了反省的意图。日本哲学重视感性和实践性,并且比较含蓄,所以很多日本人对日本哲学并不十分了解。因为扎根于日本民族性的日本哲

学思想和阳明学存在很多共通点，所以比起朱子学，日本人更喜欢阳明学。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是《冈田武彦全集》的前三卷，此次《冈田武彦全集》能顺遂圆满付梓出版，承蒙日本心身修学协会会长村山实先生的不懈努力，以及明德出版社社长小林日出夫先生的大胆决断。在此，对两位先生以及热切期望《冈田武彦全集》出版的诸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冈田武彦

2002年10月吉日于福岡

注 释：

1 东正堂：又名东敬治，日本幕府末期阳明学者，东泽泻长子。——译者注，下同。

2 墨憨斋：冯梦龙的别称。

全书总目录

上卷

- 序章 圣哲王阳明
第一章 阳明降世
第二章 阳明先祖
第三章 不羁少年
第四章 五溺时代
第五章 圣学之道
第六章 倡导圣学
第七章 龙场悟道
第八章 龙场教化

中卷

- 第九章 「知行合一」说
第十章 庐陵知县
第十一章 京师讲学
第十二章 滁州讲学
第十三章 南京讲学
第十四章 南赣戡乱
第十五章 赣州时代

下卷

- 第十六章 江西时代
第十七章 阳明苦难
第十八章 倡导「良知」说
第十九章 阳明晚年
第二十章 思田靖乱
终章 阳明临终
附录一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附录二 王阳明的子孙

目 录

CONTENTS

上卷

序章 圣哲王阳明

- 002 文武双全的圣人
- 004 行动哲学阳明学
- 006 日本人与阳明学
- 009 对阳明学的误解

第一章 阳明降世

- 012 中国的文艺复兴
- 014 余姚四贤人
- 017 『守仁』之名由来

第二章 阳明先祖

- 022 王家始祖
- 026 远祖名臣王导
- 031 书圣王羲之
- 033 忠臣六祖王纲

036 遁世五祖王与准

038 洒脱曾祖王杰

040 祖父竹轩先生

042 父亲龙山先生

第三章 不羈少年

056 十岁的诗才神童

059 天下第一等人

061 巧用智谋惩戒继母

063 怀抱经略之志

第四章 五溺时代

068 心无定性

072 『格竹』失败

076 新婚之日出走

080 苦练书法

第五章 圣学之道

- | | | | | | | | | | | | | | | | |
|----------|------|---------|--------|----------|------|--------|-------|---------|------|--------|------|--------|--------|----------|--------|
| 152 | 149 | 145 | 140 | 133 | 129 | 127 | 118 | 115 | 112 | 105 | 102 | 097 | 091 | 088 | 086 |
| 摆弄禅机教化弟子 | 西湖疗养 | 莫逆之交的影响 | 悟出佛道不足 | 结交『明前七子』 | 求道访仙 | 审查江北囚徒 | 上陈边防策 | 考中进士入仕途 | 钻研兵法 | 两次会试失败 | 阳明中举 | 明初心学传承 | 新儒学的兴起 | 宋儒的『格物』说 | 拜谒大儒娄谅 |

165 排斥佛道
155 会稽山祈雨

第六章 倡导圣学

176 笃信儒学
178 出任乡试主考官
188 阳明的政治策论
191 与湛甘泉共倡圣学
194 萌发隐遁之心

第七章 龙场悟道

200 武宗与宦官
205 阳明入狱
212 别了，京城
220 摆脱刺客
226 再会无为道人
233 告别门人徐爱
237 前往贵州龙场

第八章 龙场教化

- 256 艰辛的龙场生活
250 龙场顿悟
244 创作《五经臆说》

- 264 蛮荒之地建造居室
271 德化的力量
274 教化诸生
277 龙冈书院的学规
280 书院学的历史
285 阳明与书院教育
290 阳明的教育理念
292 感化思州太守
295 劝诫土著豪族
299 埋葬暴毙的吏目

序章

／
圣哲王阳明

文武双全的圣人

英明豪迈、文武双全，左手执卷讲学授业，右手抚剑叱咤三军，旷世罕见的大圣人、大豪杰、大儒学家王阳明最终没能逃过疾病的魔爪，迎来了和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永别的那一刻。

明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五十六岁的王阳明受朝廷委任，不得不拖着病躯前往酷暑难耐、恶疫肆虐的南方戡乱。在平定盘踞各地的贼寇之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加强治安，施以教化。但是，终日的劳累诱发了他的肺病顽疾。次年十一月，完成使命的王阳明在回京途中病情加重，且又伴生了痢疾腹泻之症。当王阳明乘坐的扁舟抵达江西南安（今大余县）境内时，他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

当时，王阳明的弟子周积正在南安为官，听闻恩师抵达南安，急忙前来迎候。周积来到船舱，见恩师卧病在床剧咳不止，急忙上前请安。王阳明勉强坐起来，问他：“近来进学如何？”

“有所长进。如今政局大体平稳，恩师道体如何？”周积答道。

王阳明回答说：“病势危急，所未死者，元气而已。”

两三天后，王阳明自觉生命之灯将尽，便让家童叫周积到船舱来。周积躬身侍立在恩师枕边，神情悲怆，静静地看着恩师消瘦的脸庞。王阳明徐徐睁开眼睛，把头转向周积一侧，对他说：“吾去矣！”

周积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

孟子逝后，儒教心学丧失殆尽，王阳明重整心学，并将其发扬光大，开创新学风。其学为万世之师表，其德受万代之敬仰。在这静肃的一瞬间，圣

哲的魂魄已脱离身躯，向着幽冥飞去。

“恩师，有何遗言？”周积压抑着呜咽，问道。

王阳明张开嘴唇，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撒手人寰。

王阳明遗言中的“此心”，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晚年所作的诗歌《中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有如下词句：“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光明”指的就是良知的光辉。王阳明在晚年才开始提倡“致良知”说，这也可以说是他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才悟出的智慧结晶。

在王阳明看来，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无论贤士还是愚人，无论学者还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只要在事事物物上都“致良知”，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要听从良知的命令，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轻松克服，并且不会误入歧途。

王阳明的“良知”说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利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良知”说不仅鼓舞了知识分子，也鼓舞了不通文墨的平民百姓，它迅速在都市和乡村中传播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

行动哲学阳明学

在日本，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这也许是因为一提起阳明学人们就会想到熊泽蕃山和山田方谷等人的缘故。熊泽蕃山是备前国¹之臣，具有经世之才，在处理藩政方面成绩卓著。山田方谷是备中国²之臣，幕府末期著名的阳明学者，具有经国之略，在藩政改革方面也是功绩卓著。日本民众对阳明学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如果不经世致用，不具体实践，那么就不能称之为阳明学。

阳明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只强调博闻强识，不修德行，或者对经世致用漠不关心，这些都违背了阳明学的主旨。儒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并且注重实践，不只是阳明学，朱子学也是如此。对朱子学者来说，一旦有了合适的职业和地位，他们也都会谋求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把注重实践说成是阳明学的独有特点，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恰当的。

日本人认为阳明学是行动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信奉阳明学的学者往往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大盐中斋、吉田松阴、东泽泻、西乡南洲、三岛由纪夫等人都修习阳明学，最终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大盐中斋在浪华³发动叛乱；长门⁴的吉田松阴密谋讨伐幕府，结果入狱，被处以斩刑；周防⁵的东泽泻在庆应年间发动勤王运动，最终被流放异域；西乡南洲挑起西南之役；作家三岛由纪夫受忧国之情驱使，煽动自卫队队员发动兵变，失败之后剖腹自杀，他的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但如果认为只有阳明学者才会做出如此壮烈的举动，那就有些过于草率了。其实不只是阳明学者，朱子学者中有些人也做出过同样壮烈的举动，例

如江户⁶的大桥讷庵。大桥讷庵是幕府末期的朱子学者，他和平户藩⁷的儒学家楠本端山（恩师楠本正继先生之祖父）一起师从于佐藤一斋，并称为幕府末期的两大朱子学家。讷庵比端山年长几岁，在讷庵的指导之下，端山才最终把朱子学看作正学，并成长为一代大儒。二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儒学大师，学问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胜过其恩师佐藤一斋先生。

楠本端山在平户藩为官，为藩内的政治、教育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明治维新前后，他整顿藩政，保得一方安宁。而大桥讷庵却积极参加勤王讨幕运动，秘密储藏武器，鼓吹“攘夷论”，密谋暗杀阁老，最终被捕入狱。对于讷庵的行为，不只是同门，当时的很多阳明学者对他也提出了批评。

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其实还与王阳明独创的“知行合一”说有关。“知行合一”说的中心是“行”，而不是“知”，这是一种实践主义的思想。所谓的“行”，并不是与“知”对应的“行”，也不是局限于具体的实践行动。王阳明曾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可以看出，“行”包含的范围很广，心中萌发的意念也可以看作是“行”。

阳明学是一门重德行、以“良知”说为根本的学说。很多阳明学者对于自己的“一念之动”和行为都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例如三原⁸的吉村秋阳、多度津⁹的林良斋和但马¹⁰的池田草庵等。吉村秋阳和大桥讷庵、楠本端山一样，都是佐藤一斋的弟子，他曾说过，人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这样才不会与外界形成对立。林良斋是大盐中斋的弟子，他和池田草庵都是阳明学者，同时也是至交。他们二人提倡“慎独¹¹说”，强调独自一人时更要注意自己的“一时之念”，不要做出有违道德的事情来。

在阳明学者中，做事低调、治学严谨的学者很多。他们的学问都做得很精深，德行也很高尚。可世人往往只看见我们前文所述的那些行为壮烈的人士，并且认为那就是阳明学的精髓。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需要我们做出反思。

日本人与阳明学

江户初期，阳明学传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大儒在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之后，进行了详细的阅读。贝原益轩是福冈的一位大儒学家，因博学广识而闻名于世，在他的读书目录《玩古目录》中有《王阳明全书》。可以推测，他当时应该也读过王阳明的著作。

最早在日本介绍阳明学的是中江藤树。他先是在伊予国¹²的大洲为官，后来辞官回家侍奉双亲，被尊称为“近江¹³圣人”。中江藤树曾经创建藤树书院，并模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制订出《学舍坐右戒》，招收弟子，讲学授业。藤树最初修习的是程朱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王阳明的高徒、王学左派（良知现成派）巨匠王龙溪的著作。读后激动万分，对阳明学的崇拜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将治学方向转向阳明学。

为什么王学左派的“良知”说会如此打动中江藤树呢？王学左派主张，无论我们多么卑微，都和圣人一样具有完满的良知，无须做学问，也无须痴迷于烦琐的修行，只要达到顿悟，就可以变成圣人。在当时的思想界，王学左派的主张可谓惊世骇俗，人们不再需要日积月累的学习，也不再需要对内心和品行进行苦修，一样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

王学左派的“良知”说很快就俘获了大众的内心，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王学左派强调绝对自我，提倡为民办事和男女平等，肯定人的欲望，所以信奉民主主义的欧洲学者大都喜欢研究这方面的思想。无论是谁，当有人对他说：“你和圣人一样，都具有出色的良知。你本来就是圣人，只是还没意识到而已，只要意识到了，你就能变成圣人。”这个人肯定会产生强大的自信。

因此，中江藤树会对阳明学产生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王学左派的思想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刨根问底。它最大的功绩在于阐明了王阳明潜藏于内心，而没有直接言明的思想，但同时也生出了极大的弊端。此派学者不赞同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与自由，呼吁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结果乱了世间纲纪。他们大都率性而为，一旦对社会和政治不满，便会毫无忌惮地发怒。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家伙”，喊着酒色才气不碍菩提路，并把这看作是顺应良知的行为。日本社会从战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风潮和明末的风潮极其相似。

如上所述，中江藤树因为王学左派的“良知”说而对阳明学产生了兴趣，但是藤树却没有沿袭王学左派的行为。其实不只是中江藤树，所有日本的阳明学者都是如此，日本人对阳明学的吸收是积极和稳健的。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推崇“同心同德”，这和《论语》中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有些相似，所以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推崇“仁爱精神”的儒学。日本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人与人的心灵自然相通，也不存在严重的对立。由于这一民族性，日本人一直以来都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总而言之，日本人天生就具有自他一体的世界观，再加上没有遭遇过外族入侵，所以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民族性。

日本人自他一体的世界观，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日本列岛地理气候多样，漫长的海岸线呈锯齿状，四季的变换营造出绚丽的色彩，生长于斯的日本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情感也变得丰富。具有此种民族性的日本人，当然会乐于接受以仁爱为本的儒家思想。

对日本人来说，很少有人会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思考问题，也很少有人会运用逻辑思维去探求事物的本源。经常有人说日本人不喜欢“发言”，不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日本人在探究事物时，是整体性地去理解，而不是站在它的对立面去研究。以上所提的“整体性理解”，指的是将事物和自己的内心合为一体之后再去理解，而不是把事物对象化，然后通过思辨的态度去理解。其实，这就是日本人的感性理解方式。

日本人非常感性，并将这一特性贯穿到了思想和文化领域。虽然感性理解方式存在各种缺点，例如容易造成理性的欠缺，陷入对事物的感性认知等，但同时它也有自身的长处，那就是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以及赋予事物生命性等。

一旦理解方式整体化，被理解的事物自然就有了生命性，理解起来也会变得简单。我们在认知一个事物时，没有必要去摆弄那些烦琐的思辨和理论，也没有必要在抽象的世界里左顾右盼。对事物进行感性认识、整体把握，未必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阳明学就蕴含着我以上所提到的这一思想，所以日本人才愿意去接受它。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他的“求道”方式是整体性的，简单易操作。王阳明提倡的“良知”说是一个严格的生命体，它包含敏锐的道德感知，也包含道德批判，既有道德的好恶之情，也有道德的法则。根据阳明学的理论，只要顺应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极其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其效果越具有真实性。日本人被阳明学的“良知”说所吸引也是必然的了。

对阳明学的误解

1972年6月，“纪念王阳明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我受邀参加，并做了《幕府末期的阳明学和明末儒学的关系》的演讲。研讨会共进行了六天，参会人员都是世界各地的阳明学专家。有一天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文化与阳明学”，因为只有我一个日本学者，所以就责无旁贷地成为小组讨论的主角。

我率先介绍了日本的民族性容易吸收阳明学的原因，之后是两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发言。其中一位学者坚持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并举了大盐中斋之乱和三岛由纪夫的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

其实这种观点早已存在，中斋之乱后，日本学术界就出现了此种论调。当时京都有一位儒生名叫春日潜庵，他打算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有朋友告诫他，阳明学是不稳之学，劝他不要信奉。

年轻的美国学者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可能还与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有关。于是我反驳他说：“三岛虽然自称自己信奉阳明学，其实他并没有悟得阳明学的真谛。大盐中斋虽然在阳明学方面负有盛名，但仅凭其一人的举动，就定义阳明学为‘谋叛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明朝发生有覆国之忧的大叛乱时，亲率大军前往征剿的正是王阳明。如果因为大盐中斋发动叛乱就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那么基督教教徒还发动了岛原之乱，为什么不说基督教也是‘谋叛宗教’呢？”

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对阳明学像这样的误解依然还有很多。

注释：

1 备前国：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冈山县东南部。——译者注，下同。

2 备中国：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冈山县西南部。

3 浪华：大阪的旧称。

4 长门：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山口县西北部。

5 周防：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山口县东南部。

6 江户：东京的旧称。

7 平户藩：日本旧时地方藩国的名称，位于今长崎县北部，辖区主要位于今平户岛，在日本锁国前为日本的主要国际贸易港。

8 三原：今广岛县南部的一处地名。

9 多度津：今香川县西北部的一处地名。

10 但马：日本旧时藩国的名称，位于今兵库县北部。

11 慎独：中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最先见于《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意指持守或牢固地保持自我的道德本性和本心。

12 伊予国：日本旧时地方藩国名称，位于今爱媛县。

13 近江：日本旧时地方藩国名称，位于今滋贺县。

第一章

／
阳明降世

中国的文艺复兴

王阳明是“明代第一理学大师”，也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功臣。阳明学是中国最早提出尊重“人的个性”的学说，欧美学者对阳明学的关注也先于程朱理学。

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始于宋代，严格来说，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王阳明。王阳明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正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

当今世界，科学、文艺、思想和哲学飞速发展，日新月异，若追溯其源头，皆可以说是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

王阳明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日本后土御门天皇文明四年。他生活的15世纪下半叶恰好是西方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复兴”源始于法文“Renaissance”，是“再生”“复活”之意，最早兴起于意大利，后波及欧洲各地。主张复古和人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一切文化思想，是思想意识的一次大革新。

由于人性的解放，这一时期的民众不再拘泥于既成概念，而是充满了怀疑精神。在14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民众突破陈规陋习、随心所欲生活的例子。这一时期的民众不再受限于传统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信念和欲望自由自在地生活，对基督教修士恪守清规戒律的伪君子行为表示强烈反感。

阳明学在明末臻于成熟，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恰好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二者都高呼人性解放，反对旧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强调男女平等，呼吁言论

自由。阳明学对那些虚伪的儒学家充满憎恶，以率性而为、随心而乐为善。虽然这种人性解放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但在这里先暂且不论，毋庸置疑，阳明学开启了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之路。

兴盛的地中海贸易造就了繁荣的商业都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明朝中后期，中国文艺复兴的出现也与中国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商业都市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

余姚四贤人

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余姚位于杭州湾南岸，风光秀丽，南有四明山和天台山，西南有会稽山，姚江穿县而过，因此阳明学又被称为“余姚之学”、“姚江之学”。

绍兴府古属吴越之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观光览胜之佳所，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一处文化中心。受当地风土的影响，余姚的文化艺术向来兴盛，仰慕道家仙士的玄虚静退之风盛行，才子名士辈出。余姚有一座龙泉山，王阳明之父龙山公曾经在此读书，王阳明晚年也曾曾在山腰处的中天阁传经授业，教诲弟子，兴盛时期门人弟子一度高达三百多人。

王阳明是余姚四贤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东汉的严子陵，明末清初的朱舜水和黄宗羲。

严子陵，名光，字子陵。年轻时便负有盛名，曾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一起在太学学习。刘秀登基后，他便改名易姓，隐身不见。

光武帝深知他的才能，想起用他，派人四处寻找，最终将其寻得。使者三次登门恳请，他才肯出山。严子陵抵达京都洛阳后，光武帝马上来到他寄宿的馆舍拜访，是夜二人同榻而眠。相传严子陵熟睡后把脚压在了光武帝的肚子上，这本是无礼犯上之罪，可是光武帝却替他辩解说：“朕与故人子陵共卧耳。”以此训诫那些企图责难严子陵的臣下。

光武帝授予严子陵谏议大夫一职，严子陵不肯接受，回到富春山去过田园耕种生活，直到八十岁而终。严子陵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的敬重，龙泉山上现在还留有碑文，记曰“汉高士严子陵”。

王阳明，幼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是阳明学的开山之祖。他曾在会稽山阳明洞建造草堂，世称“阳明先生”或“阳明翁”。因对国家有大功，生前被封为新建伯，死后追封为新建侯，所以又被世人称为“新建伯”、“新建侯”或“王新建”，亦称“明翁”。

王阳明是南京吏部尚书王华（龙山公）的长子，少时沉迷于“五溺”，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三十岁之后，终于悟出老庄和佛教之不足，转而笃信儒教。

他二十八岁中进士。三十五岁时，因替戴铣求情而入狱。当时戴铣因弹劾宦官刘瑾不成，反而被打入死牢。后来，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就是在这里，他悟出了“心即理”的思想，并提出“知行合一”说。

他三十八岁出任庐陵知县，历经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在此期间，他先平定了南方叛乱，四十八岁时又平定了宁王宸濠之乱，立下大功。但由于武宗身边佞臣的挑唆，王阳明不但没有受到奖赏，反而遭到毁谤和诬陷。四十九岁时他创立“致良知”说，最终成为一代大儒。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是一位定居日本的学者和诗人。明朝灭亡后，他遍访日本、交趾（现在的越南），致力于复兴明朝，最终于万治二年（1659年）定居日本。九州柳川藩¹的儒生安省庵在长崎拜舜水为师，并且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资助老师的生活。宽文五年（1665年），朱舜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以“宾师”身份招入江户（今东京），对水户光国及其所属的水户学派影响颇深。朱舜水精通程朱理学，对阳明学也有所涉猎，并且熟知古文，对日本汉学影响颇深。终年八十三岁，逝于日本。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其父黄尊素是明末清初东林党人，受魏忠贤迫害而亡。黄宗羲幼时就与东林党人的子弟交往甚密，师从父亲之好友刘念台（刘宗周）。明亡后，黄宗羲组织家乡青壮年抵抗清军，最终失败。据说当时为了求得援军，曾经远渡日本。

反清复明的希望破灭后，黄宗羲撰写了《明夷待访录》。在该书中，黄宗羲详细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王朝，批判君主专制制度，阐明民主主义的立

场。黄宗羲终身不仕清朝，其子黄百家、弟子万斯同后参与编纂《明史》。

黄宗羲继承先师刘念台之学风，在思想上较之念台更倾向阳明学，但他对阳明学末流沉迷禅学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黄宗羲排斥空谈阔论，主张研读经史，强调学术思想要真诚，因此又被称为“清代史学之祖”。黄宗羲一生著作颇丰，比较有名的有从史学角度研究宋明理学思想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

黄宗羲之师刘念台是新阳明学者，他吸收了大量的程朱理学的思想，不太认同王阳明以良知为学问之宗旨的思想，觉得诚意才是为学之宗旨，体现出对“良知”说中本体生命性的重视。

“守仁”之名由来

成化七年（1471年），二十六岁的龙山公迎娶郑氏。翌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诞生。

圣贤伟人的诞生一般都会伴有一段奇异的传说。昔时，尧的母亲怀胎十四个月才分娩，相传郑氏也是妊娠十四个月才生下王阳明。

一天夜里，王阳明的祖母岑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天上阳光明艳，祥云缭绕，诸多神仙身着绯红色的衣服，击鼓吹箫，乐声悠扬，其中一位仙人怀抱一婴儿，脚踩瑞云，自空中徐徐而降，径直朝着王家宅邸而来，将婴儿送入岑氏怀中。

仙人说：“此子授汝。”

岑氏说：“吾已有子。儿媳终日孝敬公婆，请将此子授伊。”

仙人回答：“可矣！”

仙人说完之后，岑氏忽闻婴儿啼哭之声，不禁惊醒。此时，院内仿佛还有仙乐回荡。岑氏将这一奇事告知竹轩公（王阳明的祖父王伦），竹轩公也颇感奇怪，于是给新生婴儿取名为“云”，这就是后来的王阳明。

伴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岑氏的美梦也在街坊邻居中传开了，大家都觉得十分新奇，于是就将王阳明出生的那座房子命名为“瑞云楼”。瑞云楼的遗址现在还在，但屋子已易主，建筑物也已变为清代样式。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曾著《瑞云楼记》，其中就详细记述了王阳明出生的传说。

一直到五岁，王云都还不会说话，王家人很是担心。有一天，王云和其他小孩一起在门外嬉戏玩耍，恰巧一位神僧路过，他盯着王云端详了一会儿

后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此话正好被竹轩公听见，竹轩公心中一惊，顿时醒悟：取名为“云”，一语道破天机，泄露了王阳明的出生秘密，所以王阳明才迟迟不会说话。于是竹轩公为其改名“守仁”，王云便立刻会说话了。

有一次，竹轩公听到小守仁正在咏诵自己曾经读过的书，十分惊讶，问道：“何以能诵？”

小守仁答曰：“闻祖读时已默记矣。”（《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王阳明的弟子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²中的记载与上述有所不同。

一日，过路的僧人摸着王云的头顶，说道：“有此宁馨儿，却叫坏了。”

龙山公听闻之后顿时醒悟，于是将其名改为“守仁”，之后王阳明很快就显露出其非凡的才能。

按照人之常情，孩子出生之后，身边的亲人总是会将理想寄托到孩子身上，并会给他取一个相称的名字，希望孩子长大之后真正能够人如其名。

爱菊好酒的陶渊明便是如此，他为长子取名“俨”。“俨”有恭谨之意，陶渊明之所以为长子取此名，是希望长子能够像古时的圣人那样温恭有礼。

孔子之孙孔伋（即子思）曾著有《中庸》。陶渊明为使儿子成为像子思一样的人，为儿子取字“求思”。陶渊明有《命子》诗，诗云：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

名汝曰俨，字汝求思。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竹轩公为王阳明取名“守仁”，正是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名仁德兼备的圣贤。而王阳明不辱其名，终成一代圣贤。

朱熹，字元晦，宋朝大儒，也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因创立朱子学而闻名于世。“元晦”二字是其恩师刘屏山给他取的。

朱熹之父朱韦斋（朱松）与刘屏山是至交，在朱熹十四岁时因病去世。临终之前曾留有遗言，让朱熹师从自己的四位好友刘彦修、刘白水（刘勉之）、胡宪（籍溪）和刘屏山。四人都把朱熹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其中一位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朱熹。四人悉心教导朱熹，希望他日后能成大器。

元晦的“元”字有天地之德、人之仁德之意。但朱熹自己对于使用“元”字却有点惶恐，所以后来将其省去，自号“晦庵”。

刘屏山为什么要给朱熹取一个“晦”字呢？他在《字朱元晦祝词》中说明了缘由：“木晦于根，春容晬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

树木的根扎得越深广，春天枝叶就会越繁茂；人越内敛谨慎，他的精神就越清爽，内心也就越强大。朱熹一直谨记恩师的“木晦之教”。

刘屏山是一位倾向于禅学的儒学家，推崇“默坐澄心”，他教导朱熹要深刻探究人的内心世界，并最终助其成为一代哲学大师。

虽然朱熹后来也曾批判过屏山的“默坐悟人”之学，但是到晚年时，他开始追怀往昔，再次推崇“木晦之教”。

王阳明到晚年时，思想逐渐成熟，可以说是达到了与“守仁”之名相符的境界。

王阳明五十岁时提出“致良知”说，并不断完善此说。他主张良知本体是人的真心和对他人的体谅之情，所以只要“致良知”，就能实现天地万物的“一体之仁”。

王阳明秉承天理，提出“致良知”说，并受“一体之仁”思想的驱动，以天下人的苦难为自身的苦难，以天下为己任。虽然世人笑其疯癫，但他毫

不为意，这份赤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晚年的王阳明不顾世人的非议，为了拯救百姓而东奔西走，终日劳苦，无片刻休憩，在此方面简直可比肩孔子。阳明的精神，阳明的行为，都无愧于他的“守仁”之名。

注 释：

1 九州柳川藩：日本旧时藩国的名称，位于今福冈县西南部。——译者注，下同。

2 《阳明先生行状》：由明代哲学家黄绾所著，收录于《王阳明先生全集》中。

第二章

／ 阳明先祖

王家始祖

据俞鳞辑编的《王阳明先生全集》中的《年谱》记载，王阳明的祖先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可是《王文成公全书》中的《年谱》和王阳明的弟子黄绾所著的《阳明先生行状》中却将其祖先定为西晋的王览。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王家的始祖到底是王览还是王羲之，现在还没有定论。据曾拜谒过王家家庙的东正堂的弟子介绍：“羲之在上，子孙昭穆下列，辟别室单独奉祭阳明。”（东正堂《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昭穆是指宗庙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王羲之这一脉应该不是王览的正系，所以余姚王家没有把王览当作始祖，而是把王羲之当作始祖。王阳明的经历和王祥、王览兄弟有些相似，所以后人在著述过程中才误将王览当成了王家的始祖。

王祥的孝行

据《晋书》卷三十三记载，王祥（185—269），字休征，王览之兄，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裔，琅琊（今山东临沂）人。王祥至孝，但母亲早丧，继母朱氏不慈，屡进谗言，使王祥失爱于父。继母经常让王祥打扫牛圈，王祥却更加恭敬谨慎。父母有病，他衣不解带，煎汤熬药都先尝过，以验证是否有毒。

继母曾想吃鲜鱼，当时天寒地冻，王祥脱下衣服要去破冰捉鱼，就在此时，

冰面忽然自裂，两条鲤鱼从中跃出，王祥捉鱼回家孝敬继母。继母想吃烤黄雀，就有几十只黄雀飞入他的幕帐，王祥将其烤制后孝敬给继母吃。同乡的人都惊叹不已，认为这是孝心感动了上天的结果。王祥家有一棵红柰¹树，果实快成熟的时候，继母让他去看守，风雨来时，王祥抱树大哭，唯恐果子掉落。即使如此，他也未曾怨恨继母，他就是这样一位忠厚孝顺之人。

东汉末年，战事频发，为避战乱，王祥搀扶着继母、带着弟弟王览逃难到庐江。隐居三十多年后，继母去世，服丧期满，仍不肯出仕为官。后来在弟弟王览的劝导下，年近六十，才应召出仕。曹魏之时，升任太尉。晋武帝继位之后，出任太保²。《蒙求》下卷中也有关于王祥的简单记载，名为《王祥守柰》。

护兄的王览

王览，字玄通，余姚王家始祖，和王祥是同父异母兄弟。母亲朱氏对王祥不好。王览五六岁时，每见哥哥被母亲鞭挞，都会哭着向前抱住哥哥，阻止母亲施暴。少年时，经常劝谏母亲，朱氏也因此而有所收敛。朱氏经常毫无道理地使唤王祥，王览就跟着一起干活。朱氏还虐使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于是也帮着一起去做事。朱氏发现之后，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之后，王祥渐渐有了名气。朱氏对此深为嫉恨，想用毒酒害死王祥。王览察觉后，立即起身去争夺哥哥的酒杯。王祥也怀疑酒中有毒，所以执意不给弟弟。朱氏立时夺下酒杯，返回里屋。自此之后，朱氏做给王祥吃的饭菜，王览都要先尝一下。朱氏担心王览会被毒死，于是就断了下毒的念头。王览孝友恭恪，声名稍逊于王祥。

后来王览出仕做官，升任光禄大夫。《蒙求》上卷中记载了王览的事迹，名为《王览友悌》。朱熹在《小学·善行》中也记述了王祥、王览两兄弟的故事。明代百姓都熟知王祥、王览的孝行和友悌，王阳明应该也不会例外。

始祖的孝道与阳明的解释

王阳明的继母也曾虐待过他。王阳明正是因为对孝道的切身感受，所以才从佛教和老庄思想中解脱出来，转投儒学。因此，从孝悌方面来说，将王览认作王家的始祖，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从舜时起，就有虽遭继母虐待但依然尽孝的佳话。舜的父亲瞽叟和继母不喜欢他，而喜欢舜同父异母的弟弟象。象数次谋划杀害舜，但每次都失败了。舜发觉之后，没有记恨象，依然尽心孝顺父母。关于舜的孝悌之行，《尚书·尧典》有如下记载：“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对于以上这段话，朱熹弟子蔡沈在《书经集传》中如此解释：“舜父号瞽叟。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母，舜后母也。象，舜异母弟名。傲，骄慢也。谐，和也。烝，进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为奸恶也。”

蔡沈将“不格奸”解释为“不至大为奸恶”，而王阳明则将其理解为“不去正他奸恶”。原文是“舜只是自进于义，以义薰蒸，不去正他奸恶”。（《传习录》下卷）

阳明又补充说：“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是根据自身经历做出以上解释的。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朱熹和王阳明教化方法的差异。王阳明还说：“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传习录》下卷）

其实这是王阳明到晚年才做出的解释，年轻时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三十七岁时曾著《象祠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其中关于“不格奸”的解释和蔡沈相同，都是“不至大为奸恶”。

王阳明十三岁丧母，父亲的小妾经常虐待他，他就想出各种奇招去对付，最终促其继母悔悟。从中可以看出，少年时的阳明与王祥、王览是不同的。晚年的阳明，随着人生阅历的积淀，转变认识，开始赞同王祥、王览的举动，所以才有了对舜之孝行的那一番解释。

远祖名臣王导

王导（276—339），字茂弘，谥号文献公，王览之孙，王裁之子。东晋元帝时，出任丞相，明帝、成帝时，出任司徒、太傅。《晋书》卷六十五为其立传，《蒙求》也有其传记，名为《王导公忠》。

王导年少时就风姿飘逸，见识器量清越弘远。陈留高士张公见到他后非常惊奇，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当元帝还是琅玕王时，就和王导关系密切。当时王导察觉天下已经大乱，于是全心全意地辅佐琅玕王，立下兴复朝纲的志向。元帝移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市）之后，吴越人士多不归顺，王导又和堂兄王敦一起宣示帝威，促其归顺。

西晋崩溃之际，大批中原士子携带家眷逃往江南避难。王导就从中挑选贤士，让他们辅佐国事。东晋建国后，王导出任丞相。元帝称颂他：“卿，吾之萧何也。”

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坚辞不受。他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元帝这才作罢，任命王导为司空³。《蒙求》将王导的传记定名为《王导公忠》，也正在于此。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后，人生一度跌入低谷。在此期间，他做了一首《纪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假托东晋忠臣郭璞梦中向自己示诗，来批判王导：“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

王阳明为什么不顾社会舆论，假托郭璞之言，来批判自己的先祖呢？

据历史学家研究，王导曾遵照元帝的遗诏辅佐明帝和成帝，出任司徒和太傅，并受封为始兴郡公。王导完善学校制度以教化百姓，设置史官以保存文献，劝元帝打消废嫡之念，规劝堂兄王敦不要谋反，王敦谋反后，又率全家向朝廷请罪。苏峻之乱⁴后，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王导主张宽容政治，积极调和江南豪族与南迁北方大族的关系，为东晋的稳固奠定了基础。南迁士人经常慨叹南北之间风土人情之异，王导总是劝导他们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王敦（266—324），字处仲，王基之子，王导堂兄，与王导共同辅佐司马氏的江东政权。东晋元帝登基之后，身居要职。后杜弢叛乱，王敦和陶侃一起平定杜弢之乱，受封镇东大将军。

王敦内达恭谨，喜好清谈，从不谈论财色，因此声名远播。在平定南方之乱的过程中，立下大功。手握重兵之后，就萌发了夺权篡位的野心，以清君侧为名进攻建康。明帝时，自任江州牧，将相全部出自门下，最后以讨伐温峤为名，举兵叛乱。结果被明帝击败，最终病死。

阳明梦中出现的郭璞又是何许人？郭璞（276—324），字景纯，郭瑗之子，河东闻喜人，东晋著名诗人和卜筮学家。郭璞博学有高才，善辞赋，辞赋被誉为东晋之冠，卜筮也堪称当时之首。早年曾参与王导的军事活动，元帝每遇大事，必求郭璞占卜。后来出任王敦的记室参军，王敦叛乱时也曾求其占卜。郭璞告诫他万万不可，“明公起事，必祸不久”。王敦大怒，杀之。郭璞曾著《洞林》《新林》和《卜韵》，并为《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和《楚辞》作注。

根据以上所述，王导劝诫王敦不要谋反，且在王敦叛乱之后举家请罪，真真切切是一代名臣。郭璞也是因为劝诫王敦不要起兵，所以才落得惨死的下场。按道理，郭璞应该对王敦充满仇恨，而不是对王导。可是在阳明《纪梦》的序中，郭璞却对王导充满怨恨，所以才托梦示诗。如果王阳明所述为事实的话，那王导肯定有不臣之处。王阳明作为王家的子孙，为什么要假托郭璞

来批判自己的祖先呢？

王阳明少时不喜读书，父亲王华曾告诫他“吾家世以读书显”。此外，弘治十五年（1502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为叔父王袞写过一篇墓志铭《易直先生墓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其中提到：“吾宗江左以来，世不乏贤。自吾祖竹轩府君以上，凡积德累仁者数世，而始发于吾父龙山先生。”

王阳明父子所感受到的祖先之德，其实是指王纲之后的祖先。《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三十八的《世德纪》为王纲之后的每一位祖先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世德纪》中的《海日先生行状》和《王文成公全书》的《年谱》中都将王览以及他的曾孙王羲之视作王家的远祖，所以王阳明父子也应该会将王导视为其远祖。

王阳明在《纪梦》的序中记述了王导是王敦叛乱的幕后黑手一事，但是在流传下来的王导的传记中，都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如果王导与王敦叛乱真的毫无关系的话，王阳明是不会写的。为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呢？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舆论认为王导是忠臣，所以史官在写史时刻意将王导的不臣之实忽略了。

王阳明身为王家子孙，却假借托梦之举对祖先提出批判，这种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当时的王阳明已经历经千难万险，“良知”说的思想也已显现雏形。王阳明批判祖先王导，可能是他仅凭“良知”所做出的一种举动，并没有其他的意图。对此，一些学者有不同意见。曾著有《阳明先生传纂》的余重耀先生认为，王阳明这是在借古讽今，假借托梦来讽刺奸邪谗佞之人。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王阳明作为一名忠臣，对向武宗进献谗言的小人肯定充满愤懑，《纪梦》一诗也许是为了表达这一层意思。

王阳明在《纪梦》的序中写道：“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阁，忽梦晋忠臣郭景纯氏以诗示予，且极言王导之奸，谓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其言甚长，不能尽录。觉而书其所示诗于壁，复为诗以纪其略……”

接下来是王阳明写的这首诗：

秋夜卧小阁，梦游沧海滨。
 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银宫阙高嶙峋。
 中有仙人芙蓉巾，顾我宛若平生亲；
 欣然就语下烟雾，自言姓名郭景纯。
 携手历历诉衷曲，义愤感激难具陈。
 切齿尤深怨王导，深奸老猾长欺人。
 当年王敦觊神器，导实阴主相缘夤。
 不然三问三不答，胡忍使敦杀伯仁？
 寄书欲拔太真舌，不相为谋敢尔云！
 敦病已笃事已去，临哭嫁祸复卖敦。
 事成同享帝王贵，事败乃为顾命臣。
 几微隐约亦可见，世史掩覆多失真。
 袖出长篇再三读，觉来字字能书绅。
 开窗试抽《晋史》阅，中间事迹颇有因。
 因思景纯有道者，世移事往千余春；
 若非精诚果有激，岂得到今犹愤嗔！
 不成之语以箴戒，敦实气沮竟殒身。
 人生生死亦不易，谁能视死如轻尘？
 烛微先几炳易道，多能余事非所论。
 取义成仁忠晋室，龙逢龚胜心可伦。
 是非颠倒古多有，吁嗟景纯终见伸！
 御风骑气游八垠，彼敦之徒草木，
 粪土臭腐同沉沦！

最后，阳明记述了梦中郭璞展示给自己的诗：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来事。
时人不我识，遂传耽一技。
一思王导徒，神器良久觊。
诸谢岂不力？伯仁见其底。
所以敦者侔，罔顾天经与地义。
不然百口未负托，何忍置之死！
我于斯时知有分，日中斩柴市。
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
九天一人抚膺哭，晋室诸公亦可耻。
举目山河徒叹非，携手登亭空洒泪。
王导真奸雄，千载人未议。
偶感君子谈中及，重与写真记。
固知仓卒不成文，自今当与频谑戏。
倘其为我一表扬，万世万世万万世。
右晋忠臣郭景纯自述诗，盖予梦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可以看出，这是王阳明在假托郭璞来表白自己的内心。

书圣王羲之

王家始祖最初居于山东琅玕县，至王羲之时，迁至浙江会稽山阴县，到二十三代王寿时，又迁到余姚县。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被后人尊称为“书圣”。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书法家因为临摹王羲之的法帖，书法日益精进。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曾出任右军将军和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羲之不仅草书和隶书冠绝古今，文章也是精美绝伦，曾作有《兰亭⁵序》、《乐毅论》和《黄庭经》等。其子王献之也擅长书法，所以世人常将王羲之父子合称为“二王”。

在王羲之的所有书法作品中，以《兰亭序》最为有名，这是他用行书为《兰亭集》作的序文。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谢安等四十一位名士齐集会稽兰亭，饮酒作诗，好不痛快。后来，他们将此次所作的所有诗歌辑成一个集子，取名《兰亭集》，并由王羲之亲自为其作序。

《兰亭序》的真迹后来流传到酷爱书法的唐太宗手中，按照唐太宗的遗命，《兰亭序》作为陪葬品和他一起下葬，从此在世间绝迹。世人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摹本，但从摹本中，依然能够感受到王羲之的书风。

兰亭离王阳明在绍兴的住宅不远，附近还保存着王羲之的书楼和故居等旧迹。王羲之卸任之后，经常和文人墨客一起登山戏水，足迹遍布绍兴周边。王阳明向来景慕王羲之，这些遗迹他应该也都游历过。王羲之风骨硬朗，王阳明与他有诸多相似之处，无怪乎后来有人说：“阳明景慕远祖，故风骨言行与羲之甚是相似。”

王羲之修习道教养生之术，经常和道士游山玩水，王阳明也是如此。王阳明擅长书法，从其书风中可以窥见王羲之之风韵。

忠臣六祖王纲

王纲是王寿的五世孙，《王文成公全书》的《世德纪》中有其传记。王纲之后的诸位祖先的品行，都或多或少对王阳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王纲是王阳明的六世祖，《明史》卷二八九的《忠义传》中也有其传记。以下将根据《世德纪》中收录的张壹民先生撰写的《王性常先生传》，来介绍王纲的生平。

王纲（1302—1371），字性常，又字德常，弟弟字秉常，又字敬常，二人以文学造诣而闻名于世。王纲有识鉴之才、文武之功。元末，王纲为避兵乱，和母亲避居于五泄山。一天，一道士夜宿他家，王纲发现这道士的气质不同寻常，应该是一位得道之士，所以对他礼敬有加。

王纲问他：“君必有道者，愿闻姓字。”

道士回答说：“吾终南隐士赵缘督也。”

二人彻夜长谈，赵缘督教给王纲占卜之法，并为王纲占卜说：“公后当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终庸下。今能从吾出游乎？”

王纲因为家里还有老母，所以面露难色。道士笑着说：“公俗缘未断，吾固知之。”然后飘然而去。

王纲还与因军功卓著而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诚意伯、以诗文驰名于世的刘伯温是至交好友。

刘伯温是一位著名的儒学家，广涉经书和史书。他中过元代的进士，且一度出仕为官，后来辞官归乡，隐居在家乡青田。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伯温接受朱元璋的邀请出山，向朱元璋献出“时务十八策”。他曾为辅佐

明太祖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官职不断升迁，最终升任为弘文馆学士。洪武三年（1370年），刘伯温在家乡去世。刘伯温是开国文臣，与宋景濂⁶并称为“一代文宗”，其诗歌也足以和高季迪比肩。

当刘伯温还是卑贱之身时，曾经常造访王纲。王纲对他说：“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称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异时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

但是，刘伯温却因爱惜王纲之才，最终向朝廷举荐了他。洪武四年，王纲来到京城，年逾七十的老人齿发精神仍如同壮年。王纲向明太祖提出治国之策，太祖非常高兴，全部采纳，并任命他为兵部郎中。

没过多久，广东潮州地区的百姓起事，朝廷擢升王纲为广东参议，前往广东督兵粮。

王纲写信向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吾命尽兹行乎！”

然后，和儿子王彦达⁷一起踏上前往广东的路。王纲等人乘一艘快船到达潮州，劝诫百姓不要谋反，潮州百姓感激涕零，纷纷叩头服罪。当王纲回到增城时，海盗曹真等人却突然出现。他们敲着大鼓，高喊着口号，列舟行礼，请求王纲出任他们的头领。而王纲却劝诫道：“汝等究竟何许人？当今圣上下诏平定地方叛乱，汝等本是良民，理应在此太平盛世安心生活，却挑起动乱，无疑自谋死路。”

众海盗不听他的劝诫，于是王纲开始厉声斥骂。众海盗挟持王纲而去，并且特意设坛，让王纲端坐坛上，每日一起行礼膜拜，请求他出任首领。王纲不为所动，每日斥骂不止，终被海盗所杀。

当时，王彦达也被海盗掳去，看到父亲被海盗所杀，他痛苦不堪，一边痛哭，一边大声斥骂，要求海盗将自己一并杀死以陪伴父亲。海盗们大怒，打算也杀死他，但海盗的头目却说：“父忠而子孝，杀之不祥。”

海盗给王彦达东西吃，但他却不肯吃。海盗为王彦达的孝心所感动，他们把王纲的遗骸装在一个羊皮袋里，交给王彦达，放他离去。王彦达背负着父亲的遗骸，回到家乡浙江，将父亲葬在禾山（今余姚马渚镇开元村）。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御史郭纯向朝廷详细报告了此事。朝廷决定在增城为王纲立庙，并起用王彦达。但王彦达却痛心于父亲的忠死，遂自号“秘湖渔隐”，耕田养母，粗衣恶食，终身不仕。王纲遇害之时，王彦达年仅十六。

遁世五祖王与准

王与准，王彦达之子，字公度，号遁石，《王文成公全书》的《世德纪》中收录了国子监祭酒⁸胡俨为其作的传记《遁石先生传》。王彦达将其父王纲遗留下的书籍全部传给王与准，并告诉他说：“但毋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

于是，王与准便闭门做学问，熟读了祖父留下的所有书籍。当时乡里后进之士中有一些求学之人想拜他为师，王与准推辞说：“吾无师承，不足相授。”

后来，他来到四明山赵先生王处学《易》。赵先生为他的气节所动，将本族的一位女孩许配给他，并劝他出仕为官。王与准对赵先生说：“昨闻先生‘遁世无闷’（《易·乾·文言》：“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之诲，与准请终身事斯语矣。”赵先生听完之后，颇感惭愧。

前文已述，曾有道士送给王纲占卜之书。王与准闲暇之时，也会捧起这些书，研究一下占卜之术，有时也会给人占上一卦，皆出奇的精准。后来远近之人都来求其占卜，就连县令也派使者前来，请他前往占卜，有时，一日竟达两三次。王与准最终厌恶至极，在使者面前把占卜之书付之一炬。

“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公门，谈祸福。”这一举动招致县令的愤恨，王与准只好逃到四明山的石室中隐遁起来，一年多不归。

当时朝廷正在征召全国的奇才，吏部使者来到余姚，打算起用王与准，可是余姚县令却进谗言说：“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

使者听后大怒，命人拘捕了王与准的三个儿子，并且派人入山搜捕王与

准。王与准获悉之后，就逃往更深的山中，不慎失足跌入山崖，腿部受伤，最终被抓获。王与准虽然身受重伤，但是言行容貌却似平常，这让使者非常惊讶。王与准被抓后详细叙述了自己焚烧占卜书籍、遁入山林的原因。使者明白了真相，释放了王与准，并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

王与准不得不从，只好让儿子王杰到县学补弟子员，而自己则因足部受伤免于处罚。

王与准如此这般希望隐遁，究竟是为何呢？他曾对人说：“吾非恶富贵而乐贫贱，顾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说：“吾非伤于石，将不能遂栖遁之计。石有德于吾，不敢忘也。”因此，后来他自号“遁石翁”。

王与准身材魁伟，长髯飘逸，精通《礼》《易》，著有《易微》。他曾经为自己占卜过一次，遇到“大有”之“震”，遂对儿子说：“吾先世盛极而衰，今衰极当复矣。然必吾后再世而始兴乎？兴必盛且久。”

然后，飘然而逝。

洒脱曾祖王杰

王杰，字世杰，王与准之子。其父曾在门前种植三棵槐树，所以王杰自号“槐里子”，世人尊称他为“槐里先生”。《世德纪》中收录了翰林院编修戚澜为他撰写的《槐里先生传》，前文所述的《遁石先生传》中也有关于王杰的部分记载。

王杰到县学补弟子员，当时的教谕是程晶。程晶负才倨傲，奴视诸生，但在看到王杰时，却面露敬意。他对人说：“此今之黄叔度也。”

黄叔度是指东汉的黄宪，十四岁时就有人夸赞他几乎可以和孔子的高徒颜回相比肩。

有一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县里的官员都觉得王杰一定能够考取。可在王杰到京城后，发现书生们因过于勤奋，都披发袒衣，形容枯槁，他叹道：“吾宁曳履衡门矣。”于是归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发布诏书，要求各地举荐能够对社会施以教化的有才之士，若有此种人才，可以破格任用。当时的余姚县令黄维雅打算举荐王杰，并为他准备了行李和仆从。可王杰却以家中尚有老父为由推辞不受，并将这机会让给了好友汪叔昂。

父亲遁石翁去世之后，县里又举荐他，他又以家中尚有老母为由推辞不受，将机会让给了好友李文昭。王杰一边耕田一边教授弟子，生活清苦，经常断顿，但仍安然自若。由于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其母在临死之前留下遗言：“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毋忘吾言！”

王杰遵照母命，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接受地方举荐进入南京国子监。

祭酒陈敬宗见到王杰之后，对他施以友人之礼，不把他列入弟子之列。翌年，王杰被推荐到朝廷做官，还没到任，就去世了。

王杰容貌秀丽，秀目美髯，远远望去貌似神人。无论贤愚亲疏，他都一视同仁，敬爱有加。他以古时圣贤为榜样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曾经对弟子说：“学者能见得曾点（曾皙）意思，将洒然无人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

《论语·先进篇》中记载有曾子的故事。有一天，孔子让子路、冉有、公西华和曾子各述其志，曾子之外的三人都陈述了自己的施政理想，唯独曾子与众不同，他在最后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喟然叹息曰：“吾与点也！”

由上述可知，王杰非常羡慕曾子的超脱和洒落。

王杰著有《槐里杂稿》《易春秋说》和《周礼考正》。撰写《槐里先生传》的戚澜的父亲冷川和王杰是好友，他极力夸赞王杰的《易春秋说》和《周礼考正》，称其为“近世儒者皆所不及”。

冷川在与其他人品评人物时，也称赞王杰是“当世之第一”。

国子监祭酒胡俨也称颂王杰说：“古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诚于世杰见之，异时求当天下之大任者，非世杰而谁乎？”

祖父竹轩先生

王伦（1421—1490），字天叙，王杰之子，王阳明祖父。《世德纪》中收录了布政使⁹魏瀚为他撰写的《竹轩先生传》。

王伦生而好竹，在自家房子周边遍植竹子，每日在竹林中吟啸诗歌，世称“竹轩先生”。王伦淡泊名利，早年秉承父训，终成德才兼备之人。二十岁时，浙江各地富贾大户争相邀请王伦教育自己的子弟，凡是经他授业点拨的学生，其德行和学业都有明显长进。

父亲王杰英年早逝，所以王伦少时家中十分贫穷，父亲留给他的仅是数箱书籍。每当王伦打开书箱，都会暗自垂泪，他对自己说：“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

于是王伦刻苦读书，尤其喜欢《仪礼》《左传》和《史记》。

王伦擅长弹琴，每当风清月朗之时，都会焚香弹上数曲。之后咏诵诗歌，让弟子和之。

王伦心胸坦荡，认识他的人都说其有晋代陶渊明、宋代林和靖（林逋）之风。王伦的生活也很清苦，靠教授弟子来维持家用。

王伦的母亲非常严厉，但性格和善，每遇亲戚中的丧父小儿，她都会给予深切的爱怜。王伦也深知母亲心意，每次都会积极地提供衣食，但却无暇顾及自家的饥寒。在弟弟王粲还很小的时候，父亲王杰就去世了，所以母亲对弟弟格外爱护。王粲幼年时，王伦在家塾里亲自教他，等他长大了，王伦就带着他一起游历天下，同甘共苦。

后来，王伦的儿子王华出任翰林，王华向朝廷请求将自己的俸禄分给父

亲，而王伦却拿出其中一半用来照顾同族的子弟。当时乡里有同族起纠纷者，听说王伦的事迹后，都备感惭愧，最终恢复了亲睦关系。

王伦身材魁伟，细目美髯。与人交际时，蔼然可掬，但对门人弟子，则矩范严肃，凛然不可犯。王伦做文章喜欢简素古意，讨厌浮躁华美。作诗提笔立就，不拘泥于章法，但亦不会脱离于规范之外。王伦著有《竹轩稿》和《江湖杂稿》若干卷。其子王华后来身居要职，出任翰林院修撰和礼部右侍郎。

父亲龙山先生

王华（1446—1522），王伦之子，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又号“海日翁”，曾在龙泉山的寺庙中读书，所以后人又尊称其为“龙山先生”。

《世德纪》中收录了王华的弟子国子监司业陆深撰写的《海日先生行状》以及大学士杨一清¹⁰撰写的《海日先生墓志铭》。明末清初，墨憨斋写了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其中也有很多关于王华的小故事。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海日先生墓志铭》是将《海日先生行状》中的一些内容抄录整理之后写成的。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九月，王华降生。出生前夜，祖母孟氏（王杰之妻）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婆婆（王与准之妻）赵氏身穿绯衣，腰佩玉带，怀抱一个童子朝自己走来。婆婆把童子放入她手中说：“妇事吾孝，孙妇亦事汝孝。吾与若祖丐于上帝，以此孙畀汝，世世荣华无替。”

于是婴儿出生之后，取名为华。王华的长兄名荣。通过两个孩子的名字，可以看出王家对荣华富贵的憧憬。

自王彦达以来，王家世代隐遁，生活贫困。王杰的母亲留下遗愿“吾死，尔必仕”，家族女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对荣华的憧憬。到王华这一代，王家终于实现了荣华之愿。

王华生得聪明俊敏，会说话后，祖父王杰经常抱着他教授诗歌，每次听完，他都能够背诵出来。等他年龄稍长，家人让他读书，他皆能过目不忘。

有时，母亲在窗下织布，王华就会坐在旁边读书。有一天，恰逢迎春佳日，孩童们都外出游玩，唯独王华在家读书不辍。母亲问他：“若亦暂往观乎？”

王华回答道：“大人误矣，观春何若观书？”

母亲听后大喜，对他说：“儿是也，吾言误矣。”

关于王华少年时期的传说还有很多，以下是《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相关记载。

王华六岁时，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水边玩耍。这时，一个醉汉来到水边洗脚，洗完之后扬长而去。王华最先发现那名醉汉落了东西，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个钱包。他用手掂了一下，沉甸甸的，里面有好多金子。王华当时就想，这肯定是那名醉汉落下的，等他酒醒了，一定会回来找的，但他又怕被小伙伴们抢去，所以就把钱包扔进了水里。

小伙伴们跑过来问他：“汝投水是何物？”

王华撒谎说：“石块耳。”

小伙伴们玩毕，到吃晚饭的时候，就招呼王华一起回去。王华假称自己肚子疼，没和大家一同走，而是坐在岸边静静地等那醉汉前来寻找。等了好一会儿，那醉汉酒醒后意识到自己丢了钱包，号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回来寻找。王华站起来问他：“汝求囊中物耶？”

醉汉回答说：“然。童子曾见之否？”

王华告诉他：“吾恐为他人所取，为汝藏于水中。汝可自取。”

醉汉把钱包从水里捞出来，打开一看，里面分文未少。醉汉感到非常惊讶，就对王华说：“闻古人有还金之事，不意出自童子。”

于是醉汉取出一小锭金子，作为对王华的酬谢：“与尔买果饵吃。”

王华不要，笑着说：“吾家岂乏果饵，而需尔金耶？”说完，扬长而去。回家之后，也没有将此事告知父母。

《海日先生行状》和《海日先生墓志铭》的记载与以上所述稍有差异。据两文记载，最后王华对那名醉汉说：“不取尔数十金，乃取尔一金乎？”醉汉感到非常惭愧，便跟随王华回到家中，对王华家人无论老少一概鞠躬敬拜。

据上所述，可见王华少年时代的品德。

十一岁时，王华师从乡里的塾师钱希宠学习。初学对句。一个月后，学

作诗。两个月后，学写文章。数月之后，塾生中已无人能及王华的才学。塾师赞叹说：“岁终吾无以教尔矣。”

有一次，县令率随从视察私塾，塾生们见后都抬头看热闹，唯有王华不为所动，依然伏案朗读课文。钱希宠感到非常惊奇，就跟他开玩笑说：“令亦人耳，视之奚为？若诵书不辍，彼亦便奈呵责也？”

王华借用父亲王伦的话说：“公子德器如是，断非凡儿。”

十四岁时，王华和数名亲友一起在龙泉山的一座寺庙中读书。寺庙古旧，有妖怪作祟。同读的亲友都是富家子弟，向来自负为豪侠，不相信寺庙里有妖怪，还经常欺侮寺庙的僧人，弄得僧人苦不堪言。第二天晚上，妖怪出来伤数人。

寺僧趁此机会夸大其事，搞得人心惶惶，同读的人仓皇而逃。唯独王华没有逃跑，他独自一人留在庙里，一如往常，妖怪再也没有出现过。寺僧感到很诧异，于是每晚都会登上房顶，大笑狂叫，或者用瓦片、石块投掷王伦的卧榻，或者借风雨雷电之夜，敲击王华房间的墙壁，想尽一切办法吓唬他，想看一下他有什么反应。

透过墙壁的间隙向里窥望，寺僧发现王华正襟危坐，神态自若，丝毫不为所扰。寺僧虽然都赞叹不已，但还是变着法子吓唬他，结果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当寺僧所有手段都用尽了之后，便问王华：“向妖为祟，诸人皆被伤，君能独无恐乎？”

王华回答说：“吾何恐？”

寺僧又问：“诸人去后，君更有所见乎？”

王华回答说：“吾何见？”

寺僧再问：“此妖但触犯之，无得遂已者，君安得独无所见乎？”

王华笑着回答说：“吾见数沙弥为祟耳。”

寺僧闻之，相顾色动，怀疑王华已经发现了他们做的“好事”，于是继续打探道：“此岂吾寺中亡过诸师兄为祟邪？”

王华笑着说：“非亡过诸师兄，乃见在诸师弟耳。”

诸寺僧回应道：“君岂亲见吾侪为之？但臆说耳。”

王华反驳说：“吾虽非亲见，若非尔辈亲为，何以知吾之必有见邪？”

众僧人听后惭愧无比，向王华道歉说：“吾侪实欲以此试君耳。君，天人也，异时福德何可量？”

这一传说在《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是另外一个版本：“年十四学成，假馆于龙泉寺。寺有妖祟，每夜出，抛砖弄瓦。往时借寓读书者，咸受惊恐，或发病，不敢复居。公独与一苍头寝处其中，寂然无声。僧异之，乘其夜读，假以猪尿泡涂灰粉，画眉眼其上，用芦管透入窗棂，嘘气涨泡，如鬼头形。僧口作鬼声欲以动公。公取床头小刀刺泡，泡气泄。僧拽出，公投刀复诵读如常，了不为异。闻者皆为缩舌。”

才学毕显，任教祁阳

天顺六年（1462年），王华十七岁，以“三礼¹¹”参加乡试，文章优秀。数日之后，县令特意复试王华，出题之后，王华一挥而就。县令怀疑他可能押对了题，考试之前就已做好了答案，所以三度出题，但每次出题，王华都能立刻写出答案。县令惊奇不已，赞叹道：“吾子异日必大魁天下。”

此后，远近豪强大族皆备好礼，争相邀请王华教育自己的子弟。

有一次，松江提学张时敏测试余姚学子，王华和谢迁共登榜首。张时敏夸奖说：“二子皆当状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

结果真的如他所言，谢迁后来出任少傅，是仅次于太傅的辅佐官。

浙江左布政使祁阳人宁良请张时敏为自己的儿子推荐老师，张时敏推荐了王华，并说：“但求举业高等，则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学行兼优，惟王某耳。”

当时王华不过二十来岁，宁良亲自上门，奉王华为上宾，请求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王华来到祁阳之后，湖南之士数十人前来拜访，拜其为师。

王华在祁阳期间，住在梅庄别墅，别墅内的藏书多达数千卷。王华日夜

诵读这些书籍，三年未曾出门。永州陈氏听闻王华是笃学之士，就特意到梅庄别墅请教。陈氏随意取出其中任何一本书来提问，王华都能对答如流。陈氏惊叹道：“昔闻‘五经笥’，今乃见之。”

祁阳有叫妓女陪酒的习俗，王华对此极为反感。王华在祁阳待了三年，离别之际，祁阳士人在旅馆为他践行，并偷偷将两名妓女藏于岸边。客人散去之后，两名妓女悄悄出现在王华身边。王华呼舟不得，于是卸掉门板，扶着门板渡河而去。世人为王华的态度所折服。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与上述不同，大意是：

有位富豪听闻王华的美名，就把王华请到自己的馆舍来住。一天晚上，一位美姬突然出现在王华的卧室，王华惊讶异常，避之唯恐不及。

美姬说道：“勿惊讶，我乃主人之妾也。因主人无子，欲借种于郎君耳。”

王华回答说：“蒙主人厚意留此，岂可做此不肖之事。”

美姬从袖中取出一扇，说：“此主人之命也，郎君但看扇头字当知之。”

王华看了一下扇面，确实是主人的亲笔，上面写着：“欲借人间种。”

王华看罢，在后面加了一句：“恐惊天上神。”然后，厉色将美姬斥退，美姬怅怅而去。

故事还没结束，后来那名富豪为求子嗣又请来巫师为其祈祷，巫师在祷告期间睡了好一会儿。等他醒来后，富豪问他原因。巫师回答说：“适梦捧章至三天门，遭天上迎状元榜。久乃得达。故迟迟耳。”

富豪忙问状元是谁，巫师对他说：“不知姓名。但马前有旗二面，旗上书一联云：欲借人间种，恐惊天上神。”

富豪惊愕不已。

状元的仕途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三十六岁的王华考中状元。此前，王华从祁阳归乡之后，屡次参加乡试，但都名落孙山。成化十六年，王华参加浙江省乡试，考得第二名。翌年，参加殿试，考取头名。

尚书省和礼部每隔三年会在京城举行由各省举人参加的官吏选拔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中合格的举人被称为进士。王华在殿试中取得头名，高登状元榜。考中进士是一族的荣耀，考中状元更甚。一旦成为进士或状元，就可以保证整个家族的荣华。

考取当年，王华就被授以翰林院修撰。成化二十年，又被授殿试弥封官。（弥封官是负责将参加殿试考生的试卷上的姓名部分用纸糊上，并写上编号的官员。）成化二十三年，王华出任会试主考官。所谓会试，是指将各省举人汇集到京城进行的中央考试。在会试中合格的考生，被称为“贡生”。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王华参与编写《宪宗实录》，出任经筵讲官，负责给皇帝讲读经书。

弘治二年，本应加官晋爵之际，王华忽闻父亲竹轩公病倒的消息，便立即请求辞官，希望回家照顾父亲。朝廷和身边好友都劝他不要辞官，王华说：“亲有疾，已不能匍匐归侍汤药，又逐逐奔走为迁官之图，须家信至，幸而无恙，出岂晚乎？”

弘治三年，王华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即日南归，将父亲安葬在穴湖山，还在墓地旁边搭建起一间草屋为父亲守墓。据说，该墓地原是一处虎穴，老虎经常结队前来，但从不伤害王华，时间一长，老虎和王华也熟悉了，经常在小屋旁睡觉，人畜互不相犯，众人都认为这是老虎受王华感化的缘故。

弘治六年，王华为父亲守丧期满，重新出仕为官，升任右春坊右谕德¹²，后来又被任命为经筵讲官。在此期间，他向明孝宗进献《劝学疏》，王华在其中写道：“今每岁经筵不过三四御，而日讲之设，或间旬月而

始一二行，则缉熙之功，无亦有间欤？虽圣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颐所谓涵养本原，熏陶德性者，必接贤士大夫之时多，而后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也。”

孝宗对此大加赞赏，欣然接纳。

弘治九年三月，王华被皇帝任命为每日进讲的日讲官。王华进讲时，声音洪朗，言辞贴切。他每日讲授圣人之学，规劝皇帝勤奋学习，远离逸乐，亲贤远佞。当时负责向皇帝进讲的还有数人，有些人在进讲之前会准备良久，但见到皇帝之后，还是会紧张失色，而王华则不做丝毫准备，进讲时仍是雄辩异常，滔滔不绝。

一天，皇帝端坐御座，听日讲官进讲，当值的日讲官突然晕倒，意识全无，众人狼狈不堪，忙推荐王华代讲。王华从容来到书桌前，打开书本，整理了一下仪容，开始进讲，博得同行们的一片叹服。

当时宦官李广得宠。有一次，王华进讲《大学衍义》¹³，其中有一段讲的是唐朝李辅国受唐肃宗宠爱，坏事做尽，还勾结张皇后，祸乱朝政的事。当讲到这一段时，周围的侍臣都竭力阻止他，以免触怒李广，但王华却全然不顾，他字正腔圆地大声诵讲这一段，毫无停止之意，身边大臣都缩头吐舌，惊恐不已，而明孝宗却听得津津有味。进讲完毕后，明孝宗还特意赐给他美食。

弘治九年四月，受诸位公卿推荐，王华升任东宫辅导。弘治十一年三月，他兼任东宫讲读，并且还出任顺天府的乡试官。弘治十四年，他又出任应天府的乡试官。弘治十五年，他担任翰林院学士，负责为皇帝拟定诏书，这其实是一个名誉官职，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获得这一职位。王华还受命指导鲁铎等庶吉士的学业。（庶吉士是指从进士中挑选出来的，在翰林院任职的人员。）此外，他还受命参与编写《大明会典》，并于弘治十六年完成。

弘治十六年，王华出任詹事府的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负责东宫内外的日常事务。同年五月，他参与编纂《历代通鉴纂要》¹⁴。六月，又升任礼部右侍郎，兼日讲官。王华的讲义主旨鲜明，内容丰富，深受明孝宗的喜欢，所以才能长期担任主讲官之职。

弘治十八年，他奉命祭祀江淮诸神，途中顺便回家省亲。还朝后，他以母亲岑氏年老为由，数次提出还乡意愿，但都没有被准允，后来还被升任为礼部左侍郎。

弘治十八年夏天，明孝宗驾崩，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武宗继位，翌年，改年号为正德。当时，宦官刘瑾专权，只要有人冒犯了他，就会立刻被投入监牢，真可谓刘瑾的一呼一吸都事关他人的祸福。很多士大夫都投奔其门，以求免祸自保。但王华却不这样做，这让刘瑾耿耿于怀。

当时，王华之子王阳明是兵部主事，因为上书为狱中之人求情，触怒了刘瑾，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当刘瑾还是卑贱之身时，曾跟随王华的一位同乡学习书史，从那人处听说王华的忠孝仁义，所以一直以来都对王华非常仰慕。后来获悉王阳明是王华的儿子之后，对王阳明的怒气也缓和了些许。刘瑾派人告诉王华：“吾于先生有旧，若一见可立跻相位。”

王华断然拒绝，这更加激怒了刘瑾。正德二年（1507年），王华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刘瑾又派人前来道贺，并说：“不久将大召。”却仍被王华拒绝。刘瑾怒不可遏。但刘瑾费尽心机也找不出治王华罪的理由，后来翻出一件王华任职礼部时的陈年旧事，虽然与王华毫不相干，还是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逼迫王华辞职。王华闻听，欣然同意，并说：“吾自此可免于祸矣。”

王华的性行与学识

有一次，王华的同年好友向朝廷污毁王华。大家都劝王华向朝廷阐明自己的清白，但他却不肯这样做：“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讪其友矣。是焉能挽我哉？”

后来，王阳明回到京师，官复原职，听闻士大夫们言及此事，就打算向朝廷上书，替父亲辩明此事。王华修书一封，反劝王阳明确说：“是以为吾平生之大耻乎？吾本无可耻，今乃无故而攻发其友之隐私，是反为吾求一大耻矣。人谓汝智于吾，吾不信也。”

王华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修边幅，谈笑议论由心而发，朝廷之上，家庭之内，言无两样。只要他人有些许优点，王华都会给予夸赞；若听闻他人有危难，他的内心就会焦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济。而他人有过失，王华也会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王华时常遭人嫉恨，但当大家知道他是出于真心之后，对他也就不那么怨恨了。

王华才识宏达，志操坚守，无论诸事多么纷杂，他都能够从容应对。即使大事发生，他也能做到临危不乱，从容以对。不过，王华从不刻意去表现自己的这些优点，所以知者甚少。

王华生活节俭，不计较利害得失。有一次，家中失火，资财付之一炬，当亲友前来救火时，他依然和往常一样和大家谈笑风生，毫无慌乱之举。众人都由衷地佩服他的性行和度量。

王华作诗文，提笔立就，以达意为旨，追求自然，不事雕琢，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诸书杂录》《进讲余抄》和《海日翁日记》等。

前文已述，王华获悉父亲患病，便立即辞官归乡。父亲去世后，他又在墓旁建造草屋，不惧虎威，诚心守孝。后来为刘瑾所逼，被迫辞官，此时已年逾七旬，母亲岑氏也年近百岁。王华朝夕陪伴母亲，还经常扮小儿状逗母亲一乐。他为母亲按摩，陪母亲散步，寸步不离其左右。有时受朋友之邀外出游山玩水，船刚离岸，王华忽念家中老母，就会立刻反棹驶回。

母亲去世之后，王华以土块为枕，草毡为被，捶胸顿足，悲恸大哭，最终因悲伤过度而得病。母亲出殡之时，王华裸足前行数里山道，病情益甚，进而卧床不起。数年之后才慢慢康复，但身体已日渐衰弱。

王华以圣贤之书为本，从不涉猎儒家经典之外的异端书籍。辞官归乡之后，来客中有人劝他修习神仙长生之术，王华拒绝说：“人所以乐生于天地之间，以内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亲，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从游聚乐，无相离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此与死者何异？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圣贤之学所自有。吾但安乐委顺，听尽于天而已，

奚以长生为乎？”

来客道歉说：“神仙之学，正谓世人悦生恶死，故其所欲而渐次导之。今公已无恶死悦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术无所用矣。”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王华素闻宸濠之恶，早就怀疑他会叛乱。有一次，他对亲友说：“异时天下之祸，必自兹人始矣。”

他让家人在浙江上虞的龙溪置地，买田筑屋，为将来的隐遁生活做打算。

但是，事与愿违，宸濠最终叛乱，数千艘舰船向东挺进。当时王阳明正在赣州，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剿灭当地乱军，但当抵达丰城之后，获悉宸濠已起兵谋反，所以不再前行，留在丰城传檄近邻，招募义兵，间不容发，举兵勤王。在此期间，王阳明遇害的消息在民间散布流传，有人劝王华到龙溪避难，但王华却说：“吾往岁为龙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儿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于天地乎？”并且告诫家人要注意自身的言行。

后来，王阳明起兵勤王的檄文传到家乡，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由于王阳明已成宸濠之敌，宸濠极有可能派刺客前来刺杀王华，所以众人都劝王华速回龙溪避难，但王华却笑着说：“吾儿能弃家杀贼，吾乃独先去以为民望乎？祖宗德泽在天下，必不使残贼覆乱宗国，行见其败也。吾为国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敌。倘不幸，胜负之算不可期，犹将与乡里子弟共死此城耳。”

王华还派人告知郡县主事，宜速调兵粮，禁止谣言，以防民心动摇。

王阳明率军攻陷叛军的根据地南昌之后，本欲攻击南京的叛军，获悉南昌失守，立即撤军反攻。王阳明和叛军在鄱阳湖决一死战，最终将其一举歼灭，宸濠和数千叛军被俘。

不到一个月，王阳明战胜的消息就传回家乡，亲戚友人纷纷携酒前来祝贺，而王华却说：“此祖宗深仁厚泽，渐渍人心，纪纲法度，维持周密，朝廷威灵，震慑四海，苍生不当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间，罪人斯得，皆天意也。岂吾一书生所能办此哉？然吾以垂尽之年，幸免委填沟壑；家门无夷戮之惨；

乡里子弟又皆得免于征输调发；吾儿幸全首领，父子相见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

后来，杨一清曾对王阳明父子的大度和忠义大加赞赏，他在文中写道：“自古奸雄构乱，虽有忠臣义士，必假以岁月，乃能削平祸难。伯安奋戈一呼，以身临不测之渊，呼吸之间，地方大定。公闻变从容，群嚣众惑，屹然不为动。伯安得直前殉国。不婴怀回顾以成懋绩。公之雅量，伯安之忠义，求之载籍，可多见哉？”

当时，尽管王阳明已经擒获宸濠，但明武宗还是想亲自出征，过一把征讨之瘾。王阳明对宦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使很多人丧命，最后折中的结果是在明武宗到达南京后，放出宸濠，让武宗亲自抓获宸濠，以取悦武宗。然而，明武宗身边的奸党嫉妒王阳明的功绩，想嫁祸于他。奸党们蠢蠢欲动，一时间流言四起，王阳明危在旦夕。

甚至有人到王华家中，调查记录资产、房屋、壮丁和家畜等情况，打算抄家没收。亲朋好友都惊恐万分，不知如何才好。唯独王华安然自若，在家静心休养，并嘱咐家人不要外出，要谨言慎行。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继位，发诏肯定王阳明的功绩，并把他召回京城。王阳明回京途中顺便回乡省亲。

后来，明世宗任命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并封他为新建伯。朝廷派人赐给王阳明一些银子和丝织品作为嘉奖，同时也赐给王华一些羊肉和美酒。

有一次，王华过生日，亲朋好友云集，王阳明举杯祝寿。王华郑重地说：“吾父子乃得复相见耶！贼濠之乱，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以为事难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灵，朝廷威德，岂汝一书生所能办。比谗构横行，祸机四发，赖武庙英明保全。今国是既定，吾父子之荣极矣。然福者祸之基，能无惧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与犯盈满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耶？”

阳明跪拜回应道：“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

众人听后，无不感动。后来王华又召集村邻和友人，举行酒宴，长达月余。

正德十六年岁末，王华旧病复发，王阳明和诸弟日夜服侍左右。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王华病情恶化，于二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临终之际，王华突然意识清醒，毫无半点昏聩之状。

朝廷念及王阳明之功，追授其父王华、祖父王伦和曾祖父王杰皆为新建伯。去世当天，恰有吏部使者持公文前来，王华气色突变，忙令王阳明等人外出迎接，并对孩子们说：“虽仓遽，乌可以废礼？尔辈必皆出迎。”

听闻王阳明等人行礼完毕后，王华安然闭目离世。绍兴东边有一山，名天柱峰。翌年八月，王阳明和诸弟将王华安葬于天柱峰南侧的一块平地里。

王华生前曾说：“惟古贤人君子未遇之时，每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际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为也。”

杨一清回顾王华的一生，做了如下描述：“公少负奇气，壮强志存用世。顾其职业恒在文字间，而未能达之于政。际遇孝宗，讲筵启沃，圣心简在，柄用有期。不幸龙驭上宾，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见沮于权奸，偃蹇而归。岂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伟卓犖，凡公之所欲为，噤而不得施用者，皆于其子之身而显施大发之，公又亲及见之，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专，而泯然无闻于世者，其高下荣辱宜何如也？”

王华夫人郑氏，生来静婉，有慈孝之心，甘愿与王华同甘共苦。她每日都会早起，汲水、推磨、纺线，孝敬公婆。当王华富贵之后，郑氏更加恭俭。郑氏四十一岁时去世，比王华早走三十六年。

郑氏去世之后，王华续弦纳赵氏，并娶杨氏为侧室。王华共有四子一女：长子守仁出于郑氏，次子守俭出于杨氏，三子守文出于赵氏，四子守章出于杨氏；一女出于赵氏，后来嫁给南京工部郎中徐爱¹⁵为妻。

王阳明系出名门，或多或少受到祖先遗德的影响，尤其是祖父和父亲的亲自教养，对他的影响最为明显。

注 释：

1 红柰：沙果的古时称呼。——译者注，下同。

2 太保：古代官名，辅导太子之官。

3 司空：东晋时主管司法的最高官职。

4 苏峻之乱：苏峻在讨伐王敦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后来起兵叛乱，攻陷建康。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建康一片凋敝，所以有大臣提议迁都豫章，三吴豪强则要求迁都会稽。

5 兰亭：位于会稽，名士在此设宴作诗时，王阳明远祖、书圣王羲之亲自写下序文《兰亭序》，因此闻名。

6 宋景濂（1310—1381）：名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宋景濂与高季迪、刘伯温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7 王彦达：阳明五世祖，当时十六岁。

8 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最高负责人。

9 布政使：明代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布政使参议相当于副职。

10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成化八年进士。

11 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

12 右谕德：在东宫负责辅佐太子的官职。

13 《大学衍义》：由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撰写。

14 《历代通鉴纂要》：此书由李东阳等人奉敕编写。

15 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明代哲学家、官员，浙江省余姚马堰人，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

第三章

／ 不羈少年

十岁的诗才神童

前文已述，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考中状元后，被立即任命为翰林院修撰，当时王阳明年仅十岁。

明朝翰林院内的职务有好几类，修撰只是其一。这一职务相当于天子的顾问或秘书，不直接参与政治。只有状元才有资格被授予这一要职。可以说当年龙山公获得这一职位是非常荣耀的。

龙山公成为翰林院修撰之后，日益思念尚在家中的老父竹轩翁，希望把父亲接到京城来，安享晚年。翌年，成化十八年，竹轩翁和十一岁的小孙子王阳明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

前文已述，王阳明五岁时就显露出神童的潜质，当时竹轩翁在一旁读书，听完他便能立刻背诵出来。赴京途中，竹轩翁顺便游览了江苏镇江的金山寺。镇江位于长江南岸，和扬州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是观景览胜之佳所。

竹轩翁在金山寺设赏月之宴，招待宾朋，觥筹交错间，陶然而醉。竹轩翁诗兴大发，但一时无应景的佳句，这时阳明对他说：“祖父，给我笔。”

竹轩翁非常惊讶，问他：“孺子亦能赋耶？”

王阳明立即作诗一首：“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顿时，四座皆惊，众人啧啧称奇。有人想再试一试王阳明的诗才，又以“蔽月山房”为题，令其吟诗一首。阳明不假思索，随即应口诵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两首诗都显得过于外露，缺乏古意——中国诗歌和绘画讲究一个“藏”字，所以会刻意避免过于外露，所以不能算作佳作，但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已实属不易。

前一首诗的大意是：“微醉之际，披着月光倚在妙高台上远眺伸入到江水中的金山，这时的金山看起来仅有拳头般大小。远处传来清澈的箫声，山洞里的龙也许已经睡了吧！”最后一句“玉箫吹彻洞龙眠”描述了一种仙境般的清幽境地。

后一首诗的幻想更为奇妙，似乎预示着王阳明终将成为一位大哲人。在这首诗中，山和月因为观赏者心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大小之别，诗歌的境界也超越了世俗，达到悟道之人的水平，充满禅诗的意趣。

以上的解释都是后人所为，当时十一岁的王阳明未必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但我们却可以据此推断出王阳明在少时就具备了洞察万物的慧根。山和月的对照，大和小的对比，少年时代的王阳明似乎已参透了《庄子·齐物论》中的理论。

读过王阳明的《蔽月山房》，四座宾朋更是惊叹，他们对竹轩翁说：“令孙声口，俱不落凡。想他日定当以文章名天下。”

王阳明听罢，反驳说：“文章小事，何足成名？”

小小孩童竟有如此认识，大家都赞叹不已。

据传，王阳明幼时沉迷于象棋，并因此而耽误学业，父亲龙山公震怒，将棋子全都扔进了河里。王阳明为此还特意作诗一首：“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这首诗后来被收录到清人撰写的《坚瓠集》中（见东正堂《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因为沉迷象棋，遭父亲斥骂，就能做出如此诗歌，真乃天才也。后来，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之后，做过一首名叫《晓霁用前韵书怀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其中有一句是：“谩有虚名拟八叉。”

“八叉”是取自“八叉手”的典故。据说晚唐诗人温庭筠叉八次手，

就能作诗一首，后来借指才思敏捷、立即成诗之人。上面这句诗是王阳明对别人评价自己是“八叉诗才”的批评。

天下第一等人

十二岁时，王阳明遵照父命，在京城入私塾读书。王阳明生来豪放，不愿被规矩拘束，所以经常偷偷跑出来，和外面的小朋友们玩“战争游戏”。王阳明自制了大大小小的旗子，让小伙伴们举着，侍立在四周，他是大将，坐在中间，指挥着大家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就跟排兵布阵一样。

父亲龙山公获悉之后，怒斥他道：“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

王阳明问：“读书有何用处？”

龙山公道：“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力也。”

王阳明问：“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

龙山公道：“止我一世耳。汝若要中状元，还是去勤读。”

王阳明笑道：“只一代，虽状元不为希罕。”

龙山公听罢，更感愤怒，把他痛打了一顿。龙山公担心王阳明的豪放不羈，但其祖父竹轩公却毫不在意，他觉得王阳明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大人物。

有一次，王阳明问私塾先生：“天下何事为第一等人？”

塾师道：“巍科高第，显亲扬名如尊公，乃第一等人也。”

王阳明吟道：“巍科高第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

塾师问道：“据孺子之见，以何事为第一？”

王阳明答道：“惟为圣贤方是第一。”

龙山公闻之笑道：“孺子之志何其奢也。”

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篇》）但是，宋代以后的一些学者，他们做学问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为了成为圣贤。

自汉至唐，儒生做学问都是为了科举考试，为了加官晋爵。但到了宋代，出现了一些儒生，例如程明道（程颢）等人，他们从过去的弊病中解脱出来，强调做学问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为了成为圣人。其实，这才是“孔孟之教”的根本，是最崇高的精神。

汉代以来，人们忘却了这一根本，把科举考试、加官晋爵当作自己做学问的目的。王阳明的塾师也是这么想的，并且把这一错误的看法传给了自己的学生。王阳明当时虽然年少，却一语道出了圣学的真谛。但当时的王阳明并不清楚这句话会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影响！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有一天，王阳明去市场上游逛，看到有人卖麻雀，他非常喜欢，就想要一只，但没带钱，那人无论如何也不肯给他，最后二人就争吵起来。恰在这时，有一个人称“麻衣神相”的道士从他身边走过。道士看到阳明的面相之后非常惊讶，对众人说：“此子他日大贵。当建非常功名。”

于是出钱买下麻雀，送给王阳明，并且摸着小阳明的脸说：“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毫，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接着又嘱咐他自重自爱：“孺子当读书自爱。吾所言将来以有应验。”

王阳明受道士的感化，从此潜心读书，心无杂念，学问日进。

巧用智谋惩戒继母

王阳明十三岁时，母亲郑氏去世，他悲痛异常，但是与朱熹相比，王阳明要幸福得多。朱熹十四岁丧父，由父亲的好友抚养成人，而王阳明至少还有父亲和祖父，而且父亲的地位还非常显赫。

父亲龙山公有一爱妾，在郑氏去世之后升为正室。但这位继母却对王阳明不太好，王阳明心中也一直很不舒服。

一天，王阳明去街上游玩，见到一个卖鸛鸟的，就立刻出钱买了下来，然后来到巫婆的住处，给了她五钱银子，告诉巫婆过会儿见到继母要如此这般说。叮嘱完毕，王阳明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家了。他偷偷走进继母的卧室，把鸛鸟藏在被子底下。

继母回到卧室，一掀被子，鸛鸟突然从中飞出，在屋子里乱转，还发出阵阵怪声。这下可把继母给吓坏了，她赶紧打开窗子，把鸛鸟赶了出去。

在民间，野鸟入室是不祥的征兆，更何况还是一只发出怪声的鸛鸟，那真的是太不吉利了。继母寻思，这只鸛鸟是怎么进到自己的被子里的？屋里挂着窗帘，锦被也非常厚重，鸛鸟根本不可能钻进去。继母越想越觉得害怕。

王阳明听到继母发出惊叫声后，佯装什么都不知道，进屋询问原因。

继母向他详述了这一怪事，阳明听罢说：“何不召巫者询之？”

继母立刻派人找来巫婆。巫婆一进门就嚷嚷道：“家有怪气。”

然后又盯着继母看了一会儿，说：“夫人气色不佳，当有大灾晦至矣。”

继母将被子中飞出鸛鸟一事告知巫婆。巫婆听后对她说：“老妇当问诸

家神。”

于是点好香烛，让继母跪拜诸神。仪式结束后，巫婆又假托王阳明生母的亡灵附体，警告继母说：“汝待我儿无礼。吾诉于天曹，将取汝命。适怪鸟即我所化也。”

继母信以为真，跪拜无数，认罪忏悔，并且表示：“此后再不敢。”

过了好长时间，王阳明生母的亡灵才离去。巫婆苏醒后又说：“适见先夫人，意色甚怒，将托怪鸟啄尔生魂，幸夫人许以改过，方才升屋檐而去。”

此事过后，继母对王阳明的态度大有好转，不敢再无礼。

虽然以上所述未必为真，却显示了王阳明从小就善权谋术策。正是因为如此，他日后才能从刺客手中死里逃生，才能平定长年作乱的贼寇，并神速果敢地讨灭了宸濠的叛乱，完成救国之大业。

但是，如果王阳明对于继母的所作所为是真的话，那么此举就完全有别于其祖先王祥、王览的孝行。前文已述，王祥、王览的孝行是世间的典范，而王阳明则是用权谋术策惩戒自己的继母，并最终助其向善，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

后世有人指责王阳明善权谋，认为阳明学充满了权术和霸术，但那都是王阳明少年时期的所作所为，暂且不论他使用的手段，单从最终促使继母悔悟这一点来看，就不应该对王阳明横加指责。

怀抱经略之志

仰慕伏波将军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王阳明十四岁,开始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法书籍。他认为儒生的最大缺点就是不懂兵法。虽然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但当世的儒生仅仅是巧于章句,平时只关注科举及第和荣华富贵。儒生做文章粉饰太平,一旦遇事,就束手无策,实乃儒生之耻。

翌年,王阳明十五岁,和父亲同游居庸关。王阳明怀抱经略北地之志,对诸夷狄的种类及其村落进行调查,倾听针对夷狄的防御对策,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赶走夷狄的骑兵,阻止他们进一步南侵。

一日,王阳明梦见自己拜谒伏波将军庙,还赋诗一首,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的志向。

伏波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将。马援最初在北方以畜牧为业,王莽朝时出仕为官。后来追随光武帝,因讨伐羌族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

此后马援又屡立战功,先后平定交趾叛乱,征讨匈奴和乌桓,讨伐南方武陵玉溪蛮族暴动等。老年时,再次出兵匈奴,最终病死疆场。马援深得光武帝的信任,并将皇帝的威仪传及诸夷,是一位彪炳史册的大将军。正因为有光武帝这样的明君,才会出现马援这样的大将军。

武陵蛮夷暴动之时,马援已六十余岁。他上书光武帝,要求亲自带兵出征。

光武帝考虑其年事已高，没有应允。马援立即在光武帝面前披挂整齐，上马驰骋，环视四方，以夸示自己体力尚好。光武帝笑着说：“矍铄哉是翁也。”于是派马援率领大军前往征剿。

马援曾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并申明壮志”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默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马援以社稷为重，不顾己身，不追求功名利禄，实为东汉之一大豪雄。他对自家子弟的言行也非常用心。他南征交趾时，在前线听说侄儿们到处乱发议论，讥讽别人，而且与一些轻狂不羁的人物结交往来，便立即写信劝诫他们：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援的忠诚和人品令少年王阳明推崇备至。

王阳明在梦中所作之诗《梦中绝句》，收录于《两广诗》二十一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

伏波祠位于广西横县东部的乌蛮滩（邕江支流）上游。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五十六岁，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和田州平定叛乱。归乡途中，拜谒了伏波祠，并作诗两首，题曰《谒伏波祠》。当时，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自己十五岁时在梦中所作的绝句，还特意为《梦中绝句》作了序：“此

予十五岁时梦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梦中。兹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识其事于此。”

王阳明十五岁时作的这首诗，似乎预言了他晚年平定思恩和田州叛乱之事。

《梦中绝句》这样写道：“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卷甲归来”是指马援平定交趾叛乱后胜利归来。当时，马援在国境立了一根铜柱，上面题了六个字。据东正堂考证，这六个字应该是“铜柱折交趾灭”（《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大明一统志》卷九十的安南部分记载了马援的誓文，其中就有这六个字。

王阳明在《梦中绝句》中表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年仅十五，就能写出如此高风亮节的诗，真让人惊叹。阳明少年时代的诗歌虽然无法与他二十多岁时“以心入文”的诗歌相比，却充满了奇趣、理性和个性，应该说这是他少年时代诗歌的一大特色。

经略四方的志向

明朝中叶以后，大明王朝内忧外患。王阳明十二岁时，鞑靼侵入大同，明军战败。

据《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记载，王阳明十五岁时，各地或洪水泛滥，或旱灾频发，盗贼乘机作乱。石英和王勇在京城周边肆意掠夺，陕西的石和尚和刘千斤也发动叛乱，攻城略地，抢夺府银，官军对此束手无策。内忧外患令王阳明的忧国之情顿生，他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陈述对策。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当时王阳明对龙山公说：“欲以诸生上书请效终军故事，愿得壮卒万人，削平草寇，以靖海内。”

龙山公听罢，惊讶道：“汝病狂耶！书生妄言取死耳。”

从此，王阳明不敢再言及此事，开始专心致志做学问。

王阳明所言及的“终军故事”是何典故呢？终军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侍臣，博闻多识，文采飞扬，官至谏议大夫，后来主动请缨，去劝说南越王归顺汉朝。南越王表示愿意归顺，但是南越的大臣却极力反对，他们发兵攻打南越王和汉使者，终军亦被杀害，时年二十余岁。

终军少年时就胸怀大志，赴长安时，步入函谷关，关吏给终军“繻”，即如今的通行证，以帛制之，上面写字，分做两半，出入合符，方能通行。终军说：“大丈夫四游，必取功名，出关何用此物？”

说完便弃繻而去，即“终军弃繻”。

虽然受到龙山公训诫之后，王阳明放弃了上书的想法，但他效仿终军的志向却非常难得。

在此需要解释一下，《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中关于石英、王勇、石和尚和刘千斤的记载存在纰缪。这些人物的事迹其实都是王阳明出生之前的，后世的一些学者对此专门做过考证。

毛奇龄在《王文成传本》上卷中说：“石和尚、刘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乱，越一年遂平。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是作疏讨贼皆公前世事也。”

此外，《明通鉴》卷三十中也有关于这一叛乱の詳細记载。

第四章

／
五溺时代

心无定性

王阳明的一生波澜壮阔，在他转投圣人之学——儒学之前，走了不少的弯路。王阳明曾和湛甘泉一起在京城为复兴圣学而努力，他去世后，湛甘泉为他写了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其中写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这就是“阳明五溺说”，记述了王阳明年轻时的精神历程。王阳明年轻时善感多变，心无定性，最初沉溺于“任侠”，后又修习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沉迷于辞章诗文、执着于道教神仙，最后却又迷上了佛学。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三十五岁，是年他转投圣贤之学，开始笃奉儒学。

前文已述，王阳明十四五岁时，沉迷于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怀抱经略北地之志，但是后来却开始专心致志读书。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原因有二，其一可能是受同在太学读书的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勉励，其二可能与龙山公的训诫有关。

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具体情况，已无从得知。正德七年，王阳明四十一岁时，曾写过一封《答储柴墟》的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其中提到这二人。根据王阳明与二人的交往来看，阳明当时应该懂得了真正的师友之道。

按照一般常识，老师一般都是年长于自己的前辈，而友人则是同年龄段的人。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特例，例如有些人虽然年纪比较小，但他们在某一方面做得非常优秀，也可以被尊称为老师；有些人彼此之间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关于这一点，王阳明在给储柴墟的信中

写道：“夫大贤吾师，次贤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则也。”

在王阳明看来，要想成为自己的老师或者好友，必须是修得“人之道”或者“心之德”的人，与身份、地位和年龄无关。对于那些没有修得“道”和“德”的人，用世间一般的礼仪来对待就可以了。

这就是王阳明的师友论，他不以老师的身份来对待自己的弟子，而是以师兄师弟之谊来对待门人。柴墟批评他的这一做法有悖于“诚心直道”，王阳明反驳说：

前书所谓“以前后辈处之”者，亦谓仆有一日之长，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齿相若而无意于求道者，自当如常待以客礼，安得例以前后辈处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来意之如何，而抗颜以师道自居，世宁有是理耶？夫师法者，非可以自处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应之耳。嗟乎！今之时，孰有所谓师云乎哉！

今之习技艺者则有师，习举业求声利者则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诚知己之性分，有急于衣食官爵者，孰肯从而求师哉！

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人顾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

将王阳明的以上言论总结一下，那就是：“当今之人，对老师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了解求师之道，所以难以求得良师。只有那些对自己的道德心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省，并且毅然以圣贤之道自任者，才能求得真正的老师。”

接下来，王阳明又举了孔子弟子曾子和北宋儒家张载¹的例子，来说明真正的“求师之道”。

在孔子所有的弟子中，曾子以“孝”闻名天下。他虽然脑子有些迟钝，但这并不妨碍他修炼自己的德行。曾子最终掌握了儒学的精髓，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并将其传至后世。据说，孔子学派分为八派，但只有曾子一派发扬

光大。曾子将所学传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将所学传给孟子。孟子去世之后，此派学说一度失传，但是到宋代之后，又有人将其传承下去，并且一直延续到后世。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曾子病卧在床，病情危急，弟子乐子春坐在枕边，儿子曾元和曾申坐在脚下，书童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蜡烛。

忽然，书童盯着曾子身下铺的席子，问他：“先生身下铺的席子华丽而光滑，是大夫这种身份高贵的人才能享用的吧？”

童子突然间冒出的问题，让乐子春觉得这是对病床上的曾子的失礼，他赶紧制止他说：“住嘴！”

曾子听到了，突然惊醒过来，说道：“是的，那是季孙氏的赏赐，我没能把它换下来。曾元，扶我起来，换竹席！”

曾元说：“您的病情非常严重，不能移动身子，等到天亮了，我一定遵从您的意思换了它。”

曾子说：“你不如书童爱我啊。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现在还贪求什么呢？只盼望死得合乎正礼罢了。”

于是大家扶起曾子，更换了席子，再把他扶回床上，还没有放安稳，曾子就去世了。

曾子临终之际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有违礼节，所以就逼着儿子换掉了席子。席子古时称“箦”，因此这个故事又被称为“曾子易箦”。“易箦”既可指换掉席子，也可指换掉病床，后来演变为对死亡的一种讳称。

依照王阳明的说法，曾子正是不断反省自己、以圣贤之道为己任、真正明白求师之道的贤人。

张载是北宋大儒，为宋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早年精通《易经》，能够用“阴阳二气”说来解释宇宙和世间的现象，后来聆听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的讲学后，深感自己学问之不精，甘愿拜二人为师，虚心向学。王阳明称赞他道：“若非舍弃私见私欲，大勇豪杰独立之士，难以做出此等行为。”

王阳明能够明白真正的师友之道，并不仅仅是他讲学修德的结果，与太

学同僚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据王阳明所述，尽管每次考试王寅之的成绩都比刘景素优秀，但王寅之总觉得自己比不上刘景素，最终决定拜刘景素为师，行弟子之礼。王阳明见后非常敬服：“寅之者，真可为豪杰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圣贤之不可及！”

“格竹”失败

王阳明和父亲在京城同住期间，曾遍寻朱熹的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王阳明曾和好友钱氏热烈讨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的问题，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要想成为圣贤，必须要掌握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

在朱熹的著作中，曾经提过程伊川（程颐）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父亲就职的官署中有许多竹子，王阳明读到这句话之后，立刻和钱氏一起“格竹子”，二人日夜沉思，但是毫无所得。

三天之后，钱氏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于是不得不放弃“格竹子”。王阳明觉得这是钱氏精力太弱的缘故，所以更加发奋图强、不分昼夜地全力“格竹子”。但等待王阳明的依然是失败。七天之后，王阳明也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因此，二人叹息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就这样，王阳明放弃了宋儒的格物之学。十七岁时，王阳明开始潜心于神仙养生之道，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前文所述的“格竹”内容，被记录在《传习录》下卷中，但《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却将此记述为阳明二十一岁时的事情。后来据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考证，王阳明十九岁时，祖父竹轩公去世，父亲龙山公回余姚守丧三年，阳明二十一岁时应该在余姚，所以《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有误。

为什么王阳明“格竹”会失败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去“格物穷理”。清初的朱子学者陆桴亭对王阳明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

他认为王阳明完全没有理解朱子格物穷理的主旨，他的做法类似于禅宗的竹篦子话。

竹篦由剖竹制成，弓形，弯曲状，长约三尺，头部多缠绕藤条，下部装饰有绢带结成的穗饰。禅林中师家指导学人时，大抵皆手持此物，作为点醒学人悟道之工具。一旦学人答出规定答案之外的答案，师家就会用竹篦击打学人的掌心，这在禅学中被称作“竹篦商量”。确实如陆桴亭所说，王阳明的“格竹”之法不是依照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而是更接近于禅宗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

朱熹在给陈齐仲的书信中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

清初朱子学者吕晚村也曾指出：“阳明求竹理之法，为朱子所排斥，故失败乃是必然。”

朱熹曾说过，“穷天理”、“明人伦”是他“格物穷理”理论的根本，这些内容圣人都已教过，因此认真学习圣人之言非常重要，朱熹推崇“读书穷理”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朱熹的“格物穷理”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和人伦，而是将其扩展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范围扩大了，但其大纲还是人伦道德。如果舍弃大纲，仅就具体的一草一木去探求其理，那就丧失了朱熹思想的精髓。

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当时阳明之所以选择格竹，是因为竹子已经在那儿。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不是竹子，而是别的东西，那么王阳明也会去格别的东西。依照王阳明当时的想法，格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穷尽其理。

如果换作朱熹去“格竹”，他会采取什么办法呢？恐怕朱熹首先会弄清楚竹之理和其他草木之理的不同。这和水墨画家画山水木石一样，在画之前要首先明白山之理、水之理、木之理、石之理，然后才能绘出山水木石。

格物也是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楚每种事物特有的法则，然后才能进一步探究其存在的生命根本之理。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

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的“理一分殊”²。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却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他没有看到分殊之理，而是直接来探求大的“一理”，因此说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儒家注重分殊之理，所以儒生才会那么重视出仕。

有儒者认为佛教持高远参悟之说，但他们基于建立在人之上的政治，而不能不对人人施以教化。

这句话反映了儒家注重分殊之理的态度，但当时的王阳明还不知道朱熹格物之学的根本就是探究分殊之理。

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

在探究竹子之理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庄子·知北游》篇中有如下记载：

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无所不在。”东郭子：“期而后可。”庄子：“在蝼蚁。”东郭子：“何其下邪？”庄子：“在稊稗。”东郭子：“何其愈下邪？”庄子：“在瓦甓。”东郭子：“何其愈甚邪？”庄子：“在屎溺。”

东郭子听到这里，惊得目瞪口呆。庄子接着说：“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从王阳明“格竹”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庄子》中“道”的影子。此事姑且不论，王阳明“格竹”是想一举求得穷极之理，但按照他当时的资质，这一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

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朱熹与陆九渊不同，他主张的是“格物穷理”。

在朱熹之前，有一位知名画家郭熙。当时的画家不再满足于画出具体的事物，而是开始去探究事物背后之理，了解事物的特性，悟得造化之理和天地之心，然后再将这一切通过物象表现出来。一石一木可观造化之理，一山一水可知天地之心，这就是郭熙所谓的格物之学。

那么，如何才能穷尽竹子之理、穷尽竹子之性呢？陈献章³在一首诗中写道：“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在这首诗中，竹与人已经融为一体，这样一来，自然就能够穷尽竹子之理，穷尽竹子之性。如果王阳明当初能够放弃刻意格竹之心，以平常心去格竹子，他或许也能达到诗中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但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朱熹的“格物穷理”之法与以上所述完全不同，倒是与郭熙的方法有些类似。如果读一下郭熙的画论，就会发现朱熹的格物之学和郭熙的如出一辙。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写道：

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
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
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

郭熙在绘画时，为求画作完美，总是客观地、经验性地、合理地、理智地去寻求物象之理。他学书法也是如此，讲究广闻博识，广泛吸收古今书法之精华，自成一家。郭熙的主张简直就是朱熹的“格物之学”在书画上的翻版。如果让朱熹去格竹，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会与郭熙做的一样。

新婚之日出走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七岁的王阳明与诸氏完婚。这一年，王阳明从京师回到家乡余姚。同年七月，他前往江西洪都（今南昌）迎娶妻子诸氏。诸氏是当时江西省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阳明在洪都期间就住在诸养和的官邸中。诸养和也是余姚人士，而且和龙山公是至交，所以王阳明才会和诸氏成亲。

王阳明迎娶的这位夫人究竟是位怎样的女性呢？

宸濠之乱时，阳明为了家人的安全，打算和家人分开，单独乘船走。但是他又放心不下妻子，所以一直犹豫不决，这时诸氏从怀中取出一把短刀，激励阳明说：“我身上带着这把刀，什么贼人来了我都不怕，您赶紧乘船走吧！”从中可以看出诸氏应该是一位女中豪杰。

据《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记载，王阳明在婚礼当天突然离家出走。翌日早上，众人将其寻回，当时他正在一座道观中静坐，在众人的劝说之下，阳明才同意回家。

故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也许是后人觉得他在这一时期潜心于神仙养身之道，所以才杜撰出这样一段逸事。虽然王阳明一向豪放不羁，但他当时身患结核病，内心充满不安，做出这样的举动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自宋代以来，儒家在年轻时大多沉迷于道教。道士基本上都是隐士，在世人看来，他们脱离尘世，志向高远，因而受到世人尊敬。加之宋朝建立伊始，皇帝特意召见隐士，向他们咨询治世之道，致使很多有识之士都想成为道士，或者沉迷于道教。

王阳明十一岁时就能写出充满哲学意趣之诗，后来沉迷道教也是必然的。但是在婚礼当天离家出走，和道士会面，并在道观度过一宿，这样的行为如果仅从他痴迷于道教来解释，就有点儿说不通了。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充满了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他从外向型行为转变为开始探究人的内心世界。王阳明最终成为心学大师，也许和这种转变有密切关系。

阳明学的源头在陆象山（陆九渊），陆象山与王阳明一样，也患有结核病。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他们不再执着于复杂理性的思辨，也不再纠结于事物终极的存在，而是转向通过简单直接的直观方法来探究事物之理。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记录了王阳明当时拜访道观铁柱宫的一段逸闻。

婚礼当天，王阳明信步来到铁柱宫，进入本堂之后，见一位道士正在一旁盘腿静坐。王阳明走近才发现这名道士眉毛粗厚，头发花白。

王阳明立刻被他的容貌打动，于是向他叩问道：“道者何处人？”

道士回答说：“蜀人也，因访道侣至此。”

王阳明又问道：“道者今年高寿？”

道士回答说：“九十六岁矣。”

王阳明继续问道：“可否知先生姓名？”

道士回答说：“自幼出外，不知姓名。人见我时时静坐，呼我曰无为道者。”

这位道士虽然已年近百岁，但身体硬朗，气力旺盛，声如洪钟。王阳明觉得他定是一位得道高人，于是就向他问询神仙养生之术。

王阳明当时虽是英姿勃发的年纪，但受疾病所扰，面容稍显憔悴。道士望了望他消瘦憔悴的面庞，对他说：“养生之诀，无过一静。老子清静，庄生逍遥。惟清静而后能逍遥也。”然后又教给王阳明导引之术。

导引之术是信奉道教的道士修炼的一种功法。

道教是将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宗教化后形成的。在汉初，它被称作黄老之学。道教以老子的自然无为之说为根本，杂糅神仙之学，追求长生不老。道教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道教为了增强自身的权威，还从儒学和佛教中吸收了很多教义。道教中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有很多，例如修炼、服丹药、房中术、符咒和积善等，此外还有导引之术、长生之术和飞升之术等。

铁柱宫的道士教给王阳明的导引之术其实是一种呼吸方法，是将宇宙中的气引入自己体内，让它在体内流动，最终实现“心神”和“虚无”在不知不觉中合二为一的一种修炼方法。导引之术适于养生，所以不仅是道士，很多儒生和僧侣也会用这一方法来修行。通过调节呼吸来使精神专一的方法古已有之，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只是在中国，印度也有类似的方法。导引之术追求的不单是身体的养生，同时还包含精神思想的修炼。

禅宗也有通过调节呼吸来使精神专一的做法。在禅宗中，坐禅的目的是为了调心，为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调身和调息，三者浑然一体才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调息指的是丹田呼吸，唐代禅僧圭峰宗密曾如此解释调息：“出入息有声音谓之风息。出入息阻滞不通畅谓之喘息。出入息不细弱谓之气息。风息、喘息和气息都是不调的表现。没有声音，没有阻滞，不粗烈，连贯无中断，似有似无，心境平和，情绪欢乐的出入息才是调息的表现。”

调息又称调气，自古以来就是养生和养心的重要方法。《庄子》中有“真人呼吸以踵”，因此，用脚后跟呼吸被看作是圣人的行为。“呼吸以踵”指的是什么呢？这可能和圭峰宗密所说的“似有似无”类似，是一种深入沟通天地之气的状态。

调息术和服丹药、禁性欲以及房中术一样受到道家的重视。随着时代的变迁，导引之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终演变成一种通过静坐来调息或者数息，最终实现长生不老的修炼方法。

贝原益轩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儒医，他生来体质就比较弱，所以对调息法非常关注，在他所著的《初学知要》中介绍了道家的这一养生方法，并且在《慎

思录》中又再次提到调息的内容：“养气须先调息，调息才能养气，这样才能心境平静。气息若乱，内心必乱……调息养气乃儒家之道，不可忽视。”

宋代大儒朱熹著有《调息箴》，其中介绍有调息之法，静坐之后，将目光集中在鼻尖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此，然后再调节气息。虽然朱熹提到了调息，但他调息的目的却和道家的完全不同。

日本的天木时中对此评论说：“儒家乐于调息并不为修得神仙之术。道家喜好神仙之术，辟五谷以求长寿，平时练习导引之术，炼其外形，养其内气，修炼到精微之处，则渣滓污浊皆消，只剩清虚之气，故身体轻如鸿毛，可寝卧云霄，亦可自由行之于天，此为道家修行者之至善也。而儒家则与此不同，儒家调息只为将精力集于一处，使之不分散外泄，出入气息力求和合，期冀活至一千二百岁也能身体康健，即使日夜忙碌，也不觉疲惫，此为儒家调息之目的。”

综合上述，儒家调息的目的完全不同于道教。无为道者教授给王阳明的导引之术，其内部贯穿的应该是道家的思想和目的。

王阳明习得导引之术，立即和道士对坐练习此术。王阳明虽感恍惚，但似乎有一种顿悟的感觉，他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二人闭目对坐，仿佛是两棵枯木，不觉天色已晚，忘记了寝食，就这样一直静坐下去。

王阳明在大婚之日突然离家出走，并且到了晚上都不归家，这令诸氏非常担心，她将此事告知了父亲诸养和。诸养和派衙役四处寻找，众人找了一夜都没有找到王阳明。翌日清晨，终在铁柱宫寻得阳明，告知他这是岳父之命，劝其回家。王阳明不得不回，于是和无为道者作别。道士对他说：“珍重珍重，二十年后，当再见于海上也。”

根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述，果然如道士所言，二十年后，他们再次在海上相遇。

苦练书法

王阳明成亲后，暂住在诸养和的官邸里。官邸内有数箱纸，王阳明每日用这些纸练习书法。翌年十二月，当王阳明启程回余姚时，盛纸的箱子都已经空了，可见王阳明练习书法的刻苦程度，在此期间，王阳明的书法大有长进。

根据《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

王阳明练字，并不是简单描摹字形，而是要掌握写出这一字形的方法，所以必须拟形于心，凝思静虑。

王阳明的书法意趣不同于唐代书法家。他学习书法的精神和宋代画家学习绘画的精神是相通的。

范宽是北宋著名画家，为宋代水墨画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范宽虽然是山水画名家，但他画山水却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景象。据说范宽为画山水，终日静坐于山林中，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求自然的意趣。哪怕是降雪之日，或者是月夜，他也会去林中徘徊，仔细观察，静静沉思，然后回到住处，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渲之于纸。

宋代画家高克明也经常徒步郊外寻找山林之趣，或者终日静坐山林，观察周围景致，然后回到家中，排除一切欲念，在安静的屋子里沉思。

这些画家在绘画时，都注重静思澄虑、潜心熟虑和去欲脱尘等心法的运用。他们的画作不是表现物之形，而是探求物之理。为了表现物之理，画家必须看清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物的本质，也必须去感受宇宙之心和天地之理的

脉动。他们通过物象来表现物之心，描绘物之理。

对这些画家来说，画山水就要穷尽山水之理和山水之性，主观性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画家画的是“胸中的丘壑”，而不是山水的自然形态。说得极端一点，自然山水只是画家在内心创立理想形象的一个诱因，是单纯的素材，没有其他的意义。

王阳明学习书法的态度和上述画家的精神是相通的，这表明他具有成为一流书法家的潜质。

北宋大儒程颢的思想是象山心学之源，其弟程颐的思想是朱子理学之源。阳明思想受程颢的影响颇深，他在书信中，屡次引用程颢之语，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程颢曾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

在程颢看来，书法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心法，这种心法同时也是做学问的根本。王阳明读过这句话后，颇有感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以上所述选自《阳明先生年谱》。《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略有不同：“夫既不要字好，所学何事？只不要字好一念，亦是不敬。”

众人听之，都由衷敬服。王阳明觉得刻意求字好之心，或者不求字好之心，都违背了“敬”。“敬”是一种心的修行，是一种心法。宋儒在做学问时，对“敬”都非常重视。

王阳明曾如此解释《大学》中的“格物”：“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在此阐述了心学“格心穷理”的“格物”说，对朱熹“格物穷理”的“格物”说提出批判。王阳明为了解释自己的“格物”说，特意引用学习书法的一段故事，其目的还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主旨。

谈到书风，世人都会想到“晋书重韵，唐书重法，宋书重意”的说法。

那么明代书法看重的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明代书风应该是重情。这是受时代风潮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书风。

日本现存有一件王阳明书法的真迹。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遣明正使庵桂悟归国，王阳明特意为他写了一篇送别序。内藤湖南对此评价说：

“王阳明此书，先学元代赵孟頫，再学王羲之，晚年又融合了北宋黄庭坚的书风，终成明代一大书法名家。王阳明与同时代文徵明的书风有些相似，但情有余而巧不及。”

在保存下来的王阳明的真迹中，有两幅是家书。其中一封是对两个弟弟的谆谆教导，内容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心得。另外一封是王阳明在去世前一年，写给养子的家书。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和田州讨伐叛贼，在赴广西途中，他给养子正宪写了这封信，内容是关于日常行为的训诫。

第一封家书的书法流畅清丽，不重技巧，率直而作，从中可以窥见王阳明的俊敏之气，笔者认为这封家书应该是在他四十岁左右时所写。

正德九年（1514年），王阳明四十三岁，他送给妻子的外甥诸伯生一幅书法作品。这幅作品的书风和前面两封家书的风格极其相似，是用他晚年圆熟的字体写成。字体遒劲苍秀，透出典雅之气。

除此之外，王阳明的书法作品还有《何陋轩记》《客座私祝》和《矫亭说》等。正德三年，王阳明三十七岁，他因为得罪宦官，被流放到荒蛮之地贵州龙场，这才有了后来的“龙场顿悟”。《何陋轩记》是他顿悟之后写的作品。虽然龙场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在文中却感叹此处“何陋之有”。这幅作品的字体有黄庭坚之风、文徵明之韵，气势蓬勃，充满霸气，笔锋自然，毫无滞拙之态。

《客座私祝》是王阳明在出征思恩和田州的前夕所作，记录了他对弟子日常生活上的训诫。全文由楷书大字写成，笔锋遒劲，字体宏毅，表现出王阳明所特有的书风。

《矫亭说》是王阳明书法作品中的逸秀之作。当时，王阳明父亲的好友方时举建造了一座亭子，命名为“矫”，特意向龙山公求文，王阳明就代替

父亲写了这幅作品。整幅作品的字体细长流畅，书风雄健直达、神采苍秀。清代学者王育将其与朱熹的书法比较后说：“朱熹的书法骨劲老练，有苍松怪石壁立千仞之势。王阳明的书法骨挺神骏，有鹰击长空之态。二者的书法骨格清奇，实乃二人功业德行使然。”

陈瑚评价《矫亭说》之书风说：“今阅其手迹，笔墨飞腾，似有龙凤翔举之势，亦可窥见内心之精明。”

钱大昕评曰：“笔势纵逸，酷似李北海。平生所见真迹，此为最上。”李北海，又名李邕，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前辈。他最初模仿王羲之，后来从王羲之的书法中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书风。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书风雄健奔放，流丽清奇，既继承了其远祖王羲之的书风，又融合了李北海、黄庭坚和文徵明等人的书风，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注 释：

1 张载（1020—1078）：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译者注，下同。

2 理一分殊：中国宋明理学讲理一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源于唐代华严宗和禅宗。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禅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

3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别号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门渔父、南海樵夫、黄云老人等，因曾在白沙村居住，人称白沙先生。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
圣学之道

拜谒大儒娄谅

弘治二年（1489年），王阳明十八岁。是年十二月，王阳明携夫人诸氏返回家乡余姚。王阳明在洪都生活了十四个月。在此期间，他热衷于书法。至于他究竟读了哪些书籍，做了什么学问，已无从得知。但不妨设想一下，他至少应读过一些儒家的书，也游览过名山大川，以便寻仙问道。

王阳明四十九岁时写了《火秀宫次一峰韵三首》，在最后一首中有这样一句：“当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复三千春。”

大西晴隆和近藤元粹都认为，此处的“三千”有误，应该是“三十”。江西省峡江县东南处有一座玉笥山，山中有一座道观，名为大秀法乐洞天，其中的主殿叫大秀宫。近藤元粹指出，王阳明拜访的应该大秀宫，而不应该是火秀宫，题目中的“火秀宫”可能是笔误。（《王阳明诗集》）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四十九岁时，“六月，如赣”，“十四日，从章口入玉笥大秀宫”。可见，《火秀宫次一峰韵三首》中的“火秀宫”，实乃“大秀宫”之笔误。

通过以上记述，可以想象得出王阳明滞留洪都期间，应该经常游山玩水，对神仙之境心驰神往。

那么，王阳明为何要在十二月返乡呢？

这可能和祖父竹轩公翌年的去世有关。在得知祖父病重的消息之后，王阳明便启程返乡。他带着妻子从洪都出发，经过鄱阳湖，然后沿信江逆流而上，从东部离开江西境地。又从钱塘江上游的常山出发，经过衢州到达杭州，最终回到家乡余姚。

在王阳明沿信江逆流而上，到达广信府上饶时，顺便拜谒了娄谅¹，向他请教宋儒的“格物”说。

娄谅是吴与弼²的三大高徒之一。据说，娄谅曾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与王阳明当时的内心情境深度契合。儒学是王阳明的家学，他在内心深处对儒学充满信赖，这也正是他要拜谒娄谅的原因。

宋儒的“格物”说

娄谅教给王阳明的“格物”说，其实是他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格物”说。娄谅的恩师吴与弼是明初的朱子学者，娄谅继承了恩师的学风。

“格物”说在儒家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说的不同解释体现了二者思想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源自他们各自独特的精神世界。

“格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大学》，是“八条目”中的一条。关于儒学之道，《大学》列举了“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分别是明明德、亲民（朱熹将其读为“新民”）和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总而言之，“三纲领”和“八条目”都是修己治人之道。修己重在修身，它主要体现于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治人重在经世，它主要体现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共同构成了儒学的根基。修身是经世的基础，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又是实现修身的必要手段。

在儒学中，修己和治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因此，明明德和亲民是一体的，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一体的，不分轻重，忽视任何一方都不能达到至善。如果儒学忽视治人，而只重视修己，那它就会变得和佛教、老庄一样，重视出仕、超脱和独善其身。如果儒学忽视修己，而只重视治人，那它又会变得和法家、纵横家一样，重视功利和权力。前者虽然纯真，但却忽视现实；后者虽然重视现实，却缺乏纯真。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只有儒学。儒学主张修己是治人之根本，这体现了儒学的特点——重视人的自由

性和主体性。

《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两篇。到宋代时，《大学》和《中庸》格外受重视，被单独列出，和《孟子》《论语》并称为“四书”。“四书五经”都是儒家经典，儒生在学习“五经”之前，必须先学习“四书”。宋儒的代表人物朱熹曾亲自给《大学》《孟子》《论语》和《中庸》作注，并把给《大学》作的注释命名为《大学章句》，足以看出他对《大学》的重视。儒生必须先学《大学》，以明白儒学的学习方法和做学问的方向；然后再学习《孟子》，以激起自己的道义精神；接下来再学习《论语》，以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最后要学习《中庸》，以了解儒学思想的终极境界。

在《大学》中有如下语句：“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是儒学的根本。到宋代后，儒家更加重视“格物”。“格物”一度成为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重要标志。对“格物”的认识促进了儒生思想的形成，儒生的不同思想又促成了对“格物”的不同认识，所以说宋明儒学的思想史其实就是对“格物”的认识史。王阳明的儒学思想也是建立在他对“格物”的认识之上的。

朱子这样解释格物：格物之“格”乃“尽”之意，穷尽事物之理，是为格物。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来说，理先于气而存在。

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格物就是要穷尽各个事物之理。事物不同，它们各自的“理”也不同，这是“分殊”。但这不同的理，又都源于一个理，这是“一理”。这和佛教中“一即多³”的理论有些相似。只要先穷尽“分殊”之理，经过积累之后，才能最终悟出大的“一理”。

如上所述，宋儒是通过“理”与“气”的关系来探讨儒学的根本原理。其实最早使用“理”和“气”来描绘世界观的是北宋的二程（程颢和程颐），朱熹后来接受并发展了“理气”论。

二程的“理气”论存在两个方向，程颢坚持“理气一元”论，朱熹的辩友陆九渊继承了这一观点；程颐坚持“理气二元”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观点。此外，朱熹还认为欲想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必须依照《大学》中言及的格物之法，通过格天下万物，明白各自之理，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在忽然之间将万理归一，最终悟出世间大的“一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朱熹才会一直强调要广闻博识。

朱熹在世之时，其学说受到朝廷的压制。在其去世之后，其学说才获得大发展。到明朝时，朱子学被定为科举科目，风靡一时。

新儒学的兴起

孟子去世之后，儒学迅速衰落。西汉初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追求高远的道家思想。后来，儒学逐渐复兴，但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变得越来越深奥，从《大学》和《中庸》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变化。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学在思想和精神方面都没有大的建树，直到宋代，才又一次出现飞跃，这被称作“新儒学的兴起”。唐代中期以后，禅学流行，这也促使当时的儒生开始探究儒学深层的奥妙，儒学深远的哲学思想逐渐为世人所知。

宋代儒生参照禅学的教学特点，从《大学》中发掘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从而确定了儒学的教学特色。《大学》中提及的“明明德”、“正心”和“诚意”实际上就是内心的修行和具体的实践。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儒生最终也找到了适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宋代儒生一般都修习过禅学，这也使他们对儒学教义的解释更加深奥和微妙，尤其是《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它是儒学区别于佛教和老庄之学的重要标志，所以儒生愿意花大力气对其进行解释。

在宋代以前，虽然儒生也曾对“格物”进行解释，但是在整个思想架构中，它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宋代以后，对“格物”的解释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主体，越来越受重视。

朱熹的“理气”论

要想了解朱熹的“格物”思想，必须明确朱熹在理性和实践性方面对“格

物”以及《大学》中“八条目”的认识。此外，还需要了解他的“心性论”和世界观。朱熹的世界观是他所有认识和思想的前提。

根据朱熹的思想，“格物”就是要理性地一个一个地去探究心外事物之理。世间万物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由气的运转流动形成的。世间万物必须如此，这就是“规范”，而为何必须如此，这就是“原理”。朱熹将前者称为“所当然之则”，将后者称为“所以然之故”，二者构成了朱熹思想中的“理”。

例如，子女必须对父母尽孝，这是每个子女必须遵守的“规范”，而为什么必须去尽孝，这就是“原理”。“规范”和“原理”合在一起就是朱熹之“理”。

在朱熹的思想中，“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气则是形而下的东西，二者是“一即二，二即一”的关系，即二者虽然是两种状态，却不可分离，虽然不可分离，但又各自独立。

朱熹认为人心是千变万化的，所以需要“持敬”⁴，“持敬”是穷理之本。格天下物，穷极其理，是谓“格物穷理”。居敬持志，修养本心⁵，是谓“居敬养存”。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朱熹还主张“性即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宇宙万理就蕴藏于“人心”。气的灵活运转形成“人心”，若不持敬，则不能明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既然宇宙万理就蕴藏于“人心”，那么直接“格心穷理”就得了，这样既简单又好操作，何必要去不劳其烦地“格物穷理”呢？这不是和王阳明主张的“格心穷理”一样了吗？其实不然，朱熹提及的“人心”并不是从本性出发的心，其中掺杂了一些不纯的东西，因此需要“持敬”，去除这些渣滓。

在朱熹看来，“格心穷理”最终会变成“格心求心”。这样一来，内心就会变得躁动不堪，也难以求得理之要点。因此，对自己的内心要“居敬养存”，对心外之物要理性地“格物穷理”，只有二者同时进行，才能将“心外之理”化为“心内之理”，才能实现“心外之理”和“心内之理”的一致。

“理”表现于“心”，如果能直接把握住自己的“本心”，那么“穷理”

也会变得简单。“本心”是“性”纯净的表现，对“本心”进行直接体认，是穷理的根本。

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和朱熹的主张不同。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有理，所以“心即理”。朱熹则认为人的心中有一些不纯的东西，如果“心即理”，那么求得的理中也会掺有杂质，所以他主张“性即理”，排斥“心即理”。他主张欲穷理，必先格尽心外之物，同时还要对内心“居敬存养”。

总而言之，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性”与“心”是一体，但朱熹追求的是严正的“性”，其学说也以“性”为根本，所以其学说被认为是“性宗之学”，而陆九渊追求的是生命的跃动，其学说以“心”为根本，所以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心宗之学”。

二人对“心”的不同看法导致学说不同，朱熹看到的是“心之不纯”，而陆九渊看到的则是“心之纯净”。这种不同导致朱熹在“格物穷理”时要求“居敬”，需要对内心进行反省，而陆九渊则相信“心即理”。

元明朱子学

在这一章节，我将简要介绍一下元明时期朱子学的动向，以使大家更好地了解王阳明拜谒娄谅这一事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宋朝末年，朱子学逐渐兴盛，并且一度风靡于世。至元明时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其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朱子学开始重视实践工夫，即开始重视“心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第二，朱子学的“二元论”变为“一元论”。朱熹为了阐述“理”和“性”的关系，同时也为了树立自己学说的威信，将“理”与“气”、“性”与“心”看作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将二者加以严格区别，确立了自己的“二元论”主张。但是到元明时期，“二元论”逐步演变为“一元论”。

第三，“朱陆调和”论。在元明时期，无论是朱子学还是陆学，都被认

为是圣人之学，二者逐渐趋向统一。

最后，朱子学也变得重视“体认”，对人文、社会和自然等世界万物的理性“穷理”变得越来越弱，逐渐趋向于陆学。

元朝时，朱子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受到所有儒生的重视，陆学只能勉强维持。元朝有三位大儒，分别是北方的许衡⁶和南方的吴澄⁷、刘因⁸。

许衡发现当时的朱子学者陷入训诂记诵之流弊，不再重视知识与思索，转而注重“涵养践履”。在《大学》中，正心被认为是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在《中庸》中，“尊德性”和“道问学”被认为是治学之本。朱子学主张“尊德性”，陆学主张“道问学”。许衡是朱子学者，他以“正心”为治学之基础，虽然对陆学提出批判，但他的很多思想却也倾向于陆学。

吴澄也发现朱子学者陷入训诂记诵之流弊，并对此提出激烈批评。他认为朱子学和陆学无论在重“尊德性”还是重“道问学”方面都存在偏颇之处，所以对二者都非常排斥。但比较起来，他还是比较倾向于“尊德性”。吴澄信奉朱子学，同时对陆学也大加赞扬，最终促成了朱子学和陆学的统一，开启“朱陆调和”论之端。其实，“朱陆调和”论最早起源于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和他的辩友汤存斋，后经吴澄的弟子虞集传至赵汸，赵汸又将其传给明代的程敏政，至此这一学说才得以完善。后来，王阳明也接受了这一学说，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论断。

刘因重视处理人间大义的义理，并将这一义理视作沟通天地之道的天理，认为其中蕴藏了天地之生机。这一天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人生的根源。刘因理解的治学之根本是将天理藏于心，然后静静地去体认融释，最终力图悟得“天之心”。在境界上，刘因与追求超脱悠远的曾子以及北宋大儒邵雍⁹有些相似。此外，刘因还追求对喜怒哀乐的持中状态。在这一点上，他和朱熹的老师、追求“理”与“心”相融释的李侗¹⁰有相通之处。

此外，刘因还吸收了老庄思想的批判精神，对一般的朱子学者提出批评。他指责这些人虽然整天宣扬孔孟理义、程朱明理，但其骨子里还是掺杂着道

家的权术思想，只为一己之私利，而不知义理天命为何物。

明代理学的开山鼻祖是薛瑄¹¹和吴与弼，二人都是朱子学者，但二人对朱熹的“博学致知”研究得并不多，他们更注重的是“涵养践履”，二人开启了明代朱子学的新篇章。

薛瑄严格遵守宋儒的矩矱¹²，他关于“太极”“理气”和“心性”的诸说都是沿袭宋儒的。虽然他不太赞同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的论断，但他对于“理气二元论”精神的理解，在明代无人能及。

薛瑄做学问重视躬行，认为“居敬”和“致知”都是“复性¹³”的途径，只有“居敬”才能穷理。这样一来，“复性”与“穷理”就都统一到“居敬”上面来了。薛瑄所言的“居敬”是一种严肃虔诚的“存心¹⁴”工夫，同时又包含浑厚包容、从容宏大的一面，它是一种从容自在的境界，和云开雾散、阳光乍现时的感觉有些类似。

在明代，真正维护朱子学正统的是胡居仁¹⁵。胡居仁是吴衡的高徒，他信奉纯正的朱子学，排斥异端学说。胡居仁主张“穷理”与“存心”并用，以“居敬存养”为自己治学之根本。他痛感从朱熹的再传弟子开始，朱子学已堕入训诂注释、词章功利的歧途；才高之士向往佛教和老庄等异端思想，精神陷入虚无空荡、灭伦弃物之流弊，所以他主张刊落一切浮华，回归真实的本心。

胡居仁的异端辨析极其精细，他一一道破佛教和老庄的本质，分别对其加以批判。胡居仁的论析精切详密，程朱以来的诸儒无人能及。依据胡居仁的解释，老子灭绝道德，佛教灭绝心性，所以“气”才会被误认为“理”，犯下“心即理”之错误。因此，胡居仁严格遵循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对其他异端学说加以批判。

胡居仁不仅批判陆九渊的心学，对北宋的邵雍和张载也提出批判。他认为邵雍之学放旷不实用，张载的“太虚”说和“太和”说把气当作道之本体，没有把握住道之要义。

此外，他对程门弟子谢良佐¹⁶也提出批评，认为他提倡的“心之开放”

掺入了太多庄子和佛教的异端思想。总之，胡居仁对于先儒诸贤的学说，只要他认为是异端或者与陆学相似的，都会毫无忌惮地予以排斥。即使是对师出同门的陈献章和娄谅，他也会一一列出其异端学说，并加以批判，批评他们陷入禅学思想。

胡居仁以程朱学为宗，认为程学和朱子学存在小的差异。他认为程学更注重涵养之功，所以践履纯正，而朱学重视穷理之功，所以文理纤悉。在道德方面，二者也不相同，程学主张针砭时弊，而朱学则不注重这些。

胡居仁以“居敬存养”为治学之根本，“居敬”沿袭的是程颐的“整齐严肃”。他贯彻“动静未已发”思想，非议“主静”；重视“存心涵养”，排斥“求索”。他还从“入头”“接续”“无间断”和“效验”四个方面来阐述“敬”，认为“敬”既有积极地存心之功，也有消极的闲邪之功，既有容貌威仪等外在的东西，也有程颐所说的“主一无适¹⁷”等内在的东西。此外，他还论述了敬与理、敬与诚、修气与主敬的关系，论述详细周密，不留丝毫漏洞。

胡居仁虽然激烈抨击异端学说和陆学，但是从他把“居敬”当作治学根本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各种学说包括陆学的影响。

到明朝中叶，又出现了一位大儒——罗整庵¹⁸（罗钦顺）。他曾和王阳明论过道。（在后文中，将会对他的学问以及论道的详细内容予以介绍。）

若将王阳明视作明学的代表人物，那么明学的始祖就是吴与弼，而不是薛瑄。吴与弼虽然信奉朱子学，但他受陆九渊心学的影响也非常深，所以说他是明学的始祖。

从宋、元和明的文化层面来看，宋代的文化是官僚知识阶层的文化；到元朝时，蒙古人开始统治中国，自视清高的宋代文化一败涂地，昔日的官僚知识阶层文化逐渐平民化；明代文化是对元代平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文化风潮的变化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影响，因此在元代，简单易操作的心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重视。

明初心学传承

比较宋明之学的差异，会发现前者是唯“理”论，后者是唯“心”论；前者是“性宗之学”，后者是“心宗之学”。若单从心学来看，明初心学是始于吴与弼的高徒陈献章。《明史·儒林传》在序中将明初诸儒都视作是朱熹弟子的支流余脉，直到陈献章和王阳明，学术才开始出现分流。但是，朱子学在明初已经呈现出重视内心的倾向。

明初的宋景濂和王祿¹⁹，以及稍后一点的薛瑄和胡居仁，都是著名的朱子学者，但从其学说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已经出现转向心学的倾向。虽然他们都声称自己恪守朱子学，但已经不再执着于朱子学的核心思想——“理气二元论”，也不再追求朱子学主张的纤细分析和博闻广识，他们开始重视心的存养，出现“一元论”的倾向。从明初开始，朱子学逐渐趋向于陆学，但真正确立心学思想的是陈献章。

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对朱熹极度崇拜，甚至做梦都会梦见朱熹，并在梦中祈求朱熹教授自己学问。吴与弼是江西人士，当时陆学余脉在江西比较兴盛，他的一些好友就信奉陆学。受明初文化风潮以及江西陆学的影响，吴与弼之学与薛瑄、胡居仁之学比起来，受陆学影响的痕迹更加明显。

虽说吴与弼的陆学风格很浓，但他又不同于陆九渊那种生动活泼、充满生命力的风格，而是更接近陆九渊的弟子杨简²⁰的风格。杨简的心学以静虚为宗，在这一点上，吴与弼与他有些相似，但二者也有不同，例如吴与弼追求艰苦地反省克己，对神明要有敬畏之心，皈依神明以求心安等，而杨简则不主张这些。

吴与弼之学传至陈献章时，心学的立场更加明确。陈献章主张：“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他认为道至大，天地之不及。道乃虚无，超越言诠。道乃难以名状之物。若想求道，必须默识神通，贵在自得。

陈献章的“自得之说”认为道就蕴藏于人的内心之中，只有去领悟，才能得道。他认为，虚无之妙道，思虑所不及。非穷尽万物之理，通过外求和积累所能达到。

陈献章主张“静坐退藏”，排斥“安排思索”，主张通过“洗心”来发现“天机”。他在一首诗中描述了去除“天机障”后，达到“物我一体”的状态：“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陈献章理解的“天机”其实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机”，是无与有，动与静的枢纽，依托于“心”而存在。陈献章还将能够揭露天机的东西称为“端倪”²¹。他主张先通过静坐使内心“虚明静一”，然后才能去求“端倪”。单从“静虚为宗”这一点来看，陈献章的学说和宋代周敦颐²²，以及程门弟子杨时²³、罗从彦²⁴和李侗等“主静派”的学说有些相似。但若从“端倪”说来看，陈献章的学说中又有陆学唯心主义的影子。陈献章曾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来，方有商量处。”

言下之意就是通过静坐养出个“端倪”来，这对做学问非常重要。如果悟出了“端倪”，那么天地将会由我而立，万物将会由我而生，宇宙也会在我内心，一切皆可及。陈献章认为这就是道之“霸柄”，主张“反求诸身，霸柄在手”。

陈献章担心儒生做学问时失去“自然性²⁵”，所以才提出“端倪”说。在这一点上，他和周敦颐等“主静派”的观点不一致。通过静坐来养出端倪，从而提升自己涵养的修行方法是陈献章学说的一大特色。端倪是“本心”的线索，这和王阳明的“良知”说有些相近。陈献章主张通过静坐来提高自己的涵养，而王阳明则是将万事都寄托于生命力的进发。二者虽然同属心学，但是各有其趣。

陈献章的心学既有恩师朱子学大家吴与弼的影子，也有曾子和邵雍的超脱之风，还有程颢浑厚的气概。黄宗羲认为陈献章的学说吸收了杨简的“主静”思想。杨简是陆九渊的弟子，陆九渊直接沿袭孟子心学，思想“主动”，而杨简则与老师不同，他主张“清虚澄明”，倾心“主静”之学。

黄宗羲还提出疑问：“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近，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

王阳明当时肯定了解陈献章的学说。陈献章的心学“主静”，而王阳明的心学追求的是简单直接，尊重生命跃动，可能是他觉得陈献章的学说没有魅力，所以才没有提及。王阳明和陈献章虽然都坚持“唯心论”，但是王阳明继承的是孟子和陆九渊的学说，主张“动”，而陈献章继承的是杨简的学说，主张“静”。二者之间是动与静之别，同时也是明学与宋学之别。

在阳明学和陆学之间起到媒介作用的是娄谅之学，而不是陈献章之学。

娄谅少时就有志于圣学，遍求名师于四方，但最终也没能求得。他认为当时的儒生都是“率举子学，非身心学”，后来听说吴与弼的声名，就前往临川听他讲学，最终拜他为师。

娄谅天性聪明豪迈，不屑于世务，但后来对一些琐碎小事也躬行。四十三岁时，出任成都训导²⁶，但不久就辞职返乡（江西广信上饶）。返乡之后，以矫正邻里风俗为己任，专心教授弟子，著书立说。据说娄谅当时事无巨细都会加以晓谕禁戒，时不时地得罪一些人。

娄谅著有《目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诸儒附会》十三篇和《春秋本意》十二篇，但遗憾的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散佚不见，今人对他的学说已经无从得知。

吴与弼对娄谅的学说也给予高度评价。娄谅主张“居敬存养”，他认为《易》中的“何思何虑”和《孟子》中的“勿助勿忘”是“居敬”之要旨，“收心放心”为“居敬”之门。娄谅的学说以“静修”为本，主张做学问的“自然性”，与陈献章的“主静”之学存在一些差异。

胡居仁对师出同门的陈献章和娄谅都曾提出过批判，认为他们二人都陷入了异端。胡居仁批评他们说：“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穷理，他却肯穷理。公甫不读书，他勤读书。以愚观之，他亦不是穷理，他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

“娄克贞见搬木之人得法，便说他是道。此与运水搬柴相似，指知觉运动为性，故如此说。夫道固无所不在，必其合乎义理而无私，乃可为道，岂搬木者所能？”

据此可以看出，娄谅穷理重在用心，“心之妙用”可致理现。胡居仁批判他陷入禅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总而言之，娄谅之学深受吴与弼学风的影响，其中充满陆学的元素。无怪乎黄宗羲会说：“姚江之学（阳明学），一斋（娄谅）为发端也。”

王阳明出生八年前，薛瑄去世；王阳明出生三年前，吴与弼去世；王阳明十三岁时，胡居仁去世；王阳明二十岁时，即拜谒娄谅两年之后，娄谅去世；王阳明二十九岁时，陈献章去世。

王阳明拜谒娄谅时，娄谅有没有向他提起以上几位，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他应该向王阳明介绍过自己的恩师吴与弼以及自己的同门师兄弟。王阳明没有见过陈献章，但对他的学风性行应该还是有所耳闻的。可以说，在明初儒学中，吴与弼和娄谅的学风与王阳明的学风还是存在一定的联系。

以上用了较大的篇幅来介绍宋、元和明的儒学，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因为这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阳明学的精髓。

问学娄谅

王阳明向娄谅请教宋儒格物之说。除了学说，娄谅可能还传授了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做学问的态度等。娄谅告诉王阳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这又燃起了阳明少年时代就有志于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的热

情。王阳明当时肯定是想通过修习格物之学而使自己成为圣人。

王阳明与娄谅的会面和朱熹与李侗的会面有些相似。李侗是朱熹父亲的好友，朱熹在和他会面之后，开始意识到佛学和老庄的不足，转而笃信圣学，最终成为宋学的集大成者。在宋学确立之前，整个时代风潮都是倾向于佛学和老庄。如果没有和李侗的会面，朱熹应该不会转向儒学，也不会把当时的时代风潮从佛学和老庄那里扭转过来。

王阳明和娄谅会面之后，开始有志于圣学，但到他真正以圣学为宗为止，其间还是经历了一段迷茫期，在此期间他也曾被异端学说所蛊惑。如果没有和娄谅的这次会面，王阳明不会笃志于圣学，也不会开创明代儒学的新篇章。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娄谅和李侗的作用几乎一样，他们都是伟大的启蒙老师。

阳明中举

弘治三年（1490年），王阳明十九岁。是年，祖父竹轩公去世，龙山公从京师回余姚为父治丧。出殡之后，竹轩公被葬于余姚东边的穴湖山。龙山公在墓旁搭一草庐，为父亲守丧。

在此期间，龙山公吩咐从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妹婿等人，与王阳明一起学习经书。王阳明白天跟随众人努力学习科考书籍，夜深人静时，则搜寻经史子集，勤奋攻读。当时科举考试考的是八股文，也就是从经书中选出一句话，让考生写文章。

中国的科举制度古已有之，汉代考对策，唐代考诗赋，宋代考策论。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在王安石的倡导下，科举考试废止考诗赋，改为考经义。所谓经义，即以经书中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至此，八股文开始现出端倪。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考试改为“四书试士”，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考生的作文字数限定在三百字以上。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和刘伯温商量之后，决定延续宋代的科举之法，每次分别从“四书”中选三篇、“五经”中选四篇作为考试内容。明天顺之前，科举制度和宋元时期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还是仅仅局限于朱熹的集注。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之后，八股文的形式基本形成。八股文是明清两朝官员选拔考试的论文体裁，又被称作八比、时文、经义、制艺、举业和四书文等。

具体地说，就是考官在命题时，将经中的一句、一节或者一段挑出来，

考生围绕这一主题作答，依照八股文的形式写成一篇文章。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领题）和四股和结束构成。

破题是指在文章开头，用两三句话概括全文主旨。破题全部由对句构成，是文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破题的巧拙决定着文章的优劣。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部分，简单明了地承接主题，短者三四句，长者五六句，和破题并称为“破承”。

起讲是指阐明主题大意的部分，又被称作原起或者发凡，通常由数句或者十几句构成。

四股又被称为四比，由提股（前比或者提比）、虚股（虚比）、中股（中比）和后股（后比）四个段落构成。每个段落都有两股排列对偶的文字，共有八股，故称八股文。

结束也被称作束语结句，位于文章的结尾，由小结和大结构成。小结和起讲对应，大结和破承相对应。

一破承、二起讲、三入题，这是文章的开始。四提股、五虚股、六中股、七后股，这是文章的中心。八结束，这是文章的结尾。八股文就是这样的文体。

明宪宗成化以后，八股文的形式被最终确立，并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上书痛陈八股之弊，于是清政府决定废除八股文，改用策论代替。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八股文已经非常完备。他若想出仕，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也就必须学习八股文。王冕、王阶等人见王阳明的文章日益精进，愧叹弗如，于是总结道：“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

王阳明在待人接物上，最初是“和易善谑”，爱开玩笑。突然有一天，他开始后悔自己以前的行为方式，变得“端坐省言”。王冕、王阶等人见他变化如此之大，都不敢相信。但王阳明却郑重地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王冕、王阶等四人受阳明的感化，也开始变得谨言慎行。

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一岁的王阳明参加浙江省乡试，得中举人，获得去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同王阳明一起中举的还有孙燧和胡世宁。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在王阳明参加乡试的前夜，巡场之人在巡视考场时，发现两个巨人，一个身着绯红色衣服，一个身着绿衣服，二人东西相向而立，大声谈论说：“三人好做事！”言毕就突然不见了。到放榜之日，王阳明和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

这虽然是传说，但三人却都和宸濠之乱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不能不让人惊奇。后来，宁王宸濠发动叛乱，胡世宁检其奸，孙燧死其难，王阳明则平其乱。

孙燧，字德成，浙江余姚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十年（1515年），升任右副都御使，被任命为江西巡抚。他发现宸濠有谋逆之心后，七次上书痛陈宸濠必将叛乱，但每次都被人从中作梗，奏折未能送达皇帝手中。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最终发动叛乱，孙燧也惨遭杀害。后来，朝廷追授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忠烈”。

胡世宁，字永清，号静庵，浙江仁和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胡世宁性格刚直，精通兵法，历任德安府推官和南京刑部主事。在任时，上书直言时政之弊，和李承勋、魏校、余佑善并称为“南都四君子”。后来被迁为江西副使，上书痛陈宸濠之奸诈。宸濠之乱后，升任兵部尚书，不断就兵政和边境防御问题向朝廷进言献策。但由于与张璁、桂萼意见不同，后来托病归乡，卒年六十二岁。朝廷追授他为少保²⁷，谥号“端敏”。

清嘉庆十七年（1538年），当地官府在杭州祥符桥²⁸旁边建了一座同仁祠，将孙燧、胡世宁和王阳明合祭其中（大西晴隆《王阳明》）。

两次会试失败

弘治六年（1493年），二十二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身边好友纷纷前来劝慰王阳明，宰相李西涯鼓励他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王阳明听后援笔立就，身边诸老都惊叹：“天才！天才！”

前文已述，进士中的第一名被称为状元。会试取中者称为贡士（“中式进士”），有资格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的前三名，被赐“进士及第²⁹”，第一名就是状元。考取进士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考中状元更是令天下人羡慕。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就是状元出身。

会试每三年举办一次。王阳明第二次参加会试已是弘治九年，这一年他二十五岁，非常遗憾的是，他又失败了。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第一次会试失败后，即时写出一篇文章，受到李西涯的夸赞，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嫉妒，这也成为他第二次会试失败的导火索。据说，当时在场的有些人事后私底下嘀咕：“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

然而，王阳明有志于圣人之学，所以即使两次会试都失败了，他也毫不介意。

既有志于圣人之学，又要修科举之业，这岂不相互矛盾？宋代程颢见到周敦颐之后，开始认识到圣人之学，于是他果断地放弃了科举之业，开始专注于圣人之学。如果真正有志于圣人之学，就应该放弃科举之业。王阳明有志于圣人之学，那他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呢？他对圣人之学和科举之业的关系是如何理解的呢？

这个问题，是萦绕在所有儒生心头的大问题。

宋日之前，儒生认为参加科举考试是自己的使命，将科举之业视作自己的第一要务。宋代之后，部分儒生将修习圣人之学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而认为科举之业是次要的。但是儒学历来主张经世致用，将出仕当作自己的目的。要想出仕，就必须处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发号施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就有必要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进而达到出仕的目的。但这样一来，就会受到功利心的驱使。

圣人之学是“为己之学”，重在完善自己的人格，而科举之学则重在出仕，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年轻时的王阳明糊里糊涂地参加了科举考试，后来他不断反思这一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王阳明一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所有儒生必须去思考的大问题。

圣学与科举之业

那么，王阳明对于科举之业究竟持何种态度呢？我们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可以略知一二。正德三年（1508年），三十七岁的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重刊文章轨范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文章轨范》是宋末谢枋得³⁰所作。谢枋得参加过科举考试，并且被赐“进士及第”的荣耀。他为了助后来者举业之事，特意编著了此书。

侍御王汝楫到达贵阳之后，慨叹当地修习科举之业的人太少，于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誊写了《文章轨范》六十九篇，并拿出自己的俸禄重新刊印发行，还委托王阳明为重刊本作序。

王阳明在序中谈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获取功名，就不能出仕为官，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说：

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

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矣，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焉。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

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贄，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故夫求工于举业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工于举业而求于幸进，是伪饰羔雉以罔其君也。虽然，羔雉饰矣，而无恭敬之实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

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不知方其举业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邹孟氏曰：“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伊川曰：“自洒扫应对，可以至圣人。”夫知恭敬之实在于饰羔雉之前，则知尧舜其君之心，不在于习举业之后矣；知洒扫应对之可以进于圣人，则知举业之可以达于伊、傅、周、召矣。吾惧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于是乎言。

王阳明将“举业”比喻成臣下向君主进献的贡品，给世间轻视科举之人当头一棒。同时，王阳明还对世人通过科举考试沽名钓誉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举业若无恭敬之实，则徇私谋利矣。

王阳明认为，在有志于圣学的基础上，再来修习举业，这样参加科举才会有意义。最后他还指出，修习举业是古之圣贤建功立业的重要一步，阐明了参加科举的必要性。

自宋代圣学觉醒以来，举业就陷入是与非的争论。二程最早致力于举业，但后来遇到周敦颐之后，便放弃了举业，转而修习圣人之学。朱熹的辩友陆九渊更是激烈批评科举之弊甚于佛学和老庄等异端思想。

总而言之，王阳明将修习圣学看作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正德六年（1511年），王阳明四十岁，在给妻弟诸用明的回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再次提到了举业与圣学的关系。诸用明在信中说自己的两个孩子虽然年少，但都已参加科举考试，还劝告王阳明不要辞官³¹。

对此，王阳明在回信中写道：

得书，足知迩来学力之长，甚喜！君子惟患学业之不修，科第迟速，所不论也。况吾平日所望于贤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识亦尝有意于此否耶？便中时报知之。

阶阳诸侄，闻去岁皆出投试，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为然。不幸遂至于得志，岂不误却此生耶？凡后生美质，须令晦养厚积。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散，况人乎？花之千叶者无实，为其华美太发露耳。诸贤侄不以吾言为迂，便当有进步处矣。

书来劝吾仕，吾亦非洁身者，所以汲汲于是，非独以时当敛晦，亦以吾学未成。岁月不待，再过数年，精神益弊，虽欲勉进而有所不能，则将终于无成。皆吾所以势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悦，今亦岂能决然行之？徒付之浩叹而已。

在上面这封信中，王阳明告诫妻弟不要急于让两个侄子参加科举考试，专心做学问才是最重要的。

王阳明不排斥科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如果不考取进士，就很难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但是，如果只重视科举，不注重身心修行的话，又会陷入功利霸道之歧途。王阳明对此深感忧虑，所以劝诫妻弟在让侄子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先做学问，好好修行。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四十七岁。是年，他平定了江西赣州之乱。在平定叛乱后，他给家乡的知名人士邦英、邦正兄弟写了两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也阐述了圣学与举业、生活与举业的关系。他说：

昆季敏而好学，吾家两弟得以朝夕亲资磨励，闻之甚喜。得书备见向往之诚，尤极浣慰。

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业举，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之说也。夫谓之夺志，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有可夺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图之。

每念贤弟资质之美，未尝不切拳拳。夫美质难得而易坏，至道难闻而易失，盛年难遇而易过，习俗难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在另一封信中，王阳明写道：

得书，见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区区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见，岂足与论？君子惟求其是而已。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然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实学，无非道也。”而况于举业乎？谓举业与圣人之学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则虽终身由之，只是俗事。”³²而况于举业乎？忘与不忘之间，不能以发，要在深思默识所指谓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则知学矣。贤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可也。

在以上两封信中，王阳明认为，不通过举业而求仕官，与不尽人事而责怪天命一样，都是错误的。举业和圣人之学并不相悖，重要的是有无圣贤之志。如果不立圣贤之志，即使每日谈论道德，也不会成为圣贤，最终只会陷

人追求功利的世俗之学，或者陷入追求高远的佛老异端。

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其实程颐早已论之。王阳明以及宋朝之后的许多儒生也都将“圣人之志”当作做学问的根本。

在王阳明看来，秉持圣人之志与致力于举业、科举及第一样，都是儒生的美好夙愿。王阳明坚持不懈地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失败两次，也没有放弃，最终取得进士，为后来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但是，程颐却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他说：“儒者出仕为官，需君主至敬至礼请之，而不可自己求之。”

程颐的这一主张有些过于理想化，是否参加科举应该根据时间和处境做出相应的调整。王阳明在信中道：“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

因为过于贫困，而不能尽到孝养之责，这时就应该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以使自己有能力侍奉双亲。所以说是否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仅靠主观意识就能决定的，有时候还会受到现实情况的影响。

会试再次落第

弘治九年（1496年），二十五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再次落第。当时，同僚中有人因为落第而感到羞愧，王阳明安慰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那人听后，对王阳明佩服不已。

会试落第之后，王阳明回到家乡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整日赋诗作乐。恰在这时，魏瀚也辞掉了布政使一职，回到余姚。魏瀚经常来龙泉山寺与王阳明下棋或者联句，但每次的佳句都出自王阳明，这令他慨叹不已。

魏瀚曾为王阳明的祖父竹轩公立传。其父菊庄翁和竹轩公是至交好友，二人一起结社吟诗。其子魏朝端和王阳明一起参加乡试，且都中了举人。这样说来，王家和魏家应该算是世交。魏瀚向来以自己富于诗才自居，但他的诗才稍逊于王阳明，据此可知王阳明在诗文方面是多么才华横溢了。

王阳明在归乡途中，顺道游览了山东任城（济宁）。他登上李白住过的太白楼，写下《太白楼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写道：“开

元之绍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时以就列兮，固云台麟阁而容与。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楼乎延伫。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怀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潏潏。”

在赋中，王阳明将李白写成是因为受世俗之人嫉妒，心中郁闷，所以才登上此楼。王阳明借李白的典故，暗指自己科举落第的原因——为俗人所嫉妒。

在《太白楼赋》的最后，王阳明用了以下两句结尾：“舟之人兮俨服，亦庶几夫之踪者！”

王阳明在此表明了自己将一直追寻圣人之道的决心。

在这首赋中，王阳明对李白的遭遇表示同情。日本阳明学者东正堂认为，在《太白楼赋》中，感觉不到像屈原《离骚》那样的愤懑牢骚之气，而可以感受到像太白那样的豪放磊落之风。

从这首赋中也可以窥见王阳明是一位出色的诗人！

钻研兵法

弘治十年（1497年），王阳明二十六岁。是年，他再赴京城。这时，明朝的边境已有些动荡。

弘治元年，鞑靼向明朝派使，希望通好。弘治八年正月，鞑靼进犯凉州。弘治十年五月，鞑靼小王子又攻扰潮河川，明朝指挥官刘钦等人战死。是年十月，朝廷起用王越，封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

边境危机，急报频传，朝廷狼狈不堪，遍求良将而不得。王阳明慨叹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欲备仓卒之用，难矣。”

于是，王阳明开始遍寻兵法秘书，精心研读。会见宾客或者参加宴会之时，他常用果核排兵布阵，向他人展示兵法。这一时期的积累使他之后能在南方各地发生叛乱之际，灵活巧妙地使用兵法，在短短数月之内平定贼寇，最终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从王阳明讨伐贼寇的计谋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兵法奇才。前文已述，王阳明少年时代就已显出奇才，十三岁时使用计谋促使继母改过自新，这似乎暗示着他终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王阳明二十六岁时攻读的兵书有哪些呢？《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中都没有记载，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但我猜测可能会是《武经七书》这一类的兵书。《武经七书》中最出名的就是《孙子兵法》。有人评价《孙子兵法》是前世所有兵法的集大成者，后世所有兵书无非是对《孙子兵法》的注解，故《孙子兵法》被称作“兵法圣书”。

史书中没有孙子使用自己的兵法建功立业的记载，但后世却有通过使用他的兵法而取得巨大战果的事例。王阳明在讨伐贼寇时使用的兵法就非常神妙。

兵法和名剑都是冷酷无情之物，名剑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变为“活人剑”或者“杀人剑”。兵法也是如此，也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变为“活人兵法”或者“杀人兵法”。

王阳明的兵法确实有冷酷无情之处，但那是兵法的本来面目。王阳明的儒家身份为他的兵法注入了一些“仁慈”元素，这也使得他的兵法成了“活人兵法”。如果不弄清这一点，就容易对王阳明形成误解。

后来，王阳明在论述“良知”说时，曾提到先秦的纵横家、外交家苏秦和张仪：“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摩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无论是兵家、法家，还是纵横家，他们都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希望将他人控制于股掌之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使用一些计谋，使他人即使被控制也感觉不到。对儒生来说，他们不仅要修身，还要经世致用，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去直面他人和社会，为了更好地应付周围的一切，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权术。

王阳明运用兵法权诈之术讨伐叛贼，最终立下大功，他对苏秦和张仪做出以上评价也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一部分儒家批评王阳明善权术，其实如果他们能够仔细体会王阳明对苏秦和张仪的评价的话，就不会误解王阳明的本意，对他也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

王阳明不愧是龙山公的后代，虽然有时候心游儒学之外，但内心深处还是对儒学充满敬重，且会时不时地流露出来。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十七岁的王阳明又燃起了修习圣学之志。当时，他遍寻天下适合自己的良师益友，却一无所得，于是心中充满惶惑。一日，他偶然间读到朱熹给宋光宗的奏折，其中写道：“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王阳明幡然醒悟，痛悔自己之前的学习虽求广博，但未曾循序渐进，最终导致自己的学问不精，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于是王阳明开始循序渐进去穷理，并努力将物之理与自己的身心融为一体。

但是，物之理和王阳明之心最终没能合二为一，仍然是判若两物。王阳明心中沉郁，旧疾复发。他心中充满了挫败感，深感要想成为圣贤还是需要天分的。在此期间，王阳明在余姚经常游山玩水，偶尔听到道士的养生之道，遂萌发了逃脱尘世、隐遁山林的想法。

考中进士入仕途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这次一举成功,名列前茅。后来又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被授予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前文已述,乡试合格的考生称举人,殿试合格的考生称进士。参加殿试的根据成绩又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中的前三名,分别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会被直接任命为高官。

据收录于《世德纪》的湛甘泉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记载,王阳明在会试时本来是第一名,但由于徐穆³³的反对,才被列为第二名。另外,王阳明那年参加会试的主考官程敏政因为泄题而遭到弹劾,朝廷命令李东阳重新校阅试卷(大西晴隆《王阳明》)。

王阳明考取进士后,观政工部,负责政府的土木建设工作。朝廷派他前往河南浚县,让他主持建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字世昌,浚县人,明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曾任兵部尚书,晚年被任命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为防范鞑靼侵扰立下卓越功勋,后被朝廷封为威宁伯。他曾三次出兵与鞑靼作战,收复了河套地区。王越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有十余年的作战经验,兵法出奇制胜,一旦出兵,必凯旋。

弘治十一年(1498年),也即王阳明考取进士的前一年,王越在甘州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谥号“襄敏”,著有《襄敏集》。王越性格豪爽,知人善用,乐于提拔人才,所以部下都甘愿为他赴汤蹈火。

东正堂在《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中提及了一些王越的逸事,由此也可知此人的品格。

一日，天降大雪，王越坐在暖炉旁饮酒取暖，身边还有四位美妓为他弹曲斟酒。恰在此时，一名士兵从前线侦察胡虏敌情归来。王越立即将其招入帐中，听他禀报前方敌情。那名士兵的汇报非常详细，王越大悦，于是将手中的金杯递给他，请他饮酒。之后又问了他几个问题，那名士兵回答得也很好，王越更加高兴，于是让美妓们给士兵弹曲斟酒，并且还将那只金杯赏赐给了他。王越和那名士兵聊天，越聊越高兴，最后干脆将美妓中最漂亮的也赏赐给了他。因此，那名士兵誓死效忠王越。

还有一逸事：

一天夜里，王越率兵偷袭胡虏阵营，突然狂风大作，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士兵们都踌躇不前，希望撤兵回营。这时，一位老兵从队列中走出来，对天空大喊“天助我也”！王越听到后，更加坚定了偷袭胡虏阵营的决心，觉得这种天气正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好时机。于是他立即下马，走到那名老兵面前，向他行礼，对他的提醒表示感谢。

王阳明年轻时，奉朝廷之命建造王越墓。晚年时，和王越一样奇袭敌营，立下赫赫战功。二人在冥冥之中似乎有着某种因缘。

王阳明还没考取进士时，一天夜里，突然梦见威宁伯王越。在梦中，王越解下腰间宝剑，将它送给王阳明。王阳明醒来之后对他人说：“吾当效威宁以斧钺之任，垂功名于竹帛，吾志遂矣。”

王阳明没有说错，他的这个梦最终变成了现实。

王阳明非常崇拜王越的兵法，所以当他来到浚县后，立即向王越的后人询问王越的兵法。王越的后人们也很乐意将自己所知的兵法告诉他。王阳明

很快便将兵法应用到了建造坟墓中。他用“什伍之法”来管理民工，每十个人或者五个人分为一组，组内人员负有连带责任。这样一来，管理就轻松多了。闲暇之时，他还会推演诸葛亮的八卦阵³⁴，以锻炼自己的排兵布阵能力。

坟墓竣工之后，王越家人为答谢他，送来一些黄金和布帛，被王阳明拒绝。后来，王越家人又将威宁伯的佩剑作为礼物，这正好与阳明梦中的情景一样，于是他欣然接受了。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前往浚县时，没有乘轿，而是骑马。当行至一处险隘之地时，坐骑受惊，将王阳明摔在地上。王阳明胸部受到撞击，当时就吐了血。随行人员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乘轿，但王阳明认为这是一个锻炼骑马的好机会，于是坚持继续骑马前行。有人推测王阳明后来患上肺病，可能与他这次受伤有关。

其实王阳明的肺病早已有之。在《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了他年轻时数次“染疾”以及“旧疾复发”的情况，此处的“疾”，应该就是肺病，无非是症状较轻而已。

上陈边防策

王越的坟墓竣工之后，王阳明回到京城。当时有彗星从京城上空扫过，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又加上鞑靼正在侵扰西北边陲，明孝宗深感忧虑。王阳明年轻时就深切关注边境防务，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他立即上了一篇《陈言边务疏》，内陈“边务八策”。

在上书中，王阳明通过古今之实例来阐述兵法，强调边境防务要慎重务实。他首先痛陈时政之弊，写道：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轍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端、惩艾而振作之者矣。

新进小臣，何敢僭闻其事，以干出位之诛？至于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苟有所见，是固刍蕘之所可进，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于言也。

接着他又列出了自己的“边务八策”：

第一策：蓄材以备急

王阳明给出的解释是：

臣惟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边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会议推举，固已仓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无可以继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敌致胜，其将何恃而能乎！

夫以南宋之偏安，犹且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之徒以为之将，李纲之徒以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冲突；今以一统之大，求其任事如数子者，曾未见有一人。万如虏寇长驱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御之？若之何其犹不寒心而早图之也！

臣愚以为，今之武举仅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今公侯之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而实无所裨益。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之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砢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至于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于科道部属之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无不深谙熟察于平日；则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王阳明认为举用人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纸上谈兵，而是要注重实地训练，挑选真正的有用之才，这样才能确保一旦边境有急，能够迅速应对。

第二策：舍短以用长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惟人之才能，自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愆于前，而后有所警于后。

吴起杀妻，忍人也，而称名将；陈平受金，贪夫也，而称谋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顾上之所以驾馭而鼓动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于仓卒艰难之际，而必欲拘于规矩绳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

臣尝闻诸道路之言，曩者边关将士以骁勇强悍称者，多以过失罪名摈弃于闲散之地。夫有过失罪名，其在平居无事，诚不可使处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则彼之骁勇强悍，亦诚有足用也。且被摈弃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奋励。

今诚委以数千之众，使得立功自赎，彼又素熟于边事，加之积惯之余，其与不习地利、志图保守者，功宜相远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³⁵，是所谓“使过”也。

“使功不如使过”，可以称得上是一条妙策。王阳明在晚年平定地方叛乱时，就使用过这一妙策。他敢于使用归顺之士去讨伐其他叛贼，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后来王阳明说过：“善恶两端，非冰炭相反，实乃一物耳。”

这句话其实是从程颢那里来的。程颢曾说：“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

王阳明年轻时已经有这样的善恶观，所以才提出“舍短以用长”的策略。

第三策：简师以省费

王阳明引用《孙子兵法》解释说：

臣闻之兵法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孙子兵法·作战篇》）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今以中国而御夷虏，非漕挽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粮于敌”矣。然则今日之师可以轻出乎？

臣以公差在外，甫归旬日，遥闻出师，窃以为不必然者。何则？北地多寒，今炎暑渐炽，虏性不耐，我得其时，一也；虏恃弓矢，今大雨时行，筋胶解弛，二也；虏逐水草以为居，射生畜以为食，今已蜂屯两月，边草殆尽，野无所猎，三也。

以臣料之，官军甫至，虏迹遁矣。夫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师旅既行，言已无及，惟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

夫兵贵精不贵多，今逮诏诸将，密于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余皆归之京师。万人之声既扬矣，今密归京师，边关固不知也，是万人之威犹在也，而其实又可以省无穷之费。岂不为两便哉？况今官军之出，战则退后，功则争先，亦非边将之所喜。彼之请兵，徒以事之不济，则责有所分焉耳。今诚于边塞之卒，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以其所以赏京军者而赏之，旬日之间，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简师以省费”是以上所述的主旨，王阳明在晚年时曾使用过这一策略。

第四策：屯田以给食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惟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边关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此之谓也。

今之军官既不堪战阵，又使无事坐食以益边困，是与敌为谋也。三边之戍，方以战守，不暇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则授甲归屯，遥为声势，以相犄角；寇去仍复其业，因以其暇，缮完虏所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冲突。如此，虽未能尽给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输馈矣。此诚持久俟时之道，王师出于万全之长策也。

正如孙子所谓，长途运输兵粮实为用兵之大忌，所以王阳明建议用兵屯田。

第五策：行法以振威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张用济斩于辕门；狄青之至广南也，陈曙戮于戏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虏。

今边臣之失机者，往往以计幸脱。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如此，则是陛下不惟不置之罪，而复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惮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

今总兵官之头目，动以一二百计，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则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骚扰道路；仗势以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戎之怨。为总兵者且复资其权力以相后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徇乎？是将军之威，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

臣愿陛下手敕提督等官，发令之日，即以先所丧师者斩于辕门，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属，悉皆禁令发回，毋使渎扰侵冒，以挠

将权，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克敌制胜，皆原于此。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也。

王阳明在这一对策中，直陈军法之混乱，军威之无存，指出军律严明才是制胜之根本，敦促皇上要自我振作。王阳明认为，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之心非常重要。他的这一观点和孙子的观点相同。

第六策：敷恩以激怒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杀敌者，怒也”（《孙子兵法·作战篇》）。今师方失利，士气消沮。三边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族亲戚也。今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自宜感动。

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仇，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而区区丑虏有不足破者矣。

兵家认为，士兵的怒气会演变为杀敌的动力。王阳明在这一策中详细阐述了激发士兵怒气的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宣以国恩，二是明以大义。

第七策：捐小以全大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之兵法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孙子兵法·兵势

篇》），又曰：“佯北勿从，饵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谓也。

今虏势方张，我若按兵不动，彼必出锐以挑战。挑战不已，则必设诈以致师，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请和，是皆诱我以利也。信而从之，则堕其计矣。

然今边关守师，人各有心。虏情虚实，事难卒辩。当其挑诱之时，畜而不应，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为当救，一以为可邀，从之，则必陷于危亡之地；不从，则又惧于坐视之诛。此王师之所以奔逐疲劳，损失威重，而丑虏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纵，许以便宜。其纵之也，不以其坐视。其捐之也，不以为失机。养威为愤，惟欲责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问。则我师常逸而兵威无损，此诚胜败存亡之机也。

王阳明指出，不中敌人的圈套，不使王师奔逐疲劳，“我师常逸”，“兵威无损”，此乃制胜安国之道。

第八策：严守以乘弊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军形篇》）。盖中国工于自守，而胡虏长于野战。今边卒新破，虏势方剧，若复与之交战，是投其所长而以胜予敌也。为今之计，惟宜婴城固守，远斥候以防奸，勤间谍以谋虏；熟训练以用长，严号令以肃惰；而又频加犒享，使皆畜力养锐。譬之积水，俟其盈满充溢，而后乘怒急决之，则其势并力骤，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

昔李牧备边，日以牛酒享士，士皆乐为一战，而牧屡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奋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后从之，是以一战而破强胡。

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师既逸，我守既坚，我气既锐，则是周悉万全，而所谓不可胜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则虏日以匮；我盛，则虏日以衰；我怒，则虏日以曲；我逸，则虏日以劳；我坚，则虏日以虚；我锐，则虏日以钝。

索情较计，必将疲罢奔逃；然后用奇设伏，悉师振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迎邀夹攻，首尾横击。是乃以足当匮，以盛敌衰，以怒加曲，以逸击劳，以坚破虚，以锐攻钝，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也。

王阳明在这一策中指出，《孙子兵法》中的“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正是对付胡虏的良策。

王阳明在“边务八策”的结尾处写道：

右臣所陈，非有奇特出人之见，固皆兵家之常谈，今之为将者之所共见也。但今边关将帅，虽或知之而不能行，类皆视为常谈，漫不加省。势有所軖，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弛废，一至于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将臣所奏熟议可否，传行提督等官，即为斟酌施行。毋使视为虚文，务欲责以实效，庶于军机必有少补。臣不胜为国惓惓之至！

通过这篇上书，可以看出王阳明年轻时就对《孙子兵法》很有研究，甚至精通。虽然王阳明当时年仅二十八岁，但他已经具备了大战略家的眼光。后来，王阳明能够荡尽南方诸贼、平定宸濠之乱，也是意料之中的。王阳明的这些作为都是普通儒生永远达不到的。

《阳明先生集要》的编写者施邦曜³⁶高度赞扬王阳明的“边务八策”，称“阳明先生的‘边务八策’胜过《孙子兵法》十三篇”（大西晴隆《王阳明》）。

近年来,水野实和永富青地还完成了对尚存于中国的《阳明兵策》的收集整理、解说和日译工作。

审查江北囚徒

弘治十三年（1500年），王阳明二十九岁。是年六月，他出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明朝刑部下设十三清吏司，负责各省诉讼事务，云南清吏司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所以王阳明异常繁忙。七月，提牢厅³⁷重修。九月，重修完毕。提牢厅的主事是每月轮番制，由十三个清吏司的主事轮流担任。十月，恰值王阳明负责提牢厅事务。王阳明当时身患咳嗽之疾（结核性支气管炎），他在《提牢厅壁题名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九）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无恙，一遇纷扰，且支离厌倦，不能酬酢，况兹多病之余，疲顿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强之日。”

但王阳明当时丝毫没有受疾病所扰，他励精图治，制定了狱中规则，并为后世所沿用（大西晴隆《王阳明》）。

弘治十四年八月，王阳明三十岁，受命前往直隶和淮南地区审查犯人。在和当地的地方官员仔细沟通之后，王阳明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弘治十五年，审查完毕后，王阳明原本打算回京复命，但由于旧病复发，只好作罢。

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奏《乞养病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希望能够回家乡治疗。他在疏中写道：

切缘臣自去岁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剂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谢去药石，医师不可，以为病根既植，当复萌芽，勉强服饮，颇亦臻效。

及奉命南行，渐益平复。遂以为无复他虑，竟废医言，捐弃药餌。

冲冒风寒，恬无顾忌，内耗外侵，旧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扬州，转增烦热，迁延三月，尪羸日甚。心虽恋阙，势不能前。追诵医言，则既晚矣。

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臣之致此，则是不信医者逆耳之言，而畏难苦口之药之过也。今虽悔之，其可能乎！

臣自惟田野竖儒，粗通章句；遭遇圣明，窃禄部署。未效答于涓埃，惧遂填于沟壑。蝼蚁之私，期得暂离职任，投养幽闲，苟全余生，庶申初志。伏望圣恩垂悯，乞敕吏部容臣暂归原籍就医调治。

从这道疏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审查完江北囚徒之后，一度北上，打算回京复命。但在弘治十五年五月行至扬州时，突然病情加重，继而卧床不起。迫不得已，他只好向朝廷请假，乞求回乡养病。

疏中还透露出，王阳明在弘治十四年三月已经患病，也就是在前往直隶和淮南地区的五个月之前。

《阳明先生行状》中记载了王阳明当时患病的原因。王阳明白天在衙署伏案起草公文，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回家之后也不歇息，秉烛夜读“五经”和秦汉书籍，诗文日益精进。父亲龙山公担心他积劳成疾，就命令佣人不要把灯带入阳明的书房。王阳明怕父亲担心，就等父亲就寝之后，再点灯读书，通常都会读到深夜。最终因劳累过度，染上呕血之疾。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王阳明在诗文雕琢方面下了大功夫。此外，王阳明旧疾复发，以致不能回京复命，可能还跟他游览九华山有关。

求道访仙

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阳明三十一岁。是年春天，他审查完江北囚徒之后，前往道教名山茅山游玩。在茅山，他偶遇同在茅山游玩的丹阳人士汤云谷。汤云谷当时也向往神仙之学，还向王阳明详细介绍了呼吸屈伸之术和凝神化气之道。

王阳明和汤云谷登上“三茅³⁸之巔”，在洞窟中小憩，于道观中休息，踏访陶弘景³⁹留下的遗迹，慨叹现世之秽浊，飘然有脱屣人间之志。王阳明在《寿汤云谷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中写道：“予时皆未之许也。”

王阳明生来身体孱弱，一直对神仙的超脱境界羡慕不已，这一念头萦绕在他心头多年。后来，他终于悟得道教神仙之不足，迎来了自己思想的大转变。汤云谷最初也是向往道教神仙的，但最终还是踏入了官场。十二年后，王阳明和汤云谷再会于丹阳。

王阳明从茅山下来之后，又前往位于青阳县西南方的九华山游玩。该山也称九子山，因山峰酷似九瓣莲花，故又称九华山。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至今还保留着诗仙李白的书斋。关于王阳明游览九华山的具体时间，不同文献的记载稍有差异。《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时间不是弘治十五年春天，而是弘治十四年。

王阳明登上九华山后，遍访无相寺和化城寺等古刹，并下榻于此。九华山有五个洞窟，此外还有山岭十一座、山泉十七处、水源两处，溪川渊池等名胜众多。王阳明夜宿古刹，白天观奇览胜，心中充满无限感慨，于是作赋一首，题曰《九华山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他在赋中写道：

嗟有生之迫隘，等灭没于风泡。亦富贵其奚为？犹荣薜之一朝。
旷百世而兴感，蔽雄杰于蓬蒿。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
群喙之啾啾！

已矣乎！吾其鞭风霆而骑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抟鹏翼于北溟，
钓三山之巨鳌。道昆仑而息驾，听王母之云璈。呼浮丘于子晋，招
句曲之三茅。长遨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遥。

王阳明在赋中感慨人生如梦，荣华富贵犹如木槿之花，朝荣夕逝。慨叹自己虽有几分雄杰之质，虽然没有被俗情所迷惑，但仍是一无所获，如同这草木一样正在慢慢腐朽，真是遗憾至极。成事者，不应介意周边小人的诽谤，要真正为民办事，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样的济世之业，自己至今都没能完成。于是，王阳明不由得羡慕起道教神仙，羡慕那种超脱尘世秘浊的境界，羡慕那种志存高远的精神。

但是，王阳明却在赋的结尾处写道：“乱曰：蓬壶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华之矫矫兮，吾将于此巢兮。匪尘心之足搅兮，念鞠育之劬劳兮。苟初心之可绍兮，永矢弗挠兮！”

王阳明因为牵挂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母，所以不忍弃世入山，如果没有这些羁绊，他也许早已出家修行去了。或许正是这份念及“鞠育之劬劳”之心，才让他最终悟出佛教老庄之不足，转而笃信儒学。

因为思慕超脱尘世的神仙之境，王阳明才会游览茅山和九华山。当他听闻有道士在九华山中修行，就萌发了前去拜访以探寻神仙养生之道的念头。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夜宿化城寺，恰巧碰见一位姓蔡的道士正在大堂中静坐。这位道士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不堪，似癫若狂。王阳明心想这定非凡人，于是毕恭毕敬地上前打招呼：“请问神仙可学否？”

道士摇头回答说：“尚未，尚未。”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屏退左右侍从，将道士引入后亭，再次行礼，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道士仍然摇头回答：“尚未，尚未。”

王阳明没有作罢，继续恳求不已。最终道士对他说：“汝自谓拜揖尽礼，我看你一团官相，说甚神仙？”

王阳明听后，大笑而去。蔡道士的一番话恰是击中了王阳明的内心。

王阳明又听说在九华山中的地藏洞有一位老道正在修行。这位老道坐卧松毛，不食人间烟火。王阳明非常好奇，决定立刻前往拜访此人。他扶着树木爬上悬崖，一直爬到山顶，见一老道正蹇腿熟睡。王阳明坐在旁边，用手抚摸老道的脚。过了好一会儿，老道才醒来，发现有人坐在旁边，惊讶不已。他问王阳明：“如此危险，安得至此？”

阳明回答：“欲与长者论道，不敢辞劳也。”

老道被王阳明的热忱所打动，将佛教和道教的要义直言相告，后来又话题转到儒学上：“周濂溪（周敦颐）、程明道（程颢），是儒者两个好秀才。朱考亭（朱熹）是个讲师，只未到最上一乘。”

王阳明非常喜欢老道的谈论，乃至于天色已晚都不肯归去，但最终也只好作罢。翌日，王阳明又去拜访老道，但老道已徙居他处。有诗为证：“路人岩头别有天，松毛一片自安眠。高谈已散人何处，古洞荒凉散冷烟。”

这是《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一首诗，至于是否是王阳明本人所作，已无从考证，但这首诗却真实地反映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四十九岁。时隔十九年后，他再次拜访化城寺，并作诗两首，题曰《重游化城寺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在第一首诗中，他回忆了自己当时游览九华山的情景：

爱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

鸟道渐非前度险，龙潭更比旧时清。

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

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

“会心人远空遗洞”，知己已远去、空留一山洞，指的就是地藏洞中的老道。

结交“明前七子”

在明朝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文学界活跃着七大才子,人称“前七子”,分别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⁴⁰、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在嘉靖年间(1522—1566),又出现了七大才子,人称“后七子”(又称“嘉靖七子”),分别是李攀龙、宗臣、梁有誉、谢榛、王世贞、徐中行和吴国伦。这些人后来又被并称为“前后七子”,他们提倡复古,文必言秦汉,诗必称盛唐,才如泉涌,睥睨天下。

宋代的诗歌注重思想性和哲学性,因此又被称为“理诗”。宋代的知识分子喜好禅学,受其影响,诞生了提倡性理学⁴¹的“新儒学”。宋代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唐代人所追求的“外观性文化”,而是喜欢探究事物存在的根本,喜欢探求事物成立的原因。宋代文化是理性的、内观性的,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到文学界,所以宋代诗歌倾向于表现事物之“理”。

一般来说,对唐诗持较高评价的人,往往会贬损宋诗。宋代的“理诗”充满思想性,历代诗人中写“和陶诗⁴²”最多的就是宋代诗人。如果从诗歌的思想性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应该贬损宋诗。

王阳明晚年时,哲学思想逐渐成熟,其诗歌的思想性也变得越来越浓厚。

按照世俗的说法,宋代以后,诗歌衰落,但进入明代后,由于李梦阳和何景明等人的复古运动,使明诗出现了一段小高潮。就在这一时期,王阳明结识了这群才子,和他们切磋诗歌技艺,唱和赋诗。

佐藤一郎曾援引铃木虎雄在《李梦阳年谱略(附:关于李梦阳与王阳明的交友及〈空同集〉)》(《艺文》第20卷第1号)中指出:

《空同集》中有《甲申中秋寄阳明子》五言律诗一首……王阳明壮年时“沉溺”于辞章，“沉溺”是“用情颇深”之意。弘治十一年，李梦阳任兵部主事时，开始提倡古文辞令。王阳明从弘治十年开始一直到正德二年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为止，这段时间一直身处京师。王阳明正是在这一时期和李梦阳等人相识。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一年，王阳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辞章艺能难以达到至善至精。弘治十八年，他痛感学者沉溺于辞章记诵而不知身心之学，于是决定把复兴儒学当作自己的重任。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翰林院庶吉士⁴³湛甘泉……在涉及王阳明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他学习古诗的记载，却没有他和李梦阳交往的任何记录，可能是后人在编写这些集子的时候，把很多跟理学没多大关系的内容都删除了的缘故。（佐藤一郎《明清时代对王阳明诗文的评价》《国学院杂志》第86卷第11号）

《阳明先生年谱》中关于王阳明审查完江北囚徒、乞求回家养病的记载存在一些错误。《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是他在弘治十五年五月，审查完江北囚徒后回京复命，然后到八月，感觉身体不适，这才上书乞求回家养病。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王阳明根本没有回京。到扬州后，王阳明就因病情突然加重，在扬州请假，后来得到朝廷应允，便从扬州直接回家乡余姚了。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在和京师旧友谈论古体诗文时，曾说过：“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这处记载可能也存在错误。王阳明真正悟得辞章记诵之弊端，应该是在他归乡之后，而不应该是在京城之时。据王阳明的高徒王龙溪记载，王阳明在归乡之后曾教导他说：“使学如韩、柳⁴⁴，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⁴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

此外，《传习录》上卷还记载了王阳明排斥空洞诗文的论述：

退之（韩愈），文人之雄耳。文中子⁴⁶，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

王阳明二十多岁时，尝与明前七子交往，学习古体诗文。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悟出辞章之学的不足。至于王阳明和明前七子具体是如何交往的，已无从得知。

但是正德六年（1511年），王阳明四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徐昌国墓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其中记述了他和徐祯卿的交往。此外，余重耀编写的《阳明先生传纂》附《阳明弟子传纂》卷三中的《南中王门弟子传》也收录了徐祯卿的传记：“徐祯卿，字昌谷，又字昌国，吴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少时和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齐名，并称‘吴中四才子’。登进士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交往颇深，二十三岁（实为三十三岁）卒于京师。著有《迪功集》六卷，附《谈艺录》一卷。”

清代毛奇龄将徐祯卿认作是王阳明的弟子，其实不然。王阳明在《徐昌国墓志》中写道：“始昌国与李梦阳、何景明数子友，相与砥砺于辞章，既殚力精思，杰然有立矣。一旦讽道书，若有所得，叹曰：‘弊精于无益，而忘其躯之毙也，可谓知乎？巧辞以希俗，而捐其亲之遗也，可谓仁乎？’于是习养生。”

据此可知，徐祯卿受过道士的点化，向往道教的玄虚之境，他还研习过养生之术，期望长寿。

正德五年，王阳明三十九岁。是年冬天，王阳明返回京城。据《徐昌国墓志》记载，王阳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明前七子都是好友，并且都曾沉溺于佛学、

老庄思想。徐祯卿获悉王阳明抵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刻前来拜访，并与王阳明一起探讨摄形化气养生之术。当时，广东增城的湛甘泉也正好在座，徐祯卿和湛甘泉意见不合，最后沮丧而去。

第二天，徐祯卿继续前来和王阳明探讨养生之道，王阳明笑而不语，于是他干脆在王阳明家中住了一宿，并问王阳明：“吾授异人五金八石⁴⁷之秘，服之冲举可得也，子且谓何？”

王阳明还是笑而不答，徐祯卿接着又问：“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兑敛华而灵株是固，斯亦去之竟竞于世远矣。而子犹余拒然，何也？”

王阳明仍然笑而不应。徐祯卿沉默了好一会儿，问王阳明：“子以予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无；践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将去知故而宅于埃壙之表，子其语我乎？”

这次王阳明终于开口了：“谓吾为有秘，道固无形也；谓吾谓子非，子未吾是也。虽然，试言之。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而固未尝超乎！而固未尝融乎！夫盈虚消息，皆命也；纤巨内外，皆性也；隐微寂感，皆心也。存心尽性，顺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趋舍于其间乎？”

徐祯卿点头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王阳明：“冲举有诸？”

阳明回答说：“尽鸢之性者，可以冲于天矣；尽鱼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

徐祯卿回应道：“然则有之。”

王阳明接着说：“尽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

徐祯卿听罢，低头沉思，突然猛地站起来，对王阳明说：“命之矣！吾且为萌甲，吾且为流澌，子其煦然属我以阳春哉！”

数日之后，徐祯卿前来道谢：“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几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惧不足以致远，则何如？”

王阳明问他：“悸乎？”

他回答说：“生，寄也；死，归也。何悸？”

这说明，徐祯卿当时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此后，二人就再也没见面。数月之后，突然有人来报：徐祯卿去世。王阳明便和湛甘泉前往凭吊，并与徐祯卿的后人聊起家常。徐祯卿的长子伯虬对二人说：“父昌国垂歿，整衽端坐，托徐子容以后事。子容泣，昌国笑曰：‘常事耳。’谓伯虬曰：‘墓铭其请诸阳明。’气益微，以指画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余遂不可辨，而神气不乱。”

通过上文可知，王阳明早年在京师时，曾和徐祯卿探讨过道教养生之术，后来他被贬谪到贵州龙场。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返回京城。此时的王阳明，已开始带头批判辞章记诵之学和佛学、老庄思想，并与湛甘泉一起提倡圣学。《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当时的徐祯卿已经从辞章之学转向道教养生之术。既然他来拜访王阳明，王阳明当然会劝他放弃道教养生之术而转向儒学。徐祯卿在和王阳明接触之后，终于从佛学、老庄的虚无世界中解脱出来，转而笃信圣学。王阳明爱惜徐祯卿之才，一直想把他引上圣学之路。但他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来说徐祯卿，而是靠自己的感召力把徐祯卿引向了圣学。但没过多久，徐祯卿就病逝了。徐祯卿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岁。王阳明觉得非常可惜，于是为他写了墓志铭。

前文已述，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阳明就已悟得辞章之学的不足。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开始在京城提倡儒学。宋儒的“文以载道”思想最终帮助王阳明悟出了辞章之学的不足，但他在此期间修习的古文功底却为他的诗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阳明后来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达意”的文章，和这一时期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王阳明使用古文写的文章一共有两篇：一篇是弘治九年二十五岁时写的《太白楼赋》，另一篇是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时写的《九华山赋》。

王阳明三十一岁返乡，悟出辞章之学之不足。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

中的诗歌都是王阳明三十一岁之后作的，之前的诗歌一首也没有。王阳明早年可能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一起合写过诗，但是没有一首留存下来。这可能是因为钱绪山等弟子在编写《王文成公全书》时，将恩师王阳明沉溺于辞章时的诗歌刻意删除了。

浜隆一郎评价王阳明的诗文说：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三者兼备才能成为伟人。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人物，能够做到三者兼备的只有三人：三国的诸葛亮、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三人品格高尚，学问精深，并且都有征战沙场之功。如果单从做学问来看，由于诸葛亮修习申、韩⁴⁸刑名之学，不能算作正学，故王阳明的学问是三人之首。王阳明是继孔孟之后，与朱熹齐名的旷世大儒。

若比较三人的诗文，诸葛亮和曾国藩都不及王阳明。诸葛亮存世的文章中，脍炙人口的仅有《出师表》和《梁甫吟》（是否为其所作，后世有异议），曾国藩留世的则仅有一部《曾文正公全集》。

王阳明的文章以苏洵为范，但在博大昌达方面又远超苏洵，文章实乃明朝之首。日本学者河内屋藤四郎编集的《王阳明文粹》成为后世文章的典范。王阳明的诗歌秀逸高雅，普通诗人难以企及。仅从他十一岁时作的两首绝句，便可知他天资聪颖，恃有诗才。后来王阳明沉溺于辞章，也是必然的。

王阳明既反对文章复古，也排斥外表华丽、败絮其中的八股文。他主张文章要写实，要注重内涵。随着他思想的成熟，他文章的内涵也越来越精细微妙。其实这一状态是很难企及的，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如此，肯定也下了不少功夫。嘉靖五年（1526年），王阳明五十五岁。是年，他给高徒邹东廓写了一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其中写道：

书院记文，整严精确，迥尔不群，皆是直写胸中实见，一洗近儒影响雕饰之习，不徒作矣……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自觉……今欲救之，惟有返朴还淳是对症之剂。故吾侪今日用工，务在鞭辟近里，删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里，删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须讲明致良知之学。

在王阳明心中，“鞭辟近里”、“删削繁文”才是真文章。王阳明恪守儒家传统，推崇文以载道，此处的“道”指的是“心中的天理”。王阳明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直抒胸中实见”，重在表现这种“心中的天理”。在这一点上，他和陈献章有些相似。总而言之，王阳明的文章已经超过了复古派的框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

明朝末年，王阳明的思想风靡一时，其文章也受到高度评价。归有光⁴⁹虽然是朱子学者，但他也给予王阳明很高评价，他将王阳明、方孝孺⁵⁰、宋景濂和王祿并列列为四大文豪，而且王阳明位居首位。茅坤⁵¹评价王阳明的文章说：

八大家以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⁵²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浍头及桶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况其设伏出奇、先后本末，多合兵法。嗟乎！公固百代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附揭于此，以见我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

但是，清代以后，阳明学受到激烈批判，对阳明文章的评价也变得非常低（佐藤一郎《明清时代对王阳明诗文的评价》）。

悟出佛道不足

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阳明三十一岁。是年，他向朝廷上书，乞求归乡养病。获得批准后，他回到家乡余姚，筑室于四明山之阳明洞。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道经第九洞天也。为峰二百八十有二，其中峰曰芙蓉峰，有汉隶刻石于上，曰‘四明山心’。其右有石窗，四面玲珑如户牖，通日月星辰之光。先生爱其景致，隐居于此，因自号曰阳明。”

大西晴隆介绍阳明洞说：

明人张鼎思的《琅玕代醉篇》卷三中引用了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薛应旂⁵³的一句话，“宛委山上有石匱，壁中有孔穴，号阳明洞，即《归经》中所云三十六洞天之一洞天也。”

.....

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说。洞天福地均为上天派遣群仙治理的地方。《云笈七签》卷二十七中收录的“洞天福地部”中的《天地官府图》把会稽山洞定为三十六小洞天的第十小洞天，其中写道：“会稽山洞周回三百五十里，名曰极玄大元山，在越州山阴县镜湖中，由仙人郭华治之。”此外，《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的记载和以上所述稍有差异：“会稽山极玄阳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会稽县，夏禹探书。”唐代学者李宗谔⁵⁴编修的《龙瑞观·禹穴⁵⁵·天经》中也有会稽山洞的记载，他引用的是《龟

山白玉经》中的“会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阳明洞天”。

前文所谓的“筑室于阳明洞”，可能就是王阳明在会稽山山脚下搭了一个草堂。（大西晴隆《王阳明》）

在大西晴隆看来，“阳明洞”并不是指真的山洞。阳明洞共有三处，其中一处就是上文所言的四明山阳明洞。但是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阳明学专家近期的调查发现，阳明洞并不是位于四明山之阳，而是在四明山之阴，也就是现在禹王庙所在的位置。其他两处阳明洞都是王阳明亲自取的名字。

第二处阳明洞位于贵州龙场，王阳明称其为“阳明小洞天”。它是个钟乳洞，能容纳百人左右。

第三处阳明洞位于江西南部，王阳明称其为“阳明别洞”。当时王阳明在江西征讨叛贼，来到玉石双洞天之后，特别喜欢这里的景致，取名“阳明别洞”。后来，阳明还再次拜访过此地。

前两处阳明洞都不能算山洞，只有第三处阳明洞才真正称得上是山洞。

此外，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记载：“筑室于阳明洞天。”

在《阳明先生行状》中，黄绾写道：“养病归越，辟阳明书院，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久能预知。”

据说，王阳明在草堂中修习神仙导引之术一月后，感觉阳神⁵⁶已经能够从身体中自由出入，而且还能够预知未来。有一天，他对身边的童子说：“有四位相公来此相访，汝可往五云门迎之。”

童子来到五云门静候，果见王文轵⁵⁷、许璋⁵⁸等四人前来拜访。此四人都是王阳明的好友，童子将受王阳明差遣、特意前来相迎一事告知四人。四人都颇感诧异，见到王阳明之后，问他：“子何以预知吾等之至？”

王阳明笑着回答说：“只是心清。”

这种预知未来的记载古已有之，又被称作“透视眼”或者“千里眼”。北宋程颐曾听说有一隐士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觉得他可能是一位圣贤，所以特意前去拜访，结果大失所望，因为那位隐士并非圣贤。后来程颐得出结

论，只要做到心清，谁都可以预知未来。

儒学中也有预知未来的说法，如《中庸》中就有：“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

后来经常有人前来拜访王阳明，向他请教吉凶祸福。不可思议的是，王阳明大多都能言中。众人都夸赞他，以为是得道的缘故，但王阳明却说：“此簸弄精神，非正觉也。”随后绝口不言，不再为他人预知未来。王阳明追求心的宁静，希望脱离尘网，弃绝杂念，渴望超然出仕隐遁。

《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中记载了他在归乡养病期间作的《归越诗》三十五首。通过这些诗歌，仿佛可以窥见王阳明当时访寺问仙、倾慕仙境的情怀，也可以看到他希望超脱世俗、无念无思的愿望。以下是其中两首绝句：

人间酷暑避不得，清风都在深山中。

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

*

两到浮峰兴转剧，醉眠三日不知还。

眼前风景色色异，惟有人声似世间。

王阳明当时，正像诗中“池边一坐即三日”和“醉眠三日不知还”所描绘的那样，独坐于深山之中，弃绝一切俗念，在融通无碍的世界中畅游。

在王阳明这一时期的诗中，经常可以看到“袒褐坐溪石”、“罪拂岩石卧”这样风格的诗句，使人不禁怀疑他当时是不是在进行“坐忘”的修行。

“坐忘”是《庄子·大宗师》中的词。《庄子·大宗师》记载了一段孔子和其弟子颜回的对话，其中言及了“坐忘”这一概念，后来逐渐演变成一则寓言：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

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根据孔子和颜回的对话，可以看出“坐忘”其实就是达到物我两忘境界的一种修行方法。

在《庄子·齐物篇》的开头部分，曾用非常优美的文学语言描述过物我两忘的境界：“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

“天籁”是超脱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肉眼凡胎听不见，是一种来自上天的声音。文中的“忘我”“无我”和“坐忘”一样，都是谋求超脱现世的修行方法。

《庄子》中的“坐忘”和佛教中的“无相无想”有些相似。“无相”指的是逃脱物质束缚，悟出万法皆空，最终实现内心的清净无垢。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放弃一切牵绊的心境。“无想”是指心无牵挂，超越物相和心相的状态。总而言之，“无相无想”就是万物皆空，不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要求修行者必须放弃七情六欲。

王阳明追求心灵的平静，希望自己也能达到《庄子》中的“坐忘”以及佛教中的“无相无想”的境界，超越世间的一切羁绊。

但在王阳明的心中还有一份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牵挂。他的祖母岑太夫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对他疼爱有加，父亲龙山公对他有养育之恩，王阳明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王阳明心里明白，如果不放下这段感情，就不可能达到出仕的境界。他也曾努力地去放下，但越是这样做，心中的牵挂

反而越强烈。

踌躇不决之际，他忽然觉悟到：“此孝弟一念，生于孩提。此念若可去，断灭种性矣。此吾儒所以辟二氏。”

至此，王阳明心中的迷雾一扫而空，他悟出了佛学和道教的不足，转而笃信儒学。佛教和道教追求的是弃绝人伦，也就是放弃对亲人的恩爱之念，这完全有悖于王阳明有志于家国民生的志向。王阳明能够迷途知返，幡然醒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王阳明以孝为本，转而批判佛学、老庄思想，这一转变的意义十分深远。众所周知，孝道是孔孟之教即儒学之根本，也是儒学区别于道教、佛教的关键所在。如果比较陆九渊、王阳明与程颐、朱熹的孝道思想，就会发现陆九渊、王阳明更注重孝道，这也是为什么阳明学者中会出现那么多重孝道思想家的原因之所在。

程、朱、陆、王虽然都批判道教和佛教，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否定道教和佛教，对其中一些积极的思想也给予了肯定。比如佛教、老庄思想不同于法家和世俗的现实主义思想，追求的是把人引入永远光明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是好的。但是，如果过于拘泥于此，又会使人泯灭“本性”。他们觉得，道教和佛教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以人为本，没有顾及人的“本性”。

道教认为，“真正的超脱之道就蕴藏在天地万物之中。”佛教主张，“即心即佛”“即身成佛”。由此可见，虽然道教和佛教都主张通过出仕来探究道之本源，但求道的最终结果还得回归现实本身。从本源上看，儒学与道教、佛教的出发点不同，儒学主张以人为本，要求直接从现实出发去求道，而道教和佛教则是拐了一个大弯。

在王阳明的观念中，孝道是人本性的流露，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质，而佛教和道教则将孝道视作假和空，这是对人性的泯灭。毫不夸张地说，孝道就像横在道教和佛教咽喉处的一把刀。道教和佛教对孝道的认识阻碍了它们在中国的发展。

莫逆之交的影响

上文中提到四位才子曾前往阳明洞拜访王阳明，其中两位就是王文轵和许璋。二人的思想对王阳明有一定的影响。

《明儒学案》中的《姚江学案》记载了王文轵和许璋的事迹。此外，耿定向的《天台集》中的《先进遗风》、张履祥的《杨园先生全集》中的《近古录第三》，还特地对许璋作过详细介绍。

王文轵，字司舆，也作思舆，号黄轸子，绍兴山阴人。成年后，身体多病，故修行静坐隐居之术。读书喜欢自己体会，不喜欢章句训诂，他曾对别人说：“朱子注说多不得经意。”

众人听后，都非常惊讶。王文轵和王阳明是莫逆之交。他对儒学经典的解释对王阳明有一定影响。

日本古文学派和古文辞学派的儒学家们一直批评朱熹在对经典作注释时杂糅了太多的佛教、老庄思想，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不能不说是朱熹的独创。朱熹向来尊重汉唐的训诂之学，并在此基础上对经典进行注释。他的经典注释充满了独创性。

如果读一下王阳明的《传习录》，会发现他在很多地方并没有把经典当作经典去做客观的解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说得极端一点，王阳明是在借解释经典之机阐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经典解释方法在欧美学者中比较常见，但他们有时为了表述自己的观点，反而将王阳明的解释视作是对经典的权威解读。据此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学者在做学问时的根本性差异。

无论如何，王阳明对经典的解释方法深受王文轵的影响。但是在清代，这一解释方法却受到清朝文人的激烈批判。《明史·儒林传》对此评价说：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

同情阳明学的明末僧人智旭评价王阳明说：“余每谓明朝功业士，远不及汉、唐、宋，理学则大过之。阳明一人，直续孔颜心脉。”（《灵峰宗论》卷第六之四《西方合论序》）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王阳明受朝廷之命，前往江西南赣⁵⁹、福建汀漳二州巡查，平定盘踞当地的叛贼。出发前夕，王文轵对王阳明的弟子说道：“阳明此行，必立事功。”

众人问其缘由，王文轵回答说：“吾触之不动矣。”

王文轵死后，王阳明开始讲授良知之学，时人多有批评非难之声。王阳明愤慨地说：“安得起王司舆于九原乎？”

许璋是王文轵的好友，当王阳明在阳明洞养生时，时常前去拜访。

许璋，字半圭，绍兴上虞人。许璋性格醇厚，潜习性命之学，对世事恬淡无欲。此外，他还善权谋之术，精通天文、地理、兵法和奇门遁甲。他曾把诸葛亮的阵法和奇门遁甲之术传授给王阳明。

正德十四年（1519年），四十八岁的王阳明果断出兵，迅速平定了宁王宸濠之乱，并且生擒宸濠，立下大功。这和许璋的教诲密不可分。后来王阳

明为了报答许璋之恩，赠送给他一些钱财和布帛，但被许璋拒绝了。据说王阳明还经常坐着竹轿去山中拜访许璋。

许璋曾经拜访过陈献章，王阳明应该从他那里听闻过陈献章的心学。陈献章的心学以静虚为宗，主张通过静坐来养出“端倪”。王阳明去拜访娄谅的时候，也可能曾听过陈献章的心学。但他当时年仅十八，内心比较单纯，还未受到形形色色思想的侵扰，对心学的认识也没有那么深。当他和许璋交往时，思想成熟了很多，陈献章的心学应该已经深深烙入他的内心。但王阳明从来没有论及陈献章。

前文已述，《明儒学案》的著者黄宗羲在《白沙学案》的序中写道：“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

陈献章提倡“端倪”说，王阳明提倡“良知”说，其实在“端倪”说中也可以看到“良知”说的影子。陈献章主张从“静”中养出“端倪”，而王阳明则主张良知的“扩充向上”和“发用流行”。二者虽然同属心学，但却是一个主“静”，一个主“动”。

阳明学派的唐荆川⁶⁰曾说：“白沙先生尝言，静中养出端倪，此语须是活看。盖世人病痛，多缘随波逐浪，迷失真源，故此耳。”

在唐荆川看来，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端者，王阳明则是光大者。多亏了王阳明的“主动心学”，陈献章的“主静心说”才能变为“活看”。但是严格来说，陈献章的“主静心学”和陆九渊的“主动心学”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而王阳明继承的正是陆九渊的“主动心学”。

前文已述，陈献章和王阳明的学说虽然同属心学，但却存在着静与动之别，这恰恰也是“宋学”和“明学”的区别。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陈献章并不是明代心学的开端，王阳明也不是他的继承者。

朝鲜的李退溪⁶¹对此评价说：“陈白沙、王阳明之学，皆出于象山，而以本心为宗，盖皆禅学也。然白沙犹未纯为禅，而有近于吾学。故自言其为

学之初，圣贤之书无所不讲，杜门累年，而吾此心与此理，未凑泊吻合，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心体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始涣然自信云。”

又说：“至如阳明者，学术颇忒其心，强狠自用。其辩张惶震耀，使人眩惑而丧其所守。贼仁义，乱天下，未必非此人也。”

因为李退溪是纯粹的朱子学者，所以对陈献章的人品和学问都给予了肯定，而对王阳明则是既排斥其学说，又贬低其人品。

王阳明应该从许璋处了解到许多有关陈献章的事迹。后来王阳明和陈献章的弟子湛甘泉、杨景端成为好友，不可能不知道陈献章的事迹和思想，但他为什么从未提及陈献章呢？这可能和王阳明对陈献章的“虚静”“存养”之说不感兴趣有关，此外还可能跟王文轵、许璋尤其是许璋的影响有关。据《明儒学案》中的《许璋传》记载，许璋潜心于性命之学，对陈献章的“虚静心学”不感兴趣。

不管怎么说，事实就是王阳明虽然从许璋处了解到陈献章的“虚静心学”，但最终并没有被白沙学所吸引。许璋还教给王阳明权谋之术，使他接触到儒学的“性命之学”和“体认之学”，为其最终转向儒学助了一臂之力。

从佛教和道教中解脱出来、转而笃信儒学的王阳明立志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同时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须有强健的体魄，于是第二年，即弘治十六年（1503年），他来到了西子湖畔疗养身心。

西湖疗养

西湖位于浙江杭州。杭州昔属吴越国，为南宋立都之地。西湖的名山胜水得天独厚，古刹隐士不可胜数，文人墨客往来不绝。王阳明曾经畅游杭州，遍访当地的古刹名寺。

北宋初年著名的隐逸诗人、被后人尊称为“和靖先生”的爱梅之士林逋⁶²曾经在西湖居住。林逋是杭州钱塘人，结庐于西湖的孤山，二十年不曾踏入城市半步，并且在草庐旁为自己修建了坟墓。终生未娶，唯喜植梅养鹤，常驾小舟泛游于西湖之上，拜访西湖周边的寺庙。林逋有一首咏诵西湖的诗歌，赞美了西湖的景致。

混元神巧本无形，匠出西湖作画屏。

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

桡炉粉堵摇鱼影，兰杜烟丛阁鹭翎。

往往鸣榔与横笛，细风斜雨不堪听。

王阳明也作过两首与西湖有关的诗，题为《西湖醉中漫书二首》。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

白凫飞处青林晚，翠壁明边返照晴。

烂醉湖云宿湖寺，不知山月堕江城。

*

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

在第二首诗歌的最后两句中，王阳明说没有必要到莲池旁去赏花，醉卧岸边，微风一样会把莲花的芬芳送到你面前。

日本有近江八景，中国有潇湘八景，西湖同样也有十大名胜，被称为“西湖十景”，分别是：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王阳明选择了西湖这片风光明媚的胜地来疗养身心，并且一有闲暇，就去拜访当地的古刹。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曾经游览过南屏山的净慈寺和大慈山的虎跑寺。

净慈寺是禅宗名寺，百丈怀海法师曾在此寺教化弟子大慈寰中。此外，法眼宗的道潜和延寿、云门宗的冈照宗本、大通善本都曾在净慈寺修行过。据久须本文雄的调查，当时在西湖地区除了净慈寺和虎跑寺之外，还散落着法镜寺、法净寺、灵隐寺、护国寺、葛仙祠（抱朴道院）和理安寺等古刹。王阳明很有可能也游历过这些古刹。

一日，王阳明去虎跑寺游玩，听闻有一禅僧已经坐关三年，终日闭目静坐，不发一语，不视一物。

王阳明径直来到禅僧面前，粗声大气地说：“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和尚受惊不已，立刻起身。摆弄禅机如股掌之物的禅僧反而被王阳明的禅机吓了一跳，觉得王阳明定非凡人，于是毕恭毕敬地行礼问：“小僧不言不视已三年于兹。檀越却道口巴巴说什么，眼睁睁看什么，此何说也？”

王阳明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他：“汝何处人，离家几年了？”

和尚回答说：“某河南人，离家十余年矣。”

王阳明问：“汝家中亲族还有何人？”

和尚答曰：“止有一老母，未知存亡。”

王阳明问：“还起念否？”

和尚答曰：“不能不起念也。”

于是，王阳明说道：“汝既不能不起念，虽终日不言，心中已自说着；终日不视，心中自看着了。”

禅僧听闻这番话，幡然醒悟，合掌向王阳明请教说：“檀越妙论，更望开示。”

王阳明答曰：“父母天性，岂能断灭？你不能不起念，便是真性发现。虽终日呆坐，徒乱心曲。俗语云：爹娘便是灵山佛，不敬爹娘敬甚人。”

王阳明的话还没有说完，禅僧便不禁大哭起来，对王阳明更是感激不已。他对王阳明说：“檀越说得极是，小僧明早便归家省吾老母。”

王阳明放心不下，翌日再次拜访该寺，发现坐禅的禅僧不见了。寺内的僧人告诉王阳明，禅僧一早就收拾行李启程返乡了。

摆弄禅机教化弟子

前文已述，王阳明通过摆弄禅机，即刻感化了禅僧，令人惊叹。王阳民生来就具有奇谋，少年时代就曾用计谋促使继母改过自新。在后来教授门人弟子时，他也会时不时摆弄一下禅机。

在王阳明之后，著名朱子学者陈清澜对朱子学极度虔诚，而将程王之学视作禅学，对其极端排斥抗拒，甚至一度痛斥不已。朱子学在明末有所抬头，和陈清澜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陈清澜排斥王阳明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王阳明对禅机实在是太熟悉了，可谓是运用灵活。接下来就介绍几个他运用禅机教化门人的例子。

王阳明在创立自己的心学之后，经常运用禅机来教化门人。虽然经常摆弄禅机，但他并没有为禅学所浸染。王阳明分得非常清楚，阳明学是以儒学的世界观为基础，而禅学是以佛教的世界观为基础，二者本源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若读《传习录》，随处可见让人激情澎湃的问答。若读《朱子语类》，这样的感动就会很少。朱熹重理性，观察纤密尖锐，解释自己的学说时偏向于理论性，所以读起来就少了那份生命的跃动。

王阳明阐述自己学说的方式则是简单明了，直中要害，做学问同样如此。阳明学重视体验，有一些神秘主义哲学的特性，所以王阳明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摆弄出几段禅机。但不管他如何的重体验，如果他不够足智多谋，也不可能摆弄出禅机。

王阳明在江西作《无题》（《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其末尾有如下

两句：“同来问我安心法，还解将心与汝安。”

禅宗二祖慧可是达摩祖师的入室弟子，有一次他请求师父：“我心未宁，乞师以安！”

达摩回答道：“将心来，与汝安。”

后来，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之间也有类似的会话。王阳明将这一典故写入了《无题》中。王阳明也曾用禅宗的禅机来教化弟子，在《传习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萧惠：“己私难克，奈何？”王阳明：“将汝己私来，替汝克。”

萧惠是王阳明的弟子，曾经痴迷于道教和佛教。王阳明告诫他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鸢窃腐鼠耳！”

萧惠貌似没有把老师的告诫放在心上。

萧惠：“请问二氏之妙？”

王阳明：“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萧惠：“惭愧备至，请问圣人之学？”

王阳明：“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

萧惠再三恳求。王阳明对他说：“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在《传习录》下卷中也有王阳明运用禅机教化弟子的记录。曾有弟子问王阳明自己不能切实修行的原因，王阳明说：“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

弟子回应说：“‘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

王阳明回答说：“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弟子又回应：“正求讲明致之之功。”

王阳明又回答：“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

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其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

过了一会儿，又有其他弟子问修行的要点。王阳明环顾左右说：“我尘尾安在？”

这时，一座弟子都站了起来，对老师佩服不已。王阳明就是这样，在教诲他人时，一句话就足以让人领悟。

在《传习录》下卷中还记载有另外一段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王阳明晚年创立的“良知”说，也可以窥见他随机应变、运用禅机来教诲弟子的实态。

有一天，弟子王汝止（王艮）外出归来，王阳明问他：“游何见？”

王汝止回答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对他说：“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过了几天，董萝石⁶³外出归来，对王阳明说：“今日见一异事。”

王阳明问：“何异？”

董萝石回答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对他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王汝止傲气过重，自以为是圣人，故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讽刺他说是你自以为是圣人，满街人都看你装模作样地扮个圣人。董萝石质朴守分，尊重世人，故其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时，王阳明知其心中确实诚笃如此，故而说这是平常之事，我辈儒者皆应有见及此，故而无须特异。

王阳明的弟子后来分成三派，分别是良知现成派（左派）、良知归寂派（右派）和良知修证派（正统派）。良知现成派中多有才之士，大多具有搏龙斗蛇的气概，他们拥有使人瞬间醒悟的能力，并且经常摆弄禅机。良知现成派的这些特点给阳明学带来了诸多弊害，最终导致了阳明学的没落。顺便补充一句，在日本的阳明学者中，没有良知现成派。

排斥佛道

王阳明排斥佛教与道教中的神仙养生之说，认为儒学中才存在真正的养生之道。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作《赠阳伯》，其中写道：

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

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谬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大道即是人心，长寿的秘诀在于求仁，《论语·雍也篇》中就曾提出“仁者寿”。王阳明认为服用仙丹并不会使人长寿，自己过去三十多年来一直追求的道教长生不老之法谬误至极，于是后悔不已。通过“大道即人心”这句诗，我们已经能够窥见王阳明心学的一些端倪。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三十七岁。是年，他被贬谪到蛮荒的贵州龙场，龙场生活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翌年，有人问他道佛的神仙养生之道，他在回信中写道：“仆诚生八岁而即好其说，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按照常理，王阳明应该笃信神仙养身之术才对，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认为儒学中才有真正的长寿之道。王阳明当时没有轻率地批判道佛的神仙

养生思想，这可能和他不能完全否定长寿的广成子和老子有关。

后世道教出现的一些拔宅飞升和秘术曲技等，尹文子曾将其称之为“幻”，释迦牟尼曾将其称之为“外道”，王阳明对这样的怪诞之事也都极力否定。王阳明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单纯靠理论，而是通过自己的内心体认，才最终悟出的。所以说，王阳明对道佛神仙养生的批判是他悟得人生奥义的结果。

王阳明又指出：“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后世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若达摩、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

在王阳明看来，儒家亦有神仙养生之道，故“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虽然道教因养生之道闻名于世，一些方外之士也被传得神乎其神，但他们都未曾真正得道，反而是达摩、慧能这些佛家弟子离神仙之道更近一些。无怪乎钟伯敬会赞叹说：“阳明虽未论神仙，但却知晓神仙之道。”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王阳明在龙场时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本、三教合一的思想。这一倾向在他的后世弟子良知现成派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王阳明在悟得道教和佛教之不足后，开始排斥道教与佛教。王阳明曾作《长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诗，其中阐述了自己排斥佛道的思想。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

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

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

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

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这首诗是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五十六岁的王阳明途经浙江金华常山县时所作。王阳明年轻时向往神仙之道，中年时悟得佛道之不足，转而笃信儒学。在诗歌开头六句，王阳明介绍了自己早年修习道家的养生之术，但却一无所得，反而离真正的道越来越远的窘状。

此外，王阳明还作过两首题为《书汪进⁶⁴之太极岩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的诗。

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
须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

*

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
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

这首诗是王阳明在江西时所写的很重要的一首诗歌，也可以称作哲学诗。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四十九岁，平定宸濠之乱后，他来到九华山散心，在太极岩前作了这首诗。在诗歌中，王阳明对比了庄子的“混沌”和周敦颐的“无极太极”论，并且借用六祖慧能的“明镜”论来阐述自己心即理的主张，同时指出禅宗追求的心死乃是大错，并且对世人施以劝诫。

混沌之典出自《庄子·应帝王篇》。南海的大帝名叫儵，北海的大帝名叫忽，中央的大帝叫混沌。儵与忽常常相会于混沌之处，混沌用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于是儵和忽在一起商量报答混沌的深厚情谊，说：“人人都有眼耳口鼻七个窍孔用来视、听、吃、呼吸，唯独混沌没有，我们为他凿开七窍。”他们每天凿出一个孔窍，凿了七天，七窍生成了，可是混沌却死了。庄子借这一典故表明即使以再英敏的智慧去分析未分化的混沌，也难以得其要领。

可是在千年之后，道州营道县人士周敦颐只将混沌凿了一个窍，就将其本质告之于天下。王阳明认为周敦颐是儒学千年传统的真正传人，是他的思

想贡献才让儒学这棵老树发出了新枝。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开篇就说“无极而太极”，这是对《周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解释。周子认为，太极生万物，无限定，故太极即无极，同时太极又蕴藏于生成的万物之中。

“明镜”论取自《六祖法宝坛经》。五祖弘忍为了挑选禅宗衣钵的继承人，命弟子作偈。神秀和六祖慧能各作了一首。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

在王阳明看来，心也是无极的，和六祖慧能所言一样，心本无形，不可能像明镜台，明镜本身就是尘埃。心就如同周敦颐的太极图中画的那个圆圈，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不需要像禅僧那样，坐在蒲团上打坐，也不需要舍弃三昧，心如死灰。《书汪进之太极岩二首》是一组批判禅学的诗，王阳明在其中引用了周敦颐的“无极太极”论。通过这两首诗，我们还可以发现当时王阳明已经觉得任何人都具有良知，并且这种良知堪比较洁的明月。

儒佛的本质区别

王阳明接触到的佛学主要是禅学。根据他的理解，儒学和佛学都是以心学为宗的学说。嘉靖四年（1525年），五十四岁的王阳明写了一篇《重修山阴县学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在文中他这样说道：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

……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

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

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

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

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

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今之为心性之学者，而果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而可谓之禅乎哉！

“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这其实是陆九渊的主张。王阳明认为在“学以求尽其心”方面，禅学和儒学是相同的，但其中还是存在毫厘之差。禅学将心分为内外两部分，由于担心“外”会扰乱“内”，所以主内斥外，所以禅学讲的“尽其心”是自私自利的心。而儒学的“尽其心”则与其不同，儒学追求内外统一，万物一体，讲究典章制度和礼乐教化。总而言之，儒学和禅学都是以心学为宗的学说，是否追求“经世致用”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在《传习录》下卷中，王阳明从道教和佛教的本质区别入手，对道教和佛教加以批判：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

能无上加得一毫有？

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

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障碍。

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这是王阳明晚年提倡“致良知”说时发表的对道教和佛教的批判。在王阳明看来，儒学的本体是“良知”，追求的是天地万物的绝对虚无，其中不含半点私欲。而道教和佛教虽然也都坚持虚无，但他们追求的却是长生不老和脱离生死苦海，说到底追求的还是自己的私欲，所以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虚无。

佛教还执着于“相”（现实的形态），王阳明对此也提出了批判。《传习录》下卷中记载了一段黄直⁶⁵和王阳明之间的对话。

黄直问：“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⁶⁶，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请问。”

王阳明答：“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父子、君臣和夫妇这些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佛教却极力否定，不承认它们的存在。佛教的目的是“不着相”，可是刻意为之就变成“着相”了。儒学与佛教完全不同，儒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顺势而为之，看起来是“着相”，其实已经变成佛教所追求的“不着相”了。

在《传习录》下卷中，王阳明批判了佛教动静分离、厌动求静的思想。

黄直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王阳明答：“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在佛教看来，儒学是主动的；在儒学看来，佛学是主静的。佛教主张的动静合一是以静为主，而儒学主张的动静合一则是以动为主。王阳明在问答中，通过天理的有无来区分二者的不同，这使得佛教和儒学在动静问题上的差别更加明显。

自宋代以来，就常有儒学家批判佛教抛弃人伦事物、轻视经世的弊端。王阳明也认为，佛教把心看作幻想，与世间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能治天下。前文已述，王阳明虽然承认儒学和佛教都是以心学为宗，但认为儒学追求的是心物合一，并且人伦和事物之理都蕴藏于其中，所以说在心法方面，儒学和佛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有人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王阳明答：“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王阳明在写给陆澄⁶⁷的回信中，从“良知”说的角度对佛教的利己主义进行了批判。其实，这也是宋代以来，儒学家批判佛教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

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⁶⁸”，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

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

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根据王阳明的理解，佛教中所提的“本来面目”就是“良知”。如果能够明确认识“良知”，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提“本来面目”。良知的本体是“本自宁静”、“本自生生”，本来“无善无恶”、“善恶自辨”，但佛教却非要“欲求宁静”、“欲念无生”，非要去求一个“无善无恶”，这正体现了佛教的自私自利之心，是佛教仍然执着于尘世的一种表现。

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出任山东省的乡试官，他所拟定的考试题目就是“异端论”。在后文中，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此处所说的异端主要是指道教和佛教。在王阳明看来，“人伦之学”，即儒学以外的所有学说都是异端，都要加以排斥。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

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后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

上文是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五十四岁时在杭州作的《万松书院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的两段话。王阳明提出的“明伦之外无学矣”，实乃千古之卓见，一语道破了儒学的本质。异端指的就是明伦之外的所有学说。

万松书院位于杭州南部凤凰山麓，弘治年间由浙江右参政⁶⁹周木在一座荒废寺庙的旧址上修建而成。嘉靖四年，侍御⁷⁰潘景哲到杭州视察，为了教育当地的秀才，下令扩建万松书院。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详细介绍了修建书院的经过，同时还强调“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并对其加以论述。

“良知之学”与三教合一

王阳明在晚年时觉得如果修习自己创立的“良知之学”，那么佛教所追求的“解脱”和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也都可以一并获得。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嘉靖二年（1523年），王阳明五十二岁。

十一月，都御使林见素⁷¹前往萧山⁷²，王阳明迎接，林见素的随行弟子张元冲⁷³在舟中问王阳明：“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

王阳明回答说：“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备？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

不染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

“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已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

“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在晚年时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一的思想，但他没有刻意强调自己的这一思想。在上文中，王阳明指出，如果认真修行儒学，那么佛教所言的“虚无”和道教所言的“长生”都可以一并求得，同时还论述了道教与佛教的偏颇之处，并对其加以批判。

当良知现成派形成后，王阳明的弟子们开始强调他的三教合一思想。例如，王阳明的高徒、良知现成派的代表人物王龙溪就曾评价说：“先师的良知之学乃三教之灵枢。”同时还指出：“吾儒未尝不说虚，不说寂，不说微，不说密，此是千圣相传之秘藏。从此悟入，乃是范围三教之宗。”（《三山丽泽录》）

会稽山祈雨

在王阳明悟得佛教和道教之不足的第二年，即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阳明三十二岁，是年，他受会稽太守佟公之邀，从杭州来到会稽山为百姓祈雨，并作《祈雨文》一篇。

据《送绍兴佟太守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九）记载，成化十八年（1482年），竹轩公带着王阳明到北京定居，后来佟公也搬到了他家隔壁。当时的王阳明虽然尚幼，但已经觉得佟公将会成为一位栋梁之材。佟公吏治严明，刚健果敢，后来转任苏州，政绩斐然，深得苏州当地士大夫的钦佩。王阳明对其更加信任。此后，佟公又转任王阳明老家绍兴府的太守。王阳明对他充满期待，特意送序一首。在序的末尾，王阳明写道：“公虽不久于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则如之何！”

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佟公的期待是多么大了！

弘治十六年四月至八月，会稽地区遭遇大旱。佟公特意邀请王阳明前来祈雨。王阳明最初坚决不肯，但经不住佟公的多次邀请，最终决定前往会稽山祈雨，并作《祈雨文》一篇。

古时祈雨多用书符或者咒水，方术之士有时也会通过法术来求雨，但是儒家经典中对此皆无记载。

之所以邀请王阳明来祈雨，可能跟王阳明在阳明洞中修行道术、能够发挥灵能的传闻有关。王阳明熟悉佟太守的才德，同时也被他的爱民之心打动，最终答应了佟公的请求，愿意前往会稽山求雨。王阳明在《答佟太守求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的开篇写道：“昨杨、李二丞来，

备传尊教，且询致雨之术，不胜惭悚！今早湛节推辱临，复申前请，尤为恳至，令人益增惶惧。天道幽远，岂凡庸所能测识？然执事忧勤为民之意真切如是，仆亦何可以无一言之复！”

王阳明在《答佟太守求雨》中发誓将排斥前文提到的异端之术，专心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儒学之道，用自己的诚心来感动山川社稷之神。在文章的末尾，王阳明写道：

夫以执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诚无愧于神明，而又临事省惕，躬帅僚属致恳乞诚，虽天道亢旱，亦自有数。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内，自宜有应。

仆虽不肖，无以自别于凡民，使可以诚有致雨之术，亦安忍坐视民患而恬不知顾，乃劳执事之仆，仆岂无人之心者耶？

一二日内，仆亦将祷于南镇，以助执事之诚。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通过《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也可以窥见王阳明信奉儒学、排斥道教神仙之学的态度。

注释：

1 娄谅（1422—1491）：字克贞，别号一斋，明代著名理学家，江西广信上饶人。其学以“收心、放心”为居敬之门，“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著有《目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译者注，下同。

2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一作子传），号康斋，初名梦祥、长弼，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清代黄宗羲在他的《明儒学家》一书中，把《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又把吴与弼列为《崇

仁学案》的第一人，说明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3 一即多：又作一即十十即一、一即多多即一。谓一与一切，其体用相融而不二。即谓一与多可以等同，用以说明法界缘起中现象间之相即关系。

4 持敬：朱熹认为，持敬就是收敛起放纵散逸之心，使心如止水、明镜般地专静统一，以这样一种心态去读孔孟书和格天下物，穷极其理，而不是闭目塞听、绝物弃智地空寂禅坐。

5 本心：将内心的杂质去除之后，留下纯净的，像良心和良知一样的东西。

6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学者称之鲁斋先生，13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

7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

8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初名骈，字梦骥，元代诗人。河北容城人。

9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创“先天学”，认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10 李侗（1093—1163）：字愿中，人称延平先生，南宋学者，程颐的二传弟子，年轻时拜杨时、罗从彦为师。朱熹曾从游其门，并将其语录编为《延平答问》。

11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明代思想家，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山西河津（今稷山县）人。

12 矩矱：规矩、法度和基准之意。

13 复性：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实践儒学的一条

重要指导思想。人性本善，但由于受到蒙蔽，纯真的人性难以显露出来。复性的目的就是使被蒙蔽的纯真人性显露出来。

14 存心：源自《孟子·尽心上》中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之句，为保持赤子之心之意，是儒家宣扬的修养方法。

15 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明代学者，余干县梅港人。他认为“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实也”。穷理的方法不止一端：“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深，行事得之最实。”胡居仁性行纯笃，不为利禄所动。著有《易象抄》《居业录》《居业录续编》等。

16 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蔡州上蔡（河南上蔡）人，人称上蔡先生或谢上蔡，北宋官员、学者。从程颢、程颐学，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谢良佐创立了上蔡学派，是心学的奠基人、湖湘学派的鼻祖，在程朱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桥梁作用。

17 主一无适：由程颐提出，后来朱熹也对其进行了解释，是指心存敬意，精神集中，则内心就不会受外界所扰。

18 罗整庵（1465—1547）：名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明代教育家，泰和人。

19 王祹（1322—1374）：字子充，号华川，明代官吏、学者。浙江义乌人。洪武初参与编纂《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

20 杨简（1141—1226）：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与袁燮、舒璘、沈焕，并称“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他曾师事陆九渊，是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传播了“心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主要著作有《慈湖遗书》《慈湖诗传》《杨氏易传》。

21 “端倪”：指本心的萌芽。

22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著名哲学家，

是学术界公认的宋明理学开山鼻祖。

23 杨时(1053—1135)：原字行可，后因犯友人父讳，改为中立，号龟山先生。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与游酢、伊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四大弟子）。南剑州将乐（属今福建明溪）人。

24 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号豫章先生，闽学的奠基人之一，朱熹父亲的老师，南沙剑州剑浦人。

25 自然性：此处的自然包含三层意义：其一，指天理自然；其二，指为学方法自然；其三，指精神境界自然。

26 训导：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明清时期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在清朝之位阶约为从七品。训导职能通常为辅佐地方知府，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主要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27 少保：官名，辅佐太子，明清少保皆为正二品。

28 祥符桥：位于今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运河支流宜塘河上。

29 进士及第：科举殿试时录取分为三甲，一甲头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

30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与袁继咸、文天祥并称为“江右三山”。江西信州弋阳人。

31 正德十年，王阳明一度打算辞官回乡。

32 两引文皆系张载语，见明朝吕柟《张子抄释》卷三，此处为王阳明的误用。

33 徐穆(1467—1511)：字舜和，江西吉水人。明弘治六年(149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任满升侍读，参与修纂《历代通鉴纂要》。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命徐穆为正使，出使朝鲜颁布大明历法。博学有才识，下笔千言，为文雅致。

34 八卦阵：诸葛亮根据八卦图创立的一种阵法。

35 “使功不如使过”：中国古代的一条谚语，意指使用有功绩

的人，不如使用有过失的人，使其能将功补过。有关的典故颇多，例如：从秦穆公用孟明视（百里视），到后汉索卢放说“夫使功者，不如使过”，再到唐高祖说李靖“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一直到康熙皇帝也对徐乾学讲“使功不如使过”。

36 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明代官员，浙江余姚人。

37 提牢厅：刑部下属机构，掌管狱卒，稽查南北所监狱的罪犯，发放囚衣、囚粮及药物等。

38 三茅：句曲山为三茅山，简称茅山。

39 陶弘景（452—536）：齐梁时代的道士，茅山道教的集大成者，在华阳隐居，被后人尊称为“山中宰相”。

40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被人称为“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明代文学家，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

41 性理学：指宋儒程（程颢、程颐）朱（朱熹）派理学。本于程颐“性即理也”之说。因别于陆九渊、王阳明“心即理也”之说，故清儒以“性理之学”标举程朱派理学。

42 和陶诗：晋代以后，以苏轼、郝经为代表的诗人，他们非常推崇陶渊明的诗歌，并以步韵、次韵、从韵等形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所谓和陶诗，为晋代以后诗人创作的和陶诗的总称。真正意义上的“和陶诗”自苏轼始。

43 庶吉士：明朝翰林院中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的最下级官员。

44 韩、柳：韩愈和柳宗元。

45 颜、闵：颜回和闵子骞，二人都是孔子的高徒，都以孝行闻名于天下。

46 文中子：王通（580—617），字仲淹，号文中子，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隋朝河东郡龙门县人。

47 五金：指金、银、铜、铁和锡。八石：指朱砂、雄黄、云母、空青、硫黄、戎盐、硝石和雌黄。

48 申、韩：指申不害、韩非子，法家的代表人物。

49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明代官员、散文家，江苏昆山人。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

50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明代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浙江宁海人。曾以“逊志”命名其书斋，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为“文正”。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

51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明代散文家、藏书家。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儒将茅元仪祖父。文武兼长，雅好书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观点，至于作品内容，则主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茅坤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同被称为“唐宋派”。

52 尊经阁：尊经是指尊重经书，尊经阁是收藏经书的图书馆。

53 薛应旂（1500—1575）：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著有《宋元资治通鉴》《考亭渊源录》《甲子会记》《四书人物考》《高士传》《薛子庸语》《薛方山纪述》《宪章录》《方山文录》《浙江通志》等。

54 李宗谔（964—1012）：字昌武，景德年间为翰林学士，迁谏议大夫。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李昉之子。风流儒雅，藏书数万卷，曾参与编《续通典》。

55 禹穴：位于会稽山的一座山峰之上，相传夏禹曾藏书于此。

56 阳神：神气混融后的升华，虚灵无质而有体有用，能“聚则为形，散则为气”，隐显自如，并分身散体，变化无方，以神通妙

用而游戏人间，积劝立德，一旦上帝的诏书降下，或不愿活动于人间时，使可从天门而出，弃壳升仙，大做“天官”，或做优游于洞天福地的散仙。

57 王文轵：字司與（《王文成公年谱》作“思與”，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作“思裕”，又写作“司與”），号黄舉子，明朝人，生卒年不详，浙江山阴人。与王阳明先生为莫逆之友。在王阳明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王文轵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58 许璋：字半圭，明代上虞人。淳厚苦行，潜心性命之学。为余姚王阳明塾师，授以奇门遁甲诸书与诸葛武侯战阵之法。

59 南贛：明弘治十年（1497）始置，驻贛州（治今江西贛州市），辖江西的南安、贛州，广东的韶州、南雄，湖广的郴州，福建的汀州。

60 唐荆川（1507—1561）：原名唐顺之，字应德，明代武进（常州）人。因爱好荆溪山川，故号荆川。嘉靖初年与王慎中同为当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世称“王唐”。后又与归有光、王慎中三人合称为“嘉靖三大家”。后人把唐、归、王三人与宋濂、王阳明、方孝孺共称为“明六大家”。

61 李退溪（1501—1570）：名滉，字季浩，后改景浩，号退溪、退陶，16世纪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师。他的学说主要以朱子学为宗，而对当时的诸子性理学之异同，亦得曲畅旁通，折中于朱子。

62 林逋（967—1028）：字君复，谥和靖，北宋诗人，钱塘县人。淡泊名利，于西湖孤山之上结庐隐居，据说三十年里都没有到过人烟稠密之处。与薛映、李及等交好，一生清谈自适，不曾娶妻，深爱梅花与仙鹤，自谓梅妻鹤子。尽管其诗文清澈严整，奇句较多，但大多都在写成后被其本人丢弃，所以如今现存的仅三百余首。林逋擅长行书，著有《林和靖诗集》。

63 董萝石（1458—1537）：董沄，字复宗，号萝石，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县人，著名诗人。一生布衣，未入官场。听了王阳明的讲

说后深受感动，成为其门人。董萝石，比阳明年长十四岁，开始请求拜师时，被王阳明拒绝了。王阳明表示希望作为师友交往，后因董萝石强烈要求才将他收入门下。因此，在阳明的门人中，他是个特异的人。

64 汪进：字希颜，江西婺源人，明天顺年间进士，以清廉正直著称。

65 黄直：字以方，江西金溪人，明中期学者、谏臣。

66 着相：就是当真。谁当真谁痛苦。其一，佛为了让众生离苦，所以告诉众生不要着相。其二，一切相都是缘起不实在的，想着也着不上，如水中月不可捞。佛可怜众生做徒劳的傻事，所以劝众生不要着相。

67 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浙江湖州归安人，正德年间进士，潜心于通过静心来养生。

68 夜气：黎明时分的清明之气。

69 参政：明代在各省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分领各道。

70 侍御：监督地方官员的官职。

71 林见素（1452—1527）：林俊，字待用，号见素，世宗时升任刑部尚书。

72 萧山：浙江的一个县，位于杭州和绍兴之间。

73 张元冲：名元冲，字叔谦，号浮峰，浙江山阴人，曾任右副都御使、江西巡抚。



／ 倡导圣学

笃信儒学

本节将向各位读者介绍王阳明笃信儒学的经过，以使各位能够更好地去理解王阳明儒学和朱熹儒学的不同立场。

前文已述，结婚翌年，即弘治二年（1489年），十八岁的王阳明拜访了广信府的大儒娄谅。娄谅向他介绍了宋儒的“格物”说，并且还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使得王阳明开始对儒学产生了较强的兴趣。

当时恰是朱子学鼎盛的时期，一提起儒学，一般都指朱子学。在京城期间，王阳明迷上了朱熹的著作。朱子学的特点是“格物穷理”，朱熹也曾言“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于是王阳明就按照朱熹的教诲去修习格物之学。其父所在官署的庭院内有很多竹子，王阳明觉得每棵竹子都应该有其理，于是不分昼夜地盯着竹子看，打算穷尽竹子之理。时间一长，王阳明感到疲劳困乏，再加上生来体弱多病，最终病倒了。王阳明“益委圣贤有分”，于是放弃了修习朱子学。后来他又沉迷于文学，学习兵法，修习神仙养生之道等，度过了一段思想的混乱期。

王阳明有志于朱子学时还不到二十岁，年龄、学识和经验都很不成熟，再加上他想直接悟出旷世大儒朱熹所说的“物之理”，由于缺乏积淀和不切实际，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王阳明生来体弱多病，但富有豪气。他不想循序渐进，只想一气呵成地体悟到朱子学的穷极之理，这是导致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朱熹的“格物之学”其实源自于北宋的程颐。朱熹重视“格物”，他把“格物穷理”视作是儒学入门的第一步。在四十岁左右时，朱熹通过“格物”，

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学问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在这一过程中，朱熹读书一直非常刻苦，一有疑问便会问老师，如果对老师的回答仍有疑问，他又会去问别的老师，一直问到明白为止。经过刻苦学习和积累，朱熹最终明白了“格物”的奥义，并将其确立为自己学问的基础。朱熹的勤学之苦和积累之功是常人所不能比的。

若比较朱熹和王阳明做学问的方法，会发现朱熹是学究型，而王阳明却很难达到这一程度。王阳明还不满二十岁，就想要穷尽朱熹“格物之学”的精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失策的举动。

王阳明在修习朱熹“格物之学”上碰壁之后，转而便走上了异学异端之途。三十一岁时，他又悟出了异端之学的不足，于是重新转向儒学，至此才从“五溺”中解脱出来，开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朱熹和王阳明在确立自己学问立场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差异。朱熹在内省己心的同时，还注重苦读和向师友咨询，最终才确立起自己学问的基础。而王阳明则更注重内省和体验。王阳明是在克服内心苦恼的过程中，体会出真正之道即人伦之道后，才发现儒学之道和自己悟出的人伦之道完全相符，这才开始笃信儒学。

一言以蔽之，在王阳明看来，修习圣贤之学就是依照人伦道德去真实地生活，这是王阳明一生的坚守和选择。

前文已述，朱子学注重“格物穷理”和“存心涵养”，重点是“格物穷理”，而阳明学则更注重“存心涵养”，并且认为“存心涵养”中包含了“格物穷理”。世人普遍认为，宋代之后的新儒学是指心学，王阳明主张求道于心，仅从字面来看，阳明学可以说就是心学。

王阳明曾说：“向心内求理，方得真知。”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这一做学问的方法也是一以贯之的。

王阳明三十一岁笃信圣学，此后就再也没有被异端之说迷惑过，并且还 对异端之说进行了批判。朱熹和王阳明一样，自从信奉儒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出任乡试主考官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阳明结束西湖疗养之后，回到京城。翌年，王阳明三十三岁。是年秋天，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王阳明能够出任主考官和陆偁有很大的关系。陆偁时任山东巡按监察御史¹，久闻王阳明的大名，所以特派使者前往京城，邀请他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

乡试的主考官必须是文章精粹之士，而且王阳明赴任的山东省是孔孟之乡，是昔时齐、鲁、宋、卫之地，孔子的诸高徒也多出身于此，因此能够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挑选拔擢人才贤士，乃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王阳明非常感激陆偁能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同时也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大多是从京官中挑选。明代，在王阳明生活的数十年间，乡试主考官大多是由负责教学的官员担任。王阳明当时是刑部主事，按说是不应该出任主考官的。由此可以看出，这次任命是一次打破常规的人事变动。

那么，成为山东乡试主考官的意义何在？它可以成为王阳明能否以一个儒学家的身份青史留名的试金石。

王阳明后来写了一篇《山东乡试录》（《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其中记录了山东乡试的一些情况。通过《山东乡试录》的序文，我们能够窥见王阳明作为一名儒学家的远大抱负。

山东，古齐、鲁、宋、卫之地，而吾夫子之乡也。尝读夫子《家语》，其门人高弟，大抵皆出于齐、鲁、宋、卫之叶，固愿一至其地，以观其山川之灵秀奇特，将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间，而吾无从得之也。

今年为弘治甲子，天下当复大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辈以礼与币来请守仁为考试官。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取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遂致应名取具，事归外帘，而糊名易书之意微。自顷言者颇以为不便，大臣上其议。天子曰：“然，其如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

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事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又况夫子之乡，固其平日所愿一至焉者，而乃得以尽观其所谓贤士者之文而考校之，岂非平生之大幸欤！虽然，亦窃有大惧焉。

夫委重于考校，将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尽，是不忠也。心之尽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责，吾知尽吾心尔矣；不明之罪，吾终且奈何哉！

盖昔者夫子之时，及门之士尝三千矣，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其尤卓然而显者，德行言语则有颜、闵、予、赐之徒，政事文学则有由、求、游、夏之属。

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学副使陈某者盖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试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呜呼！是三千有奇者，皆其夫子乡人之后进而获游于门墙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艺者乎？

夫今之山东，犹古之山东也，虽今之不逮于古，顾亦宁无一二人如昔贤者？而今之所取苟不与焉，岂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欤？

虽然，某于诸士亦愿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诚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诸士之中苟无其人焉以应其求，以不负其所取，是亦诸士者之耻也。虽然，予岂敢谓果无其人哉！

夫子尝曰：“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夫为夫子之乡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弃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与不明，其相去何远乎，然则司考校者之与诸士，亦均有责焉耳矣。

嗟夫！司考校者之责，自今不能以无惧，而不可以有为矣。若夫诸士之责，其不听者犹可以自勉，而又惧其或以自画也。诸士无亦曰吾其勖哉，无使司考校者终不免于不明也。斯无愧于是举，无愧于夫子之乡人也矣。

王阳明将“理”与“情”融入这篇序文中，让人读罢能够感受到一股温情。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中充满着温情，晚年的“拔本塞源”论和“万物一体”论就是这种温情学术思想的结果。

《山东乡试录》的全文由王阳明亲自执笔写成。接下来就简要介绍一下该书的目录及各部分的要旨。

四书三题

一、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一部分介绍了该如何去做好一名臣子。臣子应该以仁义之言来引导君王，如果君王不听，那臣子就应该奉身而退。

二、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

其中介绍了修身是《中庸》的“治国九经”之本，同时还论述了“存静持敬”和“克己复礼”的重要性。

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

在这一部分中，王阳明认为一个人的地位决定了他要负的责任和义务。上古时代的大禹和后稷身居要职，治国安民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都热心于救民。颜子因为没有官职，也就不存在救民的责任和义务，故而他才能安于自守，自得其乐。但到了后世，人们却忘却了职位与责任的关系，为官之

士以获取高位为荣耀，隐退之士以忘却尘世为高节，结果导致了进不能忧大禹、后稷之忧，退不能乐颜子之乐。

易二题

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王阳明认为在圣人眼中，人道即天道，道无天人之别，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然而常人由于受私欲所扰，将天人分别视之，只知其分，而不知有其理。末尾，王阳明指出“循理则与天为一”。

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王阳明认为天地万象都可以通过“河图洛书”中的数字来显现，圣人也是据此作《周易》。

书二题

一、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

王阳明认为君王必须修其大德，同时还需要在百姓之间建立中庸之道，通过义来裁决事务，通过礼来控制内心。要想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得到良师的教诲和辅佐。

二、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王阳明认为用人就必须用“善人”，而不能用“恶人”。一旦用了“善人”，就要用人不疑，这才是王者之道。

诗二题

一、不遑启居，玃狁之故。

王阳明指出周文王执政顺应民心，同时也让国民了解到边境防御是为了百姓自己的安宁，故戍边之士兵役虽苦，但无人厌烦。王阳明在这一部分还介绍了日常防备在国防中的重要性。

二、新庙制以顺人心。

王阳明介绍了君王施政要顺应民心，并举了鲁僖公的例子。鲁僖公非常擅长这一施政之道，他为了顺应民心，曾修过一座非常华美巨大的寺庙。顺应民心的施政之道其实是始自鲁国国君伯禽，这一优良传统一直为鲁国后代国君所沿用。

春秋二题

一、楚子入陈，楚子围郑，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郟，晋师败绩。楚子灭萧²。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王阳明介绍了上文的春秋笔法，并阐述了战国时期战争与防御的正道。楚王本来是侵略陈国³与郑国，但《春秋》中并没用“侵”字，而仅用“入陈”和“围郑”两词，“入”“围”二字其实是为了掩盖楚王的罪责。此外，还特意列出了晋国败将的名字，其目的是为了指出失律丧师之戒。当提到萧国灭亡时，没有用“萧国溃亡”，而是用“楚子灭萧”，一个“灭”字就断定了楚王的罪责。晋、宋、卫、曹四国结盟本是四国公卿所为，但《春秋》中却将其记为“晋人、宋人、卫人、曹人”，没有指明具体的公卿名字，这表现了对列国公卿的蔑视，同时也暗示着这份同盟条约不可能得以实行。

二、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王阳明介绍了由于吴王无德，陷入夷狄之道，故楚王联合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和越人一起讨伐吴国。《春秋》在提到蔡国、陈国、许国、顿国和沈国的国君时，用的是他们的封号，或为“侯”，或为“男”，或为“子”，但提到徐国和越国，用的却是“人”，即被认为蛮夷。在《春秋》中，将蛮夷之国徐国、越国与蔡国、陈国等国并列，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

表现了对徐国和越国的认可。王阳明指出君子应该与人为善，不应该拘于世俗观念，把他们拒绝在外。

礼记二题

一、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

王阳明介绍了君子与人交往应该遵守礼乐之道，还指出了“慎独”的重要性。

二、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王阳明介绍了内心与身体、国君与百姓的统一性，即“心里爱好什么，身体必定能习惯它们；国君爱好的，民众必定也想得到它们”。同时还指出心是身体的主宰，身体需要服从于心。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如果君主仁义，那么百姓也肯定仁义，如果君主残暴，那么百姓也肯定会以暴制暴，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君主必须依存于百姓，如果君主遵循人伦道德，百姓也会遵守人伦道德，这样君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论一题

一、人君之心惟在所养。

王阳明指出欲想实现以善养心，必须克服内心的私利私欲。此外，还需要存养省察，即在无事时，要注意存养自己的心性；有事时，要注意省察克服自身的私欲。

表一题

一、拟唐张九龄⁴上《千秋金鉴录表》。

《千秋金鉴录》是张九龄在唐玄宗生辰时上的奏折，语言诙谐，充满警

世之语。王阳明觉得向皇帝送这样的贺仪最为恰当，不应该送美玉等珍奇的宝物。

策问“策五道”

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过程中，共出了十三道经义题、五道策论题，此外，论、表还各出一题。经义题选的大多是“四书五经”中跟经世致用有关的语句，策论主要是考察考生对当时急务的对策。王阳明在《山东乡试录》中不仅列出了自己出的题目，还附上了标准答案。王阳明的高徒王龙溪在《阳明文选》中收录了《山东乡试录》中“策五道”的答案全文，并且还附有钟伯敬的批评和赞词。可知其皆是由王阳明亲自执笔写就。（东正堂《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阳明的政治策论

王阳明之所以要做一份标准答案，可能是为了判阅的统一，以确保考试的公平性。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王阳明“策五道”的要旨。

一、礼乐论

自上古以来，礼乐就是中国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王阳明也依照传统，认为礼乐有治世与匡正风俗之功。王阳明还特意论及了礼乐精神，认为礼乐是人情的产物，且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表现形式。山东是孔子故里，先王圣贤的礼乐制度一直在流传，山东考生有必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出此策问。但是，王阳明的礼乐论和以前诸儒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此就不赘言了。

二、佛老批评论

在这道策论中，王阳明论述了佛老的弊端，并且承认批判和排斥佛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阳明“佛老批评论”的主旨是，只要切实了解圣人之道，自然就能够消除佛老思想的弊害。这样的佛老批评论其实宋已有之，但读罢王阳明的对策，还是会发现很多独特的见解。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呜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贤不肖之异焉，此所以有过与不及之弊，而异端之所从起欤？然则天下之攻异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将不攻而

自破，不然，我以彼为异端，而彼亦将以我为异端，譬之穴中之斗鼠，是非孰从而辨之？

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于存养慎独之微，而终之以化育参赞之大；行之于日用常行之间，而达之于国家天下之远。人不得焉，不可以为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为物，犹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

然而异端者，乃至与之抗立而为三，则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过焉，即不及焉。过与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则亦异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为哉？

今夫二氏之说，其始亦非欲以乱天下也，而卒以乱天下，则是为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于二氏之惑，则亦为之徒者之罪也。

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于老子，则以知礼闻，而吾夫子所尝问礼，则其为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养性，以求合于道，初亦岂甚乖于夫子乎？独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然后与吾夫子之格致诚正而达之于修齐治平者之不同耳。

是其为心也，以为吾仁矣，则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义矣，则天下之不义，吾不知可也。居其实而去其名，敛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于都无较计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较计动于其心。此其为念，固亦非有害于天下者，而亦岂知其弊之一至于此乎？

.....

宋代的儒学家在批判佛教时，出现了一些以佛教的理论来批判佛教的情况。例如，杨时就曾提出批判佛教要“操戈入室”，要用对方手中的武器去攻击对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灭佛教。

王阳明的佛老批判论和杨时等人的比较起来，要稳妥恰当得多。王阳明认为从佛老学说的主旨来看，它们是不存在弊害的，但是在后世的学习和传

承中，由于一些人为的错误，导致佛教与道教产生了弊端。

前文已述，王阳明晚年时提出了以儒学为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论，并且认为只要修行“良知”说，道教的养生之道和佛教的超脱之道皆可自然而得，佛教和道教其实皆被包含于儒学之中。通过王阳明的佛老批判论，我们已经能够窥见他“三教调和”论和“三教合一”论的端倪。

三、伊尹论与颜回论

王阳明在策问中说：“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此伊尹之志，颜子之学，所以未易于窥测也。”

王阳明提到的伊尹之志究竟是何志？而颜子之学又是何学呢？

伊尹是商之贤相，出仕前，曾在“有莘之野”躬耕务农。经商汤三次请聘，才出任宰相，辅佐商汤，最终助商汤灭掉了夏朝暴君桀。

当商汤王的孙子太甲即位之后，太甲不遵守汤规，横行无道，于是被伊尹放之于桐宫，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规。三年后，迎回太甲复位。孟子赞赏伊尹以天下重任为一身的精神，称伊尹为“圣之贤者也”。但也有人认为伊尹废立天子太甲是不忠不臣之举，孟子对此反驳说：“如贤者有伊尹爱君之志，则可以放君。如无伊尹秉忠心以爱君，则放君而生篡夺君位之心者也，以为不可矣。”

颜回以德行著称，位列孔门十哲⁵的首位。颜回天资聪颖，虽然家境贫寒，但是极为勤奋好学。二十九岁时，头发全白。三十二岁时，去世，被后世尊称为“复圣”。颜回去世之后，孔子非常悲恸。在《论语·雍也篇》中有如下记载：

鲁哀公：“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此外，《论语·雍也篇》中还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一句感叹：“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曾教授颜回“四勿之训”和“博约之功”。“四勿”是孔子对修行仁德的理解，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和非礼勿动。颜回终生都忠实于孔子的这一教诲，故王阳明将此称之为“四勿之训”。

关于“博约之功”，孔子曾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颜回恪守“博约之功”，因此能够立刻对所有事物都做出是非判断，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也毫不迟疑逡巡。可以这样说，颜回真正理解了孔子的穷极之道。

王阳明认为若想实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非礼”。此外，王阳明还认为如果不能对所有的事物都做出确实的判断，就谈不上“博约”。

颜子的“簞瓢之乐”恰恰体现了他的贤明之处，但众人若想了解他的这一乐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周敦颐才会命令二程（程颢和程颐）先去探求颜子之乐究竟是何乐。

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颜子能实现“簞瓢之乐”，其根本原因在于“穷理”，而“穷理”的根本又在于“慎独”。唐朝韩愈曾说“学问贵在正心诚意”，王阳明对此评价说：“退之之学，言诚正而弗及格致，则穷理慎独之功，正其所大缺。则于颜子之乐，宜其得之浅矣。”

王阳明批评韩愈之学没有涉及“格致”，缺乏“穷理慎独之功”，所以他对颜子之乐的理解就非常浅薄。

总而言之，在王阳明看来，只有有志于伊尹之志，才能理解伊尹之志，否则就会视伊尹的所作所为为不忠不臣之举。只有以颜子之学为己学，才能理解颜子之学，否则就不会明白颜子之乐，甚至还会认为颜子是误入歧途。

在这篇策问中，王阳明论述了“穷理”和“慎独”在做学问中的重要性，这和宋儒所言的“穷理”和“居敬”有些相似。所以说，这一时期王阳明的

思想和宋儒们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通过王阳明所说的“至于颜子四勿之训，此盖圣贤心学之大”，也可看出当时的王阳明已经开始有重视“居敬”和“慎独”的倾向。

四、风俗论

王阳明觉得世间的风气已经陷入非常让人忧虑的境地，忠信、廉洁、朴直和道义等好的品质遭轻视，人们只注重形式，而忘却了心术⁶的重要性；只崇尚“和同”，而鄙视不与他人苟合的精神。

王阳明还引用了《论语·阳货篇》中的话：“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指乡村中的伪君子。王阳明指出必须排斥这样的伪君子。

五、急务论

天下祸起纲纪之不振，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时候胡乱而为，只求结果，不注重实效故而有许多“急务”需处理。王阳明为“急务论”出的题目是：“明于当世之务者，惟豪杰为然，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然有司之意，固惟豪杰是求也。非不能钩深索隐以探诸士之博览，然所以待之浅矣，故愿相与备论当世之务。”王阳明还列出了六条亟需解决的“急务”：

1. 藩国由中央发放食禄，并且藩国数量众多，彼此不统一，因而要统一起来。
2. 军队的编制和配置要考虑地理因素，同时还要照顾到人之常情。
3. 要时刻准备应对外敌的入侵，做到有备无患。
4. 蝗灾旱魃之年，由于冗官太多，事物难以取得进展，故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5. 由于赋税繁重，百姓生活不安，故诉狱众多，盗贼横行，故而必须铲除赋税繁重这一弊害。
6. 权贵和富豪贪图私利，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必须通过“礼制”来控制这些阶层的贪欲。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政情已经出现混乱，纲纪废弛，外敌屡次入侵，并

且盗贼四起。上文中的六条建议是王阳明为明朝政府应对紧急事务提出的对策，是他代作的“标准答案”的主要内容，从中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经世的抱负多么宏大。

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时，山东考生穆孔晖拔得头筹，中了解元。他性格端雅好学，后出任侍讲学士、南京太常寺卿。去世后，被追认为礼部右侍郎，谥号“文简”。穆孔晖最初并不认同王阳明的学说，后来变得笃信，并且亲自推广王阳明的学说。但也有说法认为他后来比较倾向于佛教。

主持山东乡试期间，王阳明曾登过泰山，并作《登泰山五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第五首是：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孤坐万峰巅，嗒然遗下块。
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
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
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
吾亦不强语，惟复笑相待。
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王阳明在诗中描述了自己登顶之后，抛却世俗之心，纯净无垢的洒脱心境，并表示只有孔子才能理解自己的这一心境。

王阳明登泰山后，还想起了欧阳修的《庐山高》，于是自己也作了一首《泰山高次王内翰司献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歌颂泰山之高峻，抒发自己俯仰古今的心境。在结尾处，王阳明写道：“嗟予瞻眺门墙外，何能仿佛窥室堂？也来攀附摄遗迹，三千之下，不知亦许再拜占末行。”尽管在门墙外难以窥见孔子的厅堂，但我还是想成为孔子的弟子，哪怕忝居末席也好。王阳明借登泰山之诗，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仰慕之情。

与湛甘泉共倡圣学

前文已述，弘治十七年秋，王阳明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同年九月，被转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负责选拔武官的考试，回京师赴任。

当时的学者都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而不知身心修行之学为何物。于是王阳明开始讲学，希望借此启迪大家的心智，使他们树立圣人之志。闻者兴起，翌年，即弘治十八年，已有人愿意拜到他的门下，跟随学习。

王阳明竭诚提倡圣贤之学，但当时的很多学者因为沉溺记诵之学和口耳之学太深，反而批判王阳明是在提倡异端、为自己博取声名。

但非常庆幸的是，当时有一位学者对王阳明非常支持，不是别人，正是翰林院庶吉士湛甘泉。对王阳明来说，当时的心情几乎可以用“久旱逢甘霖”来形容，二人一见如故，共同致力于复兴圣学。无论王阳明是多么强大，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逆转时代潮流，从而祛除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学术弊病。王阳明与湛甘泉的会面，又一次唤醒了他旺盛的精力。

王湛二人的联合在明代儒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王阳明在晚年提出了“良知”说，创立了明代心学，但如果没有和湛甘泉的联合，他能否成为代表明朝的一代大儒，还很难说。

王阳明和湛甘泉会面时，王阳明三十四岁，湛甘泉四十岁。当时的湛甘泉和王阳明一样，也是痛感记诵辞章之学之弊，专心致力于身心体认之学。因此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共同发誓要为复兴圣学而奋斗。王阳明和湛甘泉是明代中期的双璧，是两大学派的巨头，据说二人称赞对方为：“此等人物，未曾遇见！”

湛甘泉，名若水，字元明，号甘泉，世称“甘泉先生”。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出生于广东省增城县甘泉郡，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去世后，和穆孔晖一样，谥号“文简”。湛甘泉比王阳明年长六岁，但比王阳明晚去世三十二年。

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湛甘泉二十七岁。是年，参加地方乡试，一举成功，但由于不喜欢仕途，于是跟随陈献章学习儒学。其后，遵从母命，进入国子监学习。弘治十八年（1505年），四十岁时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张元祯和杨廷和⁷见到湛甘泉的答卷后，称赞说：“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

湛甘泉最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来被提拔为翰林院编修。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出使安南。正德十年，母亲去世，湛甘泉回家守丧三年。守丧完毕之后，在广东省南海县的西樵建造学院，招收门人弟子，传经授业。

嘉靖元年，再次补任翰林院编修。翌年，出任翰林院侍读。嘉靖三年，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此后，任兵部尚书。嘉靖十九年，辞职归乡。

湛甘泉在很多地方创立书院，直到晚年仍坚持讲学，门人弟子满天下，据说其人数多达四千人。湛甘泉晚年身体硬朗，九十岁时还去游览南岳。著有《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圣学格物通》《心性书》《杨子折衷》《遵道录》《甘泉新论》《白沙诗教解注》和《甘泉集》等。

湛甘泉师从陈献章。前文已述，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和娄谅师出同门。王阳明向娄谅请教过宋儒的“格物”说，而湛甘泉是陈献章的弟子，二人又在京城谋面，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奇缘。此外，二人同时提倡体认之学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陈献章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他并不是特别遵守，后来创立了自己的“主静心学”。从心学的发展来看，陈献章应该算是王阳明的前辈。弟子湛甘泉也非常有主见，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学说。他本来以为恩师会批评自己，但陈献章却对此大加赞赏，称其为：“此乃参前倚衡之学。”

陈献章允许湛甘泉去发展自己的学说，这也成为湛甘泉后来做学问的缘起。“参前倚衡”语出《论语·卫灵公篇》。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主张行得通，

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孔子的意思是：若想让自己的主张被他人接受，就要在站着的时候，仿佛看到“言忠信，行笃敬”就显现在眼前，坐车的时候，仿佛看到“言忠信，行笃敬”就刻在车前的横木上。只有达到这种程度，你才能到处行得通。据此，程颐得出“学要鞭辟近里”，深切地体认。陈献章称赞湛甘泉之学为“参前倚衡”之学，实际上也就是称赞他为“深切体认”之学。

宋代的程颐重视对天理的体认。湛甘泉应该是通过陈献章继承了程颐的体认之学。可以说，自陈献章开始，宋明理学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变。

王阳明最初和湛甘泉会面的时候，对心学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深刻。虽说王阳明的心学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它总归还是以体认为主的学说。此外，从王阳明的性格秉性来看，他的心学中陆九渊心学的影子还是非常明显的。陆九渊曾说“吾之心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但其中也不乏程颐学说的影响。这样一来，可以看出王阳明和湛甘泉二人的学说皆是以体认为本的学说，他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那也是必然。

但是在晚年，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学问的主旨，而湛甘泉则坚守“随处体认天理”，二人的观点变得水火不容，一度出现彼此相互批判的情形，但都抱有将彼此学说合二归一的心愿。两大学派在对峙中繁荣发展，但是甘泉学派不如阳明学派发展得隆盛，这一结果和当时的时代思潮不无关系。

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指出的：“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

后文，还将会对王湛二学的异同进行介绍。

萌发隐遁之心

前文已述，弘治十七年（1505），王阳明转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在京城期间，与湛甘泉一起为复兴圣学、向弟子讲授身心之学，虽然忙碌，但对千里之外的故乡山水也时常挂念。他写了七首思念故乡的诗，寄托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其中第一首是《忆龙泉山》（《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

我爱龙泉寺，寺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龙泉山位于王阳明的老家余姚，山中有一座龙泉山寺，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曾经在此寺中读书。王阳明忆起当时游览此山的经历，写下了这首诗。

“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是指自己离开故乡已经三年，整日都是在俗世中奔走穿梭。“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的意思是“自己整日处于俗世中，内心已被浸染，而从龙泉山岩石上流下的泉水却依然清冽，跟泉水比起来，自己真是羞愧万分”。

在第二首《忆诸弟》的诗中，王阳明吐露了自己思念龙泉山、厌弃俗世，希望早日拂衣隐遁而去的心情。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

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
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
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

王阳明的家乡有一个叫鉴湖⁸的湖泊，唐代诗人贺知章曾在此隐居。王阳明在另一首题为《忆鉴湖友》的诗中，表达了自己对鉴湖的思念之情，同时希望自己能够抛却尘世，出仕隐居。

长见人来说，扁舟每独游。
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
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
自今当勇往，先与报江鸥。

生出如此心境的王阳明自然也会思念自己曾经的养生之所——杭州西湖。在一首题为《寄西湖友》的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到西湖旧居的心情。

予有西湖梦，西湖亦梦予。
三年成阔别，近事竟何如？
况有诸贤在，他时终卜庐。
但恐吾归日，君还轩冕拘。

王阳明一方面和湛甘泉一起燃起了复兴圣学的热情，教授弟子身心之学，希望祛除时代之流弊，另一方面却抱有以上诸诗中体现出来的隐遁之情，这究竟是为何呢？

儒家都是思想家，他们会萌发出隐遁之情，那也是必然。但是儒家所言的隐遁和道家所言的隐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儒家来说，虽然希望隐遁，

但内心深处还是会存有一旦有好的机遇，会选择再次入仕，为社稷民生竭尽全力的想法。尽管如此，可王阳明是经历了一番磨难才最终确立了儒学之志，这么快又萌发了隐遁之情，这确实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当时提倡训诂的朱子学风靡于世，王阳明提倡身心之学，结果被人误认为是借异端之学，为自己博取声名，这会不会是他萌发隐遁之心的动机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尤其是在他结识了湛甘泉之后，二人志趣相同，都致力于复兴圣学，根本不可能产生隐遁之心。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王阳明产生隐遁之心呢？这可能和当时的宦官刘瑾祸乱朝政有关。在下一章中，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注释：

1 巡按监察御史：巡按之名起于明朝，并不是固定的职官，多临时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担任，分别巡视各省，考核吏治。明朝的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又称为“巡按御史”，级别虽低，但权力极大。——译者注，下同。

2 楚子灭萧：萧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楚王在郟战胜晋军之后，趁机侵犯萧国，“伐萧不已，而围其城，围萧不已，而溃其众”。楚王通过灭亡小国而宣扬自己声威的做法为当时的士大夫所不齿，故《春秋》中认定灭萧的罪责在楚王。

3 陈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其都城位于今河南省陈州。

4 张九龄：字子寿，历史上的名相，唐玄宗开元年间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5 十哲：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即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

6 心术：指心意的动向和性质。语出《礼记·乐记》：“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管子·七法》：“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尹知章注：“凡此六者，皆自心

术生也。”

7 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号石斋，四川省成都府新都县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正德年间升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于武宗驾崩、世宗尚未登基的四十天时间里，执掌国家大权。

8 鉴湖：位于今浙江省绍兴市南部。

第七章

龙场悟道

武宗与宦官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庙号武宗。翌年，改年号为正德。明孝宗是明代屈指可数的贤君，而明武宗则是明代头号愚蠢皇帝。但是，据清代大儒毛奇龄在《武宗外记》中记载，明武宗容貌端严，爱好读书，记忆力超群，还是太子时明孝宗以及诸位大臣都非常看好他。此外，明武宗还是明朝诸代皇帝中最喜欢动用武力的皇帝。

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父亲去世之后，他再无忌惮之人，于是就开始宠幸起平时跟自己比较亲近的刘瑾等八名宦官，人称“八虎”。这八名宦官自幼就开始服侍武宗，当武宗被定为太子后，他们更是想着花招逗武宗开心。

大学士刘健和谢迁看到刘瑾等人引诱武宗，都非常气愤，于是上书劝谏武宗疏远宦官。刘健和谢迁二人是孝宗驾崩前的托孤重臣、正义凛然之士，遇到问题都会直言不讳。刘瑾等人看到他们的上书之后，都非常恐惧，心中惴惴不安，主动向武宗请辞。这时，户部尚书韩文联合六部九卿诸位大臣联名上书，请求杀掉“八虎”，以图永绝后患。

在当时的宦官中，也有耿直刚正之士，司礼太监¹王岳便是如此。他虽身居大监要职，但不肯与刘瑾等“八虎”同流合污，并劝谏武宗除掉“八虎”。受众人的影响，武宗的想法也出现了动摇，他打算第二天就颁布圣旨，将“八虎”绳之以法，但这一消息不慎走漏。

“八虎”之中，数刘瑾最为奸诈多智，他没有丝毫迟疑，连夜召集“八虎”，一起到武宗面前哭诉说：“陛下为何要杀我们呢？我们平日对陛下忠心耿耿，对陛下的命令言听计从，何罪之有啊？而王岳等人，他们对陛下毫无功劳，

反而联合起来陷害我们。他们这是不臣之举，真正有罪的应该是他们。”

武宗看刘瑾等人哭得挺可怜，又想起他们以前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就改变了主意，下令逮捕了王岳。武宗当即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还任其为禁军总督。至此，刘瑾掌握了宫内和禁军要职，且朝廷内外其他重要职位也都由“八虎”担任。他们立即谋划剪除王岳和其他忠义之臣，所有这一切变故发生在一夜之间。

诸位大臣对此还一无所知。第二天，他们齐聚大殿，等待武宗下达最后的诏书，但等来的结果却和他们期待的完全相反。诸位大臣看到大势已去，于是纷纷上书请辞。刘瑾伪造圣旨，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请求。

这样一来，刘瑾开始专权，祸乱朝纲，凡是可能会触怒武宗的劝谏，刘瑾都会处理掉。他对内迎合君心，对外施以严法，一旦有人违逆了他的意愿，都会被严加惩戒。后来，南京科道²戴铣因为劝谏皇帝而被迫入狱。王阳明也因为上书替戴铣求情而触怒武宗和刘瑾，最终被贬谪到贵州龙场。

东正堂对此评价说：

东汉末年，窦武、陈蕃等大臣想除掉宦官曹节，反被曹节所杀。唐文宗执政时，大臣郑注和李训想除掉宦官仇士良，后来也是被宦官所害。刘瑾之事和以上所述有些相似，都是因为密谋泄露，给对方造成了可乘之机，从而留下千古遗恨。由于他们过于疾恶如仇，最终造成了“穷鼠咬狸”的惨剧。仔细想来，明孝宗托付的顾命大臣原来只是一些忠诚义愤有余、智慧谋略不足之士。

东正堂评价“武宗之罪”：明武宗最初还有挽救时局的机会，但随着他一系列错误的用人政策，这种机会就一去不复返了。武宗曾经到大学士杨一清的家中拜访，向他求书，二人还一起作诗，君臣之间充满难以分舍的奇特之情。通过武宗对杨一清的赞赏，可以看出武宗的爱才之心，也可以看出他有成为英明有为君主的潜质。但由于他上任伊始就出现用人失误，最终导

致围绕在自己周边的全是小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某一天突然良心发现，那也是后悔莫及了。（《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宦官之祸

翻开中国的历史书，会发现宦官祸乱朝政的例子比比皆是。宦官又称宦者、宦寺、宦人或者阉官，是指阉割之后，在宫中服务的男性。市村瓚次郎在《东洋史统》中指出，虽然人们都认为东汉和唐朝受宦官之害最深，但明朝所遭受的宦官之祸其实一点儿也不比以上两个朝代少。

宦官最初是由遭受宫刑³的人担任。宫刑被废止之后，宦官则由自宫者、去势⁴幼儿，以及去势的外国俘虏或者奴隶担任。自宫者多为成年男性，他们大多是自愿被阉割的。去势幼儿则是指在幼儿时就被割掉生殖器，然后进入宫内服务的孩童。此外，在战争中俘获的一些外国俘虏以及奴隶也会被阉割，然后归入宦官，为宫中服务。再到后来，通过海路输入了一些外国的自宫者，所以在当时的港口地带，例如福建和广东等地，自宫者甚多。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宦官祸乱朝政的教训，大幅缩减宦官数量，并且严格控制他们的权力。太祖规定宦官严禁参与政治，并且禁止宦官学习。禁止宦官学习是怕宦官通过学习获取知识，从而助长其不法行为。因此，太祖在位时的宦官大多从事杂役工作，不参与任何政治，看到官员要立正低头，以示谦卑。

但是到明成祖时，宦官迎来了参与政治的好时机。据说，成祖和建文帝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曾有宦官将宫中文情透露给成祖。成祖知恩图报，故对宦官加以厚待，并放宽了对他们的限制。而宦官则以此为契机，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后来不仅涉足政务和军务，还有一些宦官被皇帝派到各地担任钦差大臣，甚至一些宦官还被皇帝派到国外担任外交使节。此外，成祖不仅放宽了对宦官学习的限制，还规定宦官子弟可以享受官费教育。

宦官专横跋扈始自明朝第六位皇帝英宗。当时宦官金英和王振出任要职，

他们祸乱朝纲，肆意而为。在第九位皇帝宪宗时，宦官汪直也是极端专横。但在第十位皇帝孝宗时，没有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可是等第十一位皇帝武宗即位后，又出现了一个大宦官刘瑾，操纵朝纲，为所欲为。

刘瑾专权

刘瑾幼年去势，儿时就陪伴武宗在东宫玩耍。武宗当时年纪尚幼，刘瑾就变着花样去讨取武宗的欢心，逐渐赢得武宗的宠爱。武宗登基之后，立即任命刘瑾为内官监⁵。当时受武宗宠爱的除刘瑾之外，还有另外七人，分别是马永成、谷大用、张永⁶、罗祥、魏彬、丘聚、高凤。此八人被并称为“八党”，由于百姓都惧怕他们，因此又被称为“八虎”。

大学士刘健和李东阳看不惯他们的专横跋扈，于是上书指斥他们的行为。后来，户部尚书韩文等人也上书直陈“八虎”的罪行，予以痛斥。当时他们在上书中是这样写的：

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高凤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優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嫖褻，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缘此辈细人，唯知蛊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

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传之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恣无餍之欲，以累圣德乎！

前文已述，刘瑾获悉有人弹劾自己之后，立即联合其他七人一起来到皇帝面前哭诉。结果，武宗不仅不再追究，反而还对他们加以重用，让刘瑾担

任司礼监之要职。刘健、谢迁和韩文被罢免，皇帝身边的忠臣王岳也被处死。这样一来，刘瑾就完全控制了政权。

明时，奏折先是被送到内阁，然后由内阁官员代替皇帝批答臣僚的奏折，并将拟定之辞书写于票签之上，附本进呈皇帝，由皇帝做最终裁决，这就是明朝的“票拟”制度。刘瑾专权之后，所有的“票拟”都要依照刘瑾的意思书写。

阳明入狱

刘瑾上欺武宗，下乱朝纲，排斥忠臣，并且还安插自己的心腹掌管重要职位。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给事中⁷戴铣、御史薄彦徽共同上书弹劾刘瑾，请求留用刘健和谢迁，“皇上新政，宜亲君子，远小人。不宜轻斥大臣，任用阉寺。”

刘瑾知悉之后，向武宗进献谗言，说戴铣等人所述乃一派胡言，并将他们全部打入大牢。

戴铣，字宝之，江西婺源人。薄彦徽，字舜美，山西阳曲人。二人同为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并且都是豪放忠直之士。

王阳明当时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看到戴铣和薄彦徽等人被打入大牢，他义愤难平，于正德元年十一月，向皇帝上书一封，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试图将二人救出。全文如下：

臣闻君仁则臣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

臣迹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千雷霆之怒者。

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谏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戒，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

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岂其无忧国爱君之心哉？惧陛下复以罪钺等者罪之，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然则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

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况今天时冻沍，万一差去官校督束过严，钺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钺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

王阳明在奏折中，人情入理地劝说武宗放掉戴钺等人，还劝他广开言路。他在题目中用了“去权奸”一词，没有涉及弹劾刘瑾的词句。尽管如此，刘瑾看到这封奏折之后还是大怒。他票拟圣旨，将王阳明打入大牢，杖责四十，还令亲信亲自监督。行刑者加力杖责王阳明，致使王阳明在中途一度昏死过去。此后，王阳明又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

王阳明离开京城时，父亲龙山公还在礼部侍郎任上，也在京城。听闻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的消息后，龙山公非常高兴，对他人说：“吾子得为忠臣，垂名青史，吾愿足矣！”

但是对王阳明来说，因为要远别父亲，不能在父亲身边尽孝，所以悲愤异常。离别之际，王阳明给好友汪抑之写了三首诗，题为《答汪抑之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写道：“子有昆弟居，而我远亲侧。回思菽水欢，羨子何由得！”

正德元年十二月，王阳明被打入大牢，是在牢中过的新年。在此期间，王阳明写了《狱中诗十四首》，但留世的仅有八首。通过这些诗歌，也可以想象得出王阳明在严寒的大牢中过得多么凄惨。《狱中诗十四首》的第一首为《不寐》：

天寒岁云暮，冰雪关河迥。
 幽室翺翺生，不寐知夜永。
 惊风起林木，骤若波浪汹。
 我心良匪石，讵为戚欣动。
 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
 崖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
 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
 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垌！

开头四句表现了狱中的严寒。接下来，王阳明用“我心良匪石，讵为戚欣动”两句诗，表达了自己不为奸党所动的态度。

“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表现的是国家崩溃的情形。“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则叙述了面对国家崩溃，上天见而不救，自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无能为力的复杂之情。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垌！”表达了王阳明面对国家已经无药可医的现状，希望自己也能和《论语·微子篇》里的隐士长沮和桀溺一样，归隐山林，躬耕田园。

第二首为《有室七章》。王阳明在这首诗中叙述了狱中的生活，同时还表达了自己落寞的心情。

有室如廩，周之崇墉。
 室如穴处，无秋天冬。

*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
 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

倏晦倏明，凄其以风。

倏雨倏雪，当昼而蒙。

*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

岂无白日？寤寐永叹！

*

心之忧矣，匪家匪室。

或其启矣，殒予匪恤。

*

氤氲其埃，日之光矣。

渊渊其鼓，明既昌矣。

*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

悠悠我思，曷其极矣。

明末文人钟伯敬认为第二节中的“耿彼屋漏”暗指皇帝的昏聩，第五节中的“或其启矣，殒予匪恤”则是在叙述自己的忠诚。而东正堂则认为第二节中的“日月”和第五节中的“家室”是在暗指皇帝之心。东正堂对“或其启矣，殒予匪恤”的解释是：“如果能够因此而开启君心，那我死在牢里都不足惜，表现了王阳明对皇帝的耿耿忠心。这种精神在第七节中表现得更加充分。”

第四首为《岁暮》，其中有这样两句：“高檐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时登床。”表现了狱中的凄惨光景。王阳明整日兀坐于这样的环境中，如木石一般，无怪乎他会在诗的开头写道：“兀坐经旬成木石。”

此外，王阳明还想起了远在故乡的阳明洞，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在《岁暮》的后半段写道：“峰头霁雪开草阁，瀑下古松闲石房。溪鹤洞猿尔无恙，春江归棹吾相将。”

第五首名为《见月》，抒发了王阳明的悲叹之情。东正堂认为这首诗是《狱中诗十四首》中最优秀的一首（《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八《诗二》）。以下是《见月》的全文：

屋罅见明月，还见地上霜。
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
匪为严霜苦，悲此明月光。
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
胡为此幽室，奄忽逾飞扬。
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
盈虚有天运，叹息何能忘！

“月光如流水”之后的数句表现了王阳明虽然悲叹自己的遭遇，但是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第六首叫《天涯》，王阳明在诗中表示将心平气和地奔赴龙场。尽管被武宗投入大牢，但王阳明依然为自己没能匡正武宗，以及无以报答君恩而慨叹，于是王阳明在《天涯》中写道：“思家有泪仍多病，报主无能合远投。”

他在《天涯》的末尾又写道：“留得升平双眼在，且应蓑笠卧沧洲。”在传说中，沧州有仙人居住，他在此借沧州喻指家乡。他用这两句诗表达了希望能够看到天下恢复太平，然后归乡隐匿的心愿。东正堂评价这两句诗说：“通过末尾两句，可以看出王阳明具有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志气和大度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八《诗二》）

《屋罅月》是《狱中诗十四首》的第七首。王阳明在《屋罅月》的开头写道：“幽室不知年，夜长昼苦短。但见屋罅月，清光自亏满。”

这四句诗再次反映了王阳明在狱中的凄惨生活。在接下来的诗句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对武宗放荡无度，恐会导致社稷沦丧、令宗庙祭祀废绝的担忧。

佳人宴清夜，繁丝激哀管。
朱阁出浮云，高歌正凄婉。
宁知幽室妇，中夜独愁叹。
良人事游侠，经岁去不返。
来归在何时，年华忽将晚。
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

王阳明在狱中服刑时，虽然一开始谁都不认识，但很快就结识了两三位命运相同的友人，他们一起讲学论道。王阳明在前往龙场之前，还特意作了一首《别友狱中》的诗，向他们告别。其中写道：“累累图圜间，讲诵未能辍。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从中可以感受到王阳明在狱中已经忘却了自己的“罪过”，开始专心致力于圣贤之道，并且心中充满愉悦之情。接下来，王阳明又写道：“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表达了自己依循正道，不迎合时世，渴望追随前哲的心愿。

尽管王阳明遭受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对武宗却没有丝毫的怨恨。他在诗中写道：“所恨精诚眇，尚口徒自蹶。天王本明圣，旋已但中热。”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已经达到了韩愈在《拘幽操》中提到的文王的境界。周文王曾被殷纣王幽禁在羑里，但他对纣王没有丝毫的怨恨，这也恰恰体现了文王的至德之处。王阳明或许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有过错，所以对武宗没有丝毫的怨恨。

王阳明在狱中最喜欢读的书似乎是《周易》，尽管当时极其不得志，但他却没有选择佛教和道教的书籍，而是选择了精微深奥、充满处世哲学的古代经典《周易》。王阳明这样做，可以说也是必然的。

中国的文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在艰难困苦之际，很多人都会选择读《周易》，王阳明自然也不例外。后来王阳明在贬谪之地龙场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并且还写了一篇《玩易窝记》，记述当时的情形。

正如《狱中诗十四首》的第三首《读易》表现的一样，王阳明在开头写道：“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义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

在诗的末尾，王阳明还直接引用《周易》中的话，对自己加以劝诫，“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在王阳明看来，能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就再好不过了，同时还表达了希望能够在家乡会稽山的阳明洞中安贫乐道地度过余生的心愿。王阳明通过读《周易》，忘却了狱中的烦恼和忧患。

别了，京城

正德二年（1507年）春天，王阳明离开北京，前往贬谪之地贵州龙场。在《答汪抑之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第二首中，王阳明开篇就提到了“北风春尚号”，据此可知，他离京的大致时间应该是在春天。

而在《答汪抑之三首》第一首的末尾，王阳明写道：“良心忠信资，蛮貊非我戚。”这两句诗其实是取自《论语·卫灵公篇》，“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只要自己“言忠信，行笃敬”，那么即使被流放到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也不需要担心。

在第二首中，王阳明写道：“间关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在王阳明眼中，旅途的艰险不足为道，而道义的倒退却让人深感遗憾。

汪抑之，名俊，字抑之，谥号文壮，江西弋阳人，世称“石潭先生”。弘治六年（1492）进士，正德年间曾参与编纂《孝宗实录》，后来出任礼部尚书。汪抑之品行高尚纯洁，在朝廷为官光明磊落，方正耿直，因此与刘瑾等人不合。汪抑之和王阳明是好友，但二人学说不同，汪抑之信奉的是朱子学。

在第三首中，王阳明写道：“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

鹅湖位于今江西省铅山县北部。宋代时，儒学双璧朱熹和陆九渊曾经在鹅湖寺聚会，双方展开论辩，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以“存养德性”为治学的第一要义，而朱熹则以“格物穷理”为治学的第一要义。后来，陆九渊批评朱熹的学说是醉心于追求心外事物之理，丧失了心的主体性，陷入支离；而朱熹则批评陆九渊的学说是向内求理，流于禅学，陷入虚妄，导致弊害。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之会”上，都没有刻意掩饰彼此学说的差异。

前文已述，阳明学是对陆学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朱熹和陆九渊做学问的主旨不同，但二人却是很好的辩友。白鹿洞位于江西省南康府五老峰山下，唐代始建书院。后来朱熹重建书院，并在此讲学。

有一次，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向弟子们讲授《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己也在一旁听讲。弟子们听完陆九渊的讲课之后，都感动得哭了起来。朱熹为此特意将陆九渊的讲义刻在石头之上，以便让后来人也能知晓。

王阳明在写给汪抑之的诗中，提到了“鹅湖”和“鹿洞”，可能是想等有机会和汪抑之一起去拜访这两个地方，此外也可能暗示了自己想和信奉朱子学的汪抑之进行论辩的心愿。

虽然王阳明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自己沿袭的是陆学，但从其学说“重体验性”来看，却恰恰暗合了陆九渊的心学，所以说在内心深处他应该是认可以陆学为宗的。王阳明在赠给湛甘泉的一组题为《八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诗：“此心还此理。”

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想法与陆九渊是一致的。此外，王阳明在前往龙场途中，作《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第二首这样写道：“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

很明显，当时的王阳明是以“尊德性”的陆学为宗的，并建议在“问学”时，要去掉朱子学陷于支离破碎、溺于字词析义的毛病。

王阳明南行前往龙场前夕，湛甘泉曾作《九章》赠别，而崔子钟又和了一组《五诗》，于是王阳明以一组《八咏》回赠二人。王阳明的《八咏》，其实是模仿了南梁沈约的《八咏》。沈约曾经写过一首诗，共八句，但写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以诗中的每一句为题，扩为八首，取名“八咏”。

崔子钟，名铤，字子钟，又字仲凫，初号后渠，后来改号浞野，河南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因为得罪刘瑾，被贬南京，担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刘瑾倒台、明世宗即位之后，被擢升为南京国子

监祭酒，后又出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并于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敏”。崔子钟信奉程朱理学，所以在晚年时曾斥责王阳明是“霸儒”。不过二人在年轻时却是道义之交。

《八咏》中的第一首是赠给湛甘泉的，开头写道：“君莫歌九章，歌以伤我心。”

第二首是赠给崔子钟的，开头写道：“君莫歌五诗，歌之增离忧。”

《九章》原是《楚辞》中的篇名，因是九篇述怀的辞赋而得名。湛甘泉所作《九章》乃是模仿之作。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几篇。第三篇的题目为《惜别》，湛甘泉在诗中写道：

黄鸟亦有友，空谷遗之音。
相呼上乔木，意气感人深。
君今脱网罟，遗我在远林。
自我初识君，道义日与寻。
一身当三益，誓死以同襟。
生别各万里，言之伤我心。

在湛甘泉心中，王阳明是自己的“辅仁⁸”之友。他在《惜别》中表达的是自己与王阳明离别的感伤心情。

第七篇的题目为《皇天》，诗中写道：

皇天常无私，日日常盈亏。
圣人常无为，万物常往来。
何名为无为，自然无安排。
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

湛甘泉在这首诗中指出，依照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孟子·公孙丑上》）

工夫，可以得出“天机”。

湛甘泉在最后一篇，即第九篇《天问》中写道：

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

与君心以通，离别何怨嗟。

浮云去不停，游子路转赊。

愿言崇明德，浩浩同无涯。

《天问》中的“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体现了湛甘泉“万物一体”的思想。湛甘泉认为，天地间的万物和“我”本是一体的，天下百姓和“我”的骨肉亲人一样，都是一家人。实际上，这沿袭的是程颢和张载的“万物一体”思想。程颢曾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张载则说：“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湛甘泉尤其强调“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晚年所提出的“致良知”说，尽管不同于湛甘泉的学说，但也是认同以良知为本的“万物一体之仁”的。这与他年轻时曾受湛甘泉的影响不无关系。

王阳明在《八咏》第三首的开篇写道：“洙泗流浸微，伊洛仅如线。后来三四公，瑕瑜未相掩。”通过这四句诗，王阳明暗示程学已经衰退，而朱子学又不完善，如果要继续孔程之学，就很难再有进步了。可以看出，这时的王阳明已经对朱子学有所不满，并且开始寻求自己的唯心理学。《八咏》第四篇的开头写道：“此心还此理，宁论己与人。千古一嘘吸，谁为叹离群。浩浩天地内，何物非同春！”从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唯心理学的影子。

陆九渊曾说过：“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可见，陆九渊之学和主张“心即理”的程颐之学以及朱子学完全不同。但通过《八咏》第四篇的诗句，可以看出王阳明对陆九渊之学是暗暗仰慕的。

陆九渊之学的源头在程颢。程颢主张“道器一体”说“天理体认”说和

“万物一体”说。前文已述，湛甘泉沿袭的是程颢之学，王阳明曾和他一起倡导圣学，在内心倾向程颢之学也是必然的。所以在《八咏》第五首的开篇，王阳明写道：“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他在这里从程颢“道器一体”的立场出发，隐秘地批判了朱熹的“道器二元论”和“理气二元论”。

而在《八咏》第六篇的开头，王阳明写道：“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中有亦何有，天之即成空。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

周敦颐曾经提出“主静无欲”说，以上诗句便体现了王阳明对周敦颐之学的继承。根据王阳明的理解，“静虚”乃是圣人之心，和佛教以枯槁之心为宗的“虚寂”完全不同。周敦颐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无欲故静”。王阳明后来继承的也是周敦颐的这一思想。所以王阳明终生都没改变对周敦颐和程颢的仰慕之情。

同样在第六篇中，王阳明写道：“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机，非子孰与穷！”

湛甘泉的“体认之学”以孟子的“勿忘勿助”为治学之要旨，王阳明在此称赞了他的这一观点。湛甘泉认为，比起“有事”工夫，“勿忘勿助”工夫更为重要。后文我们还将叙述，王阳明到晚年时却对湛甘泉的“勿忘勿助”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如果以“有事”为宗的话，“勿忘勿助”自然可成，并且指出自己的学说和湛甘泉的学说存在着直接与迂曲之别。

读罢王阳明的《八咏》，会发现比起别离之伤，不能再和朋友一起切磋学术的悲伤似乎更甚。

虽然和友人的别离还未满十日，却如别三年。他梦到和汪抑之、湛甘泉、崔子钟一起讨论的情形，并为此作了三首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第二首如下：

起坐忆所梦，默溯犹历历。

初谈自有形，继论人无极。

无极生往来，往来万化出。

万化无停机，往来何时息！

来者胡为信？往者胡为屈？

微哉屈信间，子午当其屈。

非子尽精微，此理谁与测？

何当衡庐间，相携玩义易。

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的思想是在《周易》之理中驰骋，并且还倾向于周敦颐和邵雍的“宇宙生成论”。周敦颐根据《周易》得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认为阴阳的流转生成万物，所以要从“无极”中寻求造化之理。

邵雍则指出：“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认为阴阳的屈伸可生成万物，所以要从屈伸的极限处寻求宇宙之理。

王阳明在晚年作《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在第四首的开篇，王阳明写道：“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由于年轻时曾修习过周敦颐和邵雍的“宇宙生成论”，所以王阳明认为在良知的本体中存在着乾坤万化的根源。

在前往龙场途中，王阳明充满了忧愁。为了抚慰内心的悲伤，他不时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也不时回忆起在故乡耕钓以及沿河而下拜访江村的情景。在此期间，他作的《因雨和杜韵》，后半段写道：“客途最觉秋先到，荒径惟怜菊尚存。却忆故园耕钓处，短蓑长笛下江村。”

“荒径惟怜菊尚存”其实是取自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三径荒就，松菊犹存”句。王阳明是想用这句诗来表达对秉持清高之志的陶渊明的仰慕之情。

王阳明很早就得了肺病，后来的牢狱之灾，更令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他沿运河南下前往杭州，心中充满了对亲友的无限思念。

那么，王阳明为何要先到杭州呢？

一方面可能是受乡愁的驱使；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杭州风光明媚，是观光胜地，他想在此先疗养一段时间，等养好身体之后，再长途跋涉前往龙场。

当王阳明乘坐的船只抵达杭州北新关时，他的弟弟们一起前来迎接。能够在有生之年和他们再次相见，王阳明非常高兴，于是作诗一首，题曰《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

扁舟风雨泊江关，兄弟相看梦寐间。
已分天涯成死别，宁知意外得生还。
投荒自识君恩远，多病心便吏事闲。
携汝耕樵应有日，好移茅屋傍云山。

但在诗中王阳明丝毫未表现出前往贬谪之地的悲怆之情。

数年前，王阳明曾在西湖疗养过。当时，他经常前往南屏山游玩，所以这次也特意选了位于南屏山山麓的净慈寺居住，从春天一直疗养到夏天。在此期间，他作了一首题为《卧病净慈写怀》（《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来纪念这段时间，其中写道：

卧病空山春复夏，山中幽事最能知。
雨晴阶下泉声急，夜静松间月色迟。
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纓随意濯清漪。
吴山越峤俱堪老，正奈燕云系远思。

在诗歌的最后一句，王阳明还表达了对皇帝的思念之情。

后来，王阳明又移居胜果寺养病，在《移居胜果寺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第一首中有这样一句：“六月深松无暑来。”可以看出，王阳明从净慈寺移居胜果寺应该是在六月，而特意移居此地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避暑。从“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远尘埃”一句中可以看出，王阳

明移居胜果寺是为了治疗自己的肺病，同时也是为了远离尘俗，使自己的内心保持纯净。其中“日脚倒明千顷雾，雨声高度万峰云”一句可谓是描述景致的千古佳句！

摆脱刺客

刘瑾获悉王阳明在前往龙场之前，会先到杭州养病的消息后，就派出刺客，准备刺杀王阳明，但是王阳明使用奇计，最终虎口脱险。《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用小说化的语言记录了整个经过。

夏日午后，王阳明在胜果寺的廊下乘凉，身边的仆人也都外出了。这时，两名头戴小帽，身着窄衫，貌似捕快的大汉突然闯入。他们腰悬刀刃，口吐北音，问王阳明：“官人是王主事否？”

王阳明回答：“然。”

两名大汉说：“某有言相告。”

二人左右挟持王阳明而去。

王阳明问道：“何往？”二人回答说：“但前行便知。”

王阳明以自己有病在身，不能迈步为由，拒绝前往。二人却道：“前去亦不远，我等左右相扶可矣。”

王阳明没有办法，只好任由他们挟持而去。大约走了三里多路，有两名男子从后面追来。王阳明觉得二人面熟。追上来的两名男子问王阳明：“官人识我否？我乃胜果寺邻人沈玉、殷计也。素闻官人乃当世贤者，平时不敢请见，适闻有官校挟去。恐不利于官人，特此追至，看官人下落耳。”

两名大汉闻之，脸色骤变，对沈、殷二人说：“此朝廷罪人，汝等何得亲近？”

沈、殷二人不肯屈从，对他们说：“朝廷已谪其官矣，又何以加罪乎？”

那两名大汉不听这一套，继续挟持着王阳明前行。沈、殷二人也不肯罢

休，紧紧跟在后面。至暮色时分，他们来到河边的一处空房子内。

两名大汉言明自己是大内密探，在沈、殷二人耳边低语说：“吾等实奉主人刘公之命，来杀王公。汝等没相干人，可速去，不必相随也。”

而沈玉却说：“王公今之大贤，令其死于刃下，不亦惨乎。且遗尸江口，必累地方，此事决不可行。”

两名大汉听罢，沉思道：“汝言亦是。”

于是，从腰间解下一条一丈多的青索，投给王阳明：“听尔自缢，何如？”

但是，沈玉又说：“绳上死与刀下死同一惨也。”

两名大汉听罢大怒，拔刀厉声问道：“此事不完，我无以复命，亦必死于主人之手。”

殷计对他们说：“足下不必发怒，令王公夜半自投江中而死，既令全尸，又不累及地方，足下亦可以了事归报，岂不妙哉？”

两名大汉低头私语，少顷把刀收回鞘中，然后对沈、殷二人说：“如此庶几可耳。”

沈玉接着提议：“王公命尽此夜，吾等且沽酒共饮，使其醉而忘。”

两名大汉答应了，把王阳明锁在屋里。王阳明招呼沈、殷二人说：“我今夕固必死，当烦一报家人收吾尸也。”

沈玉提醒说：“欲报尊府，必得官人手笔，方可准信。”

王阳明说：“吾袖中偶有素纸，奈无笔何。”

沈玉起身回应说：“吾当于酒家借之。”

沈玉和一名大汉前往镇中买酒，殷计和另一名大汉在门外看守。过了一会儿，沈玉买酒归来。两名大汉打开房门，放二人进去。二人拿着瓢箪进去之后，沈玉把瓢箪斟满，递到王阳明面前，不禁哽咽起来。王阳明安慰他说：“我得罪朝廷，死自吾分，吾不自悲，汝何必为我悲乎！”

然后将酒一饮而尽。殷计又将酒斟满，王阳明把酒送到嘴边抿了抿，然后还给殷计说：“吾不能饮矣，既有高情，幸转进于远客，吾尚欲作家信也。”

沈玉将笔递给王阳明，王阳明从袖中取出纸来，挥笔赋诗一首：

学道无成岁月虚，天乎至此欲何如。
生曾许国惭无补，死不忘亲恨有余。
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
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

王阳明觉得自己当时的遭遇和春秋末期的伍子胥极其相似，于是在诗的最后一句提及了“子胥”。

子胥是伍员的字。春秋时期，伍子胥辅佐吴王夫差击败越国，帮助吴国成为春秋霸主。当时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并且大肆贿赂吴王，乞求留住自己一条性命。伍子胥为绝后患，强烈建议吴王杀掉勾践，但却没有被吴王采纳。伍子胥愤懑难平，把剑交到门客手中，对他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然后，慷慨赴死。

吴王夫差听闻后，大怒，下令把伍子胥的遗骸装入皮囊内，投入长江。后来确实如伍子胥所预言的那样，九年之后，吴国被越国所灭。这次轮到吴王向越王乞求留一命了，但越王没手下留情，干净痛快地把吴王杀了。

书归正传，上文中王阳明作的那首诗可以算是陈述忠臣孝子至情的千古名篇。

写完第一首后，王阳明诗兴未尽，于是又写了一首：

敢将世道一身担，显被生刑万死甘。
满腹文章宁有用，百年臣子独无惭。
涓流裨海今真见，片雪填沟旧齿谈。
昔代衣冠谁上品，状元门第好奇男。

之后，王阳明又写了一篇很长的绝命辞，在最后用篆书题了“阳明已入水，沈玉、殷计报”十字。在这篇绝命辞中，王阳明真真切切地表明了自己

的投水自杀之意。沈、殷二人将绝命辞告知两名大汉。那两名大汉本不通文字，只见王阳明的书法流畅秀拔，“相顾惊叹以为天才”。王阳明写完之后，又开始吟诵，四人一边听王阳明吟诵，一边交杯换盏，最后都酩酊大醉。

将近午夜之际，云月朦胧，两名大汉趁着酒兴逼王阳明投水自杀。王阳明回顾沈、殷二人，嘱咐他们说：“必报我家，必报我家。”然后，从河岸的滩涂往河中走去。

那两名大汉开始还在后面跟了一段，但由于喝了不少酒，所以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再加上恰逢涨潮，他们便不再紧跟了。二人站在岸边，远远地望着王阳明。突然，听到落水的声音，后来一切又都归于静寂。

在岸边站立了好久，两名大汉觉着王阳明投水自杀是确定无疑了。后来又转念一想，觉得应该留下一点儿王阳明自杀的证据，于是又沿着河岸去搜寻，在岸边发现了一双鞋。借着水面上泛起的淡白月光，他们发现在水中还漂着一件薄绢头巾。二人相顾而语：“王主事果死矣。”

二人打算将这两件物证一并带走。这时，沈玉对他们说：“留一物在，使来早行人人见之，知王公堕水，传说至京都，亦可作汝等证见也。”

两名大汉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将鞋子留下，只拿着头巾回去了。

接下来，再说胜果寺这一边。仆人们发现王阳明没了踪影之后，都非常担心，住持也不知其行踪。众人提着灯笼四处寻找，但一直没发现任何线索。后来不得已只好将事情的原委告知了王阳明的弟弟王守文，当时王守文恰好到杭州来参加浙江的乡试。

王守文也非常吃惊，于是就委托浙江官吏和胜果寺的僧俗四处搜寻。恰在这时，沈、殷二人也来找王守文，向他诉说了事情的原委，并且把王阳明留下的两首诗和绝命辞一并交给了他。王守文一看，确定是兄长的亲笔后，悲恸大哭。不久，又有人捡到了河边的那双鞋，并且把鞋送到官府，官府派人把鞋转交给王守文。这样一来，众人都确信王阳明是真的投水而亡了。

王守文将王阳明的两首诗和绝命辞寄回老家，家人看后都悲痛欲绝。父亲龙山公认为至少应该先找到王阳明的遗体，于是派渔夫到王阳明落水处打

捞，一连打捞了数日，一无所获。王阳明的弟子们听闻这一消息后，也是无不悲痛，唯独徐爱不相信王阳明已死，他说：“先生必不死。天生阳明，倡千古之绝学，岂如是而已耶！”

据《明鉴易知录》记载，浙江藩、臬⁹以及郡守杨孟瑛都认为王阳明已死，于是在钱塘江边设立灵堂凭吊，王阳明的家人也都身着丧服出席。

前文已述，王阳明少年时代就足智多谋，再加上年轻时研究过兵法，所以他对权谋术策非常精通。这次也不例外，他运用计略，成功地虎口脱险。

从岸边离开那两名刺客后，王阳明就在心里嘀咕，这条路一直通往河中，一直往前走的话，必死无疑！这样一来，那两名刺客也就放心了。他们喝了那么多酒，河滩又软，石头和泥沙又多，他们不可能跟着走。

于是，王阳明走下岸来，脱下鞋子放在水边，再解下头巾扔入水中，又搬起一块大石头，“扑通”一声扔到水里，伪装了跳水自杀现场。周围非常昏暗，什么都看不清，那两名刺客以及沈、殷二人都以为王阳明已经跳河了。

王阳明沿着河滩走了好长一段距离，发现了一处洞穴，于是就委身其中，一直等到天亮。翌日，一艘小船经过此地，王阳明随船往东驶去。船家可怜他没有穿鞋，送给他一双草履。七天之后，小船抵达舟山岛。王阳明在此换船前行。可事不凑巧，遇上暴风，小船往南漂了一昼夜，最终抵达了一块陆地。上岸一问，才知是福建北部。

后来，王阳明被巡航的兵船发现，士兵觉得他形迹可疑，于是就逮捕了他。王阳明表明自己的身份，道出实情：“我乃兵部主事王守仁也。因得罪朝廷受廷杖，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自念罪重，欲自引决，投身于钱塘江中。遇一异物，鱼头人身，自称巡江使者，言奉龙王之命前来相迎。我随至龙宫。龙王降阶迎接，言我异日前程尚远，命不当死，以酒食相待，即遣前使者送我出江。仓卒之中附一舟至此，送我登岸，舟亦不见矣。不知此处离钱塘有多少程途？我自江中至此，才一日夜耳。”

士兵们听罢，颇感惊奇，于是拿来好酒好菜款待王阳明，并派人向官署禀报。王阳明知道一旦官署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再想逃脱就难了，于是瞅准一个间隙，偷偷地溜走了。

再会无为道人

王阳明沿着人迹罕至的山路，狂奔三十余里，来到一座古寺前。当时天已昏黑，王阳明叩响寺门，希望能够借宿一晚，可寺内的僧人却拒绝说：“寺有禁约，不留夜客歇宿。寺旁有野庙久废，可往他处歇宿。”

没有办法，王阳明只好在野庙中将就一宿。

王阳明实在是太累了，刚进入野庙，就靠着神案前的香炉昏睡过去。半夜，有一群老虎在野庙周围咆哮，却未入庙内。

翌日清晨，周围都静悄悄的。寺僧在半夜听到老虎咆哮之声，以为夜宿野庙之人肯定已经被老虎吃了，于是就想将王阳明的行囊和财物据为己有。当寺僧来到野庙后，发现王阳明横躺在地上。寺僧想确认一下王阳明到底死了没有，于是就用棍子敲了敲他的腿。王阳明惊坐而起，反而把寺僧吓了一跳。寺僧大惊说：“公非常人也，不然岂有人虎穴而不伤者乎？”

王阳明茫然不知，问道：“虎穴安在？”

寺僧回答说：“即此神座下是矣。”

寺僧惊奇不已，于是就邀请王阳明到寺内进食。用餐完毕，王阳明游览了大殿，穿过大殿来到后院，见一长道士正在打坐。道士看到王阳明后，立刻起身问他：“贵人还识无为道者否？”

王阳明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仔细端详老道的容貌，原来正是二十年前，自己结婚当日在铁柱宫见到的那位老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无为道者的容貌没有丝毫的变化。老道说：“前约二十年后相见於海上，不欺公也。”

他乡遇故知，王阳明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奇遇而欣喜。他向无为道者详细

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请教自己今后的去处：“我今与逆瑾为难，幸脱余生，将隐姓潜名，为避世之计，不知何处可以兼容，望乞指教。”

道士听罢，对他说：“汝不有亲在乎？万一有人言汝不死，逆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越，何以自明？汝进退两无据矣。”

无为道者还为王阳明写了一首诗，激励他奋起。

二十年前已识君，今来消息我先闻。

君将性命轻毫发，谁把纲常重一分。

寰海已知夸令德，皇天终不丧斯文。

英雄自古多磨折，好拂青萍建大勋。

大意是：你不看重性命，把性命看得比毫发还轻，你的这一令德，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皇天并没有丧失天道，他把你派到人间，就是为了让
你去维护世间正道。自古英雄多磨难，你要用青萍宝剑斩尽所有的磨难，建立彪炳天地的大功勋。

王阳明非常感激无为道人的指教，他不再迷茫，决意前往贵州龙场。王阳明向寺僧求来一支笔，在大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题曰《泛海》：“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大意是：我根本就不在乎是顺境还是逆境，所有这一切都跟天空中的浮云一样，风一来，就被吹走了。月夜，我在静静的大海上泛舟三万里，那种痛快感觉和我驾着锡杖、乘着天风，从高山之巅疾驰而下的感觉一样。这首诗表现了王阳明“悟道自得”的高深境界。

《泛海》应该算是王阳明所有诗歌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当咏诵这首诗时，心中的迷云会消失殆尽，痛快之感会充满心头。

《泛海》和李白的《朝辞白帝城》的痛快劲有些相似，但两首诗痛快的内容却不相同。此外，《泛海》和朱熹的《醉下祝融峰》也有些相似。“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

《泛海》的最后一句和《醉下祝融峰》的最后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若考虑朱熹作这首诗时的背景，就会发现朱熹其实是想借这首诗表示自己将学问本质的疑云一扫而空时的心境。因此，《醉下祝融峰》和《泛海》都是体现顿悟境界的一种诗，但二者在内容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朱熹的《醉下祝融峰》描写的是自己登上祝融峰之后的真实心境，而王阳明的《泛海》则是假借虚构的海上旅途，来表达自己冲破生死迷雾，决意奔赴龙场时的心境。

王阳明在《泛海》中体现的悟境和无学祖元¹⁰在《示虏》这首偈中所体现的悟境有相通之处。

“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大意是：天地之间没有我立锥之所，但令人欣喜的是人是空的，法也是空的，万事皆空，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元兵手里握着三尺长剑，看起来非常威武。他要砍我的头，那就让他砍好了，结果无非就跟冒着火花的闪电斩春风一样。

无学祖元是宋代明州庆元府人。日本弘安二年（1279年），受北条时宗的邀请，无学祖元前往日本，定居在镰仓的建长寺。无学祖元是一位著名的禅师，他后来创建了圆觉寺，并将临济宗在日本发扬光大。这首偈原本是写在圆觉寺的山门前，令参拜人员一进山门便有所触动。

关于这首偈，还有一个小故事。

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当祖元禅师正在温州的一座寺庙内坐禅的时候，被元兵抓住了。元兵打算砍下他的头颅，于是他就写下了上文中的那首偈。他将偈呈递给元兵，元兵被他的气势所震撼，最终向他道歉而去。

故事的真伪已经无从考证，很有可能是后人杜撰的。当时，元兵如怒涛般侵入南宋，他们在南宋的土地上肆意蹂躏，大批的民众被杀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祖元禅师为了阐述自己的了悟，特意写了上文那首偈。

王阳明的《泛海》，也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表达自己内心心境的一首诗。在日本有一位和歌诗人，名叫西行法师，他从没到过奥州¹¹的白河关，

但是写出来的和歌宛如他到过那里一般。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阳明告别无为道人之后，又沿着小道登上了武夷山。在山中游玩期间，他在岩壁上题诗《武夷次壁间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和江西省的交界处，是福建第一名山，传说神仙武夷君曾在此山居住，故名武夷山。《武夷次壁间韵》的全文如下：

肩輿飞度万峰云，回首沧波月下闻。
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
溪流九曲初谙路，精舍千年始及门。
归去高堂慰垂白，细探更拟在春分。

湛甘泉认为王阳明当时根本就没去过武夷山，他之所以写这首诗，就是为了迷惑大家，不让大家知道他的行踪，让大家误以为他去了武夷山。湛甘泉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人或告曰：阳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诗曰：‘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征矣。甘泉子闻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为之作诗。有云：‘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及后数年，会于滁，乃吐实。”

古时，殷纣王残暴无度，箕子劝其停止暴虐之举，但没有被采纳，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发狂，逃往北方之地。明代，王阳明写诗假装自己逃到了海上，并且还声称登上了武夷山，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蒙混世人罢了。

前文已述，王阳明生来就聪慧过人，再加上他又精通兵法，运用这种小把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湛甘泉是王阳明的至交好友，后来二人见面时，王阳明亲口告诉他自己根本没去过海上，也没有登过武夷山，那些事情都是自己编造的。湛甘泉的叙述应该非常可信。

但是，王阳明的弟子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记载：

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决意远遁。

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纳。行半里许，见一古庙，遂据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视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无恙？”

因诘公出处，公乃吐实。道士曰：“如公所志，将来必有赤族之祸。”

公问：“何以至此？”

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迹，将来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寻究汝家，岂不致赤族之祸？”

公然其言。尝有诗云：“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

遂由武夷至广信，溯彭蠡，历沅、湘，至龙场。

此外，《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基本相同，无非是多了道士在为他指明出路之后，王阳明又为自己算了一卦。当时得出的卦象是“明夷¹²”卦。“明夷”乃是卦名，本卦为异卦相叠（坤上离下）。上卦为坤，坤为地。下卦为离，离为日。从卦象上来说，“明夷”之卦的“坤上离下”意指太阳沉到了地下，天地一片黑暗，寓意王阳明将会遭遇困难。处于上方的是皇帝，由于他昏庸愚昧，导致小人得势，这样一来，处于下方的臣子就要遭受磨难，世间也会变得暗无天日。《周易》中有一句卜辞叫“利艰贞”，暗示当遭遇“明夷”时，要学会忍耐，同时还要隐藏自己的智慧，这样才能避免引祸上身。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仅会使自己身陷危险，而且也不能匡正人间正道。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在给自己算完那一卦之后，提笔在寺庙大殿的墙壁上题下了《泛海》，然后取小道从武夷山返回。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从鄱阳出发前去看父亲，父子二人得以相见。十二月，王阳明抵达钱塘，然后从钱塘前往龙场。

由于刘瑾等人被称为“八虎”，所以在王阳明的传记中经常会出现关于虎的故事。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却是王阳明和无为道人分

别之后，他沿着小路游览了武夷山，从铅山出来后，来到上饶。在那里，再次拜会了娄谅。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按照《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王阳明此次拜访娄谅是三十六岁，即正德二年（1507年），而娄谅在弘治四年（1491年）就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王阳明不可能拜会他。不过，我们姑且还是继续按照《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往下说吧！

先生辞道者欲行，道者曰：“吾知汝行资困矣。”乃于囊中出银一铤为赠。先生得此盘缠，乃从间道游武夷山，出铅山，过上饶，复晤娄一斋。

一斋大惊曰：“先闻汝溺于江，后又传有神人相救，正未知虚实。今日得相遇，乃是斯文有幸。”

先生曰：“某幸而不死，将往谪所。但恨未及一见老父之面，恐彼忧疑成病，以此介介耳。”

娄公曰：“逆瑾迁怒于尊大人，已改官南京宗伯矣。此去归途便道可一见也。”

先生大喜。娄公留先生一宿，助以路费数金。先生径往南京，省觐龙山公。父子相见出自意外，如枯木再花，不胜之喜。居数日不敢久留，即辞往贵州，赴龙场驿驿丞之任，携有仆从三人。

在以上各种王阳明的传记中，和二十年前相识的道士再会于福建山中寺庙，以及野庙中老虎不伤害他等故事，无不显得荒诞离奇。

清代学者毛奇龄认为这些荒诞离奇之事都不可信：

守仁时径之龙场，而谱、状乃尽情诋诞。举凡遇仙遇佛，无可乘间摭入者，皆举而摭之。于此二十年前、三十年后，开关闭关随意胡乱。亦思行文说事，俱有理路。

浙江一带水与福建武夷、江西鄱阳俱隔仙霞、常玉诸岭峽，而岭表车筏尤且更番叠换，并非身跨鱼鳖可泛泛而至其地者。即浙可通海，然断无越温、台、鄞、鄮，不驾商舶得由海入闽之理。且阳明亦人儿，能出游魂。附鬼伥，朝游丹山，暮飞铁柱，何荒唐也。

毛奇龄对王阳明遇到刺客一事予以否定，但日本的东正堂却坚信王阳明曾经遭遇过刺客。东正堂认为，王阳明的绝命辞在正史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众人也都确信他已经遇难，并且还特意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由此可以断定王阳明遭遇刺客一事绝非空穴来风。

总而言之，王阳明为了从刺客手中逃脱，曾假装跳钱塘江自杀，并隐匿在家乡附近的一座山中，后瞅准时机，经过广信府，前往龙场。

告别门人徐爱

最初投入王阳明门下的是徐爱，之后还有蔡希渊和朱守中。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人。他是王阳明的妹婿，比王阳明小十六岁。

王阳明最初讲学授业的时候，从各地踊跃前来听讲的人士并不少，但能够真正理解王阳明所讲内容，并且把圣学当成己任的一个也没有。徐爱在二十岁时奋然有志于圣学，于是趁王阳明出狱返回杭州之际，向王阳明行弟子礼，拜他为师，所以说徐爱是王阳明最早入室弟子。

正德三年（1508年），徐爱中进士。正德七年三月，王阳明在考功清吏司¹³郎中任上时，绍兴山阴县的蔡希渊和朱守中也拜他为师。王阳明曾评价徐爱、蔡希渊和朱守中三人说：“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沉潜，朱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

由于徐爱一直沉溺于旧说——朱子学，所以当他第一次听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时，内心骇愕不定，后来渐知“反身实践”的必要性。

正德七年（1512年）冬天，徐爱出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和王阳明一道乘舟返回家乡余姚省亲。在舟中，徐爱从王阳明处得知《大学》的要义，兴奋不已，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于是，徐爱开始相信阳明之学为孔门嫡传，而其他学说都是未得孔门精髓的傍蹊小径。

当徐爱在南京工部员外郎任上时，王阳明也正好在南京担任太仆寺少卿。当时，徐爱和黄宗贤等人日夜聚在阳明门下，刻苦学习，勤奋不殆。后来，徐爱升任南京兵部郎中，因病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辞职返乡。

当时，很多人都不认可王阳明的学说，但徐爱却能很好地理解老师的意思，明白其要旨。无怪乎王阳明会称赞徐爱：“曰仁，吾之颜回也！”可以说，徐爱是一位真正领悟了王阳明学说的高徒。

徐爱学识渊博，为人平和纯朴，其学术造诣实乃蔡希渊和朱守中所不能及。徐爱去世后，王阳明悲恸不已。有一天，授课完毕后，王阳明慨叹说：“安得起曰仁九泉，闻斯言乎！”然后带着一千门人弟子，去给徐爱扫墓。

薛侃¹⁴刊刻的《传习录》上卷也是由徐爱所记录。孙夏峰曾评价徐爱说：“先生生来纯朴，锐意于学问，可上天夺其命太速。”

聂双江也慨叹说：“今之为良知之学者，于《传习录》前编所记真切处，具略之。”

蔡希渊，名宗衮，字希渊，号我斋，浙江山阴县白洋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蔡希渊曾出任庶吉士，但由于他性格耿直方正，不随流俗，所以不为当政者所喜欢，很快就辞官回家。当时，王阳明告诫他说：“归计良是，但稍伤急迫……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¹⁵恻怛之心。”

很快，蔡希渊又出任福建莆田府学的教授¹⁶，但仍被当政者所嫌恶。王阳明又训诫他说：“既而询之，果然出于意料之外，非贤者之所自取也。虽然，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曰‘我必无礼’。自反而有礼，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渊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为忠乎？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当时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过，甚可惜也。”

蔡希渊闻之，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努力使自己做到“忠恕”。后来，蔡希渊出任四川提学金事¹⁷。林见素曾评价他是“壁立千仞”。

朱守中，名节，字守中，号白浦，和蔡希渊一样也是浙江省山阴县白洋人氏，正德八年（1513年）进士。朱守中后来出任御史，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王阳明曾对他说：“德业外无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骋事功，则希高务外，非业也。”

后来，当朱守中巡按山东之时，流贼四起，整日驱驰于戎马之间，最终

因劳累过度而亡，被迫授为光禄少卿。他曾说：“平生于‘爱众、亲仁’二语得力，然亲仁必从爱众得来。”

正德二年（1507年），王阳明悄然回到家乡余姚。也就是在这一年，徐爱、蔡希渊和朱守中被举¹⁸于乡，三人辞别王阳明前往京城。离别之际，王阳明做了一篇《别三子序》赠予三人，以示激励：

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兴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废者，亦志之弗立，弗讲于师友之道也。

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一人为之，二人从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众焉，虽有易成之功，其克济者亦鲜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

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诲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

盖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颜¹⁹、朱守中于山阴之白洋，得徐曰仁于余姚之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颜之深潜，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

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长视予以先辈，予亦居之而弗辞。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为之证，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师友之饥羊，不谓其不可也。当是之时，其相与也，亦渺乎难哉！

予有归隐之图，方将与三子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忽焉而忘吾之老也。

今年三子者为有司所选，一举而尽之。何予得之之难，而有司

者袭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举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为予憾；三子亦无喜于其得举，而方且憾于其去予也。漆雕开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欤？曾点志于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与之，斯予与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欤？

三子行矣，遂使举进士，任职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进而归，咏歌优游有日，吾知其乐也，然而未可必也。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欤！三子则焉往而非学矣，而予终寡于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潜刚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焉往而非学矣。苟三子之学成，虽不吾迹，其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

增城湛原明宦于京师，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见焉，犹吾见也已。

读罢此文，会感受到王阳明在家乡得到三名优秀弟子的喜悦之情。在文中，王阳明阐述了立志和师友之道的重要性，最后还叮嘱三人前去面见湛甘泉。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非常尊敬湛甘泉，并且把他视作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这一时期，王阳明还作了《忆别》（《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佐藤一斋认为此诗是王阳明在杭州北新关作别诸位弟子之后所做。其实不然，王阳明在诗中写道：“贤圣可期先立志。”指出了立志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窥见王阳明是如何要求弟子们立志于圣学的。

前往贵州龙场

王阳明究竟是通过什么路线抵达龙场的呢？通过他的《赴谪诗五十五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基本可以窥见其大概。

王阳明在家乡附近的山中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就沿着须江而下，经过江西省玉山县的草萍驿²⁰，到达娄谅老宅的所在地——广信府。《草萍驿次林见素韵奉寄》中有“山行风雪瘦能当”和“乡心草色春同远”之句，据此可以推测出王阳明抵达草萍驿的时间应该是在冬天。钟伯敬是这样评价第一句诗的：“‘山行风雪瘦能当’，真乃绝妙至极之佳句，它能使人联想起王阳明意气沮丧、瘦骨嶙峋之状。”

而后王阳明又来到玉山的东岳庙，并作《玉山东岳庙遇旧识严星士》，其中有这样一句：“春夜绝怜灯节近。”

“灯节”即元宵节，每年阴历的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会挂灯笼庆祝。所以说，王阳明应该是在正月初来到玉山县的。正月十五日，王阳明宿泊在广信府的石亭寺。

二十年前，王阳明从家乡前往南昌娶妻途中，也曾在此石亭寺宿泊。前文已述，王阳明在返乡途中曾在广信府滞留，期间拜访了娄谅，向他请教宋儒的“格物”说。而当王阳明再次到达此地时，娄谅已过世。王阳明在石亭寺作《夜泊石亭寺用韵呈陈娄诸公因寄储柴墟都宪及乔白岩太常诸友》。在第二首诗的末尾，王阳明写道：“白璧屡投终自信，朱弦一绝好谁听？扁舟心事沧浪旧，从与渔人笑独醒。”这披露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

东正堂认为：“白璧屡投终自信”出典于《韩非子》的“卞和献玉”和《汉

书·邹阳传》的“投璧道中”（《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八《诗二》）。“投璧道中”是说如果在路上将夜光璧暗中投掷给别人，人们没有不按着剑柄斜看的，虽说是好东西，但由于是无缘无故抛到面前的，所以任何人都会感到吃惊。

卞和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他在荆山里得到一块璞玉²¹。卞和捧着璞玉去献给楚厉王，但楚厉王认为卞和是在拿假玉欺骗自己，于是就命人砍了他的左脚。楚武王即位之后，卞和再次捧着璞玉去见楚武王，楚武王又以同样的理由命人砍了他的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抱着璞玉哭泣不已。楚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他为何痛哭，卞和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于是，楚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玉，就命名为“和氏璧”。据说楚文王曾打算封卞和为零阳侯，但被卞和拒绝了。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白璧屡投终自信”，是借上文中的两个典故来喻指自己的内心就像白璧一样，纯洁无垢。同时他也是在用这句诗来表明自己即使受到再严厉的刑罚，也不会改变初衷，也不会有丝毫的后悔；无论刘瑾如何残酷迫害自己，内心也绝不会有丝毫的动摇。

“朱弦一绝好谁听”出典于《礼记·乐记篇》中的“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意是：宗庙祭祀时，用瑟来弹奏《清庙》²²。它用的弦是朱色熟丝，声音浑浊，再加上底部零散地钻了些孔，所以声音又变得凝滞，听起来并不是很悦耳。虽然声音不美，但演奏时却能达到一人唱、三人赞叹的效果。因为这是先王留下的音乐，所以大家都会对其倍加尊敬。

在这里，王阳明是在用“清庙之瑟”喻指自己的信仰。就像一人唱、三人赞叹的高雅之音已经绝世，不可能再有人听到一样，自己的信仰不被世间所容也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末尾两句出自《楚辞》的《渔父辞》，王阳明是在借《渔父辞》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屈原，战国时代楚国王族，名平，字原，号灵均。屈原博学强记，精通治乱之理，熟习辞令文章。最初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出任三闾大夫²³。后来，由于楚怀王听信谗言，渐渐疏远了他。屈原忧愁幽思，写下《离骚》。楚怀王去世之后，楚襄王继位，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到江滨。屈原写下了《渔父辞》等作品，表其心志。但终在五月初五，怀抱巨石，投汨罗江自杀而亡。

《渔父辞》的全文如下：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混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渔父秉承的是老庄思想，不论世之清浊随波而流，而王阳明秉承的则是儒家思想，把清廉洁白做人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

在上文的诗中，王阳明自比“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而世人则像渔父一样，也许会嘲笑自己因追求自身风节而引祸上身的行为，但那又何妨呢？由他去好了。

王阳明从广信府，继续沿须江而下，到达鄱阳湖之后，又沿着赣江逆流而上，来到袁州府的分宜²⁴，写下了《杂诗三首》（《王文成公全书》卷

十九)。

在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即使处境艰难，也要把艰难视作坦途的气概。在此期间，他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勤读史书，不断思索，思慕古人，训诫自己，寄思想于上天，去人欲而深入探究天理之妙。不过，这时最能抚慰王阳明内心的还是《周易》。

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
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
我足复荆榛，雨雪更纷骤。
邈然思古人，无闷聊自有。
无闷虽足珍，警惕忘尔守。
君观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琴瑟在我御，经书满我几。
措足践坦道，悦心有妙理，
顽冥非所惩，贤达何靡靡！
乾乾怀往训，敢忘惜分晷？
悠哉天地内，不知老将至。

*

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
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
起舞还再拜，圣训垂明明。
拜舞讵逾节，顿忘乐所形。
敛衽复端坐，玄思窥沉冥。
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阳精。
冲漠际无极，列宿罗青冥。

夜深向晦息，始闻风雨声。

许舜屏评价这三首诗：“骇绝奇绝，见险如夷，终能悟道，文成贤人。”

接下来，王阳明从分宜来到袁州府，回想起韩愈当年也是被贬谪到此地，不禁感慨万千。韩愈曾作《新修滕王阁记》，王阳明为自己未能观赏滕王阁而遗憾。当夜，王阳明宿泊在宣风馆²⁵，并写下了《夜宿宣风馆》，其中有这样一句：“越南冀北俱千里。”越南是指家乡余姚，而冀北则是指京师。王阳明在这句诗中寄托了对家人和皇帝的思念之情。

不久，王阳明到达江西萍乡²⁶，顺便拜谒了宋学之祖周敦颐的祠堂。王阳明当时宿泊在萍乡的一处道观武云观里，睹月思乡，不禁想起远在绍兴南部的鉴湖（镜湖）。

而后王阳明从袁州府出发向西走，来到湖南醴陵²⁷。一路上山道崎岖艰险，一点儿也不亚于太行山中的险道。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王阳明宿泊在醴陵附近的泗州寺，写下了《醴陵道中风雨夜宿泗州寺次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诗的末尾，他写道：“还理义编坐夜长。”从中可以推测出王阳明在艰难的行进途中，应该是非常喜欢读《周易》的。

王阳明到长沙府后写下一首长诗，题为《长沙答周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岳麓山就位于长沙西部，当年朱熹和张栻²⁸曾经在此处讲学。王阳明在长沙时，颇有才气的周生前来求教，王阳明谆谆教导。王阳明在诗中写道：“愿子且求志，蕴蓄事涵泳。”这句诗体现了王阳明对孟子“养心寡欲”思想的赞同，同时也表明他非常重视孟子的“心性存养”之学。

当时，王阳明还特地渡过湘江，拜访了坐落于岳麓山的岳麓书院，以向朱熹和张栻致敬。其间，王阳明作了两首长诗，虽然内容多为叙景之句，但和《长沙答周生》一样，其中也不乏仰慕颜回和曾子的诗句。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超脱境界是相当向往的。

在经过湘江和沅江²⁹时，王阳明想起屈原南征时也曾渡过湘江和沅江，于是写下《吊屈原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极力夸赞屈原忧国忧

君的至诚之情。其实，这首赋也吐露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在赋的末尾，王阳明写道：“世愈隘兮孰知我忧。”毫无疑问，王阳明在此叙述的正是自身的感受。

王阳明离开岳麓书院返回长沙，随后便乘船沿湘江而下，船行驶得很快，傍晚时分即抵达了沅江，但非常不幸的是，路上遇上了暴风雨，乘船有所损坏，王阳明只好在天心湖附近停留了三天，后经过罗水沿岸的罗旧和沅水两个驿站，最终抵达贵州省。到达贵州后，王阳明先是抵达思州府的平溪卫³⁰，然后又来到镇远府的兴隆卫³¹和都匀府的清平卫³²。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清平卫即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阳明在末尾写道：“华夷节制严冠履，漫说殊方列省卿。”

当时有人认为统治“蛮夷”的办法，就要“节制”，即严加管治，用国威压制他们，让他们驯服，但王阳明对此却持不同意见。王阳明在晚年受命追讨南方诸族的时候，不仅仅是通过使用武力，更多的是通过安抚来让对方驯服。通过以上两句诗，也可以窥见王阳明的讨伐之策：先抚慰，抚慰不成，再诉诸武力。

王阳明离开清平卫后不久，便踏上了贵州崎岖的山路。这段山路就如同画中描绘的那样，共有七道弯，崎岖盘旋，艰险无比。王阳明触景生情，写下了《七盘》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他在末尾写道：“投簪实有居夷志，垂白难承菽水欢。”意思是：我与孔子一样拥有“欲居于九夷”之志，想舍弃官职，可是我却放心不下父亲，父亲已年迈，须发已白，那粗衣粝食的贫困生活又如何能让他老人家安度晚年啊！

正德三年（1508年），在春意盎然的时节，王阳明抵达贵州龙场。

从京城至龙场途中，王阳明作《赴谪诗》五十五首。这些诗歌大多描述的是王阳明在流谪途中的感触，但其中也不乏描写风景名胜的佳句。通过这些诗歌，可以看出王阳明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周易》，并通过《周易》来探寻人生和宇宙之妙理。此外，还可窥见他通过深入思考和无数体验，将艰险的旅途化为坦途，并在途中还不忘教诲门人的情形。所以说，王阳明不

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在抵达龙场后不久，就收到了家书。信中叙述了逆臣刘瑾听说王阳明依然健在，并且还和其父在南京相会的消息之后，勃然大怒，伪造圣旨逼迫龙山公致仕还乡。

这段记载可能和真实的情况有些出入。前文已述，龙山公曾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但还没有赴任，就被刘瑾逼迫辞职返乡了。此外，王阳明在前往龙场途中，抵达杭州时，其父龙山公正在京城，所以说他们父子二人在南京相会是不可能的。

艰辛的龙场生活

王阳明是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时节抵达龙场的。当时，他写了一首题为《兴隆卫书壁》（《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莺花夹道惊春老。”

由此可见，当他抵达龙场时，正是花开烂漫、燕语莺啼的好时节。但龙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仅有土著山民居住的一个小村落，它与中原大地完全不同，是一块难以想象的蛮荒之地。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贵州远离京城，自古以来就被视作蛮夷之地，一直未曾受中国本土文化的熏陶，自明代开始才在当地设置行政区划。但幸运的是，自从王阳明来到此地，这片蛮夷之地慢慢开始接触中华文化。

贵州的中心是贵阳，而龙场只不过是贵阳西北的一个小村寨，这里条件恶劣，道路艰险，而且王阳明和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阳明先生年谱》曾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魎，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鸩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也提到：“居无宫室，惟累土为窟，寢息其中而已。夷俗尊事蛊神，有中土人至，往往杀之以祀神，谓之祈福。”

王阳明初抵龙场，便披荆斩棘，搭建了一间茅草房。茅草房非常小，只有齐肩高，仅够宽慰旅途劳累。王阳明以原有的荆棘为篱笆，垫土为阶，台阶非常低矮，若有若无，以致让人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茅草房到处都是缝隙，早晨的凉风会呼呼地吹进来。屋顶铺着茅草，漏雨是在所难免的，但幸好便于修缮。早晨，可以在茅草房中听到清澈的潺潺

流水声；傍晚，当郁郁葱葱的森林变得一片淡黑时，又可以体味那无尽的森林之趣。

龙场的百姓依然过着“与鹿豕游³³”的野蛮生活，他们相当淳朴，经常聚到王阳明身边，用全然不知所云的语言向他打招呼。渐渐地，王阳明与当地人产生了骨肉般的亲情。当地人每天都会送食物给王阳明，王阳明也会和他们一起饮酒，有时会喝到酩酊大醉。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先生初至，夷人欲谋杀先生，卜之于神不吉。夜梦神人告曰：‘此中土圣贤也，汝辈当小心敬事听其教训。’一夕而同梦者数人，明旦转相告语。于是有中土往年亡命之徒能通夷语者，夷人央之通语于先生，日贡食物，亲近欢爱如骨肉。”

王阳明来到龙场之后，不禁想起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之世，于是写了一首题为《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的诗，末尾有“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之句。

太古时期，尧帝的宫殿非常简陋，台阶是泥土做的，且仅有三层，屋顶是用茅草铺的，连茅草的穗儿都没切除。虽然宫殿简陋，但尧帝的仁德却令天下百姓感服，他们遵守人伦道德，心平气和地生活。尧帝的仁德实在是太伟大了，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人民日日沐浴其中，时间久了就会被同化，也就感受不到恩德的特殊存在了。正如《击壤歌》中所唱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十八史略·帝尧陶唐》）

尧帝的理想是“无为而治”，他是一位推行“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伟大君主。

王阳明到龙场之后，感觉这里就如同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时代的“理想乡”，因此即使他身处逆境，也能够随遇而安。王阳明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全凭他日常不懈的修行。

不久，王阳明发现了一处钟乳洞，于是便将自己的住处搬到洞中。这个钟乳洞大约能够容纳百人，初名“东洞”，后来王阳明效仿家乡的阳明洞，

把它更名为“阳明小洞天”。其实，王阳明家乡的阳明洞，并不是一处洞窟，而龙场的阳明小洞天却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洞窟。钟乳洞所处的位置较偏僻，荒凉不已，而王阳明却觉得这是因为钟乳洞不容他人，专等自己到来。王阳明搬入此洞后，乐其幽静，悠然自得。他将洞内平整之地打扫干净，安放好床具，修好灶台，堵上老鼠洞，还作诗三首，题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第一首诗的末尾，王阳明写道：“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达到了《中庸》中提到的“素位”境界，即君子要根据自己的地位来行事，而不要考虑其他不切实际的事情。

《中庸》中关于“素位”境界的原文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根据《阳明先生行状》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当时跟随王阳明前往龙场的家仆共有三人，当王阳明决定搬进阳明小洞天时，他们都为能够找到这样的天然住处，无须再费力盖房子而欣喜。对此，王阳明在第二首诗中做了如下描述：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
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
清泉傍厨下，翠雾还成幕。
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
虽无柴戟荣，且远尘嚣聒。
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

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和家仆都夸赞这天然的住处，并为能够远离俗世而感到高兴。王阳明还为自己能够过上远古时代的生活而欣喜，他在第三首诗中写道：“上古处巢窟，杯饮皆污樽。沍极阳内伏，石穴多冬暄。”

接下来，王阳明又写道：“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喻指这样的隐居生活可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就像豹子隐藏起来，以防自己的毛皮花纹被雨雾损坏；龙蛰伏起来，以保证自己的身体完好一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住在宏伟的宫殿里，身着轻柔裘皮的生活才算快乐，但王阳明却期许颜回那样的生活。孔子曾大力夸赞弟子颜回，称其为：“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故王阳明又在第三首诗的末尾处写道：“邈矣簞瓢子，此心期与论。”

龙场生活的最大困难在于粮食不足，经常会出现上顿不接下顿的情况，这使得身边的家仆开始抱怨起来。王阳明在《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开篇写道：“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

古时，孔子带着一帮弟子来到陈国，结果断了粮食，众人饥饿难耐，后来有人病倒了，不能起身，不堪其苦的子路愤愤不平地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对子路的告诫其实就是儒家一直坚守的“穷困之节”。

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孔子极其相似，但他觉得必须要确保粮食的充足，于是就向当地人学习种粮的方法。王阳明焚烧草木，开垦耕作土地，这样一来，谷物就有了剩余。王阳明用剩余的粮食接济穷人和寡妇，有时还会举办宴会，甚至用遗漏的稻穗喂小鸟。

书归正传，王阳明接着前面的诗句还写道：

山荒聊可田，钱镔还易办。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

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

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

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羨。

出来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此外，王阳明又延续上诗，做了一首题为《观稼》（《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诗中写道：

下田既宜秔，高田亦宜稷。
种蔬须土疏，种蕓须土湿。
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
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穡！

在《观稼》诗中，仿佛能够窥见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影子。

王阳明在龙场时，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父亲。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抵达龙场后不久，就收到了家书，这更勾起了他对家人的思念。他为自己不能尽孝而痛心疾首，于是写下了《采蕨》（《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其中写道：

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浮云塞长空，颍阳不可回。
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
已矣供子职，勿更贻亲哀！

即使身处逆境，王阳明也依然保持着贤良忠贞之心。他自比“松竹”，喻指自己具有《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的清白气节。他还向朋友发誓，即使相距遥远，也要相互切磋学问。所以王阳明在《猗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诗中写道：

猗猗涧边竹，青青岩畔松。

直千历冰雪，密叶留清风。

自期永相托，云壑无违踪。

如何两分植，憔悴叹西东。

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

惟应岁寒意，随处还当同。

这一时期，王阳明还写过一首题为《南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表达了自己对好友的思念之情。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是戴罪之身，被贬谪到遥远偏僻之地，所以非常希望找到一位能够了解自己内心的好友，他想起了曾经和自己一起在京城倡导圣学的湛甘泉。王阳明把自己比为一只“哀哀求侣”的鸣鸟，“何时共栖息，永托云泉深”，这说明王阳明非常期待能和自己的好友一起复兴圣学。

王阳明有时会到小溪中戏水，溪水清澈见底，可以洗涤冠缨。当他看到澄清的溪水映出的白发，愕然不已，于是写下《溪水》一诗，其中有如下几句：“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王阳明慨叹自己虚耗时光，结果仍一事无成。

通过上文所述的这几首诗可以看出，即使处境再艰难，王阳明也能够超然面对。然而，他身边的家仆却没有他这般贤良忠贞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所以很难达到王阳明这样的境界。家仆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这恶疫横行之地后，就先后病倒了，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于是王阳明便亲自给他们生火煮粥。为驱散他们的抑郁之情，王阳明还为他们诵唱诗歌，如果仍不奏效，他会唱起故乡的民谣，或者讲笑话，让大家忘掉疾病和夷地之苦。

龙场顿悟

王阳明获悉父亲龙山公被刘瑾罢免之后，便意识到豺狼般的刘瑾不知何时就会把魔爪伸到自己眼前，于是心中不免涌起生死之念。

前文已述，王阳明虽然能够超然面对荣辱得失和艰难困苦，但他对生死之道还没有看得那么开。在佛教和道教中，生死是一件大事，儒家对此也非常重视。孔子在回答弟子提问的时候，曾经谈到过死，“未知生，焉知死？”即“实实在在地生活也是一种对死的超脱”。孔子在此非常直率地道出了儒家的生死观。此外，《周易》中也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指“顺应天地生生³⁴之道其实就是超脱生死之道”。

总而言之，专注于生就是为了克服死，这和日本神道教的精神是一致的。故而也可以这样说：“生生乃是天地神人之大道。”

对后世儒者来说，生死观是修行中的一件大事，如果不能打通生死关的话，哪怕是闯过了其他所有关卡，也不能成就圣贤之道。朱熹认为，生死乃是一种“理”，只有至“理”，才能够克服死。如果生死真的如朱熹认为的那样，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如何让一个人理性地去面对突然而至的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明末大儒刘宗周³⁵（念台）面对死亡时，内心曾起过大波动，于是痛感自己的学问尚不彻底，转而更加刻苦地修行用功。

王阳明自己也曾论述过超脱生死之念的重要性，“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

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王阳明虽然以超脱生死念头为主要追求，但并不蔑视超脱其他诸念的行为。在王阳明看来，儒者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探寻天下万物之本源，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不能超脱生死之念，就不可能实现儒者的理想。

总而言之，对王阳明来说，“格物致知”是超脱生死之念的唯一之道。在阐述超脱生死之念时，王阳明虽然和佛教徒一样，承认生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他并没有如同佛教徒那样谋求从生死中解脱出来。如果他也谋求从生死中解脱出来，那他就不再是一位儒学家，而是一名佛教徒了。

王阳明在龙场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超脱生死之念后，感到愕然，于是在屋后建了一个石墩，日夜端坐其中，参悟死之要义，寻求心之静一，以求自己能够超脱生死之念。

一天夜里，王阳明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地欢呼雀跃起来，感觉就像云开雾散、豁然见到阳光一样，终于使至今未曾参透的“格物致知”之旨露出了真相。王阳明觉悟到：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龙场顿悟”。

王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前文已述，王阳明曾经秉承朱子之教，去格一草一物之理，但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心”与“理”的融合，最终不得不放弃。龙场顿悟，其实是王阳明第一次体认到“心”与“理”的融合。

在龙场顿悟之前，王阳明通过和湛甘泉的交游及自身的体验，已经或多或少对“格物致知”有了一些想法，即“格物致知”不应该一味地靠“理性主义”完成，最主要还必须靠对“理”的体认。尽管王阳明当时持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一直苦于未能实现“物之理”与“人之心”的融释。

龙场顿悟后，王阳明尝试用脑海中的“五经”之言去验证自己顿悟的成果，结果一一契合，反而是朱熹的注释和自己的所悟完全不同，于是他就作

了《五经臆说》。

以上是《阳明先生行状》中关于王阳明顿悟前后的一些记载。《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和《阳明先生行状》的记载基本一致，但略有不同，下面为《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谈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此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和《阳明先生行状》《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也有出入。《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如下：

久之得家信，言逆瑾闻先生不死，且闻父子相会于南都，益大恚忌，矫旨勒龙山公致仕还乡。先生曰：“瑾怒尚未解也。得失荣辱，皆可付于度外。惟生死一念，自省未能超脱。”

乃于居后凿石为椁，昼夜端坐其中。胸中洒然，若将终身夷狄患难俱忘之矣。仆人不堪其忧，每每患病。先生辄宽解之，又或歌诗制曲，相与谐笑，以适其意。

因思设使古圣人当此，必有进于此者。吾今终未能免排遣二字，吾于格致工夫未到也。

忽一夕梦谒孟夫子，孟夫子下阶迎之，先生鞠躬请教。孟夫子为讲良知一章，千言万语指证亲切，梦中不觉叫呼。仆从伴睡者俱

惊醒。

自是胸中始豁然大悟，叹曰：“圣贤左右逢源，只取用此良知二字。所谓格物，格此者也。所谓致知，致此者也。不思而得，得甚么？不勉而中，中甚么？总不出此良知而已。惟其为良知，所以得不繇思，中不繇勉。若舍本性自然之知，而纷逐于闻见，纵然想得着，做得来，亦如取水于支流，终未达于江海。不过一事一物之知，而非原原本本之知。试之变化，终有窒碍，不繇我做主。必如孔子从心不逾矩，方是良知满用。故曰‘无入而不自得焉’。如是何有穷通荣辱死生之见，得以参其间哉。”

于是默记“五经”，以自证其旨，无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即王阳明真正把“良知”作为自己学问宗旨是在四十九岁以后，而在龙场时，他还未到这一年纪，所以不可能用“良知”来解释“格物致知”。

“良知”说本是孟子所创，但当时的王阳明还没有将“良知”作为自己学问的宗旨。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就托梦向其传授“良知”说的秘意，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所以可信度更高的《阳明先生行状》和《阳明先生年谱》，就没有王阳明在此时提出“良知”说的记载。

其实，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顿悟，仅仅是对“致知”的顿悟，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却将其误认为是对“致良知”的顿悟。

那么，王阳明的“龙场顿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王阳明通过“主静修行”而超脱了生死之念，然后又以此为媒介，在实现“心”与“理”统一的过程中，体悟到“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那样是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因此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龙场体悟与陆九渊对“心即理”说的体悟是相通的。

但在《阳明先生年谱》中却并没有明确提及“心即理”三字，而只是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可见，王阳明是明确反对向心外求理的，所以说他悟出的其实就是“心即理”说。而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中的“性”的含义，则与程颢“定性说”中的“性”的含义比较相近。张载曾向程颢请教关于“定性”的问题，程颢回答说：只要顺应“理”，“心”自然就会安定下来。所以“定性”的“性”指的就是“心”。不过王阳明所理解的“心”并不同于程颢所理解的“心”。王阳明所理解的“心”乃是《孟子·告子上》中的“本心”。

朱熹提出的是“性即理”说，认为“性”和“理”是形而上的东西，具体的事物则是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要依附形而下的东西而存在，“格物穷理”乃是通过格形而下的东西去求形而上的东西。

朱熹将“心”视作形而下的东西，重视向心求理，但又觉得心是灵活多变的，向“心”求“理”最终可能会演变成向“心”求“心”。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混乱，所以他主张向心外求理，并且认为只需用“心外工夫”就可以了。

尽管朱熹没有明确说过向心内求理，但他对“心”的工夫一样非常重视。他所提出的“居敬”说，其实就是一种跟“心”有关的实践工夫。

王阳明并不认同朱熹所主张的“心外求理”的观点。《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是王阳明悟出了“性即理”，这其中可能有些错误，因为真正秉承“性即理”的应该是批判陆九渊心学的朱熹，而王阳明悟出的应该是“心即理”。王阳明所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沿袭的并不是朱熹的“性即理”说，而是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这一点上，他与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自从王阳明笃志圣学以来，曾屡遭挫折，后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悟道。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即王阳明不是通过“静悟”才最终悟道的。

总而言之，“龙场顿悟”悟得的就是“心即理”。陆九渊也曾提过“心即理”，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是否是从陆九渊那里得来的呢？当然不是。因为王阳明论述的很多东西，陆九渊根本未曾提及过。

尽管当时学术界对朱子学和陆学的异同展开了一些争论，但那个朱子学万能的年代，几乎没人会去关注陆学。假如王阳明关注陆学的话，那么在他通过朱子学的方法“格物”失败之后，应该立刻会想到陆学。但是，王阳明

“格物”失败之后，并没有想到陆学，而是强调，天分是成为圣贤所必需的，于是他只好放弃自己的修行，而把志向转向了其他异端之学。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根本就没关注过陆学。

虽然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主张“心即理”，但陆九渊并不主张“主静体悟”，而王阳明则主张“主静体悟”。若从王阳明的性格和体质来看，较之朱子学，他确实更容易倾向于陆学，但他对“心即理”的体悟却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得出的。

“龙场顿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奠定了王阳明今后做学问的方向，所以说王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是从“龙场顿悟”开始的。但是，这条道路绝非一条坦途，这从王阳明后来的学问之“三变”中也能看出来。

创作《五经臆说》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三十七岁。是年,他为《五经臆说》作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我们据此可以获悉他创作《五经臆说》的动机。

王阳明在序中有如下描述:

“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

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龙场顿悟”悟出的其实就是“心学”。

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五十四岁时写了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其中指出：“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³⁶也。”王阳明认为，人的心中已经具备“六经”之道，如果不通过体认自己的本心，而是通过向心外之物探求“六经”之道，就会陷入支离破碎，这和笨狗误认土块是食物而拼命追逐

没什么两样。通过王阳明《五经臆说》的序文，我们会发现王阳明晚年创立的心学思想其实在此时已经萌芽。

王阳明在序中告诫他人，如果不向自己心中求“五经”之道，那就只能根据他人的注释，求得一些支流末节。自己创作《五经臆说》也同样如此，如果其内容不是从自己内心求得的，那就只能是人云亦云的东西。

据王阳明在序中介绍，《五经臆说》共包括五十六卷，其中礼经史六卷，其他四经各十卷，可见这是一部非常庞大的书籍。但非常遗憾的是，《王文成公全书》中收录的仅有十三条。《王文成公全书》的编纂者钱德洪在《五经臆说十三条》的序文中说：

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³⁷“五经”略遍，命曰《臆说》。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洪尝乘间以请。师笑曰：“付秦火久矣。”

洪请问，师曰：“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

后执师丧，偶于废稿中得此数条。洪窃录而读之，乃叹曰：“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是矣。即此以例全经，可知也。”

王阳明晚年烧毁自己的《五经臆说》，和宋朝一代高僧大慧宗杲将恩师圆悟克勤的《碧岩录》付之一炬有相通之处。《碧岩录》自创始以来，一直到后来被烧毁，都被视作宗门第一名著。大慧宗杲作为圆悟克勤门下最得意的弟子，为何要将恩师的这部大作烧掉呢？

径山住持希陵禅师在《重刊圆悟禅师碧岩录集疏》的后序中做了如下解释：“后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

此外，据说程颢也曾将自己所著的《中庸》付之一炬。

后来，王阳明的爱徒徐爱将恩师的语录结集成《传习录》，以使门人弟子能够依照此书更好地了解王阳明的学说。但王阳明却说，如果拘泥于此书，就会产生诸多弊害。大凡坚持体验主义的思想家，往往会强调著述的害处。王阳明作为一位坚持体验主义的思想家，必然会对朱熹的庞大著述提出批评。

西方著名思想家奥根·赫立格尔（Eugen Herrigel, 1884—1955）曾经亲身体验过日本的神秘主义哲学，晚年他也将自己的草稿付之一炬。奥根·赫立格尔是一位德国哲学家，他兼修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哲学。大正年间，奥根·赫立格尔来到日本，在东京大学任教，热心修行日本的弓道和禅学，著有《弓与禅》一书。由于他曾修习禅学，所以在自己濒危之际，仍担忧自己的著述会产生弊害，于是将草稿全部付之一炬。通过这一举动，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真正的禅学悟道者。

日本学者东正堂认为，《五经臆说》的十三条残稿中，《春秋说》最好地表达了王阳明的学术思想（《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六《续编一·杂著》）。《五经臆说》的第一条说的就是《春秋》。《春秋·隐公》的开篇是：“元年，春，王正月。”王阳明指出，此处元年的“元”是“始”之意，尽管这一释意千古未变，但是此处的“元年”指的却是“人君正心之始”。王阳明在此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自己的“心法”。

自古以来，“元年，春，王正月”都被视作微言大义，对其解释也是众说纷纭。王阳明摒弃了《左传》中的解释，而直接去洞悉《春秋》之本意。他不认同世间学者艰深隐奥的解释，认为这些都是“任情用智，拂乱常理之为”，他强调做学问要遵循人之常情，要依循孔子的“简易正顺”之道。

王阳明在贬谪龙场期间，曾写过一篇《论元年春王正月》（《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其中也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思想。东正堂认为，王阳明是在欧阳修“春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奇之论，而从这些论述中可看出，王阳明对程颐“传为案，经为断”³⁸的春秋读法是持反对意见的（《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四》）。至于王阳明的这些论述是否恰当，在此就

不赘述了。

注释：

1 司礼大监：负责宫廷仪礼的重要官职。——译者注，下同。

2 科道：明、清两朝对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的总体称，俗称为两衙门。

3 宫刑：指古时割掉生殖器的一种刑罚。

4 去势：和阉割同义，是指以外来方式除去生殖系统或使其丧失功能的方法。

5 内官监：宦官组织的名称之一。明朝宦官组织庞大，为历代之最。明代宦官组织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号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十二监分别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等。

6 张永（1465—1529）：字守菴，初与刘瑾结党，为“八虎”中的一员，后与刘瑾反目，与杨一清等人一同上疏，奏请诛杀刘瑾。其后，此人在台面上常与王阳明站在一起，暗中却陷害王阳明。

7 给事中：明朝置给事中，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

8 辅仁：“辅仁”一语取自《论语·颜渊》中的“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句，意思是指培养仁德。

9 藩、臬：指藩司和臬司，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

10 无学祖元（1226—1286）：别号子元，宋代临济宗高僧，浙江宁波鄞县人。

11 奥州：日本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四县的旧国名。

12 夷：《广雅·释诂》中有“夷，灭也”之句。明夷，意即阳光隐退。

13 考功清吏司：明清时期吏部下设的机构，负责文职官员的议叙与处分。

14 薛侃(1486—1546)：字尚谦，号中离，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人。

15 忠恕：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终之意。“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16 教授：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开始设教授。元代各路、州、府儒学及明、清两代的府学都设教授。

17 提学金事：主管一省学政的官员。

18 举：明代沿袭察举制的一种做法。察举制最早始于汉代，“举”即向朝廷推荐地方上的孝廉之士或者有才之人。

19 蔡希颜：名宗宪，别字希渊，号我斋，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人。明代官员、学者。

20 草萍驿：在明代，草萍驿是在广信府的管辖之内。

21 璞玉：指挖出之后，未经雕琢的玉石。

22 《清庙》：出自《诗经》。古代宗庙祭祀时，用以赞美先祖的诗或曲。在此段中，作者冈田先生在理解“一唱三叹”时出现了一些偏差。按照通用的解释，“一唱三叹”是指一人唱三人和，喻指音乐简单而质朴，后来用来形容诗词委婉而含义深刻。而冈田先生对“一唱三叹”的理解是一人唱，三人赞叹。

23 三闾大夫：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特设的官职，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

24 分宜：今江西省新余市西部。

25 宣风馆：今江西省萍乡市东部，即萍乡市和宜春市的交界处。

26 萍乡：今江西省宜春市西部。

27 醴陵：今长沙县东南部，近湖南省省境。

28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南宋著名理学家。汉州绵竹人。岳麓书院创办者，丞相张浚之子，幼时师从胡宏，得理学真传。后执掌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多年，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29 沅江：又称沅水，源自贵州省云雾山鸡冠岭，流经黔东、湘西，至黔城以下始称沅江，入洞庭湖。

30 平溪卫：位于今天贵州的玉屏县。

31 兴隆卫：位于今天贵州的黄平县。

32 清平卫：后来曾先后改名为清平县、炉山县，位于今天贵州的凯里市。

33 与鹿豕游：取自《孟子·尽心上》，“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

34 生生：易学自然哲学的重要概念，出自《易·系辞上》中的“生生之谓易”。孔颖达注释为：“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

35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36 记籍：所收藏物品的名录本。

37 阅十有九月：此处原文中记载的时间为十九个月，前文中王

阳明自己写的是七个月，版本不同，时间出现差异。

38 “传为案，经为断”：“传”指《左传》，“经”指《春秋》，意指《左传》中有对事件的详细介绍，而《春秋》则是对事件的评定。

第八章

龙场教化

蛮荒之地建造居室

王阳明的品德感化了龙场的百姓，他们逐渐和王阳明亲近起来。王阳明也积极学习当地语言，努力和他们交流。当时王阳明住在石窟中，潮气较重，对健康不利。当地百姓就提议给他建间小木屋，王阳明自然非常高兴。在大家伙儿的帮助下，小木屋不到一个月就竣工了。

为此，王阳明特意作了两首诗，题为《龙冈新构》（《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据此可以想见小木屋的一些基本情况。

滴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
凿岷薙林条，小构自成趣。
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
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蒔。
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
轮奂非致美，毋令易倾敝。

*

营茅乘田隙，浚旬始苟完。
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
锄荒既开径，拓樊亦理园。
低檐避松偃，疏土行竹根。

勿剪墙下棘，束列因可藩。

莫撷林间萝，蒙笼覆云轩。

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

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

据此可以得知，依靠众人凿岩取石、斩枝取木，才最终建成。小木屋的造型和周围的景致也非常协调。

此外，屋子周围还遍植花草。打开窗子，远处的群峰一览无余；俯瞰下去，山麓中的山寨错落有致。尽管木屋没有高楼大厦那么美观，甚至显得有些寒酸，但来客可以在里面轻松自在地休息。屋子是众人在农活间隙帮助建造的，所以盖了十天才露出雏形。为了避开一棵卧松，故而建得比较矮。在疏松的土里埋下几根竹子，同时保留墙下的荆棘，并把它们修剪成列，做成篱笆。藤蔓爬到屋子上，自由自在地生长。另外开辟了一条小路，做了一个小农圃。

王阳明在《龙冈新构》的序中提到当时有弟子建议将小木屋取名为“龙冈书院”，但他觉得不妥，于是命名为“何陋轩”，并且还作了一首《何陋轩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叙述了定此名的缘由。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缦，然此犹淳丽质素之遗焉。盖古之时，法制未备，则有然矣，不得以为陋也。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矱，将无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谓然也。

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

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蒔之以卉药，列堂阶，办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俱。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禁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粝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谓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周易》中有所谓“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意指通过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感化百姓，把百姓引入正途，这样的行为叫作“神化”，它是称颂伟人能够用伟大的品格来感化人的词汇。孔子是圣人，故其所到之处，都能用自己的品德“神化”周围的百姓。因此，从孔子口中说出“何陋之有”，乃是理所当然的。

通过上文的《何陋轩记》可以看出，王阳明将孔子视作自己的榜样，同时希望通过亲身实践，用自己的品德来感化龙场百姓。王阳明是一位重视体验的思想家，且重视的是在其他儒学家身上很难看到的切实体验。不难想象，王阳明通过切实体验凝练出的哲学思想，不仅感化了当时的儒者，也感化了龙场的百姓。

尽管王阳明自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孔子”，但在结尾处他还是谦虚地说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钟伯敬对此评价说：“若无此语，几近夸耀。”

虽然王阳明想以圣人自任，但最终还是没敢以此自居。

建造君子亭

何陋轩修好之后，王阳明又在前方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为“君子亭”，并特意写了一篇《君子亭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竹子的主干、枝叶和风姿等代表了君子的四大美德——君子之德、君子之操、君子之时和君子之容，所以竹子又被雅称为“君子”。由于亭子周围遍植竹子，所以王阳明特意给此亭取名为“君子亭”。

成为君子是王阳明的理想，而且门人弟子也一致认为王阳明就是君子：“夫子盖自道也。吾见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慑，处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于朝，今也行于夷，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时乎？其交翼翼，其处雍雍，意适而匪懈，气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盖谦于自名也，而假之竹。虽然，亦有所不容隐也。夫子之名其轩曰‘何陋’，则固以自居矣。”

对此，王阳明回答说：“嘻！小子之言过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于我哉？抑学而未能，则可云尔耳。”

通过弟子们对王阳明的极力称赞，可以想见王阳明应是一位世间少有、具有高尚品德和巨大感化力的大儒。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超群的感化力，主要有两点：一是王阳明自身的人格魅力；二是王阳明的思想是通过实践得来的，故而以切实体验为主旨，以心为根本。

前文已述，王阳明心学是对陆九渊心学的继承和发展。陆九渊拥有超常的感化力，这与他向“生机勃勃”的内心求理是分不开的。陆九渊的弟子曾说，陆九渊非常高兴时，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授课时，陆九渊不是通过对书籍的解释，也不是通过理论来说服对方，而是通过人格与人格、心与心的交流来感化对方。朱熹的授课方式与陆九渊的完全不同，他是以对书籍的详尽解释以及精微的理论分析来教诲弟子的。

通过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讲义，以及他的“断扇讼”典故，可以窥见他在教化弟子时的真性情。

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前往南康拜访朱熹。朱熹率领一群僚友弟子来到白鹿洞书院，请陆九渊讲授经义。陆九渊就向众人讲授了《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小人义利”一章，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陆九渊的授课深深地触动了众人，使得听众无不感动涕零。因为陆九渊的一字一句皆发自肺腑，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所以他的授课才能如此打动人心。

而“断扇讼”的典故，来源于陆九渊与杨简的一次对话。

陆九渊中进士之后，曾前往浙江富阳访学。一天晚上，富阳县主簿杨简与他相会于双明阁。杨简觉得陆九渊的心学还没有触及“本心”，于是就问他：“如何是本心？”

陆九渊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察觉到的日常的道德心即是“本心”，除此之外别无“本心”。当时，偶有扇商诉讼事件发生，于是陆九渊就援引此案例说：“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

杨简听后并未省悟，继续追问道：“仅此而已？”

陆九渊厉声反问道：“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吗？”

至此杨简才算省悟。

王阳明对陆九渊所说的“本心”非常熟悉，他对别人的感化力也要比陆九渊大得多。

建造宾阳堂和玩易窝

宾阳堂位于君子亭南侧，坐西朝东，为王阳明的迎宾处。王阳明为何给此堂取名“宾阳”呢？据王阳明所著《宾阳堂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记载，此名是出自《尧典》中的“寅宾出日”句，意指“向东方日出之处行礼，谦虚谨慎，勤奋不懈，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君子”。

东正堂评价此文称：《宾阳堂记》与先生在龙场期间著述的其他文章相比，更加体现了先生的深思熟虑之处。文章整体古色苍然，在最后使用韵语结尾，犹如隐语一般，其中多难语，实乃非常罕见之名文。宾阳堂是先生迎接往来宾客之处，故意在文中玩弄难语，只是为了让贤能智慧之士能够有所悟有所感。至于庸愚之士，反正他们也看不懂，这样或许更好。（《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三·记》）

据《玩易窝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记载，王阳明在龙场的一处山麓挖了个洞穴，将其改造成居室，自己在里面读《周易》。王阳明想起昔日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期间，曾潜心读《周易》，悟得其理，从而忘其忧，不知老之将至。后来孔子也曾读《周易》，为求得深奥之理，甚至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前文已述，自从王阳明被刘瑾投入监牢之后，他就时常阅读《周易》。由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推断王阳明的“龙场顿悟”应该和他当时研读《周易》有很大关系。

东正堂指出：“王阳明向来以悟道为趣，但是《阳明先生年谱》只记载了其‘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接着又叙述了他恢复表彰古本《大学》和确立‘知行合一’卓然之说，而丝毫未提及先生深入探究《周易》之事。但据此篇可以看出，先生当时的修行重在《周易》之理，后来又在《周易》的基础上，发现领悟了《大学》之要旨。”（《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三·记》）

王阳明在龙场时，不仅写了前文中已经叙述过的《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和《玩易窝记》，还写有四篇文章：《远俗亭记》《象祠记》《卧马冢记》和《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这些文章反映了王阳明的思想，皆为后世文章之典范。

宪副¹毛应奎将从官署归来用餐之亭命名为“远俗”，王阳明为了向其解释“远俗”的本意，特意写了一篇《远俗亭记》。王阳明在《远俗亭记》中写道：

俗习与古道为消长。尘嚣溷浊之既远，则必高明清旷之是宅矣，此“远俗”之所由名也。

然公以提学为职，又兼理夫狱讼军赋，则彼举业辞章，俗儒之学也；簿书期会，俗吏之务也；二者皆公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远俗”，俗未远而旷官之责近矣。

君子之行也，不远于微近纤曲，而盛德存焉，广业著焉。是故诵其诗，读其书，求古圣贤之心，以蓄其德而达诸用，则不远于举业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学，是远俗也已。

公以处之，明以决之，宽以居之，恕以行之，则不远于簿书期会，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远俗也已。

苟其心之凡鄙猥琐而待，闲散疏放之是托，以为“远俗”，其如远俗何哉！……是故苟同于俗以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远于俗以求异者，尤非君子之心。

王阳明对“远俗”的理解与宋代儒家胡安定（胡安国）所说的“心远”大致相通。胡安定是程颐的高徒，他在为杨时写的墓志铭中，评价杨时说：“果何求哉，心则远矣。”

“心远”出自晋代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的《饮酒》诗。此语用来形容隐士的心境非常贴切，但是杨时是一位儒学家，胡宏觉得用这样的词语形容杨时并不合适，于是就问胡安定：“何故载‘果何求哉，心则远矣’一句？”

胡安定回答说：“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决非慧远所能招，刘、雷²之徒所能友也。观其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可知其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龟山之贤可想见矣。”

胡宏又问“心则远矣”是什么意思，胡安定回答说：“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虑及后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谓心远矣。”（《伊洛渊源录》卷十）

德化的力量

王阳明在《象祠记》中强调：人性本善，世间任何人都可以被感化。

据《尚书》和《孟子》的记载，舜的同父异母弟弟象一直想杀死哥哥，是一个不悌的弟弟。父亲瞽叟无道，象不但不去劝阻，反而还鼓动其又做出对舜的不慈之举，因此象又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但是，象后来也被舜的仁德所感化，开始虚心向善。舜继位之后，封象于有庠³。后来，有庠民众还为象建了祠堂，世代祭祀象。但非常遗憾，在唐代，象祠被毁。

象祠原位于灵博山，居住在当地的苗族百姓把象当作神来供奉。宣慰使⁴安君受苗族百姓之请，决定重修象祠，于是委托王阳明为此作记。

王阳明在《象祠记》中写道，象被舜感化之后，被封于有庠，他任贤使能，安于其位，恩泽于民，使得政治清明，所以在象去世后，百姓一直怀念他。他在《象祠记》的末尾写道：“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由此可见，王阳明决意修行品德，使自己成为一位有德的君子，能够感化龙场的“蛮夷”。

孝子祭祀

据《卧马冢记》记载，卧马冢位于宣府城西北十余里处，是都宪王怀来为其父⁵修建的陵墓。宣府城是明朝九边⁶之一，也被称作宣化⁷，位于河北境外，统辖延庆县至大同县的长城沿线地区。

王怀来乘马到宣府城外为父亲挑选墓地，正当犹豫不决、准备返回时，胯下之马却在卧马冢处跪卧不起。王怀来见此情景，决定将父亲安葬于此。此处地形和土质良好，草木茂盛，鸟禽集聚。村民都认为这是王怀来的孝行感动上天所致，于是将墓地所在地称为“卧马”。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谪居龙场，王怀来出任贵州巡抚。王怀来到贵州后，王阳明特意前去拜见。王阳明从王怀来的乡党处听闻了上文中的趣事，当时一位同坐的客人说：“公其休服于无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协兆，峻陟三公。公兹实类于是。”

王阳明反驳说：“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终，惟安亲是图，以庶几无憾焉耳已，岂以徼福于躬，利其嗣人也哉？虽然，仁人孝子，则天无弗比，无弗佑，匪自外得也。亲安而诚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则气和，和气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于无尽，固理也哉！”

后来，王阳明又见到王怀来，二人谈到此事，王怀来觉得王阳明所言正合心意，于是请他记录成文，用来教育自己的子孙。很显然，王阳明认为选到好墓地就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的想法是愚昧和错误的。

阳明的政教思想

《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是王阳明拜访月潭寺时所作。月潭寺位于隆兴南部，在一块巨大岩石的下方。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中赞叹“天下之山，萃于云贵”。月潭寺所在之处风景优美，但是道路艰险，旅行非常不便，旅客来到此地往往要留宿。此外，官府和苗族百姓每年还会在此举行例行活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月潭寺渐渐被荒废了。云南宪副朱玘⁸到达此处之后，爱上了岩石的美丽景致，怜悯行人的艰辛，再加上当地百姓的苦苦请求，于是决定在岩石上方新建月潭寺。此外，朱玘还决定在月潭寺旧址上用原有的

旧木材等修建一所公馆，以备来往行人休息。恰巧王阳明当时也经过此地，于是就被邀写一篇记文，以记录相关事宜。

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中写道：“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他律主义”的排斥，同时也可以窥见王阳明政教思想的端倪。

教化诸生

王阳明生来喜好山、水、泉、石，即使是谪居龙场期间，他也是经常游山玩水，吟诗抒怀。很多学子因为仰慕王阳明的学识前来求教，王阳明就和他们一起畅游山水之间。在前来聚会的诸生中，有一位叫冀元亨⁹，后来在宸濠之乱时不幸遇难。

王阳明对诸生的教化和其他儒学家完全不同，他曾写过一首诗，题为《诸生来》（《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叙述了他对诸生的教化。

简滞动罹咎，废幽得幸免。
夷居虽异俗，野朴意所眷。
思亲独疚心，疾忧庸自遣。
门生颇群集，樽俎亦时展。
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腆。
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岫。
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
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
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

此外，王阳明还写了一首题为《诸生夜坐》的诗，诗中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教化特色。

谪居澹虚寂，眇然怀同游。
 日入山气夕，孤亭俯平畴。
 草际见数骑，取径如相求。
 渐近识颜面，隔树停鸣驺。
 投辔雁鹜进，携榼各有羞。
 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
 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
 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
 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
 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
 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

王阳明在教化诸生时，并不是设置一个讲席，然后坐在中间向大家诵读经书，而是和诸生一起游山玩水，听风赏月，饮酒弹琴，畅快而歌，追求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教书育人。王阳明非常喜欢这种“随处点化人”的教学方法，并且终生都未曾改变。王阳明之所以采取这种教学方法，可能和他以心学为宗的诉求及他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生活也有一定关系。

那么，王阳明在龙场教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上文两首诗中所提到的“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和“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

这八句诗体现了儒者顺应时境、怡然自得的超脱之情。对王阳明来说，这种境界其实就是孔子和曾子的“喜乐自得”之境，亦即诗中所谓的“风沂兴”。

“风沂兴”是孔子高徒曾子所追求的境界。据《论语·先进篇》记载，有一次，孔子让自己的四位弟子各抒其志，曾子之外的三位弟子都叙述了自己的经世抱负，唯独曾子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罢，佩服不已，称自己和曾子的志趣相同。

王阳明当时觉得，要想追寻儒学之道，就必须超脱名利之念。他希望持

有此志的学子能够汇集到自己位于龙场的茅草屋中。在一首题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中，王阳明表达了这一心境。

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
如何百里来，三宿便辞去？
有琴不肯弹，有酒不肯御。
远陟见深情，宁予有弗顾？
洞云还自栖，溪月谁同步？
不念南寺时，寒江雪将暮？
不记西园日，桃花夹川路？
相去倏几月，秋风落高树。
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
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
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

龙冈书院的学规

没过多久，仰慕王阳明的诸生便陆陆续续地汇集到了位于何陋轩的龙冈书院，其中大多数可能是“蛮夷”子弟。王阳明向他们出示了必须遵守的教条——《教条示龙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这其实就相当于书院的学规，其中包括四大项，分别是：“立志”“勤学”“改过”和“责善”。

给人感触最深的就是“立志”，全文如下：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东正堂认为，《教条示龙场诸生》确实应该是当时所作，并且一点儿也不逊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据藤堂询菟斋考证，“立志”中所引用的“昔人所言”应该是出自宋代

徐积之手。此外，东正堂还评价此教条说：“用贱恶和敬信来阐释立志，实乃画龙点睛之笔。”（《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六《续编一·杂著》）。

徐积，字仲车，三岁丧父。因为父亲名石，所以徐积终生未曾使用石头器具。行路之时，凡遇石头，必绕而避之。徐积对母亲也极为孝敬。最初师从胡安定¹⁰，元祐初年出任楚州教授。政和年间去世，赐谥“节孝处士”。著有《节孝语录》和《节孝集》。

王阳明在“立志”中引用徐积的话语，其实是想告诫诸生要正视自己的“良心”，振奋自己的精神。王阳明在龙场引用此语，似乎也预示着他晚年将会创立“良知”说。

王阳明提出“立志”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圣贤。自宋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提倡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圣贤，但是首先强调做学问先要“立志”的人却是王阳明，这也是阳明学的一大特色。

在上文中，王阳明并没有让大家先去了解何为善、何为恶，而是指出任何人都是喜欢善讨厌恶，从而让大家要去行善，不要去行恶。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认为圣人和常人对于善恶的感知和判断没有任何差别，并且相信任何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后来就演变成“良知”，王阳明认为无论贤愚都具有良知，并且还鼓舞大家，只要“致良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因此可以这样说，在“立志”这一教条中，已经可以看出“良知”说的萌芽。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四十六岁。是年，朝廷派他前往江西南部平定巢贼。王阳明为了教化民众，特意发布了《谕俗四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其中也叙述了和“立志”这一教条类似的内容：“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即使在蛮夷之地，也能教化前来求教的诸生，这对身陷困顿的王阳明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对王阳明来说，被贬谪到龙场担任驿丞非自己所愿，如果

能够辞职的话，他也许早就辞职返乡、和弟子们一起谈经论道了。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因为龙场百姓的关爱以及诸生的到来，才使得王阳明能够在蛮夷之地隐忍自重，也才使他能够保持一份好心境，以静待斥退奸人、起用善人的时机到来。王阳明在《龙场生问答》（《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中，通过与龙场诸生问答的形式，叙述了自己的这一心境。

书院学的历史

上一节中已经提到，王阳明在龙场开设了书院，并在此教授诸生。书院教育从宋代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当时的书院不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资兴建的，而是由民间发起创建的教育机构，因此书院和政府设立的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等机构在教育目的上存在一些差异。

科举制度在唐代已经变得非常完善，此后的历朝历代均沿袭这一制度，并最终形成学校教育是培养官吏的预备教育的观念。

书院在唐代后期出现，经五代至宋代达到顶峰。五代是一个战乱纷飞的时代，很多学校都遭损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选择在风景优美之地开设书院，教育弟子，这就是书院教育的起源。

到宋代后，战乱停息，天下太平，官立学校又得以在全国广为开设。此外，书院教育也日趋兴盛，由名士出任书院院长（正式的称呼应该是洞长或者山长），政府对此也大加赞赏，于是书院便逐渐在全国普及开来。在书院中，大学者亲自教育弟子，内容充实，故而甚至一度出现书院比官立学校更受欢迎的情况。

宋代的著名书院共有四所：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应天府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州（今衡阳）的石鼓山，最初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由当地名士李宽所创建。北宋初，朝廷赐额“石鼓书院”。宋仁宗时，书院一度荒废。到南宋孝宗时，又在原址上复院扩建。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山麓，最初是唐代名士李渤的旧宅。李渤放弃

科举考试之后，曾经隐居于此。五代南唐升元年间，李善道将李渤旧宅开辟为学馆，在此教育弟子。宋太宗时，白鹿洞书院一度达到鼎盛。白鹿洞书院几经兴废¹¹，宋真宗时修缮过一次。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郡太守，向朝廷提出修复白鹿洞书院，最终获批，从而使白鹿洞书院再一次得到修缮和复兴的机会。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大力教育弟子，使白鹿洞书院再次名扬天下。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潭州的岳麓山下，宋太祖开宝九年，由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宋真宗咸平年间，李允则出任潭州太守，在任之际，扩大了岳麓书院的规模。南宋孝宗执政时，朱熹出任潭州太守，便仿照《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了内容更加充实的《岳麓书院学规》。当时来此求学的学子众多，据说还曾出现过不能悉数接收的情况。

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戚同文旧宅的旁边。商丘在宋代称南京，归应天府管辖，所以该书院取名为应天府书院。

以上书院都持有院田，所收田租用来支付日常费用和学生的食宿支出。院田，有些是个人捐赠的，也有一些是国家划拨的。此外，书院所藏书籍多由个人捐赠或者国家提供，多被用作讲学资料或教科书。

每所书院都有自己的学规，在这一点上和学校没有什么差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二者的学规都很严格。此外，在书院内供奉孔子及其十哲弟子的塑像也成为一种惯例。

书院最早由民间发起，所以在讲课内容方面比较自由。有时，一些学者会讲得比较尖锐，甚至批评时政。明末繁荣一时的东林书院就盛行批评时政，朝廷认为东林学者是在聚众结党、攻击朝政，所以称他们为“东林党”，并对他们加以镇压。因此，东林学者和明朝政府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也成为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受明朝前车之鉴的影响，清政府决定强化对书院的控制，规定每个省只能开办二十所官办书院。但不可否认，宋明时代书院学的盛行对新儒学的兴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初的学校教育与之前的相比出现了不同的倾向。宋仁宗庆历年间，名

臣大儒汇集朝廷，造就了“庆历之治”的盛世。唐朝的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吏时，重在挑选巧于诗文之人，而宋代在选拔官吏时，则重在挑选德行优良之人，此外还必须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

宋代学者胡安定，曾在苏州和湖州教育弟子。胡安定教书育人的目的不是让弟子精通典籍的训诂通释，也不是让弟子巧于诗词文章，而是让弟子“明人伦”，他认为“人伦”是基于人的本性，而且是天命所为，此外还注重培养弟子兼备“修身养性”与“经世致用”。胡安定的教育目的，体现的是“明体适用”，即首先明白人的本性是什么，然后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后来，宋朝政府也采用了胡安定的这一教育方法。

王阳明在推行“新法”时，也采用了胡安定的这一教育方法。他以附注的经书为基础，实行严格的选拔考试制度，但遗憾的是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胡安定去世之后，一部分儒者对他的精神理解得较为透彻，不再拘泥于科举考试，而是把人格的养成当作自己做学问的第一要义，并且反对把做学问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不过对大多数儒者来说，他们做学问的目的还是为了当官，为了出人头地，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私欲。

仔细想来，当官和出人头地还是不应该被视作做学问的根本目的。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当官或者出人头地，那么就会成为孔子所言的“为人¹²”之学，而真正的学问应该是“为己”之学。有“心”的儒者都会把“修身养性”和“经世致用”当作自己做学问的目的。因此，书院教育并不是培养官吏的预备教育，它的目的不是要把人培养成官吏，而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心，并且重在学以致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那就是书院教育就是“人伦”教育。

“人伦”教育传授的是“道德律¹³”，而不是一种束缚人的教育。人的内心都具有先天的道德性。人伦道德的实践是基于人的“本性”，是“本性”的自然流露。但是，任何人都具有私欲，这种私欲遮蔽了人的“本性”，使“本性”不能充分发挥。如果严格遵循“道德律”，切实追求人伦道德的实践，那么人的“本性”就会得以恢复。

然而，一个人的人伦道德即使再完美，如果他不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和自然界的复杂法则，那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在做学问的时候，不仅要加强自我人伦道德的修养，同时还要涉猎广博的知识，但最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人伦大纲，并对其进行切实实践，同时还要努力舍弃功利之念。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了“五伦”（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时还指出了“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认为，学、问、思、辨是知性工夫，是格物穷理的必要条件。“笃行”则涉及自身的修身养性以及日常的处事接物等。

关于修身养性的要领，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言忠信，行笃敬。”用《周易》的话说就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关于处事接物的要领，用汉代董仲舒的话说就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文中告诫弟子不要把做学问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

朱熹接着又写道：“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告诫弟子们遵循人伦必须要靠自律。

朱熹还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学规，认为刻意做出学规让诸生去遵守，其实是违背了古人的趣旨。古人施教时，相信人的本性，所以不会刻意去做学规。

在朱熹看来，遵守学规并不是一种痛苦的事情，而是一种发自本性、发自内心的行为，外界不应该加以强制性的要求。朱熹为了表明学规不是“他

律性”的规则，还特意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不用“学规”一词，而改用“揭示”。

朱熹把理想看得过高，并且极端厌恶玷污理想的行为，所以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存在一些要求过于苛刻的地方。虽然儒学本来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学说，但是与王阳明比起来，朱熹还是把理想标榜得过高，显得过于坚守。朱熹的“唯理主义”和“理气二元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在朱熹的教育实践中难免会有“师严道尊”的气氛。

王阳明与朱熹不同，他秉持的是情意主义，重在鼓动和唤起人的道德心。例如，在前文所述的《教条示龙场诸生》的“责善”一节中，王阳明指出：“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

在“责善”的最后，王阳明写道：“诸生责善，当自吾始。”据此可以窥知王阳明的教育方针。王阳明营造的书院教育的气氛与其说是教师在传授学问、指导诸生，还不如说是教师和诸生在一起相互学习、彼此“乐道”。

阳明与书院教育

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恢复汉族王室之后，立即设立国子监¹⁴，培养官吏。明朝的教育内容和元朝相同，依然以朱子学为中心，陆学等其他儒学都被划入禁止之列。洪武帝通过这种思想控制，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独裁权力体制。

明成祖永乐帝继承明太祖的教育政策，大力扩张国子监，以接纳更多学生，但其教育目的仍和明太祖一样。当时，很多科举及第者都是出自国子监。明代的科举考试以朱子学为中心，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来控制 and 弹压人们的思想，限制学术自由。因此，一旦有人批判朱子学，便立即会受到严厉惩罚。

此外，明成祖还安排人员编纂了反映程朱理学思想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¹⁵，并将其作为官定读本和朝廷科举考试的准绳。但是，后世对这些书籍的评价却很差。明朝的学校教育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是为了出人头地，这和宋代之后的书院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明成祖死后，学校教育开始衰退，大学也逐渐被荒废，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得以保留，而且还在各地刮起了特权风，这也成为明代政治堕落的一大要因。王阳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为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官学的没落，才使得王阳明能够倾力于书院教育。

在明初，尽管学校教育盛行，但书院教育并没有绝迹。例如，在山东有洙泗书院和尼山书院，在江苏有濂溪书院，但遗憾的是，这三所书院在后来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到明朝中叶，王阳明和湛甘泉站出来倡导圣学，此后，

书院教育又逐渐兴盛起来。

据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¹⁶考证，与王阳明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共有七所，分别是龙冈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稽山书院、南宁书院和敷文书院。接下来，就参照多贺秋五郎的调查资料《王阳明和明代的教育制度》（《阳明学大系》第一卷《阳明学入门》）一文，对这七所书院作一简单介绍。

一、龙冈书院

前文已述，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创建龙冈书院。王阳明曾在此教育诸生，并且还做了《教条示龙场诸生》，用来约束和指导诸生的学习。

二、贵阳书院

正德四年（1509年），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¹⁷是席元山，他比王阳明年长十一岁。有一次，他前往龙场拜访龙冈书院，想向王阳明请教朱子学和陆学的异同，但王阳明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悟。席元山起初没有弄明白，于是王阳明就列举经书中的语句，向其一一说明，最终令席元山信服。后来，席元山又多次拜访王阳明，对他的学问佩服不已。当时的贵阳书院已经衰败，于是席元山就和宪副毛应奎商量，决定修复贵阳书院，邀请王阳明来做书院的洞主，他还亲自率领贵阳诸生向王阳明行弟子礼。贵阳高官亲率诸生师从王阳明，这一事件使得王阳明的声名在边境地区传诵开来。

席元山后来升任礼部尚书，王阳明对他也非常敬爱。嘉靖六年（1527年），席元山去世，王阳明还亲自为其写了祭文《祭元山席尚书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九）。在祭文中，王阳明称颂席元山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是真正的豪杰之士、社稷之臣，还称赞他做学问没有沉溺于功利辞章，且认真

修行身心体认之学，超然远览，继承了圣贤之道。

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给席元山写了一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其中提到席元山曾著有《鸣冤录》，曾给王阳明寄了一本。但非常遗憾的是，《鸣冤录》已经失传。宋末之后，朱子学一统江山，陆学日渐衰退，世人已无心顾及陆学。席元山面对这样的情形，内心非常不满，于是著《鸣冤录》，所以此书应该是一本为陆学辩护的书籍。而且，王阳明在信中也称赞陆学是“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第一人”。

三、濂溪书院

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得以赦免，升任庐陵县县令，后来又不断得以擢升，历任各职。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再次回到江西。在赣期间，王阳明修复了位于赣州的濂溪书院，并在此教授弟子。

当时江西省内各地发生叛乱，王阳明受命回江西平叛。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到濂溪书院讲学。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有一日，王阳明取得大捷，特意设宴款待诸生，在宴席上说：“始吾登堂，每有赏罚，不敢肆，常恐有愧诸君。比与诸君相对久之，尚觉前此赏罚犹未也，于是思求其过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与诸君相对时无少增损，方始心安。此即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烦口舌为也。”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在面对诸生时，始终抱持推心置腹的态度，并且以身作则，让诸生切记“反省自慎”。

四、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最早是由唐代名士李渤创建。在宋代，朱熹出任白鹿洞书院洞主之后，书院一跃成名。从明朝初建到王阳明所处的时代，白鹿洞书院又历经两次修复。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名山——庐山五老峰的山麓处，因此也被称作“庐山国学”。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王阳明曾于南昌召集弟

子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授业。

五、稽山书院

稽山书院位于浙江绍兴，离王阳明的家乡余姚不远。正德十六年（1521年）八月，王阳明归省返乡，在家乡度过了好几年时光。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的众多门人弟子汇集于绍兴，就连绍兴府太守南大吉也来拜王阳明为师。南大吉将已经荒废的稽山书院修葺一新，迎请王阳明前去讲学，自己也在一旁认真听讲。

山阴县令吴瀛不仅出资修复书院，还新建了一所藏书楼——尊经阁。王阳明来到会稽书院讲学后，听者云集，据说前来听讲的人士有三百多人，他们密密麻麻地围坐在王阳明身边认真听讲。浙江海宁诗人董萝石当时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但依然于嘉靖三年春特意到会稽书院听王阳明讲学。

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中写道：“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指出圣人之“六经”是“吾心”之常道，因此应该向“吾心”之内求“六经”之实，而不应该去寻求“文义之末”。

六、南宁书院

南宁书院位于广西南宁市。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五十七岁，尽管当时身体已经因结核病而变得衰弱不堪，但他依然拖着病躯，前往广西镇压叛乱。王阳明来到广西之后，对当地的教育非常重视，在思恩、田州和南宁设立学校，并且还创立了南宁书院和敷文书院。

七、敷文书院

敷文书院位于广西梧州，王阳明主要委托弟子季彭山来负责该书院的教

育。季彭山也是一位著名的儒学家，曾经提出“龙惕”说。在王阳明去世之后，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良知”说，但由于对“良知”说的理解不同，产生了若干支派。其中有一派主张良知现成¹⁸，他们崇尚“自然”，甚至陷入放纵。

季彭山对此深表忧虑。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具备敬畏之心，才能求得真正的“良知”。此外，他还指出，宋儒所提倡的“戒慎恐惧”工夫在当时依然是必要的。以上所述，其实就是季彭山“龙惕”说的主要内容。季彭山的性格严谨直率，故而深得王阳明的信赖。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王阳明不仅在各地的书院讲学，而且还亲自创办书院，振兴书院教育。他还受人之托，为平山书院、东林书院、紫阳书院、万松书院这四所书院撰写书院记，以激励书院教育者。在这四篇书院记中，王阳明不仅介绍了各个书院的由来，而且还指出了书院教育的本来目的，希望各书院能够正确教育弟子。

阳明的教育理念

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全人教育，做学问的目的是成为圣人。人虽然有贤愚之分，但就其本性来说却是道德的，关键是看这种道德性是否完全。因此，不同的人成为圣人的难易程度也不同，但只要通过努力，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总而言之，书院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入拥有完完全全的道德性和理想化的人格。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特意提到“五伦”，其实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书院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科举考试，也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更不应该是为了巧于诗文辞章。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书院教育的目的，那就是“明人伦”。朱熹的好友张南轩在《岳麓书院记》中曾明确阐述过这个问题，朱熹对此也大加赞赏。

王阳明称赞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不过王阳明认为，朱熹的“五伦”其实就来自于“吾心”，也正因为如此，朱熹的“揭示”之主旨才能一以贯之，只不过朱熹没有充分言明此点罢了。在坚持“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和“吾心之常道”的王阳明看来，如果朱熹的揭示不是“心学”，那他的学说就注定会变得支离琐屑，变得缺乏连贯性。

王阳明之所以将朱熹的“学规”视为心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是这份“揭示”并不是基于“他律主义”和“戒律主义”来制订的。前文已述，朱熹为了表明自己的“学规”并不是基于“他律主义”和“戒律主义”的产物，而特意将其称为“揭示”，而不是“学规”。但是，如果认真思考一下朱熹

的学术思想的话，就会发现朱熹是极其强调道德和理法的，所以他制订的“揭示”也势必会存在“他律性”和“戒律性”的倾向。然而王阳明却极力主张朱熹的“揭示”是存于“吾心”的，是“自律性”的，而非“他律性”的。而这一点，恰恰反映出了王阳明自己的教育态度。

王阳明谪居龙场之际，曾有人向他请教有无神仙的问题。王阳明在回信中指出道家的神仙之道是：“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

接着他又补充说：“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远矣。”

关于有无神仙的问题，王阳明并没有直接明言，而只是强调，只要通过对存养修行的积累，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明了。王阳明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道教的神仙之道，但从其字里行间，依然能够感觉到他对道教神仙的否定。在回信中，王阳明写道：“盖吾儒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之亡也。”

王阳明认为，儒学中也存在神仙之道，并且暗示，通过修习儒学，也可以获得神仙之道，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去劝说大家专门修习儒学。

在后文中，王阳明还提到：“若达摩、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他认为，佛家出离生死、不沾染世累的境界更接近于神仙境界，不过仍有些距离。（《答人问神仙》，《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王阳明在晚年曾说：“夫道家之长生，释家之解脱，吾儒家皆可得也。”这也是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佛教和道教所追求的东西其实都包含在儒学中。

王阳明在《答人问神仙》中，还提及自己八岁时就喜好神仙之说的经历。据此可以猜测出，王阳明在年少时，身体状况就不太好。

感化思州太守

前文已述，王阳明和龙场当地民众的感情越来越深，但思州有个小官吏，因为嫉妒王阳明的声望，不时会到龙场侮辱王阳明。当地民众听闻此事之后，都非常气愤，就聚到一起把那个小官吏痛打了一顿。后来，思州太守向朝廷报告了此事。宪副毛应奎派人来到王阳明的住处，向他晓喻祸福利害，劝他尽快赔礼道歉，但是王阳明不愿意去赔礼道歉，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答复毛应奎，信中堂堂正正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回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陵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恨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

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

废逐小臣，所守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

凡祸福利害之说，某亦尝讲之。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

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

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执事之喻，虽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励，不敢苟有所隳堕，则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顿首以谢！

上文中“一朝之患”和“终身之忧”是孟子所言。在《孟子·离娄下》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从书信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对毛应奎是非常感激的。前文已述，毛应奎曾和席元山一起修复贵阳书院，并且还亲自迎请王阳明前去讲学。

毛应奎究竟是何许人也？据东正堂考证：毛宪副即按察副使毛应奎，字、号不详。王阳明五十六岁时曾给宪副毛古庵写过一封信，但王阳明在龙场时仅有三十七岁。故上文中的毛宪副和毛古庵应该不是同一人。（《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四《外集一·书》）

毛古庵，名宪，字式之，号古庵，江苏武进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见到毛宪副，当时对方已经是按察副使，并且第二年就辞职返乡了。所以说，上文中的毛宪副和毛古庵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王阳明在《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中写道：“公始以名进士从政南都，理繁治剧，顾然已有公辅之望。及为方面于云、贵之间者十余年，内厘其军民，外抚诸戎蛮夷，政务举而德

威著。”

正德四年（1509年），也就是王阳明来到龙场后的第二年，毛宪副迫于朝廷之命不得不辞职返乡。同僚对毛宪副的离去都备感惋惜，于是设酒宴和他道别，有人称赞他说：“君子之道，出与处而已。其出也有所为，其处也有所乐……公于出处之际，其亦无憾焉耳已！”

还有人称赞他说：“公权孝养与出仕之轻重，出而自奋于功业。今而归，告成于忠襄之庙，拜太夫人于膝下，旦夕承欢，伸色养之孝，公之愿遂矣。而其劳国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释然而忘之！则公虽欲一日遂归休之乐，盖亦有所未能也。”

又有人称赞说：“虽然君子之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见夫有其用而无其体者也。”

王阳明听罢众人的夸奖后评价道：“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于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尽于道。终之言者，尽于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

众人对王阳明的评价都表示赞同，并委托王阳明将此事记录下来，以赠送给毛应奎。据此，也可以推测出毛应奎是个何样的人物了。

劝诫土著豪族

王阳明的名声越传越远，贵州水西地区的土著豪族安贵荣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派人给他送来了许多米和肉，并且希望派人来帮他做一些杂活。尽管王阳明坚辞不受，但后来安贵荣还是给他送来了一些金帛和马匹。安贵荣承继的是父亲的土司之职，出任宣慰，成为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最高长官，拥有很大的势力。

宣慰司是元代在各地设立的官衙，起着上行下达的作用，行中书省通过宣慰司将政令传达给各郡县，各郡县也通过宣慰司将请求上传给行中书省。在元代时，边陲之地的宣慰一般都会兼任都元帅¹⁹或元帅等官职，掌管一方军政大权。到明清时，仅在边境地区设置宣慰司，主要用来安抚少数民族。

安贵荣的祖先是火济。三国蜀汉之际，火济因为辅佐诸葛亮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历朝历代开国之际，土地都会收归朝廷。元朝建立时，火济的后裔霭翠正在贵州水西地区，于是就被任命为四川行政左丞兼顺元宣慰使。明太祖朱元璋一统天下之后，便任命霭翠的后人担任贵州宣慰使，统辖贵州各地，拥有强大的兵力。安贵荣就是霭翠的子孙（《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四《外集一·书·炎微纪闻》）。

面对安贵荣第二次送来的礼物，王阳明立即修书一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其中写道：

某得罪朝廷而来，惟窜伏阴崖幽谷之中以御魍魉，则其所宜。

故虽夙闻使君之高谊，经旬月而不敢见，若甚简伉者。然省愆内讼，痛自削责，不敢比数于冠裳，则亦逐臣之礼也。使君不以为过，使廩人馈粟，庖人馈肉，园人代薪水之劳，亦宁不贵使君之义而谅其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惧不敢当，辄以礼辞。

使君复不以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马，礼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当矣！使者坚不可却，求其说而不得。无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使君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

王阳明在信中表明了自己对待他人馈赠时所坚持的态度。《评注王阳明先生全集》的作者许舜屏评价王阳明的这一态度道：“于急难中仍坚持操守，若学问无根底，不可完成，先生真乃恪守孟子之教也。”

“孟子之教”出自孟子和弟子陈臻之间的一段问答（《孟子·公孙丑下》）。

陈臻问：“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答：“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赙，辞曰‘赙赙’。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赙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赙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王阳明为了坚守“君子之道”，坚决不肯接受安贵荣的礼物。“龙场顿悟”后，王阳明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龙场驿丞，

但也绝不屈从于权势，敢于通过“义”来让对方屈服。王阳明看透了安贵荣的图谋，所以才能用“义”来说服对方。安贵荣想增强自己作为地方豪族的势力，以图脱离朝廷的管辖。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安贵荣当时应该非常露骨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野心。

在明代，维持边境地区的统治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政府派遣“流官”²⁰去管理该地区；另外一种就是使用“土官”，即授权土著居民中权势最大的人，由他们代为管理该地区。“流官”经常变换，而“土官”则是世代世袭，并且拥有土地和人口，所以势力都非常大。

在明朝，朝廷常借助“土官”的力量去平定地方叛乱，这也导致了“土官”常常对朝廷桀骜不驯。尤其是当他们觉得自己平叛有功，而中央政府给的恩赏少时，就会为自己“抱不平”，这也是导致地方动乱的一大原因。鉴于这种情况，同时也为了增强自身的统治力，朝廷就在边境地区开设了大量的驿站，希望借此来达到削弱“土官”势力的目的。

安贵荣因为镇压贵州炉山县香炉山的苗族起义有功，被朝廷封为贵州布政使参政。但安贵荣对此任命很不满。他上书请求削减水西地区的驿站，图谋扩张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朝廷故意拖延不决，安贵荣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就谋划着直接向各驿站安插自己的势力。

他之所以送王阳明礼物，就是希望借王阳明之力，让朝廷答应自己的请求。安贵荣觉得与自己的功劳相比，朝廷给的酬赏实在太少了，于是派遣使者向王阳明详细诉说了自己的意图，希望王阳明能够在削减驿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但是，王阳明却拒绝了他的请求，还写信向他晓谕利害得失，告诫他如果不安分的话，朝廷有可能会把他调往别处，甚至还会没收其祖上的土地和人口，从而使安贵荣打消了歪念。

后来，安贵荣又想夺取水西地区另一个豪族——宋氏的势力，于是就挑唆宋氏的部下酋长阿贾和阿札发动叛乱。在这样的情势下，王阳明给安贵荣写了一封信，劝他立即出兵平定叛乱。王阳明在信中警告安贵荣：作为地方的最高长官，管辖的土地有上千里，辖地的百姓多达四十八万，背负的责任

非常重大，值此叛乱之际，如果不派一兵一卒的话，朝廷就会认为你主动放弃了“土官”的责任，就有可能直接派兵前来征讨，到时候你也肯定脱不了干系。王阳明的这封信真把安贵荣给震慑住了，他听从了王阳明的劝告，立即出兵平定了叛乱。王阳明的劝告于情于理，充满力量，着实让人敬服。

埋葬暴毙的吏目

王阳明来到龙场一年半之后，即正德四年（1509年）秋天，遇到了一件悲伤的事：一位前往蛮荒之地任职的吏目²¹在旅途中暴毙了。

一天，一位来自北京的吏目带着一子一仆前往目的地赴任。他们经过龙场时，下榻在当地的一位苗族家。王阳明透过篱笆正好看到他们，想向他们打听一些京城的消息，但由于当时正下着雨，而且天也黑了，所以王阳明就想等到第二天天亮后再过去和他们打招呼。第二天天一亮，王阳明就派人过去打探消息，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

将近中午时分，有人从蜈蚣坡上跑下来，告诉王阳明说：“一老人死坡下，傍二人哭之哀。”

王阳明回应说：“此必吏目死矣，伤哉！”

薄暮时分，又有人跑过来对王阳明说：“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

王阳明询问详情后断定吏目的儿子也死了。翌日，又有人跑过来报告说：“见坡下积尸三焉。”王阳明知道，仆人也死了。

王阳明不忍心三人的尸骸暴露于风雨中，于是就带着两名僮仆挖了三个坑，把尸体给埋了。起初，两名僮仆面露难色，王阳明便开导说：“噫！吾与尔犹彼也！”

两名僮仆听罢，联想起自己的处境，禁不住潸然泪下，纷纷表示愿意前去。王阳明和两名僮仆在蜈蚣坡旁边的山麓处挖了三个坑，把三人给埋葬了。他们还在坟前摆上了一只鸡和三碗饭，以示祭奠。

王阳明在埋葬三人时，写了一篇悼词，题曰《瘞旅文》（《王文成公全

书》卷二十五)，文中表达了对三人的哀悼之意和悲伤之情。上文所述的内容，皆取自这篇悼文的第一段。

接着王阳明又写道：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

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

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无死乎？

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

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瘞耳，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痛哉！纵不尔瘞，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

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

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

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

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

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

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

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

吾与尔遂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

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悲兮！

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

餐风饮露，无尔饥兮！

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

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

王阳明在《瘞旅文》的一开始，叙述了小吏带着儿子、仆人前往偏远的蛮荒之地赴任，结果暴毙于途中的悲惨情形。任何人读罢，都不免会生出一番怜悯之情。接下来，王阳明却笔锋一转，写道：“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

他想通过“为尔歌”来安慰对方的旅愁，然后又诉说了自己的境遇，最后又将话题转回到小吏身上，指出他暴毙的地方是一块“安乐之地”，可以“朝友麋鹿”、“暮猿与栖”，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安息。

《瘞旅文》真真切切是一篇千古名文，无怪乎东正堂评价此文几乎可以和屈原的《离骚》相比肩。

此外，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也评价此文：“文中足见先生之仁，又可见先生之智。皆言老而贪生，继而招死，然先生则未然，先生乃忘己之死，哀人之死。先生重人轻己乎？非也。若因犯权倖，进忠言而死，此乃命也，顺其则已。若因期冀远处之升斗而死，此乃愚也，岂不哀哉！故先生乃是忘己之死，哀人之死，非重人轻己也。”（《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五《外集五》）

总而言之，这篇《瘞旅文》是阐述王阳明人道主义至情的千古名篇。

注释：

1 宪副：相当于按察副使。明初所设按察司的副长官，正四品，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为从四品。其职掌一为按事分巡察兵备、学政、海防、清军、监军等；一为按地区分巡察、检视刑名按劾等。初为临时性质，后逐渐形成分巡道，故又称道员。——译者注，下同。

2 刘、雷：指刘遗民和雷次宗，二人当时均隐居于庐山，并与慧远结社共修净土法门。

3 有庠：又名鼻墟、鼻亭，位于今天的湖南省。

4 宣慰使：宣慰使司的长官，负责将朝廷的指令传达到各郡县，同时也将各郡县的请求传达给朝廷。

5 都宪王怀来为其父：王怀来的父亲是一位大卿。大卿是对掌管中央各寺的正职长官的称呼。

6 明朝九边：明初至中叶，明朝先后设置了九个重镇统领前线军士，这九个重镇统称九边镇，宣府是其中之一。

7 宣化：今天是河北省的一部分，但是在明朝时，宣化并不属于河北，位于河北北方，是商贸重镇。

8 朱玘：字文瑞，号恒斋，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直隶滦州人。

9 冀元亨（1482—1521）：字惟乾，号暗斋，湖广布政司，常德府武陵人。

10 胡安定（993—1059）：即胡瑗，字翼之，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

11 白鹿洞书院几经兴废：宋代，太祖赵匡胤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等书赐予白鹿洞书院，书院旋即名声大增，学生有近百人，该时期已被奉为北宋四大书院。980年，白鹿洞主被调走，白鹿洞书院再废。1002年，宋真宗赵恒颁发一道圣旨，全国兴起研学之风，白鹿洞书院得到修缮。1054年，白鹿洞书院毁于兵火，期间耕地又

被收回，书院无法继续提供膳食，学生纷纷离去，校舍逐渐倒塌，书院不久就停办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书院从此荒废百年。

12 为人：出自论语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指古时候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没有明白学习的真正意义。

13 道德律：出自康德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概念。康德曾说：“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认为人的自由完全在于理性为自己立法，人的内心都具有先天的道德律，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人之异于禽兽”的地方。

14 国子监：明代的初等学校叫社学，中等学校称为府学、州学和县学，而高等学府称为国学、国子学、国子监或太学。

15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这三部《大全》收集的并非都是朱熹及其门人的学说。

16 多贺秋五郎：研究中国和东南亚教育的日本专家。

17 提学副使：主管州县教育行政事务部门的副职。

18 良知现成：即良知现成派，以王畿为代表。他认为“良知”原是当下现成、先天自足的本体，它无须学习思虑，亦无须修正损益，便自然可以得到。“致良知”是未悟者的事，对于已悟者来说，根本无须致良知。因此，他们在治学与修养方法上，主张一任自然，反对戒慎恐惧，认为“君子之学，贵于自然”。

19 都元帅：元代于沿边地区设都元帅府、元帅府，置都元帅、元帅等官职，作为地方军事长官。

20 流官：像王阳明这种被贬谪过去的官员就是流官。

21 吏目：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明代于知州下有吏目掌文书，清代则知州下吏目佐理刑狱并管理文书。